

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

宋庆龄研究丛稿

盛永华 著

精誠無間同憂樂
篤愛有緣共死生

慶齡賢妻在 孫文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THE MUSEUM OF DR. SUN YAT-SEN

孫中山故居

ISBN 978-7-218-08290-5



9 787218 082905 >

定价：4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庆龄研究丛稿/盛永华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218-08290-5

I. ①宋… II. ①盛… III. ①宋庆龄 (1893 ~ 1981) -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0586 号

SongQingLing YanJiu CongGao

宋庆龄研究丛稿

盛永华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王俊辉

封面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8290-5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46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宋庆龄
(1893—1981)



童年时代与母亲倪珪贞合影。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合影。



1916年4月，与孙中山结婚后的合影。



1917年春夏间摄于上海。右一为宋庆龄；
中排坐者为父亲宋耀如、母亲倪珪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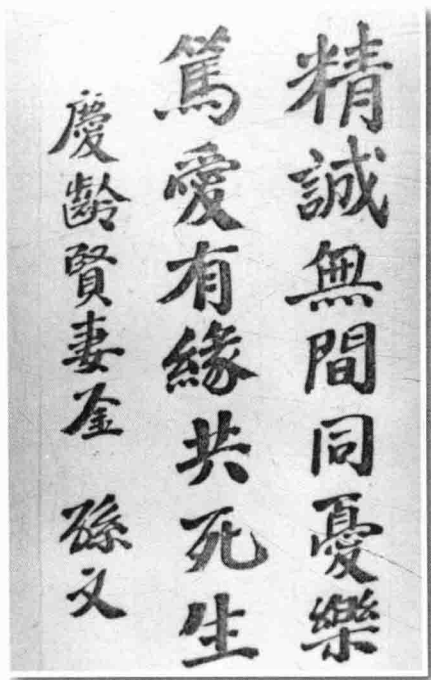
摄于上海家中书房。



1919年与孙中山摄于上海。



1920年与孙中山摄于上海。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



1924年12月，从神户赴天津时摄于船上。



1925年3月，孙中山丧礼期间的宋庆龄。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宋庆龄。



1927年，访问苏联期间的宋庆龄。



宋庆龄旅欧时摄于德国。



在上海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宋庆龄。



1938年，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时期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



抗战期间在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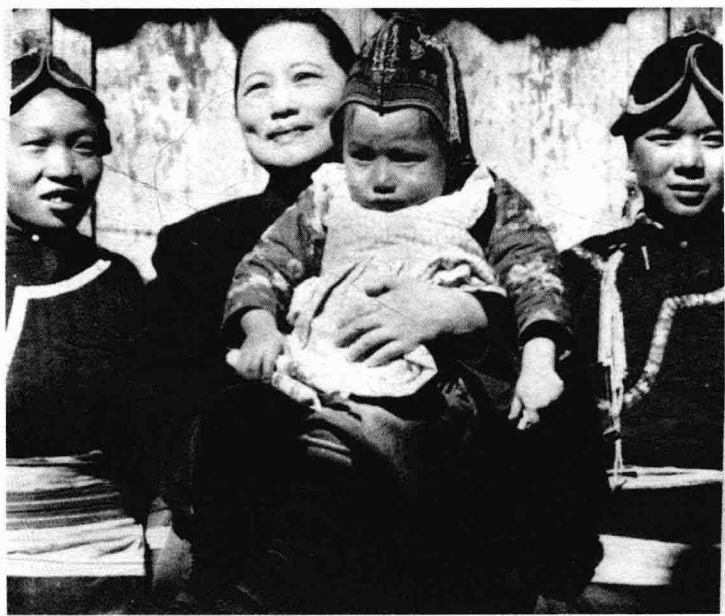




1957年11月摄于莫斯科。前排左起：郭沫若、毛泽东、伏罗希洛夫、宋庆龄。



1961年5月11日，在上海寓所会见毛泽东。



1955年11月，在云南访问少数民族家庭。

序一

金冲及

宋庆龄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周恩来总理曾称她为“国之瑰宝”。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极少，而宋庆龄当之无愧。

她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在美国受过六年教育，是一个有着世界眼光的现代女性。但她的心始终牢牢地植根于祖国的土壤中。她对祖国和人民爱得那样深，曾为它在近代的不幸遭遇而痛苦。热爱祖国，“为新中国奋斗”，是她一生能随时代的脚步而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她伟大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又是他的忠实战友和学生，是他的思想和事业的坚贞不移的捍卫者。大革命后期，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时，她大义凛然地立刻公开发表宣言，以她的特殊身份痛斥这种背叛行为。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极端困难的时刻，在那狂风暴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她顶住政治上和亲情上的种种压力，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留情地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起了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被看作国民党统治区内真理和良心的化身。她对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最初的满腔同情，进一步发展到认定只有坚决依靠最广大的民众才能真正做到救中国。她是中国共产党最真诚可靠的朋友。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的新时期，她一直为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而竭尽全力。逝世前不久，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邓小平对此作出极高评价，说：“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当得起这样评价的，能有几人？

真诚、谦虚、开朗、坦率是她性格的重要特征。那种炫耀自己、自视高人一等之类的低级趣味，在她身上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与此同时，她的心中又蕴藏着一股内在的坚毅不屈的精神力量，在原则问题上直言不讳，在危难中从容镇定，在遭受挫折、失败时百折不挠。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形容她：从外表看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罗曼·罗兰讲得好：这两个看起来很不同的方面，却如此和谐地统一在她的身上。

她对少年儿童有着特殊的深情，把他（她）们看作祖国的未来，对他（她）们充满希望。在她去世前不久，还写信给全国的少年儿童，叮嘱他（她）们：“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才。”

宋庆龄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受到世界进步人士的广泛尊敬。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生活在正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新中国，当然应该永远铭记前人，包括宋庆龄在这块国土上作出过的业绩和他（她）们的高尚品格，这是我们前进的一个精神动力。而铭记的前提是要了解。如果只有一知半解的了解甚至不甚了解，那又怎么能谈得上铭记呢？坦率地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宋庆龄的研究工作，同应该做到的相比，实在太不够了。

盛永华同志三十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对宋庆龄的研究，在1993年出版了《宋庆龄论》的论文集，以后主编出版过135万字的《宋庆龄年谱（1893—1981）》，她还担任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主任，做出不少成绩。现在，她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因此，我很高兴能为她这部文集写些话，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2011年10月于北京

序二

张 磊 林家有

每当学术界评述宋庆龄研究时，往往会提及盛永华研究员的名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30年来，她锲而不舍地身体力行，多方推动宋庆龄研究，成绩卓著，备受称道。

她与故乡——广东的学界相识已久，中介则是孙中山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她作为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到广州组稿，准备出版一部孙中山的图传。广东省社科院、中山大学历史系和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研究人员欣然应命。在她的组织下，大家努力搜集图片、撰写文字，还到上海等地广寻文物、文献资料。令我们惊叹的是一大堆图片和文字说明在她带回北京几个月后竟然成为一册内容和形式俱佳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这位编辑的诚恳、好学及严谨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开始了她与广东学术界的密切交往，直至现在。

大约在合作中，盛永华研究员就不止一次地提到应当重视宋庆龄研究。她认为广东不仅要成为孙中山研究的重镇，而且需要承担更多的宋庆龄研究的任务。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她还传达了廖承志同志强调要重视宋庆龄研究的意见，包括举办展览和编撰图录等相关建议和举措。她甚至在《广东社会科学》发表专函，呼吁推进宋庆龄研究。广东学术界回应了她的意见，在宋庆龄100周年诞辰之际，举办了首次关于宋庆龄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之后，她又推动和促成了于1994年冬在北京召开的“宋庆龄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对宋庆龄研究产生了开拓和推动的作用，盛永华研究员功不可没。

盛永华研究员的首部专集《宋庆龄论》的出版，恰与首次全国性宋庆龄研讨

会的举办同步——都在1993年初。该著作收录了她在近十年间陆续撰写的论文，甫经问世就受到广泛的关注。人们一致肯定了该书的理论和思辨性，指出它的优长在于着重对宋庆龄思想的剖析，并作出了全面、深入和中肯的评价，加强了宋庆龄研究的薄弱环节。

显而易见，思想研究对人物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人们的活动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即为思想所指导。同时，先驱者遗留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宝贵的。因为其中的精粹还能够超越时空，为后继者所传承和发扬。该书展示了宋庆龄思想发展的轨迹，对其中的重要节点作了扼要深切的探究，不少观点甚有创意。作者对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的思想关系作了新的阐述，指出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认知过程，也就是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解过程；而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后期发展，也给予了积极的影响。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守护、承传着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演进。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显示了她对民主主义的忠诚，兼具文化与政治意义。至于宋庆龄对妇女解放运动、青少年与儿童教育及福利事业的理念和实践，作者亦给出中肯的述评。正如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锡祺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本书的出版，将会对宋庆龄思想研究起一个促进的作用。”

新世纪到来后，盛永华研究员从文物研究保护工作的领导岗位退休，宋庆龄研究由“业余”变成她的“正业”，因而取得新的成果。2006年问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庆龄年谱（1893—1981）》，是她组织包括京、沪、粤几地的专家组成的团队，用了长达七年的时间始克完成的鸿篇巨制。全书近140万字，分为上下两卷，堪称前所未有的最为完整、翔实、内容丰富的年谱。反映了宋庆龄近70年的革命生涯。《年谱》参考、引用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及著述数百种，包括众多被访问者的口述资料，被誉为“宋庆龄研究的集大成著作”。盛永华研究员认为《年谱》的出版是集体协作的成果，不仅大有裨益于宋庆龄研究，而且团聚了各地的研究者，许多青年的研究者在工作中成长起来。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盛永华研究员完成了她的新著《宋庆龄研究丛稿》。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究，作者的研究已臻于成熟，能够从人物整体上深入、科学地考察宋庆龄的思想与活动，给予如实的反映，从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握大量翔实材料，深入钻研和思考，使得本书不愧为扛鼎之作。本书不仅有多篇富有创见的新作，如《宋庆龄与辛亥革命》、《抗战与民主——宋庆龄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指导思想》、《宋庆龄革命

生涯中的两次重大抉择》等，也有修订和改进了先前的著作。集中论述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作者深厚的学养、优良的学风与文风以及严肃的治学态度通贯全书，令人敬佩。

30年来盛永华研究员研究宋庆龄的成绩斐然。但是，宋庆龄的研究有待深入和细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宋庆龄全集》和与她辉煌的一生相称的著作问世。相关的专题研究，亦有广阔的天地。我们仍需刻苦努力，不断攀登！

祝贺盛永华研究员的新著问世，并祝愿她在宋庆龄研究中更上层楼。

2011年10月于广州

目 录

序一	金冲及 (1)
序二	张 磊 林家有 (1)
导言：宋庆龄在近现代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1)
宋庆龄与辛亥革命	(24)
(一) 在辛亥革命尾声中宋庆龄成为一名战士	(24)
(二) 辛亥革命是宋庆龄具体认识祖国的第一所大学校	(32)
(三) 宋庆龄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毕生守护者	(34)
宋庆龄——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忠诚守护者	(39)
(一) 孙中山的助手与伴侣	(40)
(二) 孙中山的学生与战友	(45)
(三) 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忠诚守护者	(51)
(四) 号召人民学习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孙中山	(59)
论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61)
(一) 宋庆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和优点	(63)
(二) 与时俱进，高举坚决反帝的旗帜	(66)
(三) 民族主义思想的飞跃——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问题	(74)
(四) 在历史的特殊关头对民族主义的实践	(80)
论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103)
(一) 为民权主义注入彻底的反封建的内容	(105)
(二) 对民权主义充实以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的内容	(110)

(三) 对民权主义理论基础的剖析与升华	(118)
(四) 为争取在中国实现民权的实践	(128)
论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140)
(一) 民生主义的坚定继承者	(141)
(二) 使民生主义发展成为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的旗帜	(144)
(三) 使民生主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好朋友”	(147)
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55)
(一) 三大政策的制订和宋庆龄的作用	(157)
(二) 围绕三大政策的斗争	(165)
(三) 三大政策的坚定捍卫者	(173)
(四) 在革命新时期对三大政策的发展	(177)
孙中山与宋庆龄	(188)
抗战与民主——宋庆龄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指导思想	(204)
(一) “九·一八事变”后，号召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民主权利夺回来”	(204)
(二) “华北事变”后力促实现民族团结共同抗日	(209)
(三)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巩固的理论活动	(213)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两次重大抉择	(218)
(一) 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选择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219)
(二) 在土地革命挫折之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222)
论宋庆龄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227)
(一)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	(227)
(二) 论证妇女解放必须与阶级解放及社会解放同步	(231)
(三) 宋庆龄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双重枷锁的挣破	(238)
(四) 争取实现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	(253)
论宋庆龄与青少年儿童教育	(256)
(一) “缔造未来”是宋庆龄教育理论的指导思想	(258)
(二) 着眼于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劳动者	(263)

(三) 倡导学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272)
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	(277)
(一) 宋庆龄对儒教批判的背景	(278)
(二) 对孔子及儒学的分析和评价	(280)
(三) 揭露“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崇儒的居心	(281)
(四) 驳斥把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与儒教混为一谈的谬论	(284)
宋庆龄与基督教	(289)
宋庆龄关于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实践	(293)
(一) “博爱”是宋庆龄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	(294)
(二) 捍卫民族独立、争取政治民主、促进改善民生、保卫世界和平 是宋庆龄“博爱”的主要实践	(297)
(三) 关注弱势群体, 给予实际帮助	(303)
辛亥革命的“隐君子”, 捍卫共和的勇士——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306)
(一) 革命的隐君子	(306)
(二) 捍卫共和的勇士	(308)
宋庆龄与宋美龄——历史上的几个时段	(315)
(一) 前言	(315)
(二) 姐妹双双出嫁后走向政治对立	(316)
(三) 抗日战争与“新生活运动”	(320)
(四) 以民族大义为重处理“西安事变”	(327)
(五) 抗战期间的携手协作	(330)
(六) 尽管天各一方, 亲情并未泯灭	(334)
附录一: 宋庆龄研究回顾与展望	(335)
附录二: 宋庆龄生平大事简表	(346)
主要征引参考书目	(375)
后 记	(377)

导言：宋庆龄在近现代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宋庆龄无愧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她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人们的深切理解和广泛赞颂，她属于全世界。

（一）

高耸的乔木，必然深植于沃土。不平凡的时代，孕育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归根结底，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杰出人物以历史为舞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力量，导演了一出出社会的悲喜剧，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同时在历史进程中必然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

已逝的一个半世纪，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世界潮流与中国社会自身固有矛盾的激烈碰撞中，古老的中国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但新时期帷幕的启开，既非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结果，亦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所导致。英国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天朝已经锈蚀的铁幕，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朝帝国的大门，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殖民主义一同涌入。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

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然而，强烈的外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使之循着独特的轨道演进，中国没有发展成为完全意义的近代化国家，却主要由西方列强塑造成为一种过渡的、畸形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帝国主义以残酷的掠夺和政治压迫阻断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将其沦为附属国；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为巩固已松动的统治根基，逐渐依附于西方列强，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桎梏。因之，中国人民被套上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使人民大众处于灾难深重的境地。为了挣破沉重的镣铐，把积贫积弱的祖国建成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各族人民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方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拯救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必须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个历史进程，由多个互为先导与继续的改革、革命阶段所组成：这就是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且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只有循着这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梯不畏险阻地攀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才能走出苦难的深渊，进入光辉的未来，这已经被实践并继续为历史发展所证明。

宋庆龄正是生活在中国与世界都处于剧变的时代。她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肩负历史的重担，进行不懈的追求与奋斗：她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走进了革命队伍，马上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争中，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候，她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迎向新的革命阶段，帮助并促成孙中山自觉地向新的革命阶段过渡；她参与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艰苦备尝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然后顺乎历史潮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宋庆龄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以坚实的步伐跨越了三个上升的阶梯，并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与时俱进。她的思想和实践因此而具有深广的内涵，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缩影，并体现了近现代中国人民振兴中华的不倦奋进。她毕生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她的英名为人们所世代传颂。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9页。

(二)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她以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的身份，支持、继承、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她在新的革命阶段，不断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国内不同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社团，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并率领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成为一支中国革命与建设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她的人格魅力，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应当指出，宋庆龄的名字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近代化的光荣先驱者——孙中山的名字是分不开的。研究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离不开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他们之间思想的交流、碰撞与共鸣，以及由此产生共同的思想飞跃及实践，使研究者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他们并肩战斗的那十年。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着老师与学生之分，但影响无疑是双向的。在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的征程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砥砺前行。孙中山作为宋庆龄的导师、战友和伴侣，对她的政治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海内外许多人的忆述和著作都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阐述了这种双向的关系，美国学者谢曼（L. Sharman）在她1934年出版的《孙逸仙的生平及其意义》（*Sun Yat - 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A Critical Biography*）一书中，就曾指出宋庆龄对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作用。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并使其深广的内涵得以不断地发掘拓展，因而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历史的舞台，仍在鼓舞人们前进，宋庆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时代与现实的要求，也是他们的思想与相互关系逻辑发展的结果。

在评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重大的、不可代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必须充分确认她与孙中山的关系的意义。他们生活在矛盾错综复杂和急剧变化的年代。跨

世纪的峥嵘岁月包含了两个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而前者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两个革命阶段之间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重要的区别。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沸腾地、曲折地而又迅猛异常地向前奔腾发展，从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到正规的民主革命——包括旧、新民主革命两阶段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次革命运动刚刚失败，另一次规模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又随即而起；一种新思潮、新理论刚刚出现，很快又被另一种更先进的思潮和理论所代替，以指导革命的新阶段。如此，便向一切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导潮流的先进人物提出了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不断扬弃，及时总结并自我超越，与时俱进。任何的停顿，他们便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倒退到革命的反面。在斗争的实践中，他们还必须非常注意保持革命新旧阶段的连续性——将前阶段革命的成果在下一阶段加以发展壮大；以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作为下一阶段的借鉴。而前一阶段的革命队伍，往往由那些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凝聚力的先进人物继续团聚，进行整顿，率领他们投入新的革命斗争。这种承诺在很多方面都是必要的，对新阶段的斗争大有裨益。宋庆龄无愧为炽烈的爱国者的楷模，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感使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反顾地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孙中山忠实的、亲密的助手、学生、战友和伴侣，她的奋进成为连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宋庆龄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了孙中山的事业。她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赋予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以新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毋庸置疑地显示了不同革命时期和阶段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和贯通性——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是后来的、高级的革命阶段的准备；后来的、高级的革命阶段，则是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的发展。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为后继者们继承和推进。他的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计划，在更高层次上已经和正在实现。这种连接和贯通，能够使过去革命斗争的传统、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革命所吸收，并使更高层次的革命斗争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

在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许多仁人志士从孙中山的旗帜下出发，走进了新的革命行列，跨入了新的革命和建设时期。

(三)

对于宋庆龄来说，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历史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认真观察和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和寻求借鉴，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破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进入近代，是时代对中国人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的特殊的家庭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使她得以在少年时代就漂洋过海，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是使她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洗礼——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她的思想主流。这种思想和政治洗礼，不仅对于民主主义者是必需的，同时是他们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的重要的积极因素。

还在负笈异域的少女时期，宋庆龄就憎恶中世纪的观念和事物，认为清帝国的统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切望祖国挣脱桎梏而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强烈的爱国主义成为这位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留学生的思想的主流。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所有先进人士救亡图存的热望。因之，爱国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共同基础与特点。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略掠夺，中国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她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为祖国遭受到瓜分、“共管”的厄运而悲愤。她的民族自尊心使她不能容忍在异国学校的课堂讨论中那种“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有悖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为中国曾对“世界的昨天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当前许多仁人志士的奋斗正在“唤醒中国人民的觉醒”。她确信只要“唤起全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就会有“真正的进步”。

旧中国专制制度的腐朽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并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要求更新和进步。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才能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她曾经对“君主立宪”有过期望，但爱国主义的情怀使她对不期

而至的革命从心底里发出欢呼。

宋庆龄满怀爱国激情和变革热望进入了青年时期。迎接她的是剧变的中国和世界。

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扼杀，革命的大潮暂时消退，斗争的果实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攫夺。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民国徒具虚名。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他的部分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再次流亡日本，在十分艰苦的处境中策划新的斗争以捍卫共和制度。

大学毕业的宋庆龄未能从大洋彼岸回到睽别六载的祖国，被她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如她所期望那样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生机和活力，学成归国后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更无由施展。宋庆龄于1913年夏从美国径直去到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学生和战友。年青的文学士在投身革命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心”。而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友谊，则是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通过她的父亲的介绍，孙中山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结成为至死不渝的伴侣。

在后来的十年里，宋庆龄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和磨砺。为了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共和制度，她与孙中山曾经流亡异国、开府广州和寓居沪滨租界，颠沛流离，备尝艰苦。但是，终于回天乏术。逆转的形势无可挽回，是由于旧民主主义已经濒于尾声，难以再涌高潮。孙中山不愧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先是在中国领导建立了共和制度，继而又最坚决地高举捍卫共和的旗帜——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在走投无路中思考“另为彻底之革命”。而宋庆龄却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饱经挫折，在孙中山的教导下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并积极地迎接新的时代和新的斗争。

历史进程中的停滞和逆转总是暂时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期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到来了。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开拓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发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使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革命的新阶段对宋庆龄和孙中山是严峻的考验，却使他们看到了“大希望”。他们不愧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为着继续领导和推进革命，他们自觉地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检验过去的理论与实践，使自己的思想与实践上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以适合“世界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通过了探索和扬弃，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再掀国民革命的新高潮。

对于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参与并承担了大部分实际的工作，而且在思想领域方面，他们的共同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的干扰。宋庆龄对孙中山无条件的支持，对于孙中山的决策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时刻，他们之间的政治、思想的交流和促进愈益强化。宋庆龄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著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

然而，正当国民革命的风暴从南方升腾起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使极度悲痛的宋庆龄更为忧虑的，是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坚毅地继续着她曾与孙中山共同的行程，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和不妥协的战士的精神面貌，独立地投身于时代的激流，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

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的叛变、年轻的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的失误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夭折，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新军阀攫夺了革命的果实。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革命在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没有重演，革命被迫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因之，革命在退却中向着纵深发展。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旗帜，向叛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力挽狂澜于既倒。而在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她竭尽全力维护孙中山革命旗帜的纯洁性，并将孙中山事业的信徒团聚起来，率领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宋庆龄揭露和批判那些自称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们的叛徒嘴脸，指出他们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事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她反复指出正是那些“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彻底背弃了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腰斩了生气勃勃的大革命，她断言“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①，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们”，他们倒行逆施，所依赖的是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新军国主义”^①。这些人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推行的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相反的政策”^②，她愤怒地谴责这些叛徒们“操纵利用国民党”打击残杀“农民、工人、共产党”，因此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反面而“丧失了革命性”，国民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③。为了同国民党右派划清界限，她表示“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④。她当时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切盼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继承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因为她对丈夫亲手创建的党深有感情。更重要的是她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深信只有“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⑤，而只有这样的国民党才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承受孙中山留下来的革命的称号的党派，因为这是唯一忠于他的主义和政策的党派”^⑥。她呼吁“用革命的方法改正错误”，把右派从国民党清除出去，把革命力量重新团聚起来，领导和推进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紧紧把握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大有助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对象。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反思，使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更为科学地认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她很快就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再生，确认它已变质和崩解。在1929年返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时，宋庆龄为新军阀的暴政所震惊：贫富悬殊，并“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为此，她斥责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全部“出卖”了孙中山的遗嘱，相信任何了解真相的人都不会再“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人民的”^⑦。稍后，她明确地断言：“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⑧从此，她把目光集注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她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确定了工农阶级的地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8、27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6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页。

位，就是工农“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①。她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的奋起，视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认为只有“全国工农参加革命”才能使“革命具有生命力”。进而断言“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②这是宋庆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最直接的表述。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出发，终于找到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革命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这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西方民主主义熏陶下成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宋庆龄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却又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宋庆龄在革命实践中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初，宋庆龄从坚持革命的三大政策出发，很快就确认了革命新阶段的领导者，分清了中国的敌、我、友的阵线，将一切忠诚于孙中山事业的各阶层人士，集合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率领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宁汉合流”后不几天，于1927年7月20日，向全党发出通告，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③不久后的“八七会议”再次肯定了这个通告，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并且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目标调整斗争的步调和策略。这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伟大创举的理论和实践，当时并未被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其中包括共产党内的领导成员。宋庆龄却持有真知灼见，她1927年9月在访问苏联时于莫斯科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决策给予了最响亮的回应，表示了坚决的支持：“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

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①她坚信要实现孙中山的理想——“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②这是因为客观现实所决定：“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③宋庆龄所强调必须使用的“革命的方法”，就是国共合作以后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及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在开展的土地革命。

在新的革命阶段到来的时候，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旗帜，把握住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加以补充和阐发，号召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支持土地革命，投入到土地革命中。她反复强调孙中山是以民生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纲领的，那么首先必须回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它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它包含些什么变革？”^④宋庆龄接着加以阐发：“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⑤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⑥她认为从民生主义“可以看到他（孙中山——作者按）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立”。^⑦因之，她尖锐地指出“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⑧。她坚信土地革命“是用革命的方法来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剥削，争取中国的自由，并使劳动人民从目前的重负下解放出来”^⑨的唯一道路。这样，宋庆龄便将孙中山作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将这种经济改革称之为“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纲领。而且她认为，中国社会革命应该是“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⑨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5页。

来”的革命，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刚刚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以及他们进行的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的理论和伟大创举一时还未被广泛认同的时候，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示深刻的理解、真切的认同和积极的支持，这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也是宋庆龄赤诚的爱国主义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表现。

经过了大革命血与火的磨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考察了苏联和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她已经完成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她在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尊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凝聚了广泛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她以各种有效的方法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争取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而妇女运动和少年儿童的保育、教育事业，始终为她所关注。在此期间，她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打击，身心遭到摧残，甚至危及生命。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更使她感到痛楚和困惑。然而，疾风知劲草，“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①

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媚外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得以践踏中国的大地。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政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指出正是“蒋介石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使今日中国濒于全部分裂、沦为

^① 廖承志：《我的回忆之二》，《人民日报》1982年5月19日。

帝国主义属国的境地”^①，面临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扩大的侵略，“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从来就不曾作过认真抵抗的准备”^②，这是因为“它总是想对帝国主义妥协。因为它怕武装的人民甚于帝国主义侵略者”^③。过去，正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豆剖”，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纾此时艰，奠我中夏”^④起而革命的，但孙中山逝世后的中国，救亡任务远未完成。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旗帜，把握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指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必“将是一个广泛的反帝斗争，最后将汇合起来成为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⑤。当中国面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厄运时，宋庆龄认为实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标志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⑥。当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面对剧变的形势，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⑦。她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为实现全民抗战而努力。为此，她遵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嘱托，恢复中断了十年的与国民党的联系，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进行各方面联络。号召以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为基础，团结御侮。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和妥协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宋庆龄同时清楚地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独立解放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和阶级解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她指出：“我们要晓得，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⑧因此，在整个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8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6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不断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作斗争；她不断呼吁“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由于过去十年间中国忽视了民权主义，我们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内战绵延不已，国家深受摧残，千百万人民丧失了生命，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①这就为日本的大举侵略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必须马上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②，并且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发言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结社与集会自由，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③。她强调“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④。在八年抗战中，宋庆龄不断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进行阐发，使其成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而且，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斗争的同时，她密切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为促其早日实现而奋斗。她还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中国不仅是为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反侵略斗争积极争取各国及各方面的援助。她努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架设相互支持的桥梁，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无愧为英勇的民族斗士和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饱受战乱苦难的广大人民群众热望国内实现和平统一，重建家园。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实行独裁统治，决心以暴力手段消灭共产党。还在临近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就把力量逐渐放在反共和反对国内其他民主力量方面。蒋介石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把发动内战以消灭共产党的罪恶企图表达得赤裸裸：“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5、11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页。

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① 美国则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考虑，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为实现和平建国作了巨大努力，宋庆龄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她动员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实现人民民主的武器。她在1946年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中，警醒国人注意在消灭外来敌人以后，“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呼吁“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她真诚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超越党派利益局囿的真正人民民主共和国，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宋庆龄认为“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强调“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宋庆龄强调指出“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② 宋庆龄的声明，以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为基础，又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理论，使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这个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推动了国内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的高涨，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亦表示响应宋庆龄的声明，在美国发起反对中国内战，反对美国给予蒋介石集团军事援助的活动。在蒋介石决心将中国人民投入内战血海的时候，宋庆龄亦以全部的热情和力量，投入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她在自己熟悉的战线上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经历了三年的奋战，迎来了胜利的曙

^①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9、179—180、181页。

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使宋庆龄快慰的是由于新中国的诞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①。她坚信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不断奋斗，使得“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②。而宋庆龄以她近40年的艰苦奋斗，证明她无愧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不长的过渡时期，又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国家领导人，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以花甲之年，经常到农村、工厂，到边疆去视察，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提出各种有效的建议。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争取广泛的世界支持，仍然是她的主要任务。与过去的年月一样，她仍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己任。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与儿童教育工作中，这些工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卓越的先驱和领导者，宋庆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把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作为妇女解放的前提，确信只有全人类的解放，妇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思想；双重枷锁的挣破——在砸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枷锁的同时，必须解除封建传统束缚的精神枷锁——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争取实现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重要内容。

宋庆龄从投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始，便突破了女权主义的局囿，把中国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教育、动员和引导妇女参加民族民主的解放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认为妇女彻底粉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的任务也还远远没有完成。因为不仅由于保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2页。

护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平等的法律、政策还有待订立和完善，更重要的是两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宋庆龄深知“要解除这些锁链，并不是容易的事”^①。因此，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在妇女解放方面着力进行两项工作：一是推动和主持各种解放妇女和保护妇女的政策、法令、措施的制订，二是不断呼吁和身体力行进行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素质的教育。关于不断地提高妇女自身的素质，宋庆龄要求首先必须“努力提高我们妇女的政治水平”^②，使她们“在政治上能够保持警觉，而且真正了解世界局势及我们自己的情形”^③。宋庆龄同时认为打碎束缚妇女的封建枷锁是全社会的责任，“除非男子完全理解，而且坚持男女平等，否则这一切都会落空”^④。因此，她坚持要对全社会进行关于解放妇女的教育。宋庆龄坚信，从封建的、闭锁的旧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是生产实践，是新中国妇女思想解放的途径。因此宋庆龄不仅推动和主持各种解放妇女及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法令、措施的制订，而且亲自督促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包括有（1）“必须继续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2）“必须提供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备，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3）“必须加紧扫盲工作，并多设训练机构，使妇女能够自由选择职业”；（4）“必须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和加强她们的组织联系，保证她们尽量地积极地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⑤为了使在生产第一线的妇女减少后顾之忧，宋庆龄不断呼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⑥。直至宋庆龄的晚年，她仍然谆谆教导广大妇女，祖国“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⑦。表现了她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不息的热忱。”

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成长，是宋庆龄一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她的晚年，当她将要渡过她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的时候，曾无限深情地说过：“我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7—328页。

⑥ 宋庆龄：《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载《中国建设》1979年第2—3期。

⑦ 宋庆龄：《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载《中国建设》1979年第2—3期。

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①她把儿童称为“世界之宝”，视为是“人类的至宝”，^②因为她深知，在儿童的身上寄托着人类的未来。因此，为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她要求人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缔造未来”是宋庆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主导思想；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祖国和世界充满义务感和献身精神、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有健康体魄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即培养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新一代，是宋庆龄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及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宋庆龄倡导的科学教育方法。宋庆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理论和在实践中的示范，现在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的重要依据。

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③，是宋庆龄教育思想的主旨。她认为教育工作的全部目的，在于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坚强的革命后代，成为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④。

宋庆龄对青少年儿童问题的关注，发端于革命走向高涨的年代。但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培养无数的后代，只有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宋庆龄则不得不为拯救和保护儿童而全力以赴，在为新中国奋斗的伟业中，为“缔造未来”打下基础，扫清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宋庆龄马上适时地将“缔造未来”的伟大工程纳入议事日程，为此工程大规模开展，在短期间内做好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把广大的劳动妇女和儿童从贫病交加的惨况中解救出来，将大批流浪儿童作妥善安置。

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宋庆龄及时指示中国福利会（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50年更名中国福利会）将包括儿童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必须要“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⑤，将儿童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儿童保健、儿童教育、儿童戏剧、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和儿童读物的出版方面”，

① 《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日。

② 《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③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④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⑤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积极开展“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①她自己首先在这方面作出表率，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建立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等等，为儿童的培养教育提供科学的示范。同时，宋庆龄极为重视建设一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及少年儿童工作者队伍，她不断呼吁建立更多、更好地培养各级教师的学校和训练班，把这称之为为国家制造“我们未来生命的血液”的事业，并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和保证。

培养教育青少年儿童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这是宋庆龄设计的“缔造未来”的伟大系统工程出发点和核心。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和人民的解放与幸福奋斗了大半生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自己“找到了最适当的一个工作岗位”——为祖国的未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她竭尽全力，默默耕耘。在她的垂暮之年，她仍然以生命的最后光辉，映照着“缔造未来”的事业。

作为伟大的爱国者的宋庆龄，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常系于她的心头，她为此而不懈努力奋斗，起着独特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宋庆龄，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乃至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中国人民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国。在近代史上，这是第一个真正拥有主权的中国”^②；台湾必将“再一次地并永久地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中来，在全体中国人民建设幸福富裕生活的过程中，作出贡献并得到福祉”^③。宋庆龄揭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台湾问题上鼓吹所谓“为了和平的利益”而“不使用武力”的伪善，尖锐地指出他们有关台湾地位的“中立化”、“托管”和所谓“公民投票”等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自私的利益而恣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粗暴的侵犯。台湾问题的尖锐，“是因为美国武装力量进行干涉而产生的。就是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危机，使远东和世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从而使其他国家和人民受到影响。”^④宋庆龄在痛斥帝国主义的谰言，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的时候，明确表示：“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它纯属中国的内政。那里发生的事情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完全是中国境内的事……而对任何其他国家或人民的事务则毫不相干。”^①“内部问题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来解决。”^②而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和平方法总是更有吸引力的。”而且，“必须指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很多场合用和平手段来增进人民利益的。在这方面，我们有正面的经验”。^③正因如此，“关于台湾地区这个具体问题，在它的国际方面，我们同样敦促使用和平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坐下来同美国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④。宋庆龄强调：“中国的立场将是始终坚定的。我们要解决台湾地区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为维护我国安全而应尽的职责，也把它当作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做的又一贡献。”^⑤

宋庆龄认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她以孙中山的学生、战友、伴侣的特殊身份，介绍孙中山亲自推动和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介绍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阐明孙中山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解放而毕生奋斗的理想，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而得以实现的。她阐发孙中山为维护祖国的主权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斗争，直至他病重北上，仍然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她呼吁和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三次合作，使祖国的统一早日实现。

当时，在帝国主义禁运和台湾当局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宋庆龄通过多种渠道与台湾及海外的亲朋故旧联络，向他们送去亲情、友情和信息，从而尽力沟通海峡两岸的关系。在“文革”前，她在有限的条件下与大姐宋霭龄保持着通信联络；在“文革”以后，她又通过友人与在美国和香港、台湾的亲属恢复了联系，从此，孙中山的孙辈、故旧和宋庆龄的亲属们经常从国外或境外来看望他们的祖母。这不仅仅是亲朋之间的感情交流，必定还会对祖国统一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每逢节日，宋庆龄总是向台湾同胞送去问候和祝福。台湾人民的福祉，祖国统一的大业，始终萦绕在宋庆龄博大的胸怀中。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1—15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与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宋庆龄毕生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新中国建立以后，她作为国家重要的领导者，在这一神圣事业中，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历史最为重大的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发展的进程和各种力量的对比，社会主义阵营真正形成并与帝国主义阵营对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为了遏制苏联以遏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把矛头对准新中国：从政治上的孤立封锁，到经济上的禁运，军事上则支持逃到台湾的蒋帮集团“反攻大陆”；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以此为导火线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军事打击；甚至不惜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来扼杀新中国和共产主义。在这种形势下，打破帝国主义的禁锢封锁，在世界上广交朋友，让世界了解新中国，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便是新中国的外交要务之一。宋庆龄深知自己的责任，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她也有着广交朋友的特点和专长。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恫吓，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名誉主席和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的宋庆龄根据我国外交的总方针，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她参与策划和发起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的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她多次参与组织和主持在我国召开的区域性和洲际的和平会议；她也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总之，她通过各种可行的渠道和有效的手段，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传达至全世界。她代表新中国庄严地号召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让“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和平的基础上共处和竞赛”。^①

宋庆龄始终认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她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为铲除殖民主义，谋求独立解放的事业，为他们的任何进步与成就欢呼。一切受到迫害或遇到困难的进步人士，不管他们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得到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宋庆龄的支持。1950年12月，日本发生了吉田内阁陷害日本共产党和打击进步工人的“松川事件”，宋庆龄立即致函日本劳农救援会，对被捕和被迫害的工人给予声援，并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指示救济总会“对松川事件”受害者的家属给予物质上的援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她得知曾在抗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页。

日战争中支援过中国人民的美籍日本友人吉幸治受到美国反动的“麦卡锡法案”迫害时，马上伸出救援之手。她甚至向有吉的家属捐出自己与孙中山结婚时母亲赠送的锦缎花衣裙，供其变卖以筹措营救之资。当时，不少受到“麦卡锡法案”迫害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曾得到宋庆龄的包括道义和物质上的多方援助。宋庆龄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在这个岗位上，她积极开展与亚洲及世界各国妇女的联系，加强与各国姐妹的友好往来。新中国刚成立，她就领导召开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之后，又代表中国妇女出席了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她在国际的讲坛上，号召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携起手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认为只有如此，妇女才能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

宋庆龄深知要将新中国的声音传达到全世界，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她不断就对外宣传的方针与周恩来总理交换意见，提出各项切实可行的建议。她亲自创办了以对国外发行为主的多语种的《中国建设》杂志，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建设成就及各种信息，通过这本杂志，源源传向世界。宋庆龄对这份杂志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精心培育，寄予很高的期望。她邀请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和对外宣传的行家里手担任杂志社的各级领导，负责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行等事宜；又邀请过去长期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外国朋友如爱泼斯坦等来华参与杂志的策划和具体领导，使杂志更有针对性地既能传达新中国的信息，又能更好地满足国外各种读者的需要；而宋庆龄自己则在百忙中经常为杂志撰稿，她亲自写作的那些充满激情而精练的政论，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及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传达于海外，成为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人类和平进步的正义之声。

为了睦邻友好，给国家创造一个和平良好的建设环境，60多岁的宋庆龄多次出访欧亚各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的许多邻国，几乎都与中国一样，曾经有过被帝国主义宰割和奴役的不幸遭遇，也有着反抗殖民主义的共同经历，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曾给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以鼓舞和借鉴，许多邻国的领导人熟悉孙中山，而且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的出访既探访了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在给各国人民送去中国人民的友谊的同时，充分表达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进步人士必须携手合作互相支持的理念和愿望。

宋庆龄始终坚持并贯彻这样的信念：“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

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此，她毕生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设友谊的桥梁，她同时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与崇敬，被视为中国人民良知的化身，被被誉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平友好的代言人”^①。

(五)

孙中山的100周年诞辰纪念会是在“文革”的黑云滚滚中举行的。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演说——《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她简明而又着重地介绍了孙中山一生的业绩，肯定了孙中山在中国及世界的意义，尖锐地指出“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她满怀深情地表达：“他（孙中山）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坚韧性经常鼓舞着我们。”宋庆龄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毫不含糊地歌颂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指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不仅是她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旗帜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也是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保护民族遗产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更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倒行逆施的抗击。在其后的岁月中，直至她生命终结为止，宋庆龄从未停止为维护孙中山的理想和事业、为维护孙中山这面革命旗帜而进行斗争，表现了她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另一种反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同志、亲友给予关怀、帮助和保护。她对当时蒙冤而身陷囹圄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的子女的关怀和安慰，她为保护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而写的证明材料等等，充分体现了她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为革命与建设事业保存力量的努力。而对国际友人的保护，更是维护了祖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文革”时期，由于“四人帮”对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严重干扰破坏，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遭遇困难，受到损失。宋庆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与各国朋友友好交流，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传达给世界，这是对“四人帮”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而且一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宋庆龄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团结了一批真诚助我的朋友。

^① 《宋庆龄来往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页。

作为一名为祖国不倦奋斗的战斗，十年内乱中的宋庆龄，她的精神世界从来没有消沉和颓唐。工作是她生活的主要内容，信念是她的精神支柱，使命感是她奋斗的动力。她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从未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她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当“四人帮”一伙的阴谋被粉碎以后，宋庆龄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她感觉“自己仿佛恢复了青春”，80多岁高龄的她满怀豪情地表示：当祖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我将非常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并肩前进在这伟大而英雄的行列中”。她把工作排得满满的。从打倒“四人帮”到逝世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宋庆龄像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着。除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外，她还发表了批判“四人帮”及对各条战线的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数十篇。她指导恢复了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并对少年儿童教育事业给予具体的帮助。她几乎每天都要会见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回复国内外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来信。宋庆龄在信件中表达了对新时代到来的欢欣，对祖国事业发展的鼓舞，对新老朋友的情谊，充满了睿智、幽默和哲理。

宋庆龄在90岁高龄的时候离开了她所挚爱的祖国和人民。她一生为之探求的祖国现代化事业正在蓬勃开展。而宋庆龄的思想和实践，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的历史新阶段中，仍然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原载1993年1月出版的《宋庆龄论》；2005年5月第一次修改于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2011年春节第二次修改于北京。）

宋庆龄与辛亥革命

参加辛亥革命，是宋庆龄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关键性的一步。

1913年对于宋庆龄来说，是她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的关键性的一年。是年，这位年轻的美国留学毕业生返回祖国探亲，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在辛亥革命高潮已过的革命尾声中，在孙中山极度困难、前途未卜的时候，由父亲亲自引领，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伟大事业，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迈开了她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坚实的第一步。

（一）在辛亥革命尾声中宋庆龄成为一名战士

1913年6月，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毕业。满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已推翻专制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的祖国的憧憬，准备回到睽违六载的故乡上海度假。她原拟度假后再返回美国学医，日后作为医生为国人服务。然而在返国途中，她接到父亲宋嘉树（宋嘉树，名教准，字嘉树，号耀如——作者注）的电报，让她推迟行期并转赴日本横滨。宋庆龄开始还以为她的全家是从上海专程到日本去接她回家的。但到达日本后，她的感受是“我的全家都在日本……中国还在打仗。与孙博士——南方的领袖关系密切的人目前在中国处境危险”^①。

宋嘉树召宋庆龄到日本的原因，是因为“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已携眷流亡至

^①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此，更重要的是让宋庆龄分担他作为孙中山重要助手的重任。

当宋庆龄启程由美返国时，中国“正处于国内二次革命的初期”^①，及至抵达日本，“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宋庆龄1913年9月在日本开始跟随父亲和姐姐宋蔼龄帮助孙中山工作，不久正式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其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革命临近尾声。孙中山在困顿中艰难地重新聚集队伍，筹划发动武装反对袁世凯专制复辟的“三次革命”，期望挽民主共和事业之狂澜于既倒。在革命的低潮中，面对暂时的历史逆流，宋庆龄马上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捍卫新生的共和国的斗争中。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宋庆龄走进了革命队伍，默默协助孙中山工作，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在国内，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在日本，孙中山处境维艰——先是日本政府受到袁氏政权的压力而拒绝他登岸停留，以后权衡了各方利弊，对已抵达日本的孙中山及他的同志在“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②的前提下，同意他们暂时留居。更大的问题在于革命队伍的本身——原本因如何解决“宋案”而意见尖锐分歧的革命党人此时队伍更加涣散；部分人因气馁而离开了革命队伍。孙中山曾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困境：“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③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相互诟谮，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④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重新聚集力量，他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但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战友，甚至连一些长期与他并肩英勇奋斗的同志如黄兴等，也因不同意入党时要宣誓效忠党魁的形式而离去，孙中山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孙中山抵日本神户时，宋嘉树已携眷先期到达神户为他做好安排。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孙中山1913年8月9日抵神户后至15日，“除宋嘉树及其女

^① 《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5—28页。

^② 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37页。本文所有引用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均由王振锁译、俞辛焯校。

^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④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60页。

儿和胡汉民访问外，未与其他中国人会见”^①。8月18日，孙中山移居东京后，即加紧着手武装反袁的“三次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他一面继续关注指导国内的反袁武装斗争，一面设法与“二次革命”失败后陆续走避日本的同志联系，并联络日本朝野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宋嘉树和他的长女宋蔼龄成了孙中山联络同志的最重要助手。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静》的记载，住在神户的宋嘉树父女，几乎每天都从神户到东京去协助孙中山工作。除进行秘密联络外，还参与了再举的谋划。^②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先后与来访之宋嘉树及其女儿宋蔼龄、美和作次郎、萱野长知商谈”；“与来访之头山满、萱野长知、菊池良一、岛田经一、寺尾亨、宋嘉树父女等议事”^③之类的记载不少。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日本横滨。父亲和姐姐蔼龄前往迎接。翌日，宋庆龄跟随父亲和姐姐拜访了孙中山，当晚，宋氏父女三人留居东京孙中山寓所。这是成年后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30日以后，她随姐姐回神户去与家人团聚。团聚是欢愉的，但生活却因革命需要而动荡——孙中山太需要、太依重宋氏父女的帮助了。从9月5日至9日的五天中，孙中山连续给在神户的宋嘉树发去6封电报，又与宋蔼龄通了两次长途电话。10日，宋嘉树自神户赴东京孙中山处工作半天。当晚，回到神户的宋嘉树又致电孙中山，孙中山随即给宋蔼龄回电。自11日至15日，宋嘉树又几乎每天自神户赴东京孙中山处工作，孙中山还多次与在神户的宋蔼龄互通电话。因为工作需要，16日以后，宋庆龄跟随父亲和姐姐移居东京，以免除每天在神户与东京之间的劳碌奔波。16日当天上午即一起访孙中山。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中记载，至当月28日，宋庆龄随父亲和姐姐赴孙中山处工作十次以上。每次短则二、三小时，长则半天甚至大半天。有时一天去两次。^④如9月20日，宋庆龄“上午11时，同姐姐宋蔼龄一起访孙中山，11时4分独自离去。下午2时10分，再访孙，

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39页。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1—844页；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2页。

③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1页。

④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9—852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95—97页。

父亲宋嘉树随即来访。下午4时20分，父女三人一同离去”。^①这段时间正是孙中山紧锣密鼓地为筹组中华革命党，筹划发动“三次革命”，与陆续到达日本的同志如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柏文蔚、戴季陶等反复密商，并广为联络日本各界朋友，争取支持的时候。他在日本密探的监视下，几乎每天都在住所频繁会见同志及日本朋友；有时也往访日本重要的朝野人士。宋氏父女此时也几乎天天进出于孙中山的住处。虽然日本外务省档案没有明确记载他们的具体所为，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断他们是在为孙中山重组革命队伍而进行联络。他们工作量很大，不停奔波，任务繁重，除联络外，有时也参与会见与密商。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静》记载：9月18日，孙中山携宋庆龄及宋蔼龄“至大久保百人町梅屋庄吉宅，和梅屋及宿在那里的殷汝骊密谈并饮酒”^②。9月21日中午12时35分至下午6时40分，宋氏姐妹在孙中山处工作。当天，孙中山在住所陆续接待了廖仲恺和宫崎寅藏等来访者。^③

对孙中山来说，宋庆龄来得正是时候。而对于宋庆龄说来，这是使她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的关键时期。与孙中山频繁的接触与交流，大大加深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事业及他的思想与人格的理解，献身革命的决心日益坚定。她忆述这段历史时说：到达日本后，很快就“从我的父亲与孙中山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说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④宋庆龄已将捍卫共和奉为“我们的事业”了。

1913年9月27日这天，“中午12时15分，宋嘉树女儿访孙中山，下午5时50分离去”^⑤。当天，筹组中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吸收了第一批5名党员，孙中

①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96页。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50页。

③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51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96页。

④ 《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⑤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山亲自主持了入党盟誓。是年10月，在东京和上海，又分别吸收了第二批党员；12月在东京、上海、大连等地，再吸收了一批新党员……。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在扩大中，孙中山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看到新的希望，认为“吾党虽全然失败，然有此抵抗之事实，能使袁氏不敢公然称帝，虽败犹胜也。”他充满信心，“从新再做，合集此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党，以为再举之图。务期达到吾党之纯粹革命目的，即民权、民生主义是也”。^①在孙中山的策动与督导下，武装反袁斗争陆续在国内各地开展。

筹款、联络及起草文书等工作是繁重的。在组织反袁的“三次革命”中，孙中山已离不开宋氏父女的帮助了。1914年1月，宋庆龄陪伴母亲回上海治病。这时，宋蔼龄因准备与孔祥熙结婚不能全力承担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而宋嘉树因肝、肾病的加重也不堪工作的重负，不得已，宋嘉树电召宋庆龄回东京协助并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自3月中旬返回东京后，宋庆龄几乎每天随姐姐赴孙中山处工作。6月份以后，宋庆龄单独赴孙中山处工作时间大大增多。8月，宋嘉树举家迁居横滨。9月，宋蔼龄结婚后，宋庆龄正式接替蔼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自此，住在横滨的宋庆龄“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地）工作，经常由我父亲陪去，他那时的任务是帮助孙中山为党筹集革命经费”^②。宋庆龄记得：在那一年里，“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③。宋庆龄回忆她的工作任务时说：“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回信工作。”^④宋庆龄的工作内容，在孙中山给友人的信中也得到部分印证：“目前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我先前的两位女秘书，是两姐妹，姐姐宋蔼龄女士刚结婚，妹妹宋庆龄女士最近已回上海。所以，我不得不亲自用英文写信”；“我的英文秘书宋蔼龄近已结婚，并偕同其妹宋庆龄返回上海……故目前无人掌管我的英文通信事宜。”^⑤

1914年5月底，孙中山发出第一次《讨袁宣言》——《讨袁檄文》和《讨袁告示》，高举“二次革命”以来武装讨袁的旗帜，历数袁氏“背弃前盟，暴行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129页。

②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③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④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⑤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5、148页。

帝制”的倒行逆施，誓与全国民众一起“掣（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扫除专制凶顽，改革恶劣政治，恢复人命（民）主权”。^①6月，中华革命党进入组织建立的实质性阶段。15日下午，孙中山与陈其美等讨论成立党本部、干部选举以及召开党员大会等问题，宋嘉树父女也参加了讨论；^②16号，孙中山继续与陈其美、胡汉民、居正、柏文蔚等讨论组织设置、干部人选等问题，当天，宋氏姐妹在孙中山处工作了一个下午；7月8日上午8时许至中午，宋庆龄在孙中山处工作了一个上午。下午，孙中山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并就任总理。由此，重新形成了捍卫共和的队伍和阵线。

9月，由于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的报纸上发表了揭露袁世凯罪行的文章，美国政府应袁氏要求，禁止上述报纸在美国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的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调查事实真相。为答复美驻日大使的询问，孙中山撰文逐项列举袁氏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廖仲恺、宋嘉树、宋庆龄参加了文件的起草。据记载，是年9月24日“下午1时40分，孙中山给横滨市山手町59号宋嘉树发一电文。2时35分，宋庆龄随宋嘉树至孙中山处，参与起草列举袁世凯罪状的材料，5时离去。除他们三人外，廖仲恺也参加了起草。”^③9月26日“上午9时，（宋庆龄）随父亲宋嘉树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起草材料，下午5时30分离去。”9月28日，“上午9时18分，（宋庆龄）随父亲宋嘉树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和孙面谈，起草材料。宋嘉树下午4时10分离去，5时20分再访。5时30分二人离去”^④。又，当日“上午波多野春房带着打字机来访，从孙处取英文稿，打印50余张。孙令廖仲恺校对原稿”^⑤。当晚，孙中山携陈其美、廖仲恺等前往美国驻日大使馆，但因大使和参赞不在而返，次日和10月1日、3日，孙中山再携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居正、谢持、田桐等几次赴美国大使馆，并得与大使及参赞面谈。^⑥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90页。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87页。

③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06—907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09页。

④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10页。

⑤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06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10页。

⑥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07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10页。

是年秋，孙中山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历数袁氏罪行，号召革命党和民众武装讨袁，恢复真正的、民主的中华民国。从主要内容看，《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与条举袁世凯的材料无异。而《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是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革命党文献《革命方略》的文件之一。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中华革命党的组建过程中，宋庆龄除担负联络工作外，还参与了宣传和文件起草工作。在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发动“三次革命”的过程中，宋庆龄是支持者、参与者。在辛亥革命尾声中走进革命队伍的宋庆龄，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她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与日俱增，因而“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①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工作十分满意，对她的学习十分关心，“鼓励甚多”，使宋庆龄“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②1915年10月，怀着“委身革命”愿望的宋庆龄，在父母亲属以及孙中山的许多亲密战友反对的强大压力下，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成为他的助手、战友和伴侣。由此，他对孙中山的帮助更为直接全面，并使流亡中的孙中山生活得到照顾，心灵有所慰藉，这成为他在失败中再起的重要动因之一。正如他给老师康德黎的信中所表示：“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他确认宋庆龄是他的“一位伴侣兼助手”^③。对于这段经历和身份的转变，宋庆龄则自诩“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④。婚后，宋庆龄仍然“在我丈夫的英文通信往来方面，尽可能多地帮助他”^⑤。她在致同学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而她的理想仅仅是“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⑥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积极地在国内外发展组织、宣传鼓动，并策划了多次武装

① 杨天石：《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载《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② 《宋庆龄自述》，载《党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6页。

③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④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⑤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⑥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反袁，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了袁世凯政权，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袁护国浪潮的高涨。然而复辟与共和、倒退与前进在紧张地角力。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正式宣布帝制自为，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这种历史的倒退理所当然为全国人民所反对。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再次举起武装讨袁义帜，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揭开护国战争的序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次日取消“洪宪”年号。在全国的讨袁声浪中，孙中山于5月1日从日本回到上海，期望协调并领导全国的武装反袁斗争。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表示这次斗争“不图以去袁为毕事”，“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①因为斗争的需要，宋庆龄应孙中山召，于5月19日从日本回到密布袁世凯的鹰犬、弥漫着火药味的上海——此前一天，孙中山极为倚重的助手陈其美就在孙中山友人的家中被暗杀。孙中山和宋庆龄只能秘密活动。他们住在法文《中国回声》报编辑部的办公室以隐蔽，由宋庆龄晚上化了妆“溜出去办事”^②。宋庆龄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学会了革命的秘密联络，了解和熟悉了革命秘密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她当然明白“我必须冒许多危险”，然而她坚信只有孙中山“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我们终将看到中国会再度恢复和平与繁荣，并造福于人类”。^③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的讨伐中抑郁病死。作为辛亥革命延续的武装讨袁护国行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巩固了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再次普及，中国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共和转变，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宋庆龄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三次革命”开始，就投身其中，在创建共和的尾声中走进革命队伍，作为一名战士，马上投入捍卫共和的斗争，为维护祖国新生的共和制度，作出了贡献。

由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根深蒂固，民主进程一定坎坷曲折，它必将在充满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中缓慢前行。孙中山和宋庆龄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必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5页。

② 《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48页。

③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前进。

（二）辛亥革命是宋庆龄具体认识祖国的第一所大学校

宋庆龄由于家庭出身、接受教育的背景等等原因，向往着“自由、平等、博爱”，憎恶专制及人间不平。又“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① 并目睹了双亲对孙中山事业的实际支持。所以在她得知辛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的专制统治后，由衷地热烈欢呼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她十分肯定这次革命的合理性：“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② 但宋庆龄——这位年轻的、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留学生，对自己的祖国、对革命的理解是抽象的，是脱离实际的，是理想主义的。她想象新生的共和国已完成“种种改革”，并且“当前在中国还进行着其它无数的改革，其中包括了社会、教育和工业方面的改组。现在社会秩序已经恢复……其它一些重要改革已经取得了光辉成果，所以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有效地、明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完善和繁荣。”她认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只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③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宋庆龄按照父亲的指示到达日本时，共和国的许多缔造者们，包括她自己的父亲，为躲避袁世凯的追杀，纷纷流亡海外。宋庆龄已闻到了血腥的气味——宋教仁的被暗杀，国内一些反袁志士的牺牲，向宋庆龄昭示共和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并非坦途；自由、平等和博爱也非指日可待。当她了解到共和国还在摇篮中就被袁世凯所代表的封建势力所扼杀，革命没有取得期待的成果，满怀爱国情怀的宋庆龄别无选择，她毫不犹豫地走上为祖国实现民主富强繁荣而奋斗的舞台，帷幕却是在血与火中启开。

宋庆龄跟随父亲和姐姐协助孙中山工作的头一两年，是她在斗争实践中认识祖国的开始。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经历，成为宋庆龄具体认识自己祖国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活的教科书。宋庆龄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学会了翻译和使用密电码，学会了革命的秘密联络，了解和熟悉了革命秘密工作的原则，甚至学会了使用手枪。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后，宋庆龄感觉：“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我

① 《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第2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①在东京他们的家里，“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②，宋庆龄还参与孙中山与来自印度、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流亡者会晤。他们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各自国家正在进行的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使宋庆龄视野为之大开。

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具体教育宋庆龄认识自己祖国的国情——一个工农大众备受压迫剥削，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国。宋庆龄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与先进的西方有广泛联系的富有家庭，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的理解是抽象的。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③“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④正是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并且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大大有助于宋庆龄日后正确判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等一系列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

孙中山偕同并指导宋庆龄积极投入以讨袁、护法为主要内容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使她得以在不断的失败、挫折与探求的实践中认识到民主共和事业的艰难曲折，受到非同一般的考验和磨砺。孙中山“一生中经常冒着危险，他从不动摇。……他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遇到无数困难，遭受许多挫折，他从不灰心”^⑤。这种愈挫愈奋的坚韧意志成为宋庆龄的楷模，使她也下定决心

①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②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5—4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我也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解放事业担当风险”^①。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孙中山还向宋庆龄展示了他所擘划的祖国近代化建设的蓝图，把宋庆龄带进憧憬中的繁荣富强的祖国的新天地——每天晚饭后，孙中山常常在挂满各种地图的起居室内，“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②。宋庆龄把这个时期称为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由父亲的亲自引领，在孙中山培养教导下，宋庆龄在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③她感觉领会了生命的真谛——“我能帮助中国”。对于经受各种锤炼逐步成长为一个为祖国实现民主富强、为人民争取自由人权的坚定的战士，宋庆龄在辛亥革命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宋庆龄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毕生守护者

辛亥革命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帝制，在中国乃至亚洲建立了共和制度而取得辉煌胜利。但从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共和国这个终极意义上看，辛亥革命却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的遗产，一个是徒具虚名的中华民国，另一个是孙中山用以指导革命并实现国家民主富强的“三民主义”。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结束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混战，孙中山谓辛亥革命打倒了一个皇帝，却生出了许多个“皇帝”——封建军阀。披着共和的外衣实行割据或独裁——假共和，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孙中山两次举起“护法”的旗帜，以挽救新生的共和制度，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宋庆龄仍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捍卫共和的斗争中与孙中山并肩前行。宋庆龄曾对孙中山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详细地描述：

因为孙博士主张民权，所以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政府，必须真正是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孙博士希望从给予人民地方自治权着手，以每个县或地区作为一个单位。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②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③ 《宋庆龄书信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这个地方政府应给予人民直接的权力，用表示他们意愿的4种现代方法管理他们的地方事务。这4种方法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

在地方政府全部组织起来后，给予每个县选举权，选出一名代表去指导县以上的中央政府。这名有任期的代表被授权使用上述4种方法，来指导中央政府的公务员。

至于中央政府，孙博士打算采纳美国宪法的三种权力，保留中国宪法的两种权力，创建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机构。

虽然政治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仅由一种权力组成，即皇权，但是孙博士发现除了皇权之外，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两种权力，即考试权和监察权。现在这两种权力已被欧洲最好的政府部分仿效。

这个五权宪法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权组成。通过这五权宪法，可使中央政府成为一个完善的政府机构。人民行使政治权力指导和控制中央政府。这种政治权力就是上述4种方法。

政治权力完全在人民手中，我们公务员的职责就完全起作用了。不像欧美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和职能的一种结合。人民具有直接控制政府的权力，每个公务员都是本行业的专家，结果就是一个高效负责的政府。

自1917年以来，孙博士发表了三部著作，两部中文版，一部英文版。论述了议会法、中国政治心理学和中国的实业发展。中国通过实业发展，可以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为全国人民谋取福利。当他的两个目的达到时，中国将成为一个既繁荣又善治的国家。这样孙博士的毕生目标就实现了。^①

这就是孙中山和宋庆龄毕生为之奋斗献身的理想的民主共和国。

陈炯明的叛变宣告了“护法”的失败。在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孙中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然而愈挫愈奋。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并继续推进革命，他不得不改弦易辙，在国内外寻找新的同盟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大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孙中山寻找新盟友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正是这“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长期所领导的、所依靠的力量再一次分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宋

^① 《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5-28页。

庆龄在陈炯明叛变中的表现，确信她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事业的忠诚，确信她对孙中山的帮助和影响的力度，便请她去说服孙中山放弃三大政策，为宋庆龄所拒。

1925年孙中山的非时逝世，使这位中国的共和之父没能看到祖国真正民主共和的实现。他所留下的遗产，也是辛亥革命的遗产：一个只有躯壳的共和国和一份思想遗产——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孙中山在一病不起之际，嘱咐同志及国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①

宋庆龄毕生守护和弘扬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的遗产，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奋斗终生。

根据孙中山的遗嘱，宋庆龄认为三民主义是实现孙中山民主共和理想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②宋庆龄以“三大政策”作为检验真假孙中山事业继承者的试金石。她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向一切假共和、假民主、真专制、真独裁进行不懈的斗争。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清共”“分共”，并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宋庆龄认为被蒋汪控制的国民党“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③。“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④因此宋庆龄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⑥宋庆龄明确表示了她与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叛徒划清界线。至于对蒋介石政权，宋庆龄从它的所作所为，断定此时“国民政府的盛名，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昔日受革命委托而担任领导工作的人……操纵利用国民党，而他们自身也正在堕落，或

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1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即将堕落为新恺撒的臣仆了”^①。认清了蒋氏政权的反人民性质后，宋庆龄多次拒绝在政府内任职。自此以后，她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探求实现孙中山理想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认为已经找到使孙中山理想得以实现的道路和模式。她认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②（孙中山曾多次表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当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而“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实现的道路与手段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③这是宋庆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表述，也说明了她同时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宋庆龄认为她的这些思想认识非但不违背中山先生的思想，而且是在革命新时期的运用与发展。因为孙中山“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她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④。在与蒋氏独裁政权斗争中，民权主义是宋庆龄的武器，“民权保障同盟”的建立即是一例。当日本侵略者以战火欲将中国变为殖民地时，宋庆龄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和“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此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认为这是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历史时机，她号召防止内战爆发，呼吁结束一党专政，“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指出：“目前的危机并不是那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解决的办法虽然困难，却是明显的，那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⑤宋庆龄的观点，表明她突破了政党政治的局囿，要求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宋庆龄认为“人权”是人民民主的核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5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心。她详述此时三民主义的要义：

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

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了。

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现在是用实际行动来建立民主的时候了。

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民生主义就是说，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纲。

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①

解放战争结束了蒋氏独裁政权。宋庆龄热情欢呼并憧憬“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②。

可见，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的过程，就是实现孙中山理想的过程。她把握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本质的核心——革命和自由、平等、博爱，与时俱进，发掘并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有着生命力，仍然成为团聚人民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凝聚力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多次发表演说或撰文，怀念孙中山，肯定他的历史功绩，称颂他是“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指出“孙中山所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理想。他遗留给我们的还有……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号召人们“向孙中山学习！”^③

宋庆龄是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毕生守护者。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41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宋庆龄——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忠诚守护者

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同时也是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忠诚守护者。

列宁曾经说过：在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领袖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核心和集体——无论他个人多么强有力和具有鲜明特色，他也只不过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中的一员。这不仅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多样化，还因为民主政治是排斥个人独断专行的。在这个问题上，近代社会政治生活迥异于古代和中世纪。因此，深入全面地研究领袖人物，就必须顾及群体——首先是他的亲密的助手、战友与同志。

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他的主要助手往往有所变化。从追随孙中山革命至孙中山逝世后，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很多，而宋庆龄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虽然他们并肩战斗的时间并不长。

研究孙中山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不可不研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孙中山的后期活动能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支持与影响，是这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她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赋予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力。她的奋进成为连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和

革命不同阶段的津梁和纽带，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历史舞台，仍鼓舞人们前进，宋庆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一）孙中山的助手与伴侣

参加辛亥革命，是宋庆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里、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的关键性的一步。1913年，这位年轻的美国留学毕业生返国探亲，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在辛亥革命高潮已过的革命尾声中，在孙中山极度困难、前途未卜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伟大事业中，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迈开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中坚实的第一步。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共和制度的主要缔造者、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袁世凯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归来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亲自引领，来到孙中山的身旁。在革命的低潮中，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给他以坚定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和战友，进而成为孙中山终生不渝的伴侣。他们一起互相砥砺，共同探索，与时俱进。

作为孙中山的妻子、学生、助手、战友，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十年征程。这是“艰难顿挫”的十年，先是为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而斗争，历尽险阻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时代的大潮中奋进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宋庆龄当然更多的是接受孙中山的指引。但他们的相互关系并非是单向的，学生对导师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宋庆龄继承、捍卫和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她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她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她无愧于她的丈夫、师长、战友和同志——孙中山。

大致说来，从1913年秋宋庆龄开始协助孙中山工作；1914年9月正式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合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是“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的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并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时期。

从“二次护法”失败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上下求索，与时俱进，探讨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思想，求索拯救祖国的新道路，成为孙中山晚期的重要助手与战友。她协助并促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逝世后至1927年8月出国访苏前，宋庆龄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磨砺，积极团聚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坚决维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1927年8月以后，宋庆龄旅居欧洲，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访问了马克思的故乡，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自我超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在其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历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她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以下简称为“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以此为旗帜，召唤国内各阶层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朋友，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懈奋斗。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开始并肩战斗时，形势极为严峻：辛亥革命的成果已为袁世凯所窃夺，“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孙中山的共和理想只是昙花一现。再次作为流亡者，孙中山陷入极端痛苦和困难的境地：“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①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相互诟谮，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②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但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革命事业处于低潮，孙中山的前途也难预卜。宋庆龄这时的到来，使孙中山在顿挫中受到鼓舞，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抚慰，长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藉。

宋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合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婚姻不同。前夫人卢慕贞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承担了孙中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所有后果——抚养孩子，侍奉长辈，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但她不可能深切理解孙中山的事业，更不能在事业上直接给予帮助。而宋庆龄则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本，第160页。

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及至大学毕业，马上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给予具体的支持和帮助，终生义无反顾。宋庆龄在自己的《自述一》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① 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她认真阅读各种材料并加以分析对比，进行反复的思考。宋庆龄当年同学的回忆谓：“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种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忠贞不贰的谋反者了。”^② 宋庆龄虽然在大洋彼岸，心灵却与祖国息息相通。乃至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将她的全部激情倾注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文章讴歌了孙中山领导的事业和辛亥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欢呼“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③ 宋庆龄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④，表达了她对祖国殷切的期望和深挚的爱。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革命的必然性——“压迫导致了革命”；革命的合理性——“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表明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在剧变的形势的推动下有了飞速的发展。还在五个月前，她曾在校刊上发表过另一篇政论《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文章虽然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但却认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的“言传身教”实现改革，并且认为“‘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

①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②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全译本），澳门书店1985年版，第115页。

③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转引自《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④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转引自《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①。文章充满对祖国的责任感和不合实际的幻想。前后两文相较，说明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使宋庆龄的思想在短短的几个月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承认革命的合理与必然，为她不久以后坚定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宋庆龄1913年8月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日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的父母时，她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宋庆龄回国与家人团聚仅半个月，即跟随父亲和姐姐宋蔼龄从神户移居东京协助孙中山工作。她几乎每天都会随父亲和姐姐往访孙中山，每次在孙中山处短则两小时，长则半天甚至大半天。有时一天会去两次。^②这段时间正是孙中山为筹组中华革命党以期发动武装讨伐袁世凯的“三次革命”，紧锣密鼓地与陆续到达日本的同志反复商讨，并广为联络日本各界朋友争取支持的时候。他在日本密探的监视下，几乎每天都在住所会见来自国内的同志及日本朋友；有时也往访日本重要的朝野人士。宋氏父女除担负繁重的联络工作外，有时也参加会见与密商。在孙中山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宋庆龄大大加深了对孙中山的人格及他的事业的理解。1914年9月，当宋蔼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宋庆龄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正式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成为一名战士。不久，她顶着巨大的压力，与孙中山结合，成为他忠诚的伴侣。

宋庆龄忆述这段时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时说：“从我的父亲与孙中山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说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

^①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里安》1911年11月号；《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64—65页。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9—852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95—97页。

的事业而工作。”^①

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合，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爱情——孙中山之前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给他以慰藉，同时成为了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这桩婚姻不能也不应以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年轻、美丽、温柔、深情而且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当时对于中国来说最先进的思想——西方的民主主义。宋庆龄后来回忆自己在美国受教育的情况时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到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②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她的好友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充满风趣和幽默的口吻来表达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③ 宋庆龄忆述她的工作任务时说：“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回信工作。”^④ 当然，在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间，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宋庆龄不仅对孙中山有着深挚的爱情，为了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她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孙中山深深体会到宋庆龄对他的爱与支持，他深情地题赠宋庆龄“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而宋庆龄在她的晚年，为感谢友人赠送鲜花纪念孙中山逝世50周年而致友人的信中说：“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⑤

^① 《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② 《宋庆龄自传》，华光出版社1938年版，第38页。

^③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④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⑤ 《宋庆龄书信·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

（二）孙中山的学生与战友

尽管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表现了她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热忱，但她对中国真正具体的了解，还是在与孙中山结婚以后。宋庆龄曾这样表述过：“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一所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的学校。”^① 她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理解很抽象。她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② 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③ “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④ 正是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了革命。”可是在军阀割据及至蒋氏政权建立以后，宋庆龄亲身体验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⑤

当然，对于人民的苦难，对于旧中国的真正了解，主要来自于革命实践。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加强，军阀混战，生产凋敝，民生涂炭的悲惨状况。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她参加了讨袁、护法、北伐诸役，革命的进程留下了她的足迹，同时

① 埃美莉·哈恩：《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②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英文版）1941年2月号。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6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页。

开阔了她的眼界，加深了对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理解。孙中山对宋庆龄极为信任，让她负责密电码的翻译和保存、处理机要文件、来往函电和对外联络的工作。孙中山后期革命活动中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当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他的《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革命实践加深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当孙中山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狗咬狗”的战争，认为严守中立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宋庆龄在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信中，抨击了段祺瑞之流为获得日本的借款而决定参战的卑鄙行径，认为“有很多自私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企图竭力将中国投入欧战”。^① 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中国以后，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与苏俄联系和学习苏俄的经验做好准备。他们设法与列宁取得联系。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②。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及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他们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③ 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是，当她还是孙中山学生和秘书的时候，她也并非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孙中山思想的变化而发展。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的介绍而窥见一斑：“他（孙中山——作者按）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说到孙中山经常发表讲演时的情形，她说：“那都是他即兴讲的。讲话内容完全是根据政治局势和听众而定。他在讲台讲演时，我

①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3期。

② 孙剑晨译：《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文件》，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③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210页。

常常像猫一样坐在他旁边，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情。”^① 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在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从各种力量的平衡及策略上考虑，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那么，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跃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积极的影响。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被孙中山称为“祸患生于肘腋”的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极度悲愤。但物极必反，这次失败成为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的转折，促使他不得不考虑“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成为促使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催化剂”；也成为孙中山、宋庆龄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契机。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优雅的妇女，内心却无比坚强。她深知当时中国不可没有孙中山，所以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她“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及至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② 以免落入叛军手中。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惩罚陈炯明叛军的孙中山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为了推进中国革命，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宋庆龄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事实上，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反动派的威胁。

孙中山不愧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当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于一生为“改良祖国、拯救同群”而寻求支持者和同盟军的孙中山提供了新的国际和国内条件。面对20世纪初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

①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页。

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他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同盟军。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①为此，他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性与功绩，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与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及相应的战略策略，工人运动由此而蓬勃开展，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已自觉登上历史舞台，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将取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并且在斗争的实践中愈益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列宁一样，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也给予肯定的评价。

孙中山从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一九一八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她还指出：“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六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②孙中山毕生期望找到帮助中国革命的“拉斐德”^③，终于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中找到了。

在促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方面，宋庆龄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④起草。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访问了孙中山。但很遗憾，这次会见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1921年冬，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中国共产党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1—382页。

③ 拉斐德：法国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自卫军司令。后曾率众携带武器到美国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

④ 《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5页。

人张太雷和共产国际驻远东的代表马林，商谈多次。他们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级的政党的建议——即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同盟的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同年夏，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代表身份在广州与孙中山会谈十余次，再次谈及国共合作。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陈炯明武装叛变后，孙中山和宋庆龄从广州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并认为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①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议题，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两党合作。从孙中山方面来说，“感觉到苏联对这场求生存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孙中山——作者按）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②就在孙中山回到上海仅十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来到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她后来回忆道：“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孙中山——作者按）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③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畅谈不厌，几乎忘食”^④。可见孙中山、宋庆龄与李大钊关系的真诚亲密。

① 《先驱》第9期。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

④ 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政干部文摘》，《党政干部文摘》杂志社2001年第8期。

孙中山、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继续总结和探索。曾任孙中山秘书的田桓回忆1923年2月的某一天，他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时，忆及“宋庆龄同志也和我谈了一些关于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她鼓励我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着想，要继续努力为革命工作”^①。说明在酝酿国共合作的时候，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还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一九二四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②正是孙中山、宋庆龄从爱国主义的基点出发，经过痛苦的探索，取得了这极其深刻的共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③通过他们多次的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国共合作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右派反对这一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当时真正彻底并始终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党员并不很多。就是在孙中山的亲密助手中，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虑。廖仲恺、宋庆龄是寥寥者中最坚定的两位。宋庆龄对于促成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订三大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她回忆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合作中，象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

①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

他。”^① 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②

孙中山在制订三大政策时，压力重重。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国民党命运的重大决策，他当然会思虑再三，内心也会有矛盾。这时，宋庆龄的理解与支持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涨，也体现了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思想的升华，他们的思想适应历史的潮流，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进步性。

（三）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忠诚守护者

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渐背离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宋庆龄在廖仲恺牺牲以后，能坚定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继续与时俱进，实与她同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一致并参与制订三大政策的革命实践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宋庆龄很快从失去丈夫与导师的悲痛中站起来，积极投入因国共合作而高涨的国民革命：她支持“五卅运动”；在国民党“二大”等一系列会议上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她大力推动妇女工作，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积极参与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但是，就在国民革命高涨的时候，反革命的逆流也在潜滋暗长，反对孙中山手订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亦从幕后策划而逐渐变成公开进行。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被暗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暴力对付左派的先声；“西山会议”使国民党原来潜在的分裂危机变成公开的行动；“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分共”、反共的信号。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政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466页。

^②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农工”的政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历史把继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的重担压在了宋庆龄和她的战友的肩上。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之一，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相比，她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晚得多，也比他们年轻得多，但由于她忠诚于革命的原则，对孙中山的事业和思想有着深刻理解，对革命事业充满献身精神，使她在国民党内和全国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何香凝在上海人民悼念孙中山的大会上致词时称颂宋庆龄：“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①这是国民党左派对宋庆龄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她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以及她对孙中山思想阐发的权威性的完全认可。

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表现在她坚决支持和参与孙中山捍卫共和的斗争，促成孙中山后期思想的转变这两个方面；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和影响，则表现为把握孙中山思想的革命精髓，通过对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阐发，维护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纯洁性，对各种歪曲孙中山思想的观点进行无情的批判。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与战友，她的作用荫蔽在孙中山的光辉之下，那么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作为高举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革命旗帜的旗手，在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斗争中，以她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她仍在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她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把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贯联起来，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生命力。

在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斗争中，宋庆龄始终把握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灵魂和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赋予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容和特点。

首先，宋庆龄强调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不可分割。而在当时的实际斗争中，她更突出强调三大政策的实施。她视三大政策为新三民主义的灵魂，

^① 《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是新三民主义的内涵，是实现新三民主义的途径，是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的体现。她多次强调“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①；“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②；“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③；孙中山“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④。宋庆龄把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她的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仍多次指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⑤这样，宋庆龄始终把把握住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任何抛弃了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都是对孙中山的背叛，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其次，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宋庆龄赋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涵。

（1）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民族革命”是孙中山领导革命事业的第一面战斗旗帜。在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进步，从旧三民主义时期对内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对外避免帝国主义瓜分、“共管”，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时期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但孙中山始终对帝国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没能提出明确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帝斗争纲领。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联俄”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志，而在实践中，她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与深化。还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宋庆龄第一次以政治家的身份就“五卅惨案”发表讲话时，便指出要以“五卅运动”为契机，“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并指出与帝国主义“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在斗争中“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段……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⑥表达了她与帝国主义绝不妥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1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协的立场，以及在反帝斗争中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之后，宋庆龄已经认识到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①。这是她对民众联合所依赖的阶级基础的明确表述。

在以后几年中，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又有了本质的飞跃，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争取祖国的民族独立自由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相联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的一切弊病及引起的社会性危机充分暴露无遗；为在全球重新分配利益的争夺正演变为帝国主义战争。20世纪30年代初，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宋庆龄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她接受了列宁主义学说，对当时的世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② 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宋庆龄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侵略和掠夺的根源。“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这个斗争必然导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③

稍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扩大和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肆虐，宋庆龄呼吁“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④。在中国，迫切实行以“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⑤，她充满信心地预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⑥。宋庆龄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充实以坚定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内涵，团结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8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国内外一切爱国和友好人士，参加到中国共产党倡议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而她自己则长期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领导人，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懈斗争。

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努力建立广泛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以“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①达到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铲除殖民主义，彻底铲除民族压迫，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这就是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完全一致，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特点。也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大发展。

(2) 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没有使孙中山理想的共和国得以建立，却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的蒋介石独裁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敏锐地察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并没有实现。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要不要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如何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怎样才能体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宋庆龄忠于孙中山的建立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的理想。她高举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大旗，同时又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重大发展：

首先，宋庆龄以工人、农民这“两大基本群众”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来衡量民权主义是否得以实现。因此，她赋予了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民”以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她指出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农民“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②，这种观念，显然是对孙中山晚年曾经赞扬的“人民独裁”论点的发展。宋庆龄认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它只给予少数人民主的权利。甚至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制的。他们只能对资产阶级所允许讨论的问题、允许进行的选举和允许存在的政党表示意见和进行投票”^③。受西方民主熏陶成长的宋庆龄对于西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页。

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① 孙中山理想中的新式的共和国“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②。

其次，宋庆龄肯定工农大众以革命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真正的民主权利，才能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得以实现。这是对孙中山期待在民国成立以后的“民权运动之方式”，主要是采取“五权分立为原则”的思想的重大发展。宋庆龄认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③ “为了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④。针对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诬蔑，宋庆龄极为明晰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⑤

以革命武力去实现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权，是宋庆龄给予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所增添的、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新的内涵。从而使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革命阶段的时候，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宋庆龄对于民权主义的补充与发展，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3) 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认为民生主义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旗帜。孙中山把民生主义主要归结为土地与资本问题。鉴于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民生主义，则更着重于土地问题的解决，给“社会革命”赋予了更深广的内涵。

由于国共合作而高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而归于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项也没有实现，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内的当权派“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三大政策被彻底抛弃：“农民、工人、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①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由帝国主义支持的新军阀，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蒋氏政权，即反对“三座大山”。

在革命的新时期，宋庆龄不得不重新考虑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权以及力量的配置等问题。在“宁汉合流”的前夜，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右派决裂。在此后的两三个月中，宋庆龄多次发表声明和讲话，阐发民生主义的要义。她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的旗帜，力图重新集结革命力量，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宋庆龄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作为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总纲，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②。但此时宋庆龄所指的社会变革，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所指的社会变革，含义已不完全相同。

孙中山为使贫困落后的祖国臻于富强，并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提出了民生主义，用以预防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希望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为主要手段，医治资本主义的溃疡，并求“毕其功于一役”，使得社会公平公正。孙中山重新解释民生主义，他还是希望以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的手段，使土地逐步国有，由国家将土地授予农民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但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阶级基础，因而他从来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因之，他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做革命的主力军。同样，虽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节制资本”比过去给予了更大的注意，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但他也从来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阶段中的地位与作用。孙中山没有把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同国民革命——政治革命密切联系起来。而宋庆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发展：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分割。从而把孙中山的带有改良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发展成新民主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主义革命阶段的民生主义，使民生主义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而且更富有生命力，成为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庆龄对“社会革命”作了新的阐释。她认为：“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她认为首先“必须解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①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宋庆龄以最明确的语言提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②宋庆龄赋予孙中山民生主义——“社会革命”以真正的革命含义。她对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论述，表明她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何等真切，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把握得何等准确。

对于革命的主力军，宋庆龄认为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③

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宋庆龄在1927年就指出，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④如果说1927年，由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国民党左派旗帜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约，还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的。但几年以后，即1933年9月，宋庆龄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中，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革命阶段中工人阶级领导和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⑤“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⑥从宋庆龄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论述，我们一方面可以体会她对中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1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26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认定，同时亦可发现她思想发展的轨迹。

宋庆龄关于“社会革命”的论述，对民生主义是极为本质的补充与发展，使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达到了一致，使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成为团结广大人民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宋庆龄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对三民主义加以阐发并提出实施的途径与措施。当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后，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被剥夺，她认为当时最必要的是实现“民权”，并创建了“民权保障同盟”；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时，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她领衔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递交了《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并号召全国人民本着民族主义的原则，同时要求实现“民权”与“民生”，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当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真正民主的人民的联合政府，她重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现在是用实际行动来建立民主的时候了。”；“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①

（四）号召人民学习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孙中山

新中国的建立，使宋庆龄欣喜地看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宋庆龄仍然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她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理解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的“总的方针和原则”，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地及时地补充体现时代特点的内涵。她以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内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新的革命事业中，并为这个事业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宋庆龄理解的孙中山是：“直到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0页。

最后一息，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他能够表达的最后思想还是革命，是怎样保卫革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① 因而她号召人民学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和“不断进步的要求”，^② 为振兴中华而不断奋进。

多年以后，宋庆龄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对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的提问时，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③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6—46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5页。

③ 《斯诺文集》第1卷，第101页。

论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在近代世界，特别是 20 世纪，民族独立和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

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进了近代的中国，民族矛盾更处于突出的地位：自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短短半个世纪，列强用侵略战争胁迫腐败透顶的清政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数十个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租界”、驻军、治外法权、关税协定……，幅员广袤的东方帝国面临被瓜分的厄运。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才使帝国主义将瓜分中国的企图变为“共管”。他们认为由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媚外政策的清朝政府作为代替他们攫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更为合适；而清朝统治者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则把外国侵略者作为维持现存封建统治的靠山，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加深和激化。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压迫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在中华民国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也导致了他们同少数民族的对立。两种性质的民族矛盾日益纠合，使近代中国社会成为了半殖民地和民族的牢狱。然而，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① 面对愈来愈迫近的“瓜分”与“共管”的民族危机，任何先进的个人、团体和社会运动，都不得不把救亡——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94 页。

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首先举起了“民族革命”的旗帜，并且制订了民族革命的纲领——民族主义。

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思想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结合的产物，他“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因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成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并打下深深的印记，造成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点和优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的口号作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提出“驱除鞑虏”的时候，摒弃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封建的宗法色彩——不是笼统地反对满族，而是反对“满洲贵族的宰制”。而且把民族独立的实现，与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密切联系起来。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前，“反满”被作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由于满洲贵族的统治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时还由于它以腐败透顶的“治绩”为列强的侵略提供了可行性。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清朝的统治阶级甘做殖民主义者的“鹰犬”，清政府更充当了“洋人的朝廷”的角色。因而，“反满”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口号，曾经起过广泛的动员作用。在面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的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得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严酷现实，使救亡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因之，挣破殖民主义枷锁，争取民族独立，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成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另一基本内容。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却错误地把反帝斗争融合在“反满”的革命中，因而民族主义便不能科学地概括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内涵。此外，民族主义也还糅杂了某些大汉族主义的因素。尽管如此，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仍无愧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的战斗旗帜，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的基本民族矛盾，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摆脱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孙中山重新审视总结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并作了重大的补充与发展，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并在实施的时候制订了“联俄”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政策；在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时，确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即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①比较科学地概括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从而使他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然而，孙中山逝世后，他昔日的主要战友与“学生”，大多背叛了他的思想与事业，成为了新军阀与官僚政客。真正忠诚于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革命者，团聚在宋庆龄的周围，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孙中山的“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的理想，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得以实现。

宋庆龄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开始，便全身心地投入实现中国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斗争。年青的宋庆龄曾经以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以后，中国将会获得自由与平等。但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后，在不断的失败与挫折中，日益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以及一切封建势力的靠山，是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头号敌人。和孙中山同步，她的反帝观念明确形成，因此坚决支持并贯彻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支持孙中山制订“联俄”和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政策。孙中山后期思想的发展，蕴含着宋庆龄的智慧，也反映了她在革命的新阶段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国民革命的高涨使宋庆龄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热情，成为鼓舞她在孙中山逝世后高举反帝爱国旗帜的力量的源泉；大革命的夭折使她接受了血与火的磨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弥坚，成为捍卫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的英勇旗手。

经过短期的反思与学习，宋庆龄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科学的认识，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步骤的分析，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达到一致。因之，宋庆龄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她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树立了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特点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把握住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核心之一——反对帝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理论作了重大的补充与发展。从此，她自觉地把祖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在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同时，在国际上坚决支持一切反帝的正义斗争，支持一切进步事业，为最终埋葬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懈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

（一）宋庆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和优点

宋庆龄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个满怀着民族感情的炽热的爱国者，她期望祖

国能够摆脱贫弱的困境，成为“完善和繁荣”的强国；她反对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帝国的专制统治，认为人们生活于自由、平等、博爱中，“彼此以兄弟相待”，才是理想的社会。对清朝封建帝国的崩溃，她表示由衷的高兴，胸臆中充满国家对民族崇高的义务感。从她十九岁时为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写下的著名政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她对满洲贵族专制统治的憎恶。她已经认识到正是清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①，认为在中国“诸如饥馑、水灾、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每况愈下等一切苦难，最终都应归咎于专横的满人和他们的朝廷中的贪官污吏”^②。因而“在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心底里，不管他是政治家还是劳动者，都蕴蓄着反满情绪”。推翻清朝政府“就是铲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③。宋庆龄欢呼推翻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当年轻的宋庆龄的眼光投向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时候，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一样，主要是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反对极端腐败的满清政府。当时，她还未能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头号敌人，而把反对满清政府的民族压迫，与争取实现国内民族平等和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联系在一起，因此她认为推翻了满清政府也就“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④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真正的爱国者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时候，必然会将民族独立与解放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爱国主义者，必然同时是民族主义者。在宋庆龄早年的政治思想中，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和优点。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寄予深切的期望。认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博爱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博爱尚有待于争取”。^⑤ 宋庆龄认为如果博爱不能实现，社会就“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

①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③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④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⑤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① 既然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已经实现了自由和平等，那么“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②。当时宋庆龄的社会政治及伦理思想，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和主要内容，她衷心希望在推翻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之后，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全国各族四万万人民“彼此以兄弟相待”。由于家庭及所受教育的背景，年青的宋庆龄思想中没有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没有封建的宗法色彩。同时，宋庆龄的民族主义思想，还表现了她鄙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世界眼光。她希望独立自由的中国“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以及在其他方面起作用，而且深信中国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③ 表现了宋庆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义务感。这是宋庆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优点和特点，也是她以后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思想根源之一。

宋庆龄早期民族思想的形成，受到父亲宋耀如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受到孙中山的间接影响。宋耀如青少年时代便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谋生，经历了许多艰苦坎坷，由于得到很多善良的美国朋友的关怀帮助，得以完成在神学院的学业。他受到美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熏陶，并且接受了宗教灌输给他的“博爱”的理念，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和自己的责任。当他学成以后，接受教会派遣归国担任教职时，他给将要成为他的上级领导的上海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团长、传教士林乐知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当我完成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为别人做好事，将他们从无尽的惩罚中拯救出来。”^④ 但是，宋耀如却遭到他所准备献身的教会的领导人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与压迫，这引起了心底里的反抗。他的经历使他自然地支持并参与他的朋友孙中山为使祖国获得独立自由的革命事业。他担任的教职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掩护。后来，他辞去了教职而从事实业，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为革命筹集经费。他信赖孙中山并追随他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少年时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思想上受西方的影响较

①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②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③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载《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④ 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

深。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姐妹生长在近代中国少有的深受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的家庭中，从小受到较为开明的教育，稍长即进入教会学校读书，他们的成长环境较少封建思想的约束。青年时期，他们又成为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到西方留学的学生，和孙中山一样，受到“欧洲式的教育”。这样的成长过程和环境，对于宋庆龄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后来她曾表示：“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伟大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① 宋庆龄当时是否知道她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并不重要，但她知道她的父亲是正在领导秘密的反满革命并迭遭朝廷通缉的孙中山的挚友，他在自己的印刷所里为革命党印刷秘密文件和传单，并告诉孩子们“不要声张，禁止拿印好的革命小册子。”^② 后来，连笃信宗教的母亲“也承担了爱国的任务，进行秘密工作”。^③ 在宋庆龄留学美国时，时空也没能阻隔她与祖国的联系。她对同学表示如果忘记了祖国，“人生就失去其意义”^④。她对父亲的来信及寄来的介绍国内情况的剪报材料进行研究和思考，“考虑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系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⑤。从而得出了“我坚定地认为我的祖国要有一个根本的变革”^⑥ 的结论。

在美国留学的时期是宋庆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期。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对内反对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国内各民族人民“彼此以兄弟相待，”人人得以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对外希望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于世界，并对“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负有义务。

（二）与时俱进，高举坚决反帝的旗帜

同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是宋庆龄民族主义思想的成熟期。

① 宋庆龄：《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对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宋庆龄自传》，华光出版社1938年版，第38页。

②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③ 张珏：《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27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④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纽约1939年英文版，第116页。

⑤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星光书店1985年版，第115页。

⑥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纽约1939年英文版，第131页。

宋庆龄1915年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一下子就“接近了革命的中心”。从坚决反对满洲贵族专制统治，到逐步明确认识要反对帝国主义，进而坚决支持孙中山实行“联俄”和“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是这个时期宋庆龄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这个时期，宋庆龄称之为“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她在实践中逐步熟悉了中国的国情；她在参与捍卫共和的斗争中，与孙中山一起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在不断地总结与探求中，终于认识到欲求中国的独立，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高举反帝爱国旗帜，成为坚决捍卫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的英勇旗手。

由于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过分地将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融合于“反满”的斗争中，所以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错误地认为民族主义已“因清廷退位而随之实现”，但是严酷的现实不得不使他重新检验自己的认识与理论。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前后，流亡中的孙中山正处在对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自省中，他逐步认识到民族危机依然严重：帝国主义在华的所有特权丝毫没有触动，他们照样掠夺中国的资源，干涉中国的政治，侵犯中国的主权。而且“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①，中国只不过是“半独立国”而已，汉族“实无国家存在于亚东大陆上！而外忧日迫，瓜分豆剖之危机……近且见之实行”^②。对于国内军阀割据与专政的局面，孙中山也愈来愈认识到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结果。他在抨击袁世凯为向五国银行团借款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二十一条的卖国条约时即指出：“设非迅速去袁，则祸至无日，今日所见，唯某国耳！假如欧洲战事底定，必及于东亚问题，俎上之肉，挟均势均利之名义上临之，庸得免耶！”^③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破产以后，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全部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为了实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不惜以我国山东、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为抵押，向日本大量借款。而且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宣布与德国断交，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孙中山的学生，宋庆龄不断从孙中山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同步发展，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分析有了长足的进步。1917年4月，她在给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信中，严厉谴责了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并且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她在

① 《总理遗教·演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年版，第68页。

② 《总理遗教·演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年版，第336页。

③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载叶夏声：《革命救亡论》，第58页。

信中说：“很可悲的是，不少人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却情愿牺牲国家的命运。”^①宋庆龄指斥段祺瑞军阀政府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是以“牺牲国家生命”为代价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以极大鼓舞。列宁领导的苏俄和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给予的道义和物质支持，使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同盟者。五四运动的爆发，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与勇气，这些新的国际国内条件，对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并修改补充自己的理论。孙中山在1920年总结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时，就表现了思想上的巨大进步，认识到推翻清朝统治以后，“其实民族主义也未完成”^②，这是因为“清室虽然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③。中国人民“脱离了满洲人的奴隶，还要作外国人的奴隶”^④。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受着世界列强的宰割，情况比沦为某一国殖民地更为悲惨，更次一等，中国是比殖民地更不幸的“次殖民地”。因之，他得出了新的结论：“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以束诸高阁。”^⑤他号召革命党人要“在民族主义上作工夫”^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集中表现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对外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确立了“联俄”的政策；对内“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孙中山指出：“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⑦而国内军阀统治与割据的原因，即是“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封建军阀“依附帝国

①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② 《总理遗教·演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年版，第35页。

③ 《总理遗教·演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年版，第38页。

④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三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418页。

⑤ 《总理遗教·演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年版，第224—225页。

⑥ 《总理遗教·演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9年版，第44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主义而生存”^①。因此，“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而“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②直至他的生命走向终点之际，仍谆谆嘱咐他的同志们和后继者一定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是这个时期民族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只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而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

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是孙中山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对民族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而这其中，包含了宋庆龄的智慧与心血。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她信奉他的思想，接受他的领导，协助他的工作。在革命前进或遭到挫折时，她同他一起总结经验，进行新的探索。她曾如此忆述1918年她和孙中山在上海的生活：“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爱的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科、埃利斯、危普顿·辛克莱等人写的书。”^③更重要的是，宋庆龄全力支持和促成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制订，并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她参加孙中山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许多重要的会见和谈判，为会谈准备各种材料文件，并负责处理与苏俄联系的往来函电。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原则以及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原则态度，宋庆龄和孙中山都认识到“俄国绝不要求治外法权和治外法权条款，也不要求在中国的领土建立法庭。俄国废除任何有损中国人民主权和利益的让步和特权。俄国在它同中国的关系上建立了完全和绝对平等的原则”^④。他们深信革命的苏俄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可靠盟友，而且认为俄国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一个民族怎样从外国压迫和不公正的桎梏下解放出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

③ 张珏：《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27辑，第1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孙中山1923年9月复函苏联代表加拉罕。转引自《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2页。

来”^①。宋庆龄把促成“联俄”政策的制订，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重要条件。

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是融合在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中，那么，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即以自己的言行，向国内外宣告了自己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她继承与坚持捍卫的，是孙中山重新解释过和民族主义的革命内核——在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在租界内，屠杀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而进行示威游行的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的反帝斗争迅速高涨。在人民反帝斗争的高潮中，6月9日，宋庆龄就“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她首先指出惨案发生的原因“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起而反抗，正是“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的表现，是“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②她十分明确地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③。由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对于这场斗争进程的看法、目标和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对于那种仅仅提出释放被捕人员、抚恤死者亲属、惩办杀人凶手等要求的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案，宋庆龄敏锐地感到这样将会使运动中辍或引入歧途，她鲜明地提出“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④。这远大的目的与彻底之主张，就是“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⑤。宋庆龄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中，表明了自己坚定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她同时号召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因国共合作而组织起来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成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她从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中总结得知“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观之，皆不可靠。”而“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惧，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故此，她认为“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

① 1924年9月英文《广州日报》发表的访问记，转引自《宋庆龄选集》，第38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①实际上，宋庆龄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她认为应当“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②这是孙中山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的具体体现。鉴于别有用心者造谣中伤，诬蔑学生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赤化”，企图搅混思想阵线，瓦解斗争队伍，宋庆龄给以坚决回击：“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对内推翻满清帝制，对外反抗一切强权与侵略，皆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并且指出“此为一切爱国者应有之主张，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③宋庆龄的这篇谈话，发表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是她追随孙中山革命十几年来第一次以个人名义、独立地向社会发表自己的政见，这在当时极为必要。她以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鼓舞人们“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向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同时，她向国内外表明她忠诚于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并接过孙中山的反帝爱国旗帜，继续为推进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奋斗。她所发表的意见，对“五卅运动”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五卅反帝爱国运动。6月5日，上海妇女反帝统一战线组织——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向警予提出的《对外人惨杀同胞宣言》，提出：“撤退武装、释放同胞、惩凶道歉、赔偿损失、收回租界，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之自由、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十二条要求。”^④宋庆龄出席了这次大会，对妇女的反帝斗争表示全力支持。6月10日，宋庆龄又赴大同学校讲演，她讲述了“五卅惨案”的有关情况，宣传反对帝国主义。^⑤宋庆龄并联络于右任、徐谦等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为失业的工人进行募捐。在募捐启事中说：“五卅事件，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之奇耻大辱。全国民众已起为民族独立人权保障而奋斗，学生罢课、商罢市、工罢业，无不抱绝大之决心，为充分之牺牲……因罢工而失业之工人方逐日加增而未已……吾人何忍坐视此爱国工人饥寒困顿。故今日救济之事，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页。

④ 上海《申报》1925年6月6日。

⑤ 上海《新闻报》1925年6月10日。

实刻不容缓。”^① 由于宋庆龄等人的感召力，各界人士甚至国外华侨朋友纷纷捐助，给五卅运动以道义及物质的极大支援。6月30日，宋庆龄还抱病专程由上海赴北平，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各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雪耻大会。她虽因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发表演说，但表示“因系群众运动，不能不到”，给与会者以极大鼓舞。

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6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空前规模的省港大罢工。宋庆龄立即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题为《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予以声援。她将孙中山1923年12月为力争两广关余^②而与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告今日热烈反抗英帝国主义之国人”，用当年孙中山“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的斗争精神，昭示国人“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鼓舞人们“毅然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③ 宋庆龄的这篇文章是为支持和鼓舞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而作，也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所写的第一篇纪念文章。她在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把握住孙中山后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内核，不失时机地加以阐发，从而表达了她“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的决心，态度极坚定，旗帜极鲜明。同时，宋庆龄还给省港罢工以直接的援助。经过她的奔走呼号，为罢工工人向海外侨胞募集了十余万巨款，^④ 这对省港罢工工人坚持长时间的斗争直至胜利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她的思想与实践，对于斗争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和巨大的鼓舞作用；她自己在与广大人民并肩的战斗中也受到锻炼与磨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的力量、历史地位和作用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这对于宋庆龄世界观的转变，有着重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卅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高潮，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勇气和力量。宋庆龄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她的言行，体现了她一贯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与特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于世界而

① 上海《申报》1925年6月10日。

② “关余”即“关税余款”。根据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辛丑条约”，中国政府以海关关税收入作为偿付列强掠夺的“庚子赔款”之用，在清偿每年的赔款后，所余部分，即为“关余”。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11页。

④ 刘家泉：《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24页。

奋斗。

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革命在孙中山逝世后仍曾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中迅猛向前发展。但大革命的夭折，使全部旧秩序得以恢复，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①在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帝国主义无疑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没有被触动，而且日益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蒋介石政权的性质及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则采取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是中国社会危机及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

宋庆龄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政权非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它“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②。正是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政策，“鼓励并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窥伺川西边界。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法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云南。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财政和政治霸权；帮助了国际联盟（英国和法国）更进一步实施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恶毒计谋”^③。这一切，使得“中国正受着被帝国主义世界瓜分的威胁”^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越烧越烈，就是这种严重威胁的信号，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仍然是一切爱国的个人、政党、社会团体以及进步运动所面临的首要课题。作为孙中山事业的忠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宋庆龄义无反顾地接过并高举孙中山反帝爱国的旗帜，她在与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决裂之后，曾力图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以便继续领导革命。但是国民党左派的涣散很快使她感到失望，然而她“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⑤列宁关于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理论曾给予孙中山与宋庆龄极大的鼓舞，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已从大革命的高涨和失败的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与中国共产党人多年的合作使宋庆龄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希望，她产生了新的信念，获得了新的力量的源泉，满怀信心地高举着孙中山的革命旗帜，走上了新的征途。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6—8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页。

（三）民族主义思想的飞跃——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她重新审视自己原来的民族主义思想，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这是她对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继承、总结、扬弃、发展的必然结果。

彻底地、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是宋庆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以阶级观点来分析民族问题，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来处理民族问题，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为祖国实现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是宋庆龄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也是她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重要、最本质的发展。从此，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祖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自觉地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把前者作为后者总战略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同时，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①，这是宋庆龄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希望国内四万万人民“彼此以兄弟相待”的思想的科学发展。承认国内各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对于宋庆龄说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在旧中国，“救亡”始终是每一个革命者所必须首先面对的课题，宋庆龄的民族主义思想充满了现实的战斗的性质，她大量的论述并全力以赴进行斗争的，首先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候，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他的民族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并提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相应的斗争口号，表明孙中山、宋庆龄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不断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孙中山没能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和征服是由其阶级属性所决定，殖民主义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孙中山痛切地感到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他认为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力”——指人口形成的压迫：帝国主义列强人口增殖率高，中国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或减少，而人口众多的民族就有可能征服或同化人口较少的民族。另一方面是“人为力”——包括“政治力”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和“经济力”，孙中山认为“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①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外交侵略”以及支持反动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反对革命，都属于“政治力”的侵略。“经济力”的侵略，是指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操纵金融、控制海关、租地割地以及在中国攫取的种种经济特权。“经济力”的侵略这种“压迫”，较之“政治的压迫，还要厉害”。^②而两者却又是“相互为用”和“彼此补充”。帝国主义就是通过“政治力”、“经济力”的侵略压迫，一步步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痛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和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但他却未能深刻理解这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因而长期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存在幻想。甚至在1923年10月致犬养毅的信中，仍然游说日本政府放弃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承认革命的苏俄，“毅然决然以助支那革命之成功”，并“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化帝国主义之后尘”，作“受屈者之友”，进而成为“亚洲之救主”。^③孙中山这些近乎天真的想法，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和局限。

宋庆龄继承捍卫了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内核，认为在新的革命阶段中，反对帝国主义仍然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她把与孙中山对民族问题的共识，在斗争中加以提炼、升华。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宋庆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与属性，逐渐有了明确的符合科学的认识，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内涵有了新的正确的理解。

自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过渡的完成，帝国主义所有的弊病暴露无遗。宋庆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罪恶的渊藪、野蛮的象征、殖民主义的根源，是世界“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阻力，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剥削制度。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处在战后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次历时四年的危机横扫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影响所及，使世界工业下降了37%，贸易额下降了2/3，到1933年，世界的失业者达3000多万人。英、美、法、德、日、意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受到首当其冲的打击。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宋庆龄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对世界进行考察后指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2页。

②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一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0页。

③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原件影印件，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对劳苦大众及其领导者施用了最残酷的压迫、酷刑和残杀，文化与生产的进步停滞。”^① 资本主义国家也曾企图以国家权力去调节与缓和各种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和资产阶级的统治阻碍它们成功”^②。宋庆龄对被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震撼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异常地尖锐：“工人和农民没有饭吃，中产阶级破产，银行和商店纷纷倒闭，连美国都放弃了金本位。”^③ 尽管资本主义“已经显示虽然人类劳动生产力大有增加，它还是没有能力来供给群众粮食、衣服和房屋等生活必需品”^④。“一方面成千成万的人民陷于饥饿，另一方面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一方面成千成万的人民无衣御寒，另一方面工厂纷纷停闭”^⑤。这些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解决，究其原因，是因为“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⑥。“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⑦。

宋庆龄论证了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的必然结果，是阶级斗争在另外一种形式下的继续，事实证明，已经在德国掌握了政权的法西斯“深知自己不能为工人带来面包而只能带来子弹，现在就努力驱使工人走上战场，走向死亡”。而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也是不可缓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于剧烈的经济战争中。货币关税的战争不久即一变而为毒瓦斯、炸弹和重炮的战争了。”宋庆龄如此概述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结成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联盟，另一方面又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

美国在为国内的通货膨胀危机寻求暂时的安神剂，同时又在加紧进行造舰计划以便夺取全世界的海上霸权。英国则一方面因过去所独占的全部海外市场在美日竞争的夹攻下打破了，另一方面英帝国本身也因经济矛盾而面临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8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页。

崩溃了，因此倡导组织列强之间的陆海军联盟，希望在潜伏于外交礼貌的表层下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遭遇到灾难性的爆发之前，进攻苏联。

法国正小心翼翼地在这种矛盾中间寻觅出路。它一方面设法维持凡尔赛和约、小协约国及法波盟约，另一方面则制造反苏集团（四强公约），使法西斯德国正式登上帝国主义舞台，但对德国的加入又心怀疑惧。

在远东的日本正一心一意地在它夺自中国的领土上扩张军备，并且有计划地准备一系列的挑衅行动，以便达到它最后进攻苏联的目的。在这一件事情上，它显然获得国际帝国主义的赞助，尽管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使英美对于日本的行动发生疑惧。^①

由此，宋庆龄作出准确的判断：资本主义各国正在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这个正确的判断已为历史所证明。这样，宋庆龄便论证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②。因之，“建筑在剥削制度之上的旧社会必将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③。列宁在他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在分析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时，曾有经典性的论断：“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④ 宋庆龄以30年代的世界形势和中华民族的危机为例，进一步阐发列宁的这一重要论断。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众多的矛盾对立中，宋庆龄把握住其中主要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析了矛盾的斗争以及转化，论证了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属性。宋庆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述，是她新的历史时期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与论述，是她对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由于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所以宋庆龄能够透过现象而抓住事物的本质，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所决定”，而并非倚仗“人为力”和“自然力”，因此她作出了科学的判断：“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① 对于如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宋庆龄认为首先要进行“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② 宋庆龄通过革命实践和理论上的攀登，终于科学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并彻底地扫除了对于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找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与途径——用民族革命战争打破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必将战胜帝国主义。由此，她对孙中山的新的民族主义作了本质的补充，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自觉地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把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作为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确信中国只有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加速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革命进程；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忘我奋斗的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解放而不懈努力，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宋庆龄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她对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的本质的本质的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为中国的自由、独立、富强的斗争中，表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世界眼光。在斗争实践中，孙中山从来没有忽略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相互支援。曾受到孙中山支持的菲律宾爱国志士彭西对孙中山有过这样的评价：“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③ 宋庆龄回忆与孙中山婚后的生活时，也曾记得在1915年及其后一段时期，在他们东京的寓所里经常坐满来自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但是孙中山还未能自觉地认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因为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分析，因而一方面他对世界革命的总趋向未能得出反映客观规律的结论，未能看到在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将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对民族问题的实质缺乏科学的认识，所以虽然他把反帝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却未能找到民族主义实现的具体途径。

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也是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革命的。强烈的爱国主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③ 詹逊：《日本人和孙逸仙》，美国哈佛大学1952年英文版，第73页。

义使她执著地攀登与追求，使自己从思想到实践都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了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仍然是一面光辉的旗帜，继续发挥它的理论指导作用，她对民族主义的理论进行总结、补充和发展，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反映出世界革命新时代的特点，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宋庆龄基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科学分析，从而深刻理解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①，资本主义制度使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备受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使殖民主义制度得以继续存在。因此，资本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一切打击或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都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是为铲除世界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而奋斗。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共同使命使得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人民必须携手并肩，在不同的战线上打击共同的敌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欧洲工人阶级以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德国和匈牙利还分别在1919年1月及3月建立过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东方的中国、印度、菲律宾、印尼、朝鲜等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此蓬勃高涨，尤其是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革命斗争的阶段。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使宋庆龄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②。她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是最为革命的阶级，并且工人阶级在长期的斗争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创立了本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便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觉地为负载历史使命而斗争的自为的阶级。因此宋庆龄指出：“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③ 她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时代有了新的特点，就是“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完成了革命，古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正为伟大的斗争而集合起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来”^①。这种国际条件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巨大的帮助，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必须集中力量，粉碎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②。从这个认识出发，宋庆龄认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必“将是一个广泛的反帝斗争，最后将汇合起来成为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③。她满怀激情地号召“一切民族革命分子，都有责任为这个斗争而准备起来”^④。

从因为斗争的实际需要，与革命的苏俄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到理论上确认反对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使命，确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认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表明宋庆龄已经自觉地摒弃了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原则融合起来，这是她对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思想的本质的发展。宋庆龄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同时，为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总目标——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而英勇奋斗，成为了一名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

宋庆龄确信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而帝国主义战争，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出发，宋庆龄同时确信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唯一途径。她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实现，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正确道路。从此，她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也为在世界上铲除殖民主义这两条互相支持的战线而不懈奋斗。

（四）在历史的特殊关头对民族主义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的形势极为严峻，受到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地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加强向国内人民的进攻——向人民转嫁危机的恶果；另一方面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以战争来摆脱危机。宋庆龄分析当时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的势力正在欧洲扩展，这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是资产阶级用来延续它已经破产的暴力恐怖制度的最后的、绝望的企图。”^① 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割去了中国广大的土地，还在长驱直入，企图在瓜分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竞争中，抢在各帝国主义者的前面”^②。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威胁，所以“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愈甚，他们对于苏联的仇视愈深，他们发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准备也愈加紧”^③。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首先加紧进攻本国人民。宋庆龄以德国为例：

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在医院里，可以看到数千肢体折断的人们，他们的情况证明了目前遍布德国的野蛮行为。

……

工人阶级的组织被镇压下去了。……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出版、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没有了，结社的权利和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采取行动的权利也没有了。

……

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全被摧残。^④

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历来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的试金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同声高唱“保卫祖国”的口号，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公然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有伟大的列宁号召“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推翻了沙俄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典范。对于战争，宋庆龄同样表现了她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态度。在1933年9月于上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2—73页。

海召开的远东反战大会^①上，宋庆龄曾十分明确地论述了战争的性质和表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

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多数的战争是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反人民的。这些战争给终生勤劳的人们带来无穷的忧患和无比的苦痛。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这些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条约”往往增加规模更大的新战争危机。因此，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了。^②

宋庆龄认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人民共同的首要任务。面对为战争阴霾所笼罩的世界，宋庆龄坚定地履行她的国际主义和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义务。在国际上，她呼吁组成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统一阵线并参与这个反战统一阵线的领导工作；在国内，她高举民族解放的战斗旗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的民族危机，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和尖锐，宋庆龄为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并且以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和作为孙中山遗孀的特殊身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架设起相互支援的桥梁。

在国际上，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人之一，宋庆龄毕生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① 由国际反帝大同盟倡议在上海召开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战大会。会议由宋庆龄领导，具体筹备及组织工作主要由中共江苏省委协助宋庆龄进行。毛泽东、朱德等亦从中央苏区致电祝贺大会召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会议不得已在秘密状态下召开，宋庆龄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的演说，介绍了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情况以及抗日斗争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使全世界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国际反帝大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统一阵线，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发起人 有宋庆龄、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塞（法国）等。1933年，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合并，称“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简称“世界反战委员会”，总部设于巴黎，宋庆龄任副主席，由于翻译不同的原因，亦称“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反帝反法西斯大会”等。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6页。

她致力于反战的宣传和组织反战活动。她把反对和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看作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的斗争的重要部分，所以全力以赴。她大量撰文、演说、会见各国朋友，反复论述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战争是对全人类的进攻，所以“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组织起来”，因为“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①。宋庆龄特别注意到由于几乎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他们开足马力大造战争舆论，“企图麻痹和欺骗人民，驱使他们和别国同阶级的工人弟兄以及同命运的受难者互相厮杀”^②。所以她号召在“全世界正在展开一个运动来唤醒群众，使他们了解迫在眼前的厄运；教育受剥削的人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只要联合行动起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以及将来的人类命运”^③。她在论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列强的侵略的时候，明确指出：“如果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对日本人民或其他外国人民的，那就错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④宋庆龄的反复论述，集中说明一点，即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并肩战斗，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与世界人民的反战斗争相互结合。在积极开展反战宣传的同时，宋庆龄极为注重组织反战的实际斗争，她认为在远东，尤其在中国，应该“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⑤1933年9月，她在上海成功地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国际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这是一次胜利的反战斗争。这次会议是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具体经过大致如下：1932年8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日益临近的帝国主义战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且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推举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任主席，巴比塞为副主席，宋庆龄等国际和平战士任名誉主席。但是作为国际著名的反法西斯战争领导人之一的宋庆龄，却因营救在上海被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夫妇，未能出席这次大会。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10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1页。

1932年底，“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问题，并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会议，表示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支持。宋庆龄得到世界反战会议的通知后，马上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1933年8月，宋庆龄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名义，发表题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声明中分析了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各国，指出它们内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警醒人们高度注意日益临近的世界战争，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制止未来的屠杀”。她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呼吁“欢迎一切愿意协助阻止新的世界大屠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出席”远东反战大会，尤其呼吁国内“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这次大会”。^①宋庆龄的声明表示，她主持召开的反战大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阵线，协调斗争的步伐，另一方面是为了促成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她动员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结成统一的队伍，向还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强大攻势，迫使他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是国民党当局禁止会议在上海召开，并阻挠世界反战委员会的国际代表在上海上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外报告》有这样的记载：“8月间，有非战同盟会代表若干人，自欧洲抵沪，拟在沪召集亚洲非战同盟会，但旋于10月4日乘亚斯卡拉登轮船前往海参崴。若辈在沪时，曾与中国若干过激团体之代表，开秘密会议，并议决在沪设立非战同盟会远东局。所拟在沪召集之亚战非战同盟会，以向本局、法租界、公董局及上海市政府陈请准其开会之时，均被拒绝，未曾举行。”^②报告所载会议“未曾举行”并不确实，只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会议不得不在极为秘密的艰难状态下进行。宋庆龄后来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反动当局一开始就对我们仇恨万分，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由于我们正处于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就必须严守秘密。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举行会议的地点在哪里，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小房子里。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83页。

^② 《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年报》（1933）。

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连外宾在内，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用的一张小桌子。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① 斗争的艰苦可见一斑。宋庆龄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分析了正义与非正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动的战争“都是反人民的”，一切“帝国主义战争、军阀战争、干涉苏维埃中国或是干涉苏联的战争、对民众的压迫和恐怖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动的目的”。^② 指出革命的人民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③ 宋庆龄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以全部力量制止帝国主义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便要按照列宁的教导“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致“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宋庆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对帝国主义战争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者，她看到“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④。她以普法战争产生了巴黎公社、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十月革命的成功等等历史事实，鼓舞人民坚定正义必胜的信念。她坚信，假如世界大战再次发生，“这战场总有一天必将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墓地”^⑤。这篇著名的演说，归纳总结了宋庆龄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表明了她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宋庆龄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宣战书。会议最后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的抗议书》、《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等等，并决定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当选为主席。其后，许多省市又成立了分会，成为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战机构。当会议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当局才通过美国记者伊罗生在《大美晚报》上所发表的消息，得知曾在上海召开过如此重要而成功的国际反战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316、316—317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8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8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5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1 页。

会议。这次会议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成功领导的一次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行动，给饱受内战之苦又面临日本侵略战火的中国人民以鼓舞，尤其使世界人民更明了中国的情况，并给予中国人民的斗争以更切实际的支持。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鲁迅对会议作了如此评价：“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国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① 1936年7月，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决定在总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支援西班牙共和国和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同盟总部派出美国的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专程到中国迎接该同盟的副主席宋庆龄出席会议。宋庆龄因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不便出国，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经与中共商讨，委派文化救国会党组书记钱俊瑞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以及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宋庆龄在全力投入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同时，以国际政治家所特有的敏锐目光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不懈地为加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阵线的团结而呼号。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英国、美国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但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暂时的利益，英、美等国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一直采取绥靖政策。宋庆龄及时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政策是“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它们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他们帮助日本加强军事机构之后，现在又可能在设法帮助它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②。他们的目的在于以牺牲中国，“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她指出英、美政府政策的自私与短视，指出中国的抗战“是远东局势的关键”，并且中国的抗战对于全世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③。宋庆龄的预见及分析是何等正确！不久，美国尝到了对日本侵略采取纵容政策而结出的苦果——它在珍珠港事变中受到日本沉重的打击。英、美在珍珠港事变后，被迫宣布对日作战，但是在行动方面，他们却迟迟没有开辟远东战场。在亚洲，中国人民仍然负担着主要的对日作战任务，中国的军队和人民“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

① 《鲁迅书信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7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1、147页。

争的前卫”而成为“全亚洲的伟大屏障”。^①在欧洲，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苏联人民也作出了伟大的民族牺牲。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胜利根本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但是英、美两国出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和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的原因，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延缓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宋庆龄认为巩固和发展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仍然是战胜法西斯的关键。1943年9月18日，她在法西斯意大利公开宣布投降后几天，在向海外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即指出：“今天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失败已经在望，那末，我们就更需要保持并且加强用这样大代价换来的团结；我们就更需要保持并发扬民主；全世界人民就更需要孜孜不倦地为全世界一般人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②对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高涨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宋庆龄由衷地感到鼓舞并给以支持，她认为“对于象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因为“所有的民族革命都曾得到世界各地进步思想和行动的支持”。正如“美国的革命在英国人民中间有它的朋友，同时它本身又影响了法国的革命。我们推翻满清的运动深深受到美国的革命传统的影响，而我们反对军阀、争取人民政权、争取真正民族平等的运动，则又受到苏联的革命的鼓舞与支援”^③。宋庆龄始终把民族解放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在世界上埋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目标联系起来；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阵线中，宋庆龄始终着眼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奋斗，而对于在战争中结成反战联盟的各国，则以又团结又斗争的方式，以斗争去维护反战统一阵线的团结，表现了她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对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深刻理解，也表现了她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灵活的斗争艺术。

在国内，宋庆龄确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因此，她高举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旗帜，团结和带领各阶层的爱国人士，投身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行列，自觉地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按照不同阶段不同的战略任务，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与方针。

1931年8月，旅居欧洲的宋庆龄因母亲病逝返国。9月18日，日本根据蓄谋已久的大举侵略中国的罪恶计划，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发动了“九一八事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8、17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7—16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5页。

变”。这是日本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抢先实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计划的野心勃勃的侵略行动，而美、英帝国主义希望把中国的东北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跳板，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共产党，建立独裁统治，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即电令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而将军队调去“围剿”中央苏区。返国不久的宋庆龄为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所震惊，更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反动本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机，宋庆龄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中国的民族主义正以抗日运动的形式成长着”。^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宋庆龄马上投入了抗日反蒋的斗争。反蒋，正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清除抗日的阻力；抗日，就必须推翻“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的蒋介石政权。宋庆龄在1931年12月，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新的统一的政府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③就是这个“统一政府”在日本的“使节”命令下，出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的抗日示威运动：“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兵士和流氓包围了学生，棒打枪刺，把他们象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学生多人死伤，据报另有大批失踪。”^④声明还表达了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寄希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定立场的殷殷之情：“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⑤这个声明同时也是对中共中央9月20日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对11月刚刚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发表的对外宣言的积极响应。前一个宣言响亮地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后一个宣言动员全民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① 《民国日报》1931年9月27日。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8、107页。

③ 1931年12月20日，上海《申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5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53页。

日本的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许多原来对蒋介石政权存在着幻想的人也因为他的投降卖国政策而越来越不满。但是在此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没有在新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而是孤立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并且盲目地作出“目前政治形势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①“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在国统区工作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则采取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把反蒋的中间势力看成是“帮助国民党维持统治”的敌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左派因为可以“欺骗”群众，因而比右派更危险，他们对宋庆龄亦采取不信任、不联系的错误态度。宋庆龄对党中央领导的错误感到困惑和痛苦，但由于她在理论上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民族解放斗争的内涵有了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规律有了正确的认识，因而她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才是救国的道路。在极其复杂而艰苦的环境中，宋庆龄一面继续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极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痛切地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正受着被帝国主义世界瓜分的威胁。这一瓜分过程，几十年前就由帝国主义开始，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的全面战争更加速了这一过程。”^②她分析日本所以能够大举入侵的原因时指出：“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帮助（它们的目的也在瓜分中国）。国际联盟给日本充分的行动自由……第二个原因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蒋介石政府为了阻挠人民抵抗，不惜禁止抵制日货，暗害义勇军，并废止人民的民主权利。国家主要的军队不是用来打日本而是打自己的人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③正是国民党破坏了“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他们“一贯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在毫不抵抗的情况下丢弃了东北以后，蒋介石政府“正通过帝国主义在北平的外交官们从事一个秘密

^① 《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页。

的幕后阴谋活动”，以便“秘密出卖中国”。^① 宋庆龄指出：“如果人民大众不起来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国民党傀儡的罪恶行为，中国一定会全部被瓜分，中国人民也将遭受更惨重的奴役。”^② 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宋庆龄并不是悲观论者，她批判那些害着“恐日病”的政客，认为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③。她从坚决要求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身上看到希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④ 宋庆龄指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首先是以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⑤；“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⑥。同时，她认为要扫除抗击日本侵略的障碍——摧垮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因为这个反动政权在日本占据了东北四省以后，还派出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们忙于公私酬酢，准备签订秘密条约”，而“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⑦ 当继东北沦亡后，华北又告危急时，国民党的军队却调集去“围剿”那已经宣布对日作战的工农红军，蒋介石政权“怕武装的人民甚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因为它是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⑧。所以，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只有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大路上前进”^⑨。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⑩。宋庆龄坚信“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63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7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9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0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8 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0 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70 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77 页。

⑨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77 页。

⑩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9 页。

成”^①。因而她号召“中国的人民大众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把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走狗的魔掌中解放出来”^②；“在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不可分割是宋庆龄一贯的思想，她确信只有真正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人民政府，才能有效地组织全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直至取得胜利。认为全国人民总动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宋庆龄注意并指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她提出要使“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③。为了免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就“必须把各个工厂、学校、大学、城市和村镇组织起来……只有唤起民众，使他们觉悟到时局的严重和未来任务的重大，我们才能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将是一个广泛的反帝斗争，最后将汇合起来成为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④。为此，她不断地号召和呼吁，“我号召中国全体男女们、青年们，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和义勇军，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中国的解放、统一与完整而斗争”^⑤。宋庆龄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逐步发展，当1933年8月她在上海组织领导远东反战会议的时候，这种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表达，她欢迎所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团体和人士出席会议，“特别欢迎工厂工人、失业工人、工会、工人俱乐部、农民团体、国民党支部、各大中学、青年学生团体、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文化团体、反帝和反日团体、抵制日货的团体、义勇军、各行会以及一切愿意参加这斗争的团体，都派遣代表出席”^⑥。也就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除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以外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她呼吁“全体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3页。

致!”^①

在实际斗争中，宋庆龄自觉地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反蒋抗日”的方针进行斗争的同时，对促进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探索、尝试、宣传以及实际的组织工作。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受到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鼓舞，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反抗，坚持战斗月余，给数月以来在日本侵略气焰及蒋介石高压政策的压抑下喘息的中国人民以极大鼓舞。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宋庆龄全力给予支持，她与何香凝等立刻为得不到蒋介石政权支援的十九路军募捐筹款和筹集作战军需；又与何香凝、杨杏佛、史量才、黎照寰等友人建立国民伤兵医院，进行战时救护工作；冒着敌军狂轰滥炸的炮火视察十九路军抗战前线；对记者发表谈话，赞扬“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②。上海及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抵制了党中央的王明“左”倾路线，发动群众在各条战线以各种形式支援十九路军抗敌，在宋庆龄的号召和率领下，各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给十九路军以大量的精神与物质支持，掀起了一次中华民族联合抗敌的高潮。此后，宋庆龄发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担任主要领导。这些抗敌组织，事实上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员在其中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起着重大的作用。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在停止对苏区进攻、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武装人民的条件下，愿与一切军队合作，抵抗日本侵略。宋庆龄认为这是促进全民族抗战的契机。她在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时，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联合抗敌的意见，并详述了自己全民抗战的主张：（1）派遣全国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军队，给以充分的武备，收复东北、热河，保卫中国；（2）武装人民，并组织义勇军；（3）立即恢复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4）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③宋庆龄的这篇演说，是对苏维埃政府宣言的最积极响应。5月，她以《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为题，在美国纽约的《民族》杂志上发表了演说的全文，为促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大造舆论。在同年9月的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远东反战会议上，她对会议的中外代表再次介绍了苏维埃政府的这个正确的主张：“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军事协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附加的条件是武装人民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这提议指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认真态度。”她同时批评国民党当局“这些呼吁虽然获得了群众和兵士的同情，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响应”。^①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问题上，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内抵制王明路线的正确意见是一致的。1931年下半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党最为严重的时期，前后历时四年的错误路线基本上摧毁了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中共中央也不得不从上海撤退到中央苏区，使得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直接贯彻，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共产党的错误路线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大革命失败后逐步恢复发展的革命力量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几乎损失殆尽。这个时期，继东北四省沦亡后，日本侵略的战火又烧向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领导所理解的困难的条件下，宋庆龄在特殊战线上继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当国民党50万军队在蒋介石亲自统率下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空前残酷的“围剿”的时候，她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发出呼吁：“让我们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②当“围剿”进入最残酷阶段，中国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陷入最困难境地的的时候，由宋庆龄领衔，发表了有国民党左派及各阶层、各界的爱国人士1700余人签名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要求：（1）全体武装总动员，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全民总动员，投入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工作；（3）全体人民总武装；（4）没收一切敌产以解决作战经费，实行战时财政政策；（5）成立由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产生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同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关系。^③所有在纲领上签字的人都作为发起人，组成“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同时发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对日作战宣言》。对日作战的纲领和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页。

宣言的发表，是宋庆龄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又一次吹起响亮的救亡号角。她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在全国范围对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逼迫他停止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进攻，逼迫他放弃内战政策，实行全民抗日。这是她利用她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给予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的斗争的最大支持，也是她为保存和挽救中国革命力量所作的最大的努力，是她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亡国的威胁日益加深的时候，宋庆龄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思想的转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召开这三年多时间内，国内形势险峻而复杂，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织，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路线更使斗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调整自己斗争步调的宋庆龄有时亦不免受到“左”的影响。比如将1933年冬公开举起反蒋抗日旗帜的“福建事变”^①视为“军阀政客集团”之间的“争夺地盘”，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即为一例。不过宋庆龄很快便从思想上及实践中都予以纠正，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其后，她为促成建立、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竭尽全力。而犯“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许多工作不得不依靠宋庆龄的帮助才得以克服困难而进行，从地下电台的重新建立，到迭遭破坏的地下党机关的恢复及联络等等，都得到她实际的有效的帮助。从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党的负责人到具体工作的党员，对错误路线进行抵制，在“反蒋抗日”的斗争中与宋庆龄密切配合。远东反战会议的胜利召开，就是中共中央的支持和中共江苏省委具体进行组织工作的结果。“国民御侮自救会”及“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也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产物。地方分会的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爱国群众而开展。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必然会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不断调整双方关系与斗争步伐，在不同的战线上为着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在极为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此工农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转而为主动的战略转移和作战，胜利地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为

^① 1933年11月，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曾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的蔡廷锴、蒋光鼐，以十九路军为骨干，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部分势力以及“第三党”的力量，公开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后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攻击下，于1934年1月失败，称为“福建事变”。

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遵义会议的召开，把抗日救亡运动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1935年8月1日，在北上的途中，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申明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际……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表达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

1935年12月，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新的政治形势和由此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制订出新的战略路线和方针，会议作出《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同时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毛泽东在会议上着重论述了一切战争都应在民族战争的号召下进行的问题。瓦窑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制订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随后，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决定将“反蒋抗日”的政策改为“逼蒋抗日”的政策。为了表示联合抗日的诚意，已经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红军于1936年5月退回河西。5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武装的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希望“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感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以北平和上海为中心，掀起了全国逼蒋抗日的高潮。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救亡示威游行，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之后学生实行罢课并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抗日，学生运动与工农相结合，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上海民众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推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配合下逐步走向统一，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统一了救亡运动的队伍与步调。在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兵谏”，终于使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以实现。在历史急剧变化的紧迫形势下，宋庆龄根据

“逼蒋抗日”的方针，在帮助恢复国共两党的联系、领导救国会的斗争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实效的工作。

1935年5月的“华北事变”^①及以后日本明目张胆地继续南进的企图，威胁美、英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并直接威胁蒋介石政权的生存。蒋介石一方面仍寄希望于“外交调停”，同时不得不考虑调整对日政策并开始寻求与中共接触，通过宋子文请宋庆龄将愿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转达给中共中央。由于宋庆龄的斡旋与直接帮助，中断了八年之久的国共两党的关系终于在1936年春接通。然而，蒋介石政权仍然将重点放在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方面，迫使蒋介石走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仍然要通过艰苦的斗争，宋庆龄领导的救国会的救亡活动，就是以“逼蒋抗日”为重要目标。

1936年1月28日，在纪念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上，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三十人联名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5月于上海成立。救国会在发表的宣言和政治纲领中，指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并揭露国民党政权继续执行卖国政策，认为“中央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在对内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孤注一掷”。救国会不断公开发表函电，号召团结御侮，支持各地的反日罢工、罢课，为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进行募捐，还派出专人与国共两党及各方面的军政界人士联络，进行促进统一战线建立的实际工作。而救国会本身，就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国民党当局惧怕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于1936年11月逮捕了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七位领导人，把他们投入监狱。宋庆龄马上领导开展营救救国会领袖的斗争，她向报界发表声明，驳斥反动当局对她个人及救国会领袖的种种诬蔑，指出这种非法逮捕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重申“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②她还与何香凝、胡愈之等各界人士发起“救国人狱”运动，表示“自愿为救国而入狱”，因为沈钧儒等因救国而获罪，“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

^① 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根据与南京政府签订的反动的《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退出平津和河北，继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的政策，是为华北事变。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页。

“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①

1937年7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十余人，冒着酷暑，带着行李，从上海乘火车去到苏州，径至江苏省高等法院请求入狱，以同服“爱国罪”。宋庆龄大义凛然的精神给全国不断高涨的救亡运动注入巨大的力量，在营救救国会七位领导人的斗争中，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为核心，并联络冯玉祥、宋子文、孙科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协力进行，充分表现了宋庆龄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的斗争艺术。一时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具状投案”要求入狱“服爱国罪”，给坚持镇压爱国力量、拖延实行抗战的蒋介石政权造成强大的攻势。

在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西安事变”中，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不念个人恩怨，从民族大局出发，主张事变和平解决，她甚至准备亲自到西安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只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而没有成行。但是宋庆龄对于事变的态度以及她长期为营救政治犯的努力，对于解决事变的谈判，是深有影响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久，宋庆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出席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并联络何香凝、经亨颐、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向大会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在新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国民党应与共产党合作，“以挽救本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②。经过近十年对国民党中央反动政策的抵制，在外敌当前的形势下，宋庆龄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愿与蒋介石携手抗日。在她的率领下，大批孙中山事业的忠诚继承者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宋庆龄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竭尽心力并建立了新的功勋。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宋庆龄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不懈斗争，以保证抗战到最后胜利；另一方面是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蒋介石虽被迫抗战，但是并没有放弃反共，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对日本进行谋求妥协的秘密谈判，并希望日本军队帮助他消灭共产党；在国统区内则强化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页。

② 《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法西斯和特务统治，打击共产党和爱国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向抗日根据地挑衅，制造摩擦，袭击人民抗日武装……因此，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始终存在妥协、分裂、倒退和抗战、团结、进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宋庆龄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武器，与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动路线进行斗争。

1939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进攻陕甘宁和晋东南等边区的同时，开动宣传机器，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代和将来的一切要求”等等，篡改三民主义的理论，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制造理论根据。针对这股逆流，宋庆龄坚决进行反击，她在1939年11月及时发表了《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为被国民党歪曲的三民主义正其义，指出那些盗用孙中山名义的国民党员们“没有认识民主的真谛，更没有认识民生主义”，他们“不配算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这些人在“遇到了真正为国家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随时有思想发生动摇的危险，甚至变成卖国的汉奸”。^①这是宋庆龄对掀起反共高潮的蒋介石集团的揭露与严重警告。她同时着重阐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是有连带关系的，是救国目标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假使我们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则处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给予民众以政治上的平等和生活上的改善”，“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②就是说，国民党假如不实行国内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一意孤行要实行独裁统治，在理论上是歪曲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在实践中则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外来的侵略。宋庆龄维护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使其成为团结御侮的战斗武器，不给孙中山事业的叛徒以可乘之机。当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声讨他背信弃义袭击新四军的恶行，指出：“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更有不堪设想者。”^③又与何香凝等公开通电，斥责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弹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4、145页。

③ 《纪念宋庆龄同志》（图册），影印件，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134。

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① 宋庆龄还通过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出版的《新闻通讯》向国外详细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动员国际舆论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在共产党和新四军坚决抗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袭击，以斗争求团结的时候，宋庆龄团结了一支爱国者的队伍，一支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队伍，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相配合，击退反共分裂的逆流，使团结抗战得以坚持进行下去。宋庆龄深知“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团结”^②；“统一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继续和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证”^③，因此，她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遗余力，她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发展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维护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其次是给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的有效办法就是全面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不断地撰文、演说，阐述她的观点，给那些假三民主义之名而行破坏团结抗战的民族败类以回击，给那些怀有糊涂观念的善良人们以教育。宋庆龄指出：“抗战前途所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能否保持下去，并非党派的问题，而是战还是降、为民族而战斗到底还是用卖国诡计使抗战瓦解的问题。”而其中“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④ 要巩固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互助，以御外侮”，但决不意味着“各个属于它的党派不能有各自的观点和目标，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党一派独裁”^⑤。宋庆龄的论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并在理论上批驳了以“国防政府”、“国防军队”为幌子，企图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蒋介石及反动集团所散布的种种反动论调。她并进而指出，煽动内战就是“给敌人打开大门”，挑起党派间的摩擦，说明反动分子确是在帮助敌人。由此，便将一切蓄意破坏统一战线、阴谋挑起内战的个人和党派，置于民族罪人的地位。宋庆龄进一步论述，威胁统一战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缺乏民主”，而破坏民主的主要责任，在于当权的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他们一方面压制人民抗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姑息法西斯主义”，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46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48 页。

③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48、148—149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48—149 页。

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① 解决的办法，就是全面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② 当1943年春国民党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宋庆龄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政治阴谋，她在重庆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要求“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于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③。这是她对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和个人独裁的蒋介石的最好反击。她反复申述只有在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得到实现的时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发展，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说明宋庆龄在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时候，没有离开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她坚信只有阶级和社会的解放，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政客、军阀的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她所捍卫和发展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她为建立独立、自由、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有力武器。

积极有效的救援工作，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宋庆龄与何香凝立即团结主张抗日的各界妇女，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为前线募捐、救伤及各种后勤服务。1938年，她又以自己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与影响，先后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如贾·尼赫鲁、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赛珍珠以及孙科、宋子文、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保盟”），这是一个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战时救助机构，也是宋庆龄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力量之间架设的一座友谊的桥梁。“保盟”的宗旨，是“帮助打赢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它在物质上，“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在道义上，它“既不支持，也不曾支持过‘不干涉’政策”。^④ 因之，“保盟”对外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沟通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它先后出版的廿多种刊物，发往世界五大洲，使世界及时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理解中国人民“不仅是为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9页。

战斗”，理解帮助中国人民就是帮助他们自己。“保盟”以积极而艰苦的工作广泛联络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内，“保盟”则广泛开展募捐、战时救伤、救济和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的工作。宋庆龄公开宣布“本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①。她将救援的重点放在武器和物资严重匮乏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国民党政府非但几乎不发给他们军饷和武器，并且还进行残酷的封锁，而正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②通过“保盟”，为抗日前线，特别是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募集了大量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各种物资。很多国际主义战士通过宋庆龄和“保盟”的介绍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如国际和平医院的白求恩、马海德大夫；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木克华、仇克华大夫；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大夫；德国的米勒大夫；美国的爱罗色大夫等等。他们不但救治了大量伤病员，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办了数十所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和制药厂，培育了不少医药卫生工作者。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中，他们也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并以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宋庆龄的全部理论活动，是阐发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发展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使其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理论和精神支柱之一，成为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武器，她的全部实践，都是为了将各阶层和各种不同政治态度与不同信仰的人们团结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宋庆龄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宋庆龄曾希望“在战后实现一个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的中国，在这个中国里，工人、农民、工商业家、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将享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③——即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但是美帝国主义却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它把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政府作为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而蒋介石则企图依靠美国来帮助他维持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中国共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9页。

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为避免内战作了巨大的努力，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她响亮地喊出中国的命运“必须由中国人来决定”的号召，坚持不妥协的反帝立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蒋介石集团，并且指出“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① 一个国家，就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一个民族，就是扫除了任何外来干涉与侵略的独立自由的中华民族。在和平被国民党反动集团蓄谋破坏以后，宋庆龄一如既往，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使中国独立、自由于世界的理想。她因此成为新中国的伟大的缔造者之一。当新中国的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候，宋庆龄由衷地感到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使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得以实现，她充满激情地欢呼：“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②

宋庆龄毕生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的和平与正义而奋斗。在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里，他们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认识到中国的民族问题要获得解决，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并且要联合革命的苏俄和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对民族问题的内涵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科学的理解，认识到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压迫是阶级压迫的另一种形式，民族的彻底独立与解放必须建立在阶级与社会的彻底解放的基础之上，只有埋葬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能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因之，她在彻底地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宋庆龄在继承、捍卫孙中山新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并且为真正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她在投身祖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同时，与国际无产阶级结为同志，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支持一切民族解放事业，并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她自己也因此从一个炽热的爱国者，同时成为了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

（原载 1993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论》，2011 年 8 月修改于广州。）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79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85—186 页。

论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主要的、基本的内涵之一，是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走出中世纪的牢笼，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迈上近代化的路途。

在为中国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宋庆龄从服膺孙中山的思想，忠诚孙中山的事业出发，进而坚决继承、捍卫、发展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使孙中山的思想在其后的革命事业中，仍然是动员鼓舞人民投入实现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繁荣的伟大斗争的思想武器之一；使孙中山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得以实现。她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是革命战线上的英勇旗手，团结、号召、率领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起着重大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封建主义的沉重枷锁，使近代中国社会状况极为悲惨：生产力异常低下，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群众极度贫困，人民备受专制暴政的苛虐，没有最起码的权利；……整个社会陷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境地。同时，封建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贫弱，又为西方列强铺平了侵略中国的道路，提供了奴役中国人民的可能性。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腐败统治，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外交政策，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充当了侵略者的“鹰犬”，两者日益地结合起来。因而，封建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墙脚”。封建主义是束缚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内在桎梏，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都必须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斗争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反封建斗争的实践呼唤着民主主义——特别是比较

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因为，只有正规的民主革命，才能推翻以“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求得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以及国家富强繁荣。

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农民阶级曾经以起义和战争的方式反对并打击了封建统治，甚至建立了自己理想中的“天国”，但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他们，因而不可能产生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就如太平天国这样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也莫以能外。新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猛烈的抨击，强烈地要求社会变革，并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把挽救祖国危亡与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相联系，这是极有远见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是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一股动力。但他们既没有突破君主立宪制的藩篱，又反对发动群众以革命手段进行社会改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强固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又面临西方列强日益迫近的瓜分与“共管”，必然避免不了失败的结果。只有正规的民主革命，才能卓有成效地冲击以至铲除封建帝制，代之以共和制度，起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革故鼎新”的作用。正规的民主革命，需要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作为理论先导。因此，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正规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

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为主要思想理论基础的民权主义，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的重要部分，构成他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的核心，成为它所具有的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的标志。民权主义要求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是这个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主义政纲，赋予辛亥革命以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涵。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证明以民权主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科学、最先进的革命理论与方案。

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国内政局以及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必然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替代，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理论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与时俱进，实现重大的飞跃，方能保持它的生命力。孙中山无愧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伟大的代表，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曾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在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主义的新潮流前，他又不停顿地前进，使自己的思想与活动“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从而获致新的积极因素，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他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只是过早的逝世中断了他思想发展的过程。

宋庆龄是作为孙中山的学生、助手、战友和伴侣而踏上历史舞台的。她的一生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又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艰难困苦，愈挫愈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与时俱进；继而完成了孙中山所未及完成的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深刻转变，勇于进取，不移不屈。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在世界观上完成了自我超越，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她继承、捍卫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并在高举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旗帜，为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而战斗的同时，对民权主义理论作了全面的、本质性的重大补充与发展，把孙中山后期的“普遍民权”思想，发展成为彻底的人民民主主义。她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注入了反映时代特点的新的内容，使得民权主义获得了新生，达到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完全一致，从而使民权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仍然是实现民主革命目标的锐利武器。

（一）为民权主义注入彻底的反封建的内容

宋庆龄高扬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大旗，坚持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权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对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的蒋介石政权的反动实质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在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的时候，辨明了革命的主要对象，找到了革命的基本力量。因之，宋庆龄为孙中山的新民权主义注入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使其成为动员人民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首先，宋庆龄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很快就判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它们的代理人——蒋介石政权的封建专制性质，判定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胜利进行。1926年秋冬之际，北伐军攻克武昌并占领九江、南昌。12月，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1927年3月，北伐军直取南京、上海……在北伐军节节胜利，正要继续挥戈北上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了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并且大肆捕杀革命者与共产党人。7月，把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权的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在反共的旗帜下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合流，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

命归于失败。形势发生了逆转，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的新阶段。

蒋介石在绞杀革命的同时，却把自己打扮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他甚至企图借宋庆龄的声望，使自己“继承人”的地位合法化。就在汪精卫“分共”的当天，宋庆龄收到由她弟弟宋子文送交的蒋介石的来函，函谓“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①。但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刀光剑影中，看到了他们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背叛，看到他们已经“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看到他们“正在堕落，或即将堕落为新恺撒的臣仆了”。^②因此她公开声明除非国民党“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错误，否则“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③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在迫切需要重新划分阵线的时候，宋庆龄十分尖锐地指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分子”正在“领导着这个可耻的反革命”，^④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权势正企图把中国拉回到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的“封建官僚军阀”。^⑤稍后，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内、外政策作了进一步的剖析，指出这个政权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性质：这个政府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工农政策，对人民的压迫极为残酷，它的经济政策使得“富人更富”，更“便于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它“残酷地、狂滥地”杀害那些“将国民党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袖们。在这个政府中，野心家、阴谋家结党营私，“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都“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而且，“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⑥这些私人派系有时表面统一调和，有时公开分裂和对峙，比如孙科、汪精卫、胡汉民等曾组织“广州政府”，进行反蒋活动，他们和蒋介石都自诩为孙中山的“正宗”的继承者而互相攻讦。但是，“实际上，广州和南京这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

① 《纪念宋庆龄同志》图册影印件，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69号。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页。

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① 他们的“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他们的“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② 这个政府对外实行媚外卖国的政策，政府中“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③，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武装侵略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蒋介石政府为了阻挠人民抵抗，不惜禁止抵制日货，暗害义勇军，并废止人民的民主权利。国家主要的军队不是用来打日本而是打自己的人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④ 这是一个“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⑤ 的政权。根据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和“中央政府”实施的内外政策，宋庆龄断定国民党是“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⑥，蒋介石政权是“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利益服务”^⑦ 的，是“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⑧ 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据此，她断言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人民必须不停顿地战斗，以粉碎现存的反革命政权。而“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⑨

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政权实质的揭露和批判极为重要。她以孙中山的遗孀、在国内外极有威望的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继承者的身份，剥掉了蒋介石集团的伪装，并把他们置于革命对象的地位。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纷纭剧变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宋庆龄判定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蒋介石集团和他们把持的反动政权，以及这个政权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军阀、官僚政客和帝国主义。宋庆龄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实现民权主义的主要障碍——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之一。这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在历史新阶段的运用和重大发展。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矛头指向实行专制统治的清朝政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57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⑨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府和封建帝制，却没有把斗争的锋芒同时指向专制政治的基础，即“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在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候，孙中山逐步认清封建军阀、官僚和政客的反动本质，重新解释了民权主义，并且为了免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代议政体”的流弊，费尽心血地制订各种政治方案，期望通过这些政体构想和改革以实现“直接民权”，使共和国“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但是他始终没有将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因之，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没有充分体现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故而它不可能指导民主革命获得最终胜利。宋庆龄对于革命对象的认定，为孙中山的新民权主义扩充拓展了它原有的反封建内涵，注入以彻底的反封建的内容——这是最为本质性的补充，它使民权主义正确地反映了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宋庆龄对于革命对象的分析，与中国共产党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对象的分析殊途同归。

其次，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民权主义中关于“平民”“国民”的含义，充实以社会阶级的明确内容。

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权主义，确认了“国民革命”是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手段，规定了国家“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并决定实行“直接民权”，体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然而，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民”的意义是比较空泛和含糊的。特别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以后，就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权主义的“民”，也不能客观地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民主革命的阶级主体。尽管孙中山在他的后期，强调“唤起民众”和“扶助农工”，但是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思想中的“民”的主体，无疑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但由于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①，因而他把在民主革命中应该作为主要革命对象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归入了“民”的范畴，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在国民党反动派挥动屠刀杀害工农大众的时候，宋庆龄紧紧地把握住新三民主义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内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扶助农工”的要义作了充分的阐发，从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为民权主义的“民”找到了明确的社会阶级基础，从而正确地解决了革命首要问题的另一方面——“谁是我们的朋友”，即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和力量配置的问题。

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及失败以后，宋庆龄不止一次地强调工农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呼吁实现孙中山的“工农政策”。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她指出工农“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①。她坚信工农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②。在1927年8月出访苏联赴莫斯科前，宋庆龄向国内外发表声明时，更从工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来论证工农阶级的地位：“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工人推进和维持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民生产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因此，工农“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只有他们的参加，才使得“革命运动具有生命”。^③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的“国民”和“一般平民”的含义，作了符合国情的分析和界定，认定工人、农民这两个阶级是新国家的国民的主体，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为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实现，找到了可资凭靠的物质力量。这种科学的理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特点和要求，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④

宋庆龄对“国民”成分及地位的分析 and 界定，表明她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的运用，开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时期，开始于她与孙中山并肩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的时候。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申明“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表明了孙中山与宋庆龄对工农阶级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宋庆龄曾经记述他们当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新的认识：“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2页。

动。……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① 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中，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这种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得到锻造，与之相应的观念获得检验。

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更迫使宋庆龄不得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于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作出重新的分析和估量，从而更为自觉地掌握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宋庆龄坚持了民权主义中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在孙中山逝世后，更是一往无前地继续她曾经与孙中山共同进行的探索，在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这个转变中，随着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向前发展。

（二）对民权主义充实以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的内容

宋庆龄坚决捍卫孙中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充实以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的重大内容，使孙中山“主权在民”的共和国理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以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中得以真正实现和超越。

在近代中国，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乃是民权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唯一形式。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只是徒具虚名，全无其实。

孙中山毕生为“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而奋斗，这个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② 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的政治境界，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制度以后，他为新生的共和国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规划以“政党政治”、“五权宪法”、“地方自治”等方案，并制订了实现民主政治建设方案的“革命程序”。孙中山希望通过体现他的民主思想的一系列方案的实施，把祖国建设成为政治最修明的完美国度。但残酷的现实迅速摧垮了他的理想，共和国昙花一现，旧秩序却立即在新形势下恢复。清政府被推翻以后的现实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③。孙中山在艰难顿挫中从未中辍斗争和探索。在他的晚年，他已觉察到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弊病，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①。他抛却了单纯的倾慕，断言将“代议政体视为人类和国家永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②。因而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时候，他对民权主义作了新的阐发，使得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指出将要建立的国家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即由“全体平民”组织“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的政府，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以“直接民权”——人民享有选举、创议、复决、罢官等权力，以弥补“间接民权”——代议制的缺陷。但是无论是旧三民主义还是新三民主义，由于孙中山未能充分认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和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因而他的“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理想仍是模糊和无法实现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人民处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的重压之下，在打碎体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新国家以前，即在国体——国家政权性质没有彻底解决的时候，无论孙中山在国家政权形式的设计上用心多么良苦，也无法使国家成为真正的人民国家。事实上，孙中山为共和国所设计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脱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窠臼。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捍卫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建立“主权在民”的共和国主张，并且继续孙中山未完成的探索，对民权主义进行反思、总结和扬弃，尤其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有关国家学说，进行了充分的阐发、补充与提高，终于为孙中山民主建政的理想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得以实施的正确途径。

大致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归纳如下：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领导，进行土地革命，推翻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国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它负责制订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宪法；政府依据宪法治理国家。宋庆龄关于“主权在民”的国家学说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制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精神实质，她首先要求进行政权性质——国体的变革，然后才是政权形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5页。

式——政体的相应的变革。由此，宋庆龄把孙中山的国家学说，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宋庆龄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判定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那些在国民革命中曾经充当过“领袖”的人物，大部分已经背叛了人民，成为“新恺撒的臣仆”，与“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①他们抛弃了民主主义的旗帜而依赖于“新军国主义”。为了使孙中山的共和国理想变为现实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超越，她号召进行一场“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社会变革”，^②这场革命“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③

以革命手段，推翻以“封建官僚军阀”为统治基础的蒋介石政权，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这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忠实继承和重大发展。

“新的现代化的国家”是怎样的国家呢？它的内涵包括什么？这是宋庆龄继续探索的重要课题。从1927年至1931年，她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还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等资本主义国家。她同共产党人、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人士等各方面接触，大量收集和各国研究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尤其是亚洲诸国的土地问题，对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以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等等，有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理解，思想上发生了新的飞跃，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因而，她满怀信心地呼唤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自由、统一、革命的新中国”^④的诞生。

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新国家的思想，是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本质的发展。首先，宋庆龄把握住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国民主体的阶级性这个决定国家性质的基本核心问题。她确认国民的主体应是“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的工农大众，同时，她坚信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2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从事斗争”，^①这就解决了孙中山未能科学解决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理想的共和国的阶级内涵。在这个理想的共和国里，孙中山期望的“耕者有其田”得到实现，这就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的中国，在这个中国里，工人、农民、工商业家、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将享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②人民享有“出版、结社与集会自由”。^③也就是说，这个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阶级为主体的、全体人民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论述孙中山的新民权主义时指出：“除了谁领导谁这个问题以外，当做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④而宋庆龄正是在领导权及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对民权主义作了重大的补充和发展。因之，她科学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新中国的国体问题。宋庆龄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以后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

同时，为了真正实现孙中山的“主权在民”的准则和“直接民权”的主张，宋庆龄还对体现人民政权性质的相应政权形式作了构想，正确地解决了人民民主主义的政体问题。她强调必须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⑤，即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⑥，而“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国家实行国民代表大会制，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所组成的国民代表大会，负责组织中央政府和行使行政权力，并且制订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宪法。

辛亥革命在终极意义上以失败告终。作为民国象征的“国会”和“临时约法”也被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官僚政客所毁弃。孙中山以恢复“国会”与“约法”为号召，为捍卫共和不懈地斗争，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为了谋求国民会议的召开，他抱病从广州北上。直至病危弥留的时候，还呼唤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但是由于孙中山的阶级局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14—141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5页。

限，他没能充分认识工农大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过高的估计，因而“国会”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他的由“全体平民”组织“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的政府的希望，也就流于空想。孙中山在他的晚年的活动中，在对西方国家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还开始认识到苏维埃国家制度是“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①的一种先进的政治方案，但是过早的逝世中断了他的继续探索。

针对蒋介石的反人民政权的独裁统治，宋庆龄在大革命失败后至新中国诞生前的二十多年里，坚持孙中山“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而对于国民大会，则补充以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的内容，因而使国民大会具备了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性质。宋庆龄指出：“国民大会将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府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②她十分清楚“国民会议能否完成它的任务，全靠一种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③。为了使国民代表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宋庆龄同时强调必须“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使人民有直接的选举权。她指出中央政府“必须建立在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的直接统治的基础上”，而每个县“必须成为实行自治的基本单位和产生国民大会代表的选区单位”，^④代表要“经过民主方式选出”^⑤。“为了便利选举，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⑥人民的普遍的直接选举权，是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的保证。宋庆龄关于人民代表的选举办法，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的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⑦的民主思想，又为全民普选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是宋庆龄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在各个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她又根据革命的需要，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与策略，以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最大限度的积极性，为着实现奋斗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②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1页。

④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117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1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目标而共同斗争。在大革命刚刚失败的时候，她呼吁进行实现“社会的基本变革”的土地革命，以“建设自由新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反侵略斗争，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号召“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发言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结社与集会自由”^①。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集团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接连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的严峻时刻，宋庆龄重申“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②。她认为这是抗战胜利进行的保证。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当国民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而重开内战的时候，宋庆龄更是大声疾呼：“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这个政府必须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它决不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而只能是“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③

坚持制订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宪法，以保障工农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为民权主义补充以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的又一个重大内容。

孙中山对于制订宪法极为重视，认为宪法是“治国的根本大法”，实行“宪政”是“民主政治”的首要标志。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宪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糅合中国古代政制的因素，创立了“五权宪法”。依据宪法组织政府，治理国家，相对于封建专制统治，当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基本上仍是资产阶级分权主义政治学说的体现，在国家未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之前，资产阶级的分权主义是不能成就“主权在民”的。

宋庆龄对于孙中山“宪政”思想的继承，主要在于她维护了孙中山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事实上，孙中山在民国肇始阶段，以大总统名义公布的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就破天荒地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宋庆龄对孙中山“宪政”思想的重要发展，恰恰在于她对“全体国民”含义的明确认定，因而赋予了宪法以人民民主主义的内涵。宋庆龄指出必须要由“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人民代表，“起草一个为中国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181、180页。

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这部宪法以保护全体国民的自由权利为宗旨，其中必须申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而“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的好恶来决定”。^① 宋庆龄关于“人民”的概念是极为鲜明的，那就是指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包括除却革命对象的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工人推进和维持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民生产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② 因之，她为人民的宪法找到了最坚实和广泛的阶级基础。她在论述自己的宪政思想的时候，跨越了资产阶级的分权主义，消除了“分权主义”和“全民政治”外衣下的资产阶级属性。

孙中山将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划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这样的“革命程序”于共和制度初创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主革命和民主建政的实际进程，有助于把握全过程中各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对于革命与建政的巩固和深化有着积极作用。但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的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表现了对人民群众缺乏充分的信赖，低估了他们的力量、智慧和首创精神，没有真正理解革命斗争的实践对于“开启民智”的巨大积极作用。尽管孙中山在他的晚年，在革命的实践中已逐步放弃了他的“革命程序论”，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民主建政问题，然而他曾主张的“训政”时期却被他的事业的叛徒歪曲为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理论依据”。因此，揭穿蒋介石政权“训政”的实质，呼吁立即结束无限期延长的“训政”，早日实行“宪政”，是宋庆龄对蒋介石独裁政权进行的重要的政治斗争。她首先申明孙中山在他的晚年，因“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已经放弃了“革命程序论”。继而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政权的所谓“训政”，不过是“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为了长期奴役中国人民，“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③ 但是，宋庆龄愤怒地反问：“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④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越烧越烈，而国民党政府依然以“训政”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

为借口，坚持“抗日必先剿共”的反革命论调，杀害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钳制民主，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宋庆龄强烈要求“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会议”，“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①而当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亟需和平、民主与建设，蒋介石集团为了建立独裁统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蓄意发动内战。当战争阴霾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宋庆龄重申“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②。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与建设的渴望，给全国人民反内战的斗争以有力的支持。

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改革选举制度，制定保障人民权益的宪法，成为宋庆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统治的重要策略与武器。她对国家政权性质的论述和有关政权形式的设计，则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补充与发展，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发展成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宋庆龄在充分阐发和补充孙中山的国家学说的时候，也就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补充了彻底的反封建和彻底实现人民权力的核心内容，从根本上弥补了民权主义原有的缺陷，使民权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宋庆龄明确地、科学地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革命首要问题以及国体与政体的相应重大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找到了实现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途径——必须诉诸革命的手段，“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③为了推翻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真正跨出中世纪，宋庆龄号召进行一场旨在“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状况”的“社会革命”。她充分认识革命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和使人民获得自由解放的巨大作用，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④而劳苦大众除“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⑤外别无他途。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者是无产阶级，主力军是工农大众，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宋庆龄对体现了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和寄托着孙中山建设民主新中国的理想民权主义极为珍视，她继承它，捍卫它，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它——赋予它以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和实现人民权力的内容，使它反映出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的民权主义，发展达到与新民族主义革命纲领完全一致的民权主义。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没有脱离历史的潮流而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为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斗争的有力武器。

（三）对民权主义理论基础的剖析与升华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民有、民治、民享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进行了剖析，充实以时代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使之突破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范畴，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找到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基础，从而使民权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相应的新的内涵。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他看来，民权体现在“民有、民治、民享”，而这又与平等和自由是密切相连的，没有平等和自由，政治上就表现为国家缺乏政治民主和人民缺乏平等权利。在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以及后来反对封建军阀、捍卫共和制度的长期斗争中，孙中山以自由平等为旗帜，高呼着“天赋自由、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碍”^①的口号，动员人民挣脱封建的枷锁，争取民主的权利。他揭露和谴责清朝专制统治的暴政：“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权……国家之法律，非人民所解与闻。”^②更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及对人民的苛虐，归纳为十一个主要方面：“（1）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2）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3）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4）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① 《孙中山先生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51页。

(5) 他们自己从事于、或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6) 他们压制言论自由。(7) 他们禁止结社自由。(8) 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9) 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 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 逼取口供。(10) 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11) 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① 认为这种缺乏起码的民主的境况, 决非“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② 的。在号召人民起来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时候, 孙中山呼唤一个人人“均有平等自由之权”的中国。在这平等的国度里, 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③, 孙中山阐述“国民平等之制”的涵义是: “以四万万万人一切平等, 国民之权利义务, 无有贵贱之差, 贫富之别, 轻重厚薄, 无有不均。”^④ 然而在辛亥革命失败后, 封建暴政依然如故, 争取平等、自由, 仍旧是孙中山动员人民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武器。他对英国、法国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 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英勇斗争, 给予高度的评价, 认为“欧洲各国从前革命, 人民为争平等和自由, 都是一样的出力, 一样的牺牲”。他赞颂人民的斗争, 并以之作为激励中国人民的榜样。

在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后, 对于人民的自由、平等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性的新概念: 他把“博爱”与“民享”、民生主义相提并论, 使之成为更多地具有社会伦理色彩的观念。他从国家、政权的意义出发, 强调了民主主义的原则: 国家“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适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在1924年制订的国民党“党纲”中, 再次“确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⑤ 他希望在法律上作出规定, 保证人人都有“政治上的地位平等”, 并以此作为目标, 动员人民参加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创建真正自由、平等的共和国。孙中山所宣传的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 以及提出的相应的口号, 在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及捍卫共和的斗争中, 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 在孙中山大量关于平等、自由的论述中, 也存在不足与缺陷。他把不平等分为“天生的不平等”——人们天赋的不同和“人为的不平等”——社会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他要铲除“人为的不平等”, 造就“政治上的地位平等”, 即“真平等”。孙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25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325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9页。

④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 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 第319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24页。

中山在“天生的不平等”问题上片面地强调了人们的“天赋”的差别，未能认识到人们的“聪明才力”更多地有赖于后天的社会条件。根据“天赋”将人们分成不同层次与等级，让“天生的不平等”的人们，根据各自的条件进行自由竞争，达到优胜劣汰，而无须人为地去“压平”。他认为这种自由竞争是世界发展的一种动力，否则“世界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①。孙中山的平等观，实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同时，他的自由观的主体，也只局限于一般法律规定的规定。但是，这种平等与自由缺乏社会经济的保证。列宁对于没有社会经济条件保证的“自由”与“平等”，作了十分形象的批判：“……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来，当然是一个大进步。”“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举行集会是需要集会场所的，而高楼大厦却是私有财产。”^②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论为指导，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上的民主，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无疑就是“人人平等”、“天赋自由”的口号下的资产阶级民主。

大革命的失败，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新军阀专制统治的建立，宣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破产，证明资产阶级之阶级民主不能解决中国必须解决的自由、平等的课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所变化，已不在社会思潮中居于主导地位。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必须以新的理论作为指导，方能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其生命力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是宋庆龄真诚的信念和追求的理想。学生时代的宋庆龄，就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是她经常思考和探究的主要问题。在清帝国崩溃的前夕，她“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的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③。据她的同学回忆，宋庆龄在远离祖国的求学期间，“似乎深切地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她想在美國努力学习，以便准备回国后有所建树”^④。长达六年的留学生活，使宋庆龄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陶冶，对她以后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7页。

③ 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吴壬林、吴东之等译：《宋家王朝》，中国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④ 罗比·尤恩森著，赵云侠译：《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民主精神”成为宋庆龄从反对清朝专制制度到崇奉共和主义；从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主要动力。

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曾在学校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如《四小点》、《阿妈》等，在这些作品里，表现了她对于平等、博爱的渴望与追求。当然，年轻的宋庆龄当时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自由、平等与博爱。她的博爱的思想最早来自于基督教的教义——她出生于一个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更培育了她。随着宋庆龄的成长，她的政治意识——民主观念日益深化，朴素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更多地表现在对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人民权利平等的追求上。因而对清朝的专制统治愈益深恶痛绝。还在得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消息以前，她在校刊上发表的题为《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的政论中，就对清朝的腐败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一直以任人唯亲和弄虚作假为特征。政府的要职都为御用文人、朝廷亲信以及靠‘政治交易’青云直上的人所把持。”^① 当她得知清政府已被推翻以后，马上撰文歌颂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热烈拥护。她认为在中国结束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使“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在这篇重要的政论中，宋庆龄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发挥得淋漓尽致，指出这是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是国家积弱和人民贫困的根源。正是“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她确信“诸如饥谨、水灾、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每况愈下等一切苦难最终都应归咎于专横的满人和他们的朝廷中的贪官污吏”。因而她得出结论：“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② 从宋庆龄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对民主革命的充分认同和肯定，表明她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向着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这种转变奠定了她在毕业后毫不犹豫地追随孙中山投入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宋庆龄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充满了期望，认为革命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只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她把博爱的内涵理解得十分广泛，甚至视作

①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自由、平等的基础：“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而“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① 宋庆龄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充分反映了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对于数千年被封建思想禁锢的中国，显然具有先进的、启蒙的意义。正如她后来忆述：“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到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②

宋庆龄的热望迅速破灭，革命转入了低潮。她崇信孙中山的思想，忘我地投身于孙中山继续惨淡经营的革命事业。在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她的民主主义思想随着历史潮流的前进而发展，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在艰难顿挫中不断总结与探索，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来临的时候，他们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宋庆龄等的支持与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宋庆龄与孙中山一起，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然而，孙中山在“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中过早地逝世，中断了他的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他没能完成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宋庆龄——作为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则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奋进不已，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的前列。

大革命的失败使每个革命者都面临新的抉择。蒋介石的屠刀已经戳穿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政权的“民主”外衣，使资产阶级民主在宋庆龄的心目中完全破产，她在血与火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宋庆龄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平等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以赤裸裸的“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③，自从这个反人民的政权建立以后，“内战和政治阴谋循环不已”^④。这个政权和清朝政府一样，为了维持封建独裁统治，对外以出卖民族利益而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政权“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⑤。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② 《宋庆龄自传》，华光出版社1938年版，第3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残酷的现实证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不能使中国臻于民主。民主革命必须深化和发展，无产阶级一定要强化和改善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什么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真正的民主呢？什么才是中国需要的民主呢？宋庆龄为此不断地努力探索。她在欧洲考察时，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同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了分析对比，并对自己过去的信仰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终于发现和把握了民主、平等、自由的真谛——在阶级社会中，民主、平等和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她的政治思想跃上了一个新的阶梯，对于民主、平等、自由得出了符合历史发展和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人民民主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工农大众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工农大众的民主；被压迫民族必须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压迫，也一定要实现人民民主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最终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宋庆龄首先以彻底的、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不断进取的姿态，对自己曾经长期深信不疑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它只给予少数人民主的权利。甚至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制的。”^①群众名义上有集会、结社、言论、选举等自由，但却只能讨论“资产阶级所允许讨论的问题”只能就“允许进行的选举和允许存在的政党表示意见和进行投票”。^②而且，广大群众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手段，“所有大印刷厂、出版社、教育机关和大会场，除了很少的例外，全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宋庆龄进而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③这样，她就科学地剖析和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虚伪性以及残缺不全。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来论证资产阶级民主的破产：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的废墟上建立了独裁”。^④在德国，工人阶级在1918年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其最后的残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60—6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页。

余……也正在被消灭中”^①；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工人阶级受到越来越凶恶的迫害……资产阶级为了挽救面临的危机，公然采取赤裸裸的专政的、暴力的手段，粉碎了它的“形式的民主的体制，为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开辟了道路”。^②一切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者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被允许留存”。^③而当“民主”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则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宋庆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完全为后来的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宋庆龄最后指出：信奉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是“在思想上是受了资产阶级论点和对‘民主’的幻想的影响”。^④这是宋庆龄在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对自己过去的政治信仰进行反思与剖析，也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刻的总结。她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与评价，体现了她所崇奉的原则：“革命者就是这样，他不满意于一切的现状，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社会制度来代替旧的社会。”^⑤宋庆龄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不断进行攀登的。在清朝政府统治下的封建专制的中国，确是“十分需要民主精神”。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最富革命性的思想，它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启蒙作用，并推动人们为建立新的制度而斗争。然而，辛亥革命终归失败，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军阀、官僚、政客相互勾结建立了新的封建专制统治。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民主不能真正实现，也不能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杠杆。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必须被一种新型的民主所代替。宋庆龄坚信这种新型的民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宋庆龄在这时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分析批判，符合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及社会主义时代的客观现实，反映了时代特点，表明宋庆龄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十分明显，宋庆龄是以工人农民这“两大基本群众”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作为衡量民主政治是否得到实现的尺度。在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考察以后，当她了解到苏维埃国家的实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⑥，便确信这是更高层次的新型的民主制度。她在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页。

系时指出这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①而不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因而它使人民的各项民主、平等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她以当时的苏联为例，说明苏维埃的国家机构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若干基本民主原则，如“司法权行政权合一”，“工农广大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他们的苏维埃代表”，^②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领导国家的政党把“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摆在群众面前，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公开同他们讨论……”^③所以她断言“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④苏维埃国家使“工农两大基本群众”获得国家主人翁的权利与地位，因而“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专政机构”^⑤。因之，宋庆龄论证了只有人民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使孙中山理想中的“主权在民”的、人人“均有平等自由之权”的民权主义国家得以实现。

应当指出，孙中山在晚年重新解释他的民权主义的时候，曾认真地探索如何才能实现他的“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案。他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优于“旧式的”法、美共和国的“最新式共和国”。因为苏维埃“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⑥虽然当时因为“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断其究竟”，还未能深入研究，但他已经认识到“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⑦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孙中山的逝世，这一探索过程不得不由宋庆龄独自进行下去。她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与论述，正是她探索的必然结果，也是她对孙中山曾经赞扬过的“人民独裁”的思想内涵的发掘与发展。

在论述了民主的阶级性和肯定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以后，宋庆龄也分析和阐述了与民主相对立的武力的阶级性。她确认广大人民的革命武力是实现工农阶级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武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反之，剥削阶级的武力则是压榨人民群众的工具，应该以革命的武力予以反抗，直至粉碎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武力。

-
-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页。
 -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页。
 -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页。
 -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页。
 -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页。
 - ⑥ 《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 ⑦ 《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她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军队的不同社会功用，论证武力的阶级属性，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是为了进行侵略，为了压迫殖民地人民，为了进攻象中国这样的弱国”，即是为了保护他们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军队几乎全是用来进行军阀的混战和镇压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①而在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军队是“为了保护人民，抵御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积极准备的新干涉战争”^②。据此，宋庆龄进一步论证被压迫阶级使用武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由于“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因之“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只有以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③由此，她断言“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④宋庆龄的这些论述，是从另一角度再次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论证了中国只有进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战争，才能走上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才能实现孙中山理想中的民权主义。这无疑是为孙中山主张的以“民权运动的方式”去实现民权主义找到了正确的途径。

最后，宋庆龄指出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本质的不同，充分肯定和评价了革命暴力的巨大积极作用，把它提高到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她指出剥削阶级“使用武力是为了支持残酷的剥削与奴役的制度”，而人民大众使用武力则是“为社会向更高阶段前进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⑤宋庆龄把革命暴力与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联系起来，完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于武力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战争，宋庆龄从时代的特点出发，对之作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5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

深刻的阶级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延续它已经破产的暴力恐怖制度的最后的、绝望的企图”^①。同时说明帝国主义战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斗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② 她以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巴黎公社的建立；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以及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例子，说明战争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可避免和战争的社会作用——“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③。由此，宋庆龄公开申明自己对于战争的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④ 她引用列宁当年发出的号召，呼吁人民把帝国主义战争导向革命：“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⑤ 使战争“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墓地”，以埋葬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宋庆龄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观点。她的有关论述，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所证明，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宋庆龄对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进行分析和批判，进而坚决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从崇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到肯定被压迫阶级必须使用武力争取解放，证明宋庆龄已经掌握和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她消除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和理论的局限性而代之以无产阶级民主，使已经走入末路的民权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6页。

(四) 为争取在中国实现民权的实践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宋庆龄以经过丰富和发展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旗帜和武器，开辟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合法斗争的“第二战场”，为营救大批革命者、爱国者，为争取人民民主，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以有效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缔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英勇奋斗。她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使她无愧为英勇的民主斗士。

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的高潮中背叛了曾经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大革命被腰斩了，建立起的是靠血腥屠杀和特务统治来维持的独裁政权。他们以“清党”的名义，大肆杀戮昔日的同志——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包括受群众爱戴的党的活动家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夏明翰、向警予、郭亮等。他们完全剥夺了人民应当享有的包括言论、集会、出版等等的公民基本权利。民主受到蔑视，民权被蹂躏。按他们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动辄即将人们投入监狱，施以酷刑，以至秘密杀害。至30年代初，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被杀害、监禁的革命者、爱国者及工农大众以数百万计。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宋庆龄深刻地认识到营救大批政治犯，保护民族的精英和广大的革命人民，为革命最大限度地保存力量，是关系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命运攸关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①因此，她不顾个人安危——她的名字“也列在就要受到恐怖狙击的名单中”，并且接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冲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为营救“政治犯”——大批的革命者与爱国者而奔走呼号。

首先，她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场合，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社会舆论，揭露并声讨蒋介石集团践踏基本人权的野蛮行径。她指出已经堕落为“新恺撒的臣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1页。

仆”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军阀，正在“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革命者和工农群众，他们“要陷害人民而找不到证据时，总是施用暴君所用的最后手段：酷刑和杀戮”。^① 蒋介石的极为残暴的政策“已使今日中国濒于全部分裂、沦为帝国主义属国的境地”。她认为当前“国家的情势是如此地危急，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再一次号召中国广大人民起来斗争”。^② 为了“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她向新闻界呼吁“在这共同事业中，我们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且要忠诚地合作”，首先“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为被“非法逮捕与监禁”，受到“中世纪的残余——秘密军事法庭”摧残的政治犯“主持正义”。^③

其次，宋庆龄以成熟的政治家的胆识和斗争艺术，高举孙中山民权主义大旗，尽量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手段，在法西斯恐怖统治下，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们，结成广泛的民主阵线，为保障人权，争取民主和营救革命者、爱国者而不懈斗争。她所发起组织并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反对暴政、争取民主、保障人权的英勇斗争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32年12月，宋庆龄联络当时国内部分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如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胡愈之、鲁迅、周建人、黎照寰、王造时、伊罗生、史沫特莱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在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五人领衔签署发表的“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同盟”的主要任务是：（1）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2）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3）协助为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诸民权努力实现之一切奋斗。^④ 1933年1月，“同盟”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并推举宋庆龄、蔡元培分别任正、副主席。

“同盟”成立以后，马上以极大的热情和迅速的行动投入营救革命者、爱国者和给政治犯以援助的实际斗争。宋庆龄亲自参与了许多重大的营救活动，如营救在上海被捕的国际反帝战士牛兰夫妇；营救因呼吁抗日而以“共产党嫌疑”在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7页。

④ 《申报》1932年12月18日。

北平被秘密逮捕的马哲民、侯外庐、许德珩等爱国师生；营救著名的共产党人和爱国的文化战士罗登贤、廖承志、陈赓、邓中夏、薄一波、刘澜涛、潘梓年、丁玲等等。在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过程中，宋庆龄总是尽力动员传播媒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蹂躏人权的罪行，呼吁停止杀戮和恢复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以图掀起保障人权、争取民主的群众爱国运动。如营救许德珩等爱国师生时，宋庆龄、蔡元培等联合通电蒋介石及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北平天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等，严正宣称：“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唯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①在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后，“同盟”召开了临时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营救办法，除为其延聘辩护律师外，还通过报纸发表宣言，号召“吾民应速自觉悟，奋起力争，而要求罗、余、廖及一切政治犯之释放，尤为第一要图”^②。宋庆龄同时发表《告中国人民》，谴责非法的逮捕与监禁的暴行，认为这“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她揭露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的时候，一方面对外屈膝投降，另一方面对内实行高压政策。“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③她不断大声疾呼：“中国的人民大众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把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走狗的魔掌中解放出来。”^④宋庆龄正义的呼声是刺向反动政权的匕首和投枪，使他们惊慌害怕。还在几年前，蒋介石的说客戴季陶就曾威胁宋庆龄，要她“不要再发表宣言”了，企图剥夺她说话和斗争的权利，然后再把她“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亦可见宋庆龄的呼声的威力。宋庆龄斩钉截铁地回答：“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她始终把舆论作为向独裁政权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她以各种办法将正义的声音传送出去。当时，“同盟”的工作曾经得到中、外新闻界朋友的帮助。通过宣传媒介的作用，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的

① 《申报》1932年12月18日。

② 《申报》1933年3月31日。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7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页。

解放事业争取广泛的支持。

“同盟”的成立和广泛开展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诽谤、污蔑甚至迫害——“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就在为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中牺牲。为了予敌人以反击并廓清在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糊涂观念，宋庆龄在1933年3月发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在详述“同盟”的性质和任务的同时，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指出为民主而斗争的近期任务和长远目标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表达了她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理想将最终实现，对革命将取得胜利充满期望与信心。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宋庆龄重申了“同盟”筹委会宣言中所规定的三项主要任务：（1）“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2）“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3）“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①她首先强调“从土牢里拯救上万的政治犯是本同盟的一桩重大的任务^②”，因为那些政治犯恰恰是“中国人民的精华”，是“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和“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③；他们被投入中世纪式的野蛮与黑暗的监狱后，“在肮脏的监牢中，吃的是不堪下咽的食物，不能与外界互通信息，没有书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锁在沉重的枷锁上。他们没法反抗酷刑，无力抗拒狱吏的蛮横，只有依靠我们在外面的人把他们从垂死中拯救出来”^④。宋庆龄把对政治犯的摧残视为国民党政权反动腐败的集中表现，是对国家民族所犯的弥天大罪：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精华在监狱中被摧残得奄奄一息”，另一方面是“流氓、军阀、职业政客、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却把持政府中的要职，把我们的国家奉送给帝国主义”。她从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高度来看待政治犯问题，明确地、反复地指出：“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要求，就是革命上必要的要求。”^⑤

关于“同盟”的第二项任务，即营救保护政治犯的具体措施，宋庆龄主张首先要对虐害政治犯的罪恶制度“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同时“必须摧毁审问政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页。

治犯的秘密法庭”。^① 她愤怒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对于政治犯的极端残忍的虐害制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革命者被捕之后“几乎总是受到毒打或其他酷刑，有时甚至因而丧命，来逼他供出警察所要知道的事情，强迫他出卖同志和组织。与酷刑并施的是迫使政治犯‘悔过’的整套办法”。在国民党的秘密“法庭”，“不仅是最起码的公道，而且连人的基本权利也一齐遭到玩弄与蹂躏。”政治犯“受到种种酷刑，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并被秘密地送进监狱去苟延残喘，或送上刑场”。^② 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虐害政治犯的制度恰恰暴露了它的根源——罪恶的政权的弱点：“它不用拷打和杀害反帝战士的方法就无法维持下去。”^③ 因此，摧毁虐害政治犯的制度 and 秘密法庭，也就动摇了反动政权的统治，冲击了现存的社会制度。“同盟”还对监狱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揭露其无比的黑暗。如1933年初，宋庆龄接到关押在号称“北平军人反省院”的陆军监狱的政治犯的控诉信，揭露在狱中所受到的种种非人待遇，她立即将信签发于“同盟”主办的刊物《自由论坛》，以唤起国人注意。同时又派出“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到反省院视察调查，督促当局改善政治犯待遇。

蒋介石政权的辩护士把宋庆龄和“同盟”的营救活动污蔑为“要求释放绑票犯”和“要求释放那些从事政治暴行的政治犯”。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予以严正的驳斥。她指出绑票匪“并不属于中国人民大众，倒常常是当局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④ 存在于全国各地及租界中的对爱国者及反帝战士的绑架与逮捕，多是由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绑架和绑票这类黑暗现象源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⑤ 因而她断言，要反对黑暗腐败的政治，消灭绑架与逮捕，便“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于“政治暴行”，宋庆龄并不笼统地表示一概否定或反对，她认为“当人民的各种权利完全受到压制的时候，个人的恐怖行为就比通常时候普遍”。^⑥ 反对专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6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6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页。

制制度的个人恐怖手段，不应受到过高的指责。但是，“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行为。它决不能代替群众的斗争，并且常常阻碍群众斗争”。^① 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宋庆龄都是从现存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出发进行分析，找出根源，因而总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将人民群众的斗争引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道路。

在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实现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宋庆龄主要着眼于“群众的斗争”，她为组成统一的民主阵线而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以及她对“同盟”性质的阐述，充分体现了她组织广泛的民主阵线的思想。她对“同盟”的性质作了明确的界定：“这个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目的不是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去作政治与经济的斗争，因而它的目的不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也必须了解，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② 它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③，而首先是援救被捕的政治犯。但是，她同时强调：“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相反地，它和这些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这些斗争的一部分。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④ 这就充分说明，“同盟”所进行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是服从于中国革命的总目标的，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一个从属部分，所以“同盟”也就是为了推动“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的政治工具之一。“同盟”进行的是政治斗争，而又不是一个政党，这是因为“它的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要求的人们”，所不能容留的仅仅是那些“只是软弱地‘批评’政府个别的专横残暴的行为，而实则拥护那整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并支持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箝制民主权利的人们。”^⑤ 也就是说，“同盟”是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旗帜，反对国民党政权及其建立的压迫人民的恐怖制度，争取民主权利为宗旨的广泛的民主阵线。

宋庆龄还领导“同盟”致力于国际民权保障活动。当她得知刚刚建立的德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7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56—57页。

国法西斯政权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迫害和镇压，数万工人及他们的领袖被逮捕杀害，进步的甚至连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幸免的时候，马上撰文谴责那种“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的暴行，并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了“同盟”的抗议书，当面申明“本同盟以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特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专家，不啻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进步起见，特提最严重之抗议”^①。宋庆龄从来认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是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她关于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密切联系、互相支持、共同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同盟”的斗争既恐惧又仇恨，不惜以造谣污蔑甚至绑架暗杀等种种手段，欲置“同盟”于死地。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同盟”的总干事长杨杏佛，对宋庆龄等人的恐怖狙击也在策划中。在这种法西斯的高压政策下，“同盟”不得不停止活动，但是宋庆龄对政治犯和爱国者的营救和援助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每次重大的营救，都形成一次爱国救国的群众运动。1936年营救“救国会七君子”，同时掀起了一次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就是一例。宋庆龄对于政治犯和爱国者的救援，是她为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而进行的独特的斗争，她在极为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为保存和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她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组成广泛的民主阵线，开展保障民权，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推翻封建独裁的蒋介石政权而开辟的“第二战场”。宋庆龄无疑是这一战场的主帅。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时候，民权主义又成为宋庆龄推动抗日救亡以实现民族解放的武器。

当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国内人民强化法西斯特务统治，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围剿”的时候，民权主义成为宋庆龄动员人民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抗日”斗争的有力武器。因为“蒋介石政府正在秘密出卖

^① 《申报》1933年5月14日。

中国”，“把我们的国土和千百万人民奉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①而“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②，因此要有效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要扫除阻碍人民进行抗日的蒋介石反动政权，要救亡图存，就必须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宋庆龄深刻认识到，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这座大山，必须同时推倒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两座大山；民族解放必须与实现人民民主同步进行。因之她确信“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③。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④。她号召中国人民“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大路上前进”^⑤，把“为中国的解放、统一与完整”斗争，同“中国劳苦大众反对剥削、要求解放的斗争”和“中国民众要求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进行“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⑥。

当中国人民掀起高涨的救亡运动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现实的可能的时侯，宋庆龄马上抓住历史的这一转机，以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思想武器，促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共赴国难。她十分沉痛地回顾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国内情况，“由于过去十年间中国忽视了民权主义，我们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内战绵延不已，国家深受摧残，千百万人民丧失了生命，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而中国有见识的人士“向来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⑦。她愤怒谴责“抗日必先灭共”的政策，认为这是一种“阴险毒辣的意见”。^⑧她指出国民党如果决意遵循孙中山的政策，真正愿意抗日，那么“它决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要的”^①。而争取人民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是团结抗战的前提条件。因之，宋庆龄呼吁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以实现国内和解，共同抗日。她认为为反对和抵抗日本侵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②。要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动员全民抗战，国民党“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③。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斗争的时候，宋庆龄阐发的民权主义成为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

当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宋庆龄经常以民权主义为号召，竭诚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保证抗战进行到最后胜利。宋庆龄确信“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团结”^④，抗战的前途所系，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能否保持下去”^⑤。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几次掀起反共高潮，以图消灭共产党。宋庆龄在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的同时，对于抗战前途生死攸关的民族统一战线给予极大的关注。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叫嚣，为了澄清被他们扰乱的舆论，为了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以共同“保卫抗战的基础——统一战线”，她专门撰写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前途和它所面临的危机等问题。她警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活动，已经使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中了”，他们煽动内战，“又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这无异于“给敌人打开大门”。^⑥她认为战时中国经常出现种种危机，就是因为国内缺乏民主所致。“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⑦。这无疑对抗战前途是最大的威胁，只能“对敌人是有利”。在中国，“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中国缺乏民主，只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⑧因之，加强民主，就是“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必不可少的统一战线”所必需。宋庆龄不断地反复地申明：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9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8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0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0页。

“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① 强调“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②。她不止一次地呼吁立即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召开国民会议，给人民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并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支持和配合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她始终领导着在国内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以民权主义支持民族主义，以民主斗争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因而，宋庆龄无愧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英勇斗士和旗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继续以民权主义去敦促国民党实现国内各民族和阶级间的和解，以实现和平建国。她真诚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超越党派利益局囿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目前的危机并不是那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③ 宋庆龄“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④，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⑤。她认为此时民权主义的要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据此，她要求“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⑥ 这个政府“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全国各党派都应派出代表参加政府讨论和实施领导和平建国的大计。即便是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根据宪法来治理国家。这个宪法必须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和批准”，并且要明文规定“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个政府还必须合理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因为“人民起来反抗饥饿、封建主义和殖民制度，这是不能抹杀的权利”。宋庆龄敦促国民党“必须通过联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页。

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①她警告国民党统治集团“现在是用实际行动来建立民主的时候了”，“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②

宋庆龄在抗战胜利以后对民权主义的论述和阐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国内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热望，她使民权主义成为支持中国共产党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同时，因为她对民权主义的发展，使孙中山的思想在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中永生。当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甘为历史的罪人而重开内战的时候，宋庆龄以全部热情、智慧和力量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的伟大的缔造者之一。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孙中山倡导的民权主义，曾经作为反封建的“政治革命”的旗帜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较为科学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以涵蕴共和制度的要求而成为正规的民主革命的标志。正是由于民权主义的指导，辛亥革命才得以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并且形成了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运动。由于共和国方案的破产和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孙中山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拓深了民权主义的内涵，使之带有了更为激进的色彩：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力求实现“主权在民”的准则。但是他过早的逝世中断了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过程，使他未能跨入新的范畴。

在从旧民权主义发展到新民权主义的进程中，宋庆龄起了极为重大的积极作用——先是皈依于民权主义，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随后顺应新时代的潮流，协助孙中山赋予民权主义以新的内容和特点；在孙中山逝世后，她在十分曲折复杂的革命征途中奋勇前进，高举民权主义的旗帜，并使之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庆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封建专制主义的剖析，确认民主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坚信革命斗争的主力 and 新生政权的主体是工农群众，肯定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表明她已从旧民主主义跨入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主义，并使发生了本质性飞跃的民权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政治方案完全一致。这种民权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仍然具有生命力，在团结更为广泛的人们参加民族民主革命中起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0、181页。

宋庆龄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民权主义，并把这面旗帜在艰难的岁月中撑持到底，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践。她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争取人民民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愧为伟大的民主斗士。

（原载《宋庆龄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11年5月修改于北京）

论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三座大山压榨下的广大人民要获得解放，首要任务是挣破殖民主义的枷锁和冲决封建主义的罗网，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救亡和发展，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必须承担的两项任务。

在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的承担者都曾勇敢地面对现实，为承担历史赋予的任务，提出并实施自己的纲领。

农民阶级以农民战争的方式，企图建立人人平等、处处平均的农业社会的“天国”，这虽然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并且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就其基本趋向而言，是空想与历史的倒转。

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挽救祖国危亡与在中国实现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相联系，这是极有远见和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但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与封建地主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严重的保守倾向，极大地削弱了他们自身的进步性。面临迫在眉睫的瓜分与“共管”的空前民族危机，在反对任何改革并日益沦为西方列强“鹰犬”的清政府的严苛统治下，他们的改良方案难以实施。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与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同步进行。孙中山以他倡导的三民主义指导革命，而三民主义无疑是当时所能提出的最明确、最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在三民主义体系中，民生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鲜明显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阶级特性、优点和所处时代的特点。一方面，它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

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提出的中国近代化的方案；是解决中国“发展”这个课题的蓝图；是中国当时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纲领。同时，它实际上又蕴含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课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以及消除对于农民和工人的残酷经济剥削以改善民生等等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之，土地革命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只有土地革命，才能摧毁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墙脚——地主阶级。

在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时候，孙中山愈来愈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虽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主要内容，但就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土地问题的解决更为迫切，成为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在孙中山后期的革命生涯中，“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越来越明晰、坚定；他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平均地权亦日臻完善，“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民生主义也成为最受孙中山部分战友的质疑、反对，甚至引起革命队伍分化的“主义”。

孙中山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还未实现质的飞跃的时候，就在“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中逝世。他未能使民生主义发展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的旗帜。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了重大的、全方位的拓展。她把握住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中心课题——土地问题，对于孙中山还未来得及充分展开或未能完全认识的部分加以补充和发展，捍卫并充分弘扬民生主义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对由于阶级局限所产生的缺陷，则加以改造和扬弃，并赋予时代的内容和特点，使得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以下简称新民生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宋庆龄使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使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成为动员广大人民起而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有力武器，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仍然起着独特的作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今天的生命力，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一）民生主义的坚定继承者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后提出的“社会革命”的总纲。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孙中山考察了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看到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富的两极分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英国的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十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十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他预料到“社会革命将其不远”。为了在中国实现近代化，同时又预防资本主义的弊病的出现，使“祸害于未萌时”得以消弭，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以期“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

孙中山将民生主义的要义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兄弟提倡民生主义而归宿于‘土地’及‘资本’两样”^②；“民生主义，必不容缓……依余所见，不外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③。前者反对封建的土地制度，希望通过“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办法来防止地主对土地不断增殖的垄断，使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农民得以“大苏”；后者则是以“节制资本”、“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的办法来防止私人资本的垄断，并以国家的雄厚财力加速“实业化”的步伐。孙中山在他的后期活动中，对民生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更坚定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并明确提出和完善了他的“平均地权”的实施方案。对于“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给予了更多的注意。他希冀通过民生主义的实现，使中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事业等等得到振兴，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黄金世界’”；使中国“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④。这样的理想社会，便是孙中山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把主要矛头指向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这触及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也是民生主义中至关重要和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如果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得以实现，便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封建主义的障碍，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这样的—一个使中国“实业化”的方案，既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教训，也考虑了中国的国情，对于贫困落后的中国，这个方案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因而列宁对民生主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孙中山“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2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7页。

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①。

然而，民生主义的遭际并不顺畅，无论在孙中山生前或身后，都是如此。在民生主义提出的时候，孙中山的一些主要助手意见即有分歧。对孙中山在后期活动中坚持“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②。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反对者们首先背叛了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髓，特别是它的灵魂——“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暗杀了坚持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旗帜廖仲恺。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使大革命归于失败。历史把继续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的重担放到宋庆龄和她的战友们的肩上。

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宋庆龄坚定地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力图重新集结革命力量，以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与孙中山一样，宋庆龄把民生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总纲。她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③然而，宋庆龄所指的社会革命与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尽相同。她在社会革命的旗帜下，以新的世界观作为指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处理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从而充分发展了民生主义中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积极方面，弥补了民生主义中的缺陷与不足；同时，她对民生主义中的空想部分——主观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改造，使之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宋庆龄把孙中山的带有改良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民生主义，成为真正的社会革命的旗帜。这是在中国革命转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阶段的时候，宋庆龄对民生主义作出了重大的、实质性的补充与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二）使民生主义发展成为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的旗帜

宋庆龄从本质上拓展和深化了孙中山“社会革命”的思想，对民生主义中的民主主义因素，特别是土地方案，赋予了新的、革命的内涵。

孙中山将民生主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他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方案：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发展“国家社会主义”。而以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相比较，孙中山更为重视的是土地问题。1903年，兴中会越南分会建立时，入会誓词中已有“平均地权”的条文。并且当年孙中山已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构想；1904年，孙中山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政纲；1905年，同盟会成立，纲领归纳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6年，他在为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对“平均地权”的方案，有很明确的表述：“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①以后，平均地权的实施，逐步归纳为以“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实施方案，期望通过此而达到将土地国有，防止土地私人垄断。到1924年，孙中山已经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三大政策，十分明确地以“耕者有其田”为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现他的土地纲领的物质力量，他强调要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去进行：“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②他反复说明，他的土地方案的实施，并不是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在国家以各种办法获取土地——土地国有化以后，由国家授田给农民。

孙中山认为解决了土地问题，再加上“节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就能迅速地发展社会经济和给人民带来福祉。但是，孙中山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把“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密切联系起来，他没有认识到封建的土地占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400页。

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中国封建专制、军阀统治及帝国主义在华实行侵略压迫的阶级基础，所以他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因此他也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事实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只是一个十分温和的土地改革的方案，而不是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只是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合理要求，而不可能动员广大农民奋起为冲破封建压迫剥削而斗争。于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便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并带有空想的色彩。同样，孙中山解决资本问题的原则，是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同时保护工人的利益，使其不受“资本家之戕贼”。在他活动的后期，提出了“扶助农工”的政策，但是他始终也没有正确认识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阶段中的主导地位，没有认识工农大众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所以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只是在他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能提出的最大限度的社会经济改革的纲领，又是一个对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剥削深恶痛绝、对人民大众痛苦生活深切同情的社会经济改良的方案。在当时的中国，这个方案具有明显的空想色彩。

而宋庆龄的社会革命思想，是指“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完全意义的革命。她鲜明地指出：“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①在大革命已经失败，中国已经建立起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人民政权的时候，宋庆龄所指的“社会的基本变革”，是变革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反动政权。因之，宋庆龄赋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革命的战斗的内涵，并大大拓展了它的范围，使孙中山的经济改革方案变成真正的、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的纲领和旗帜。

宋庆龄从革命性质、任务、领导权、主力军及革命的对象等方面进行深刻而明确的论述，对“社会革命”的内涵加以阐发。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宋庆龄明确指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就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与之相应的封建专制政权。她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① 宋庆龄所指的反革命阵营，包括帝国主义，新、老军阀，高利贷者和“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集团”以及他们的总代表蒋介石政权^②。宋庆龄的论述，既把握住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土地问题，又在本质上超越了孙中山“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主张。她把土地问题的解决，与推翻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并强调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土地问题有真正的解决。这表明宋庆龄真正把握了旧中国反动统治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科学地阐明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

关于革命主力军的问题，宋庆龄认为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③。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挥向工农大众的时候，宋庆龄却认定工农阶级不仅仅“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④，更是革命的主力军。她把对待土地革命及工农大众的态度，作为革命与不革命及反革命的试金石，认为任何削弱工农的政策，都是“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⑤。稍后，在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中，她进一步从工农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及各方面的因素去分析工农群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必然性。这样，宋庆龄便突破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优秀的代表——孙中山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阶级局限性。孙中山虽然对广大人民群众苦难充满悲悯和同情，但他的局限性使他不能理解工农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他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是因为他不愿地主与农民发生“冲突”，他担心“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客观存在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而宋庆龄对于工农阶级以及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真正实现，找到了可靠的物质力量。

关于革命的领导权和前途问题，宋庆龄早在1927年就指出：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1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①如果说在1927年，由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约，还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几年以后，即1933年9月，宋庆龄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讲演中，则确认了无产阶级在“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②，她并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表示了衷心的认同。她说：“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③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宋庆龄认为：“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个前途已明晰可见，因为“亿万工人和农民已经在进行这个斗争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④从宋庆龄关于革命领导权和前途的论述，以及她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领导地位的确认，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从革命民主主义跨进了共产主义的行列。

宋庆龄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她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极为本质的补充与最重要的发展。正是她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权、主力军、前途等等问题，并以此作为民生主义的主要内涵而加以充实，使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的旗帜，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永葆活力，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三）使民生主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好朋友”

宋庆龄对民生主义中的空想因素进行了改造和扬弃，从而为孙中山用以指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找到了新的目标，使民生主义与时俱进，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在论述他的民生主义的时候，常常谈到社会主义，在国共合作时期更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2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是如此。他多次真诚地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②；“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③等等。孙中山的这些观点，一方面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憎恨，对资本垄断的深恶痛绝，对贫困的人民大众的深切同情，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对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

“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对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痛苦有切身体会。孙中山“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④

民生主义，便是孙中山要使祖国臻于富强，人民生活得以富足的理想方案，是他的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

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强国，孙中山痛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家也加速了对资本及财富的垄断，其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他看到由于垄断的加速而社会矛盾亦随之加剧。孙中山对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怀有天然的感情，对于资本家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怀着切齿的痛恨：“我人处旁观地位，当知世界上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类之功臣，而受强有力者之蹂躏虐待，我人已为不平；况有功于资本家而反受资本家之戕贼乎？”^⑤他痛斥资本家为“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⑥因此，孙中山要以他“以养民为目标”的民生主义，去打破“以赚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⑤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卷，第115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3页。

钱为目标”的资本制度，他深信“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①

当孙中山企望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对中国进行改造的时候，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西方强国的社会固有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工人阶级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正蓬勃开展。期望得到西方强国给予中国革命以支持的孙中山无数次碰壁。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正在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列宁和他领导的共产国际给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关怀与支持，使孙中山极受鼓舞。他从向西方寻求支持，到倾向于列宁领导的苏俄，向往社会主义是必然的。

对于为着使国家发达和繁荣，而又要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而提出的民生主义，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② 列宁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③。但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并不相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无论是“土地国有”或“耕者有其田”，矛头都是指向地主阶级对土地和由此产生的对绝对地租的垄断。如果这个土地纲领得以实现，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封建主义的障碍；而“节制资本”则允许私人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由国家——资产阶级领导和主宰的国家所垄断，其实质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孙中山企望避免资本主义，却制订了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带有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作了批判地继承。首先，她继承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对社会主义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和执著的追求。她在大革命失败后访问苏联时，即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一个社会新时代的诞生……我们也正在为我们自己争取同样的解放而努力。”^④ 稍后，宋庆龄为她所指的新时代作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界定：“目前的时代标志了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页。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①

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开始，宋庆龄便是孙中山思想的忠实信徒，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和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前进。她协助并促成孙中山后期思想的伟大转变，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通过新军阀来实现的联合统治。宋庆龄在阶级斗争的现实看清了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不可避免。她在旅居欧洲期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对自己所信奉的孙中山用以指导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从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她也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去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她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及产品的私人占有这一对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这是由于“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②。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激烈斗争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使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进行较量。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③最终，战场“必将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墓地”^④。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导致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就是宋庆龄的结论。进而，宋庆龄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两者之间的不同：“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供给人们经济和文化需要的生产手段，是属于公有或合作社所有的”^⑤，是一个“剥削制度完全消灭”^⑥的社会。而民生主义的所有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政策，则是“不但不要压制私人资本，而且相反地，要鼓励私人资本向有利于国家经济建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8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5页。

设的方向发展”^①。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个事实出发，宋庆龄辨明了三民主义的性质：“三民主义是一个反帝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下，私有财产制度不能也不会受到侵犯或废除。”^②由此，宋庆龄便从经济基础这个根本问题上区别了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

同时，宋庆龄又指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一般说来，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而社会主义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她指出：“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③她强调首先要完成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能在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亦即说明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需准备；社会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宋庆龄这一重要论述，修正了孙中山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会“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④。这样，宋庆龄便为孙中山的无法实现的在中国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指出了非资本主义化的出路和实施的途径与手段。为民生主义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使孙中山建设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中国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之，宋庆龄便超越了孙中山的社会改良的倾向和理想主义的空想。

孙中山认为中国实业并不发达，土地问题亦不如西方尖锐，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也没有已经养成很大势力的如欧洲那种大地主，而“一般地主的权力还不甚大”，因而阶级对立并不严重，所以民生主义的实现，只需以“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斗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制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⑤孙中山认为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生活富足的理想的社会，最好的办法是“要用一种防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8页。

② 《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8—11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6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2页。

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①。他多次强调中国不会仿效俄国的激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他认为自己不能同意那种“劫富济贫”的办法。孙中山对中国国情和阶级状况的分析，有悖于客观实际。中国正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的统治——这种统治以封建的地主土地占有制为基础——严重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近百年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疯狂的榨取，更增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有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方可解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虽然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候，孙中山的思想也随着历史潮流向前发展，逐渐认识到“外国压迫中国，不但不是专用经济力，……到了经济力有时而穷，……便用政治来压迫……这便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②并且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但他始终未能制订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反而幻想“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实现民生主义——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而宋庆龄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后，深刻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深刻理解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还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她便看到“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③。宋庆龄对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阶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基础上的。同时这种理解，来自于她所经历过的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实践。宋庆龄进一步指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④“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⑤宋庆龄所指的“以工农为基础的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她为此作出说明：“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页。

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① 宋庆龄所指的“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

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领导，以工农为革命的主力军，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这就是宋庆龄所认定的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也是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途径。宋庆龄的这种论述，体现了在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列宁的有关科学论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同时说明，孙中山的理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才能实现。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时，指出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革命纲领基本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即“（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②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进行了改造，赋予它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恰恰集中在毛泽东同志论及的四点“不同部分”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发展成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完全一致，使民生主义真正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好朋友”，实现了孙中山的愿望。正是宋庆龄使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以及在以后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仍然具有战斗性，成为团结各阶层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建设独立、繁荣、富强的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的一面旗帜。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8—649页。

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她赋予了民生主义——社会革命以新的内涵，使民生主义——社会革命充满生机和活力。

宋庆龄以她的革命实践和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的发展证明，她是最忠诚于孙中山事业的人，是“最忠诚于革命和真理的人”。

（原载《开放时代》1992年第2期，2011年4月修改于北京）

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订，对于孙中山所致力地捍卫共和制度和推进国民革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这是孙中山毕生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的必然结果，也是孙中山和他的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忠实战友及助手们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扬的标志。

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并成为它的主要标志。孙中山为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制订了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在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在中国工人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科学的革命纲领。然而辛亥革命以后，政权为封建军阀所篡夺，实现国家独立、人民民主的任务并没有完成。随着历史的进程，孙中山为了实现他的革命的目标，必须要找到可资凭靠的物质力量。而三大政策则是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即他的革命纲领实现的途径、方法和手段。为了胜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必定要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订的。它在新的革命阶段来临的时候，基本上正确解决了革命成败攸关的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力量的配置的问题。在新的革命阶段，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

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蓬勃发展和辉煌实绩，显示了三大政策的生命力。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孙中山制订三大政策提供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在国际和国内社会发展出现了重大的新因素的时候，孙中山能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地调整和修改革命的纲领，制订出新的战略和策略，

使之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固然是因为孙中山具有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家的胆略与卓识，但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朱执信、宋庆龄等人的坚决支持及大量的实际工作，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宋庆龄在促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三大政策方面所起的重大的、独特的积极贡献，更是不容忽视。

在三大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参与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与会商；经常与孙中山一起讨论以促进孙中山的积极思考。在孙中山面临国民党内右派的压力和反对的时候，宋庆龄又给孙中山以全力支持。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继续贯彻和执行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以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实际行动，回击国民党右派的挑战。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又与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毁弃三大政策的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揭露他们叛徒的嘴脸，坚决守护着新三民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三大政策。她特别强调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不可分割，从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原则。

在国民党退出了革命阵线，日益趋向反动，开始了由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土地革命的时候，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原则出发，在坚持不懈的探索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并且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她根据时代的特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革命形势的需要，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把“联俄”和“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政策，发展成为自觉地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坚信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必然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把“联共”的政策，发展成为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战略、策略，自觉与中国共产党步调一致。她自己也从中国共产党的盟友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把“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展成为明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完全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即中国革命力量的基础，从而坚定地依靠工农大众，并为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在三大政策决策与制订的过程中，宋庆龄热诚地推动促成；当三大政策遭到阉割和毁弃的时候，宋庆龄英勇守护和捍卫；当革命发展到新阶段的时候，她正

确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原则，从本质上发掘三大政策的革命内核，赋予三大政策以更深更广的内涵，从而使三大政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聚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并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伟大事业，为在中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三大政策的制订和宋庆龄的作用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是孙中山经历了无数斗争的失败以后，经过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不断的探求和奋斗中作出的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正确决策。这个对于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也凝结着宋庆龄高昂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情怀，体现着她不断进取的精神。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达成革命的目标，不断地寻求支持者和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反动统治很强大，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极为艰巨。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民主派必须动员国内和国外一切进步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阵线，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方能克敌制胜。因而，与国际反帝进步力量结成联盟，成为极其紧迫的问题。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环行世界，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汲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更期望从这些“先生”中间寻找到支持中国革命的“辣菲德”^①。他曾请求日本政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但日本政府为着自身卑鄙的目的，真正支持的却是反对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孙中山也曾希冀美国总统“主持公道……达到护法之目的”，当时美国和英国、法国沆瀣一气，分别在中国各派军阀中寻找代理人，为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可是在反对革命方面，立场和态度却颇为一致。在孙中山三次开府广州的时候，他们或则暗中煽动反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或则公然以赤裸裸的武力相威胁，必欲扼杀之而后快。无数事实的教育终于使孙中山明白：“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

^① 辣菲德：法国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自卫军司令。后曾率众携带武器到美国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

资本国家断无表示同情于吾党。”^①只有苏俄的列宁最为理解孙中山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②。认为辛亥革命取得建立共和制度的重大成果“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③辛亥革命失败后，又是列宁给孙中山以不断的支持与鼓舞，他预言“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坚信“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正为捍卫共和制度而艰苦奋斗的孙中山带来了“大希望”。苏维埃国家刚刚诞生，即发表了著名的《和平宣言》，宣布帝俄和临时政府对外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密约”等等一律“立即作废”。1919年7月2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首次对华宣言，向全世界宣布将无代价地放弃帝俄攫取的一切在华权益。次年9月，又再次发表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旨，并提出苏中两国会谈的几项意见。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特别报告。他批判了第二国际的“老爷们”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冷漠态度，指出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支持落后的国家的民族解放及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诈的孙中山从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俄得到理解与支持，他把目光迅速转向年青的苏维埃国家，向他们寻求支持和帮助就是十分必然的了。据宋庆龄回忆，当孙中山得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高兴到了极点”，立刻“想同列宁直接联系，交流革命经验”。孙中山曾经在1918年春夏间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奋斗，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战斗”^⑤。这对于被帝国主义包围并武装干涉的苏维埃政权，无疑是十分巨大的鼓舞。受列宁的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于8月1日复函孙中山，表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同情，期望两国革命互相支持。1918年夏，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后回到上海，与战友们总结失败的教

①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中正书局1948年版，第300—3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7页。

④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7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3页。

训时，他深感苏维埃的斗争经验可以借鉴，因而急切希望与苏维埃“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并且尤其注意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组织。此后，孙中山“屡次与列宁有函电往还，讨论东方革命问题”。^①

在促成孙中山作出与苏维埃国家结成联盟的决策的过程中，宋庆龄无论在思想领域或者在实际工作方面，都曾经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她承担了大部分致苏俄函电的起草——孙中山致苏俄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②；大量地搜集有关苏俄的一切资料；陪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且在事前为这些有重要意义的晤谈进行准备。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晤苏俄共产党（布）派来的第一位使者维金斯基，就双方建立关系进行了初步商谈，宋庆龄参加了会见并给维金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1921年12月，奉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访问正在桂林督师北伐的孙中山。马林与孙中山长谈了三次，他关于组建一个为各个阶层所接受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政党和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得到孙中山的赞许。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民主党派建立同盟。会议期间，病中的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国共两党的代表，表示了对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期望。会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领导成员达林来华推动国共合作，他数十次会见了由宋庆龄陪同的孙中山，进行了极富成果的会谈。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身心都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孙中山陷入难以言状的痛苦之中。他指挥军舰在广东海面坚持斗争两月后，被迫回到上海。不几天，马林便去到他的身边，给他带去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孙中山在顿挫中更加痛感与苏俄结盟以争取援助的必要。在那段日子里，学习苏俄的经验，争取他们的援助，是孙中山“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④。是列宁的思想与学说使孙中山愈来愈认识到“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⑤，被压迫民族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

① 何香凝：《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9日。

② 《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5页。

③ 维金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载《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0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持”。但是孙中山要作出“联俄”的决策绝非易事。当时国民党内外反苏的势力很大，他们攻击孙中山与苏俄代表的来往为“卖国”，甚至连他的朋友也误以为他“已经秘密实行了多年的共产政策”而有诸多责难。只有宋庆龄、廖仲恺等最忠实的助手和战友给他以无保留的支持。孙中山不断与他们讨论研究，“常常同他最信任的同志们谈起他的建立中苏联盟的理想”^①，并得出了共同的认识：“一个民族要获得解放，必须效法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人民的榜样。”^②通过反复的思考与讨论，孙中山坚定了与苏俄联盟的决心。1923年1月，在经过多次的会谈后，以孙中山和苏俄全权代表越飞的名义，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中称“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第一次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规划了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关系，表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已经形成。

实行“联共”，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孙中山后期革命活动的重大飞跃；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自觉地使自己的活动“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为了与强大的反动势力相搏斗，孙中山曾经不断寻找和团聚可以依靠的力量。早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就已力图同因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合作。但年青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老谋深算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因为政见不同，“造反”与“保皇”的目的与手段均异，合作当然难以实现。在长期的反清武装斗争中，孙中山开始十分重视结纳会党，他自己甚至加入洪门组织并且担任了职务。处于社会底层的秘密会党有着巨大的反抗能量，较易为“反满”的口号所发动，在最初的反清武装斗争中颇为英勇，往往成为主力，给予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以不断的打击。但是他们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因之革命运动“不可专恃”具有宗法色彩的秘密会党，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足以证明。以武装斗争为革命主要手段的孙中山不得不转而联络和依靠清政府建立不久的新军。由于革命党人长期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各地的新军起义严重地削弱了清朝的统治。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发难，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但新军并不是革命军队，他们中的许多首领往往为革命所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裹挟，然后借着革命的胜利和孙中山的威望而拥兵自重，成为大大小小的新的封建军阀。当他们自感羽翼丰满时，便毫不犹豫地毁弃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在西南军阀盘踞的广东，进行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孙中山虽然建立了护法军政府，但常常是“政令不能出府门”，最后为桂系军阀所排斥，连亲手创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也丢掉了。这些军阀占山为王、画地为营，为争地盘彼此之间或新旧军阀之间经常开战，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孙中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盟友的实践，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民国成立以后，投机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纷纷组成各色政党，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联合组成了国民党。由于官僚、政客、军阀的涌入以及部分革命党人的蜕变，国民党逐渐失去其革命性，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正如宋庆龄所分析：“中华民国的宣布成立……政府的形式是改变了，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而生活依然如故。”^① 旧民主主义革命临近了尾声。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十分沉痛地对宋庆龄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② “国民党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③ 他对国民党的蜕变“感到厌恶与失望”。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孙中山和他的战友提供了国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新因素。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祖国臻于独立、富强和人民获得民主、解放为己任，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迭遭失败以后，于时代的呼唤中诞生。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首先完成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和实现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发育不良”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以承担此历史使命——尽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曾经充满牺牲精神，英勇奋斗。因之，中国共产党在制订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的同时，还必须制订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并联合国内各个爱国、革命的阶级和阶层共同奋斗。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结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孙中山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抉择。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造成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惨痛失败，却加速了孙中山重新结盟，实行“联共”的决策。正是在孙中山悲愤欲绝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向他表达了合作的真诚愿望。是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明确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为在中国现存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翌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后，共产党人李大钊赴上海多次拜访刚由广东平叛前线返回的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①不久，李大钊即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作出了决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即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实行改组以实现两党联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对于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合作形式。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运用建立起来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发动工农大众进行斗争并且推动和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的潮流中；对于国民党，由于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及群众工作，可以使它振奋起来，焕发革命精神。事实上，孙中山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发现了新的力量的源泉”，而且“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他积极地通过国共合作而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是孙中山与共产党结盟的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断从各个方面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孙中山过去长期的坚定支持者邓泽如曾多次与张继、谢持、林直勉等联名上书，反对“联共”政策和改组国民党，并以退党相威胁。冯自由还曾向孙中山“哭谏”，当面诘难。过去战友日益深刻的思想分歧和背道而驰常使孙中山“愤怒得甚至食不下咽，有许多次，他身体上因气愤而感到剧烈的痛楚”^②。但孙中山并不妥协，也不动摇，“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③。以“联共”问题为争论的中心，斗争的激烈可见一斑。在这场斗争中，宋庆龄和廖仲恺等是孙中山最坚定的支持者。宋庆龄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5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6页。

除担负着协助孙中山草拟文件、搜集资料、提供信息等等繁重的工作外，还和孙中山一起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自我革新”，并“寻求使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解放的蓝图”^①。宋庆龄有着踏实与谦虚的品格，一般不愿出头露面，只是默默地工作。据许德珩回忆：1918年和1919年间，他两次作为爱国学生代表晋见孙中山的时候，宋庆龄都坐在大厅一隅打字，并没有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谈话。但是在国共合作这样重大的决策的时候，宋庆龄却是全力以赴的。她几乎参与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的全部会见和商谈，还和孙中山一起在家里接待共产党人。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同李大钊有所接触，“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②。李大钊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分析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基本问题。他们常常是“畅谈不厌，几乎忘食”^③。在孙中山反复考虑和作出决策的时候，与宋庆龄讨论得最多的是关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问题。宋庆龄常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孙中山进行更为缜密的思考，使其认识更为深化，观点更为明确。孙中山在回答宋庆龄“为什么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尖锐提问时，十分痛切地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将死的人，只有共产党才是使其得以挽救的“新血液”，而国共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④。这就是说，经由共产党人的积极工作，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通过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宣传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控制党内军人，使他们服从政治当局”^⑤。共同的探讨和反复的讨论，使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得出明确的共识：和共产党合作以改组国民党，“是保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道路”^⑥。由此，孙中山更坚定了“同一切想阻止他同共产党合作的企图作斗争”的决心，由是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才渐渐形成”。^⑦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而为贫困的农家子”的孙中山，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怀有深切的同情，他对中国工农大众备受压榨的悲惨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农民“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

③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2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

已”，工人终生劳动而“所生之利，尽为资本家所享有”，以致陷于“赡养尚不能敷”的境地。孙中山希冀通过实现民生主义，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使农民和工人从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孙中山是使宋庆龄具体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状况的第一位老师，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向宋庆龄展现了中国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的苦难。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深切同情工农大众的痛苦，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并相信民生主义是使劳苦人民脱离困厄的良方。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对工农自身力量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政策，对他们也有所影响。因之，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①。确信“有了团体”的工人“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②。这种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是孙中山和宋庆龄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他们已经不仅仅把工农大众看做是受苦者，或者是单纯的革命“受害者”，同时还理解到工农大众是国民革命的十分重要的力量：“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③“扶助农工”的决策，正是基于这样的新认识而制订的。

在三大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面临国民党右派的巨大压力：“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④当孙中山要随着时代向前跨进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这些人知道宋庆龄能够影响孙中山，却低估了她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经验，于是动员宋庆龄和他们一起反对三大政策，遭到她的拒绝。宋庆龄的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对孙中山极大的支持。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建的，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曾起过积极作用。由于时代的前进和国民党的蜕变，它已经落伍和颓唐。为了使它继续负担领导革命的任务，孙中山不得不确立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借助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与共产党结成联盟，是关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反对这一决策的内在阻力主要来自国民党右派，而他们大多是孙中山多年的追随者和得力助手，这不能不使孙中山内心矛盾

①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

重重，步履维艰。在这种严重的关头，宋庆龄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宋庆龄为三大政策的制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庆龄参与了三大政策的制订。

（二）围绕三大政策的斗争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逝世后受到更为严重的挑战。宋庆龄团结忠诚于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国民党左派，坚持三大政策，并以在国民革命中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实际行动，给国民党右派以有力回击。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公开毁弃三大政策的时候，宋庆龄坚决捍卫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完整性；更以三大政策为分水岭，作为划分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阵线。她信守三大政策的革命原则，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更为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和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同步和适应，并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旗帜，团结并带领各阶层爱国人士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

坚持与反对三大政策的两种力量的较量，主要围绕着三大政策的核心——“联共”而展开。当中国共产党已作为自觉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勇敢地承担起历史使命的时候，当中国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就成为判别人们政治立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一切真诚地希望挽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沉沦的祖国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党及社会团体，都不能不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初期，即敏锐地看到革命胜利的希望，并将共产党人引以为盟友；而以国民党右派为政治代表的各种反动势力也本能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对共产党人从疑惧到仇恨，更勿论联合了。其次，在国内实行“联共”，那么在国际上就必然要“联俄”。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为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孙中山在国内既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在国际上必定会与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的苏俄结成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再次，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政策，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而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起，即把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作为当务之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将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消灭封建专制主义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切切实实的

代表工农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农民运动的勃兴与发展，日益显示出农民的革命主力军的作用。“扶助农工”政策的制订，也是实行“联共”政策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国民党右派在反对三大政策的时候，首先集中反对与共产党合作便是必然的了。而一切真诚爱国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始终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肩战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历了不断的探索以后，跨越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阶段，实现了具有本质意义的自我超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宋庆龄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

三大政策的实施过程并不顺畅。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一些国民党代表就提出参加国民党者不得再“加入”或“隶属”它党，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遭到李大钊等的有力驳斥；3月，蒋介石致函廖仲恺，攻击联俄、联共政策，谩骂列宁领导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6月，孙科等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共提案；同月，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又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反对联共案；7月，冯自由致函孙中山，大肆攻击联共政策。孙中山在亲密的助手廖仲恺、宋庆龄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极力维护三大政策，多次在国民党内申明三大政策的要义，表达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决心。他在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中指出，“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益以言主义，则彼此均吻合，以言国情，则彼此有若弟兄”；斥责反对联共政策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①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邓泽如等的反共提案。9月，孙中山在与外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枷锁的榜样。”^②不久以后，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重申“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为培养革命武装力量而创办的黄埔军校，在任命蒋介石为校长的同时，任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等担任了黄埔军校的领导职务或教员。孙中山并邀请苏俄派往中国的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的顾问。由于孙中山决心之坚定、威望之崇高，加以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三大政策才得以在艰难中实施和贯彻，给国民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

^①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该刊发表时将原稿标题改为《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转引自《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广州公报》1924年9月8日。

孙中山逝世后，策划于幕后的反俄、反共、反工农的阴谋活动，转而成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先是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参与制订并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这是对三大政策的贯彻的一个重大打击。同年11月，谢持、邹鲁、张继等纠合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通过所谓“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和“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派李大钊”等议案，并宣布解除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职务，悍然毁弃三大政策，分裂统一战线。1926年3月，借所谓“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下令逮捕监禁共产党人并监视苏联顾问的行动。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任职和活动加以清退。

在统一战线破裂前，宋庆龄一方面严厉批评右派的分裂活动，同时在实践中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影响维护三大政策和革命的统一战线。当“西山会议”发出反共鼓噪的时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立即通电谴责，谓“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①。她尖锐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一小撮反对国民党的叛乱分子”，^②为了击退反对三大政策的政治逆流，宋庆龄力促由于国民党中央领导的软弱和意见分歧而迟迟拖延的国民党“二大”早日召开。她支持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使大会筹备工作顺利进行。宋庆龄从上海赶赴广州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在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遗训的分裂活动，号召国民党员要“团结坚固”，因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努力。如果诸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③会上，由于宋庆龄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邹鲁、谢持、张继等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或警告处分。大会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36名委员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谭平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由于宋庆龄的影响和出色的工作，“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

① 《宋庆龄是一个可爱的谦逊的人》，转引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81年5月30日。

② 《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1992年第5期。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13页。

基础稳固住”^①，使得国民党“二大”基本继承和体现了“一大”的革命精神，维护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斗争和宋庆龄的重大贡献，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恰如其分的评述：“她温文尔雅，但性格坚强……她深深了解各种社会摩擦，尽量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因素团结在一起。由于她品格上的魅力，她甚至于从对手那里争得协助，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为革命北伐赢得了喘息的时机。”^②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广州出发北伐。由于工农运动的蓬勃高涨，北伐战争得以顺利发展。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统一了江南广大地区，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兵临上海。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从广州迁往武汉，宋庆龄与鲍罗廷、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于12月到达武昌，不久成立了由宋庆龄、吴玉章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最高权力机关，领导迁都及主持日常工作。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自恃已经军权在握，并借重北伐战争顺利进行的声威，公开反对迁都武汉，而坚持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至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他在南昌成立了“中央政治会议”与“临时联席会议”，公开进行分裂活动。

“迁都之争”，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奏，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一次重大较量。在国民革命的十字路口，在统一战线即将分裂的紧急关头，宋庆龄以孙中山遗孀的特殊身份，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的忠诚继承者，集合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通力合作，为挽救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在1927年3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重申必须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的军政权力、防止个人军事独裁等一系列决议，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委员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北伐军总司令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但一切重大的军事行动及重要军官任免均需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然后交由总司令执行。这些决议的通过，大大限制了蒋介石所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但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在4月12日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以屠刀对付原先的盟友，用武力分裂

① 《吴玉章传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2页。

② 爱泼斯坦：《人民衷心敬爱的宋庆龄同志》，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81年5月19日。

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政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有过短期的对峙。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依然继续支持北伐战争，与此同时，宋庆龄领导着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对蒋介石的背叛进行讨伐。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七次会议通过了撤销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的《免职令》；一周后，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等与共产党人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安等40人联名发出《中央委员联名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已经公然举起反革命的旗帜，“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国民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揭露其目的是“与帝国主义妥协”，并且“不惜拾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之唾余，以反共产口号，博其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①

工农群众以武装起义回答蒋介石的背叛，希望扭转恶化的局势。在这关键的时刻，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终于“转向”，他虽与蒋介石有着权力之争，现在却在反共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去了。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各地反动军阀纷纷追随其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革命队伍的分化也在加速。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尤其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污为“痞子运动”、“堕农运动”……必欲镇压而后快。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以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为首的决策者们为了避免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就在“四一二”政变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还和刚从欧洲回国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言行，反诬“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等等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并谓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宣言的发表，客观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放松了警惕，并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应对蒋介石叛变后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对中国社会状况以及革命进程缺乏了解，而又一味推销苏俄革命经验的共产国际，此时给刚到中国不久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领导人罗易发来完全脱离当时斗争实际的“五月指示”。指示要求马上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千百万农民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建立自己的革

^① 《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第67。

命军队，成立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罗易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私自将“五月指示”转达于汪精卫。汪精卫在“四一二”政变后未表示支持蒋介石，甚至还曾高喊“反共即反革命”的口号，自然有他的个人打算：他把自己装扮成国民党的正统领导者，并且是国民政府的主持者，事实上是与蒋介石争夺权力。但他对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从反感、反对到敌视。“五月指示”正好成为汪精卫“分共”的借口，并且加速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分化。宋庆龄、孙科、陈友仁等也相继从汪精卫处得知“五月指示”。

对于“五月指示”，宋庆龄是不解、不安，也不认同的。在革命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各界人物都会尽量表达自己的诉求，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是必然的。这就需要革命的领导者清醒地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导潮流。宋庆龄看到并担忧革命队伍的日益分化，她既反对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系列作为——如“西山会议”的分裂活动、“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等，也不同意革命进程中不计后果的政策与过火行动。她还力图将各种力量团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下，巩固国共合作，巩固联合阵线，继续领导和推进革命。她作了最后的努力，在武汉国民政府内，对汪精卫为代表的右派进行说服与抗争。她的观点，反映在她那篇著名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宋庆龄并没有回避革命进程中的问题。她明确指出：“现在是开诚布公、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过去确是犯了错误，但我们同志当中有些人却不愿承认；我们对这些错误所应负的责任，至少与那些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完全错了的人一样多。假使我们老老实实回顾一下过去在武汉的几个月，毫不忌讳地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言论和决议，我们是逃避不了责任的。演说和宣言都载在党的历史上，但我们现在却要逃避责任，透过于他人。”^①宋庆龄所指的“透过于他人”者，很显然，是指借口反对“共产革命”而已经大开或准备大开杀戒的集中代表一切反动势力的蒋、汪之流。她认为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国共合作和国民政府领导了国民革命，革命进程中的经验应总结，错误应纠正，但错误的责任不应单由或主要由共产党来负，更不应成为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的理由。她尖锐地指出：“是的，错误是有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错误不只是他人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促成了这些错误，我们也就必须改正这些错误，并且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20页。

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革命的错误。”^① 宋庆龄认为错误的本质是“革命的错误”，是可以通过“革命的方法去改正”的。对于革命进程中的错误不应该透过于共产党。为了联合阵线不致分裂，宋庆龄力图说服国民党右派不要越走越远，她还希望那些错误是“革命的错误”，争取在国民党内或联合阵线内以“革命的方法”去改正。宋庆龄这期间的努力，充分表现她的维护统一战线、顾全大局和斗争的策略与艺术。

对于工农这两个阶级，宋庆龄始终坚信这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②。对已经发动起来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对被诬为“痞子运动”的农民运动，宋庆龄坚决肯定其革命的本质和主流。她期望以孙中山对工农大众的感情和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引导党内同志。她沉痛而诚挚地追述孙中山对自己的教导，以此为例子，说明孙中山对工农群众的感情和对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定：

“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

……

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③在讲到孙中山对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召开的感受时，宋庆龄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些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④

宋庆龄根据孙中山的教导和自己的理解，指出“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① 宋庆龄的观点，与毛泽东在1927年3月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论断：“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② 如出一辙，只是表述的方法各异而已。对于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宋庆龄明确表示应该给予支持：“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志忠于这种信心。”^③ 否则，“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④。

宋庆龄认为比革命进程中的错误更危险的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党内种种不同的分子中间发生了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分歧。有人提议一些猛烈的解决办法。”——即分裂国共合作，镇压工农运动。她尖锐地指出：“这些解决办法中有若干项如果实行起来将会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所以她表示“我必须发言。这些解决办法在我看来，是一种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必然会疏远并且压迫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⑤ 经过短期的说服、争论，宋庆龄明白汪精卫已决心步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国共破裂无可挽回。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起“分共”的旗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遥相呼应，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分共”的前日，汪精卫在寓所召开秘密会议，进行最后的策划。宋庆龄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再次遭到无耻的背叛而痛心疾首，她拒绝出席会议，并派陈友仁到会申明自己坚持反对“分共”的立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① 宋庆龄已经完全看清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

三大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曾使国民革命洋溢着生机和活力。迅速高涨的工农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随着革命的深化和发展，原先处在同一战线的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冲突愈益加剧，反动势力终于赤膊上阵，用武力摧毁了统一战线，用屠刀对付昔日的盟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宋庆龄在汪精卫“分共”前夕毅然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②。她忠诚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决然与抛弃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决裂，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坚定地与人民大众站在同一战线上迎接新的斗争。

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特别是在廖仲恺牺牲后，奋力撑持着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广大群众，对国民党右派和他们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虽然未能阻止统一战线的分裂，但她鲜明的立场、大无畏的精神、顽强的斗志，无可置辩地证明她是孙中山的事业的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三）三大政策的坚定捍卫者

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却又要借孙中山为自己“正名”，披着孙中山的外衣毁弃孙中山的事业。他们一面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虔诚信徒，一面歪曲阉割三民主义，抛弃其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偷换其中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原则，填充以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货色，为自己的反革命行动寻找理论根据。他们以篡改过的假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人民大众，并作为内部纷争和排除异己的工具，甚至成为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论据。因而，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便应反革命之“运”而生。这些“三民主义”不管是披着传统的儒学或理学的外衣蛊惑人心，抑或从西方借取反动哲学加以比附，还是赤裸裸地断章取义，歪曲篡

^①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改，但都毫不例外地抛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精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为了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廓清阵线，辨明是非，必须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准确地在理论上阐发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要义。宋庆龄深知这个十分严峻和迫切的任务义不容辞地首先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不仅因为她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伴侣，对孙中山的事业最为忠诚，而且还因为她积极参与了三大政策的制订，充分理解三大政策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

首先，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分共”以及滥杀工农群众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愤怒声讨，痛斥他们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执行的是与孙中山亲手制订的三大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这种倒行逆施因为“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使得国民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①”。如此，宋庆龄便剥去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政治伪装，还他们反革命加叛徒的本来面目。

其次，宋庆龄从理论上全面和深刻地阐发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她特别强调三大政策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灵魂，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途径。在她看来，“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②，这是孙中山最重要的遗产。宋庆龄着重指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③，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总结了许多惨痛的教训以后，孙中山“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④。因之，丢弃了三大政策，就是践踏了三民主义。宋庆龄把是否继承三大政策作为区别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的真三民主义和背叛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假三民主义的标志，任何假孙中山之名而毁弃他的思想和事业的叛徒，只要在三大政策面前，便无可逃遁地显出其原形。

宋庆龄进而从国内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的实际，论证了三大政策制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联俄”政策之能够实现，是因为“苏联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加之于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中国”^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要是从苏联人民那里才能得到同情、合作和指导”^②。不仅如此，“更重大的原因”在于“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并以充当“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朋友”^③为自己的使命。孙中山决心“联俄”，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国民党如果与苏联这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实行联合，“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当时反对革命的新军阀如陈炯明之流污蔑孙中山争取苏俄援助为“卖国”，但这并不能动摇孙中山的决心，这是因为“孙中山不怕也不耻于承认他这个革命的论题，因为他知道，法国曾经通过拉斐德^④在美国革命中起了客观的革命作用，在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中，也还有很多同样的例子”^⑤。宋庆龄和孙中山一样，“不怕也不耻于”承认“联俄”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在孙中山逝世后，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她代表孙中山访问了苏联，“站在被压迫民族一份子的立场上”，向对中国革命给予巨大支持的革命的苏联致谢。事实证明，宋庆龄不仅仅是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她已经开始接受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理论，并且从这个高度考虑“联俄”问题。关于“联共”政策的制订，宋庆龄强调指出这是因为孙中山从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十分“必要”。以明确的主义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虽短短几年，但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领导着工农运动并使之蓬勃向前发展，孙中山和宋庆龄由此而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力量中最为活跃”，^⑥决意容纳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改造国民党，可以扩大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归根到底，是因为孙中山“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⑦。至于“扶助农工”的决策，目的在于“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援”^⑧。由于“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工人推进和维持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民生产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④ 亦译为辣菲德。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口”，所以他们“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①。为了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和切合实际”，就必须吸收工农参加革命。“扶助农工”政策的制订，一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对于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群众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已逐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力。简而言之，三大政策完全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以及革命的需要而制订的。而三大政策确立的正确性，已经为革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证明。宋庆龄指出：“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并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打到长江这条历史性的防线，更击溃河南奉军主力，推进到黄河岸边。……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在那些日子里——还只不过三个月前呵——国民党可能叫人憎恨，甚至叫人害怕，但是没有人敢轻视它。”^②而丢弃了三大政策，不单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毁伤，国民党本身亦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害：“国民政府的盛名，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③宋庆龄认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如此的清楚明白，而现在国民党的“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严重危害了三大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国民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正如“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④宋庆龄以三大政策为试金石，在因大革命失败而陷入混乱的国民党内很快划清了阵线。她面对白色恐怖公然申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确信“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⑤。

在大革命刚刚失败的时候，面对着反革命的大屠杀，宋庆龄为捍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斗争，她自己因而也成为一面旗帜——国民党革命派的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2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旗帜；成为一种力量的化身——正义和良知的化身。由对三大政策的认同和毁弃而逐渐分清阵线的国民党左派，和由于对还在少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暂时缺乏充分了解，一时还找不到正确道路的各阶层爱国分子，重新集结在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旗帜下，成为一支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力量，由宋庆龄率领而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在革命的新阶段中，宋庆龄始终撑持着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以她特殊的身份，发挥着不可代替的重大积极作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在革命新时期对三大政策的发展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要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对革命实践起着指导作用，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而发展。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和三大政策的确立，就是孙中山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而对过去指导革命的理论进行总结、修正与发展的结果，也是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升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但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无论多么热诚、努力地跟随时代的步伐，终难避免历史的局限。因之，他的三大政策也不可能完全科学地反映时代的特点和全面地概括革命的任务和要求。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宋庆龄承袭了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革命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使三大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不断深化与拓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

孙中山实现“联俄”和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客观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革命的趋势与特点，但是他还未能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命题。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①。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宋庆龄在“联俄”和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问题上，超越了原来与孙中山的共识，在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自觉地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从“联俄”发展成为自觉地接受了帝国主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9页。

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并在20世纪30年代初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怀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忠诚，为中国革命的重新高涨进行新的学习与探索。她旅居欧洲四年，对社会主义苏联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考察。1931年回国定居后，又目睹了国内政治的极端黑暗腐败：国民党对内以刺刀和特务统治来维持封建独裁的政权，对外则屈从于帝国主义，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侵略一味退让投降。她深感国民党已经从革命政党蜕变为反革命政党，于是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在这个十分重要的声明中，宋庆龄在宣布国民党已经“灭亡”的同时，首次明确地提出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进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①她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她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新的认识：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必须由代表工农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人民大众的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革命；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稍后，她又更为科学、更为中肯地表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②；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看，革命的现阶段，“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起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③也就是说，在现阶段，要进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而打下基础。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是宋庆龄的世界观发生深刻转变的根本标志之一，表明她已经判明孙中山的带有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放弃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追求，相信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于是进而信仰和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并为之不懈奋斗。走俄国人的道路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5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宋庆龄对孙中山“联俄”政策的重大发展。这是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去研究社会的发展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的结果，因而她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绝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理性的结论，因之她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在宋庆龄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判断，同时受到苏联对外政策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曾经建议她和她的战友陈友仁等早日回国与蒋介石合作以领导中国革命。^① 宋庆龄既不能接受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对当时苏共日益严重的党内斗争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动摇她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她在1931年夏返国后，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等一系列旗帜极为鲜明而充满战斗性的演说和文章，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趋势，阐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她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

第一，确信帝国主义时代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完成了革命，古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正为伟大的斗争而集合起来。”因此，受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必须集中力量，粉碎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② 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成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的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她指出这个时代的另一特点，就是“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因而“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③ 宋庆龄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后指出：“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④

第三，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须大联合。宋庆龄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面临着同一个敌人的进攻”，因而“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

① 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4—16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页。

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只要联合行动起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以及将来的人类命运”。^① 宋庆龄从理论上和斗争实际需要出发，都接受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伟大号召，认同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命题——只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就一定打击了帝国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面对强大的敌人，一定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并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前途的可能。

从此，宋庆龄在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同时，也为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目标——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她努力地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与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架设桥梁。在实践中，宋庆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发挥重要影响，为在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并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起着独特的作用。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她仍然以国际反帝统一战线领导人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支持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同时，继续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争取了大批的朋友。

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敏锐的目光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但他的“联共”还是以国民党为主体，容纳革命的“新血液”——共产党人，以克服国民党的弊病，使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承担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也表现了他的阶级的局限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来临的时候，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宋庆龄也是从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出发，在革命浪潮的起伏跌宕中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锻炼，在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在新的革命阶段中，原有的革命领导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其右翼已经堕落成为反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或者成为革命的参加者、追随者，或者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而昔日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时代的呼唤中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宋庆龄正是从忠诚于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出发，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

在参与制订“联共”政策及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中，宋庆龄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而且“最为活跃”。然而她对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页。

蒋、汪叛变后国民党的蜕变以及未来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她对大革命的失败极为痛心，但并没有灰心。她相信“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① 因之，她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右派决裂，表示“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同时，她对国民党左派怀有深切的期望，相信“中国国民党左派是一个革命的团体”，认为中国“国民党左派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代表千百万人民”，他们“保证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② 因而她努力将国民党左派团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并按照孙中山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以图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她在1927年8月赴苏联访问前发表的声明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念：“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③ 她认为只要将右派清除出国民党，使国民党在组织上恢复其革命性，然后“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④ 为此，她把聚集国民党左派作为首要任务并投入了大量精力。1927年11月，宋庆龄和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合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宣布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宣告中止由蒋介石和汪精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职权；筹备召集国民党各省市代表大会，以便选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的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等等。^⑤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筹组，是宋庆龄和她的战友集合国民党左派，力图改造和复兴国民党的重要步骤。

这个时期，宋庆龄对重振国民党还怀着期望，是符合认识论的规律的，她的全部努力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宋庆龄是孙中山忠实的战友、助手和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在孙中山逝世后又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她对孙中山创建的、曾经领导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充满感情，同时怀有深深的义务感，认为国民党本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⑤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338页。

身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一面旗帜，她把尽力保护并撑持这面旗帜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且，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是在革命向纵深发展时逐步暴露的，人民群众对其本质的认识因而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国民党怀有期望和幻想的时候，国民党这面旗帜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宋庆龄重建或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努力，对于挽救革命和团结、教育人民群众，对于孤立敌人和打击敌人都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无疑曾经是先进的阶级和革命的政党，在它领导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着除了革命对象以外的全民的利益，并且取得了历史允许它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国民党成为各个阶级的联合战线，这个联合战线在一定时期还保持着革命的精神，并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又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的艰苦努力，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北伐战争得以胜利进行。革命形势的高涨给日益落伍、分化的国民党披上革命的外衣。但革命向纵深发展又日益使国民党分化并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国民党右派成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军阀、官僚、政客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国民党左派则要继续探求祖国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宋庆龄不愧为国民党左派的最优秀的代表，她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往指导革命的理论 and 战略、策略进行反思、总结与扬弃。她实地调查研究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去分析考察中国革命的问题，因而得出全新的认识，这使得她能够将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与已蜕化堕落的国民党区分开来，并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与国民党决裂，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前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中。

当宋庆龄1929年6月从欧洲返国参加孙中山的迁葬仪式时，她为国内政治的黑暗所震惊。她看到反动的国民党政权除了“妄肆屠杀几十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自私自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横征暴敛苛取于民以外，没有什么了。……只有反革命的活动罢了”^①。她对国民党的蜕变有了进一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页。

步的认识，感到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①。迁葬仪式以后，宋庆龄重返德国，继续学习与探索，尤其着重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这个时期，她的思想有了急剧的深刻的变化：从服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转变成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之，她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逐步有了科学的认识，自然也就从理论上解决了斗争所必须判明的革命领导权、革命的主力军以及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等问题。1930年8月，邓演达等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与邓演达在深切同情人民的苦难和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目标上是一致的，她对邓演达炽热的爱国热情、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献身精神极为钦佩，在多年的并肩战斗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但在革命的领导权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的前途等等问题上，他们存在着分歧，难以统一。尤其是宋庆龄对于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所以她没有参加自己曾经参与筹划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且认为这个组织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她在1930年9月从德国柏林给在上海的杨杏佛的信中说：“至于第三党……我看这一团体希望不大，以为它对南京和北京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②宋庆龄只是从另外的角度和渠道支持他们的斗争。

1931年8月，宋庆龄从德国回到她魂牵梦萦的多难的祖国的时候，国民党与蒋氏政权的反动与腐败已经暴露无遗了。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因此就更加完全依赖帝国主义者。”^③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走向反动的、“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的国民党，宋庆龄深感已经不可挽救，于是毫不犹豫宣告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灭亡”。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并且决然表示：“既然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页。

② 《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90页。

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① 这个声明，是宋庆龄与国民党决裂的宣言书，她强调她所丢弃的仅仅是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事业的国民党，而不是放弃自己的责任。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②。

宋庆龄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的同时，公开宣布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③ 代表工农根本利益的党，就是孙中山曾经倡议结为联盟的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宋庆龄世界观深刻转变的另一根本标志。她以阶级观点对政党进行分析，从而判定其在阶级斗争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国民党已经堕落为“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④，这个党和它所把持的政府成为“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因此它就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只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有资格、有能力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稍后，宋庆龄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无产阶级的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进一步论述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在长期的反对压迫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和成熟，成为一个自觉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⑤ 无产阶级不仅领导着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而且领导着以农民为国民主体的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因之，宋庆龄确认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中国的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那就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5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7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

不可抗拒的”^①。她同时承认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是武装斗争：“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② 武装斗争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③。在这种意义上，宋庆龄公然申明“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④。中国人民通过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便为实现社会主义作了必要的准备”——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⑤

宋庆龄关于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新阶段的论述，可以概括为：进行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阶级为主力军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它的前途是实现社会主义。通过这些论述，表明宋庆龄已经自觉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她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上的自我超越，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从“联共”——在统一战线中以国民党为主体而容纳共产党，到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本质性的重大发展，是她坚持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她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以此作为指导，对中国革命进行分析和总结的结果，也是她炽热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昂扬的表现。

但是，当宋庆龄坚决与国民党决裂，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组织上实行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不加分析地将忠诚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反动派混同起来，把中国资产阶级通通作为革命的对象。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中指明“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并将邓演达等组织的“第三党”斥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和“统治阶级的奸细”。对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宋庆龄、邓演达等和蒋介石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石反动政权的斗争，以及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地探索与前进，不信任、不理解、不配合、不支持，甚至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①。在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和中间派划清界限，不能和宋庆龄、冯玉祥等接触”^②。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宋庆龄感到痛苦与困惑。但是她从中国的革命事业出发，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在实际斗争中，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地方党组织和从事具体工作的共产党人，仍然与宋庆龄密切配合，互相支持，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正如她在辛亥革命以后，在孙中山极为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事业一样，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在中国共产党险遭覆灭的时候，在共产党对她有种种误解甚至错误的指责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此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宋庆龄总是自觉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斗争不懈，奋进不息。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重要组织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赋予了新的内涵：从“扶助”工农大众转变为依靠工农阶级，从把工农阶级仅仅作为革命的实行者和“受惠者”，发展到承认工农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工农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的晚年，制订了“扶助农工”的政策，要把工农阶级“吸收”到革命事业中。但是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没有正确地解决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的问题。“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③这正是孙中山的历史局限的表现。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怀着深深的同情，决心进行斗争，把他们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在因国共合作而勃兴的工农运动中，孙中山和宋庆龄越来越体会到工农力量的伟大。1924年7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出席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贫苦农民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深受感动和鼓舞，认

^①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② 刘晓：《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期。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16页。

为“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①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在继续高涨的工农运动中，更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工农大众不仅是受苦的阶级，而且是战斗的阶级。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宋庆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支援罢工而募集款项，并多次接见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向警予，她经常向宋庆龄介绍中国工人的悲惨状况和他们的英勇斗争，宋庆龄也曾亲自到上海一些日商纱厂进行考察……对工人阶级了解的加深为宋庆龄世界观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工农群众对反革命的英勇反击，更使她认识到“这广大的被压迫群众是中国真正革命分子的主力，他们是中国战胜外国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希望”^②。当宋庆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更从感性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她从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去确认它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民主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去理解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当宋庆龄确认中国工农这“两大基本群众”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的时候，它便解决了对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关键问题，这是孙中山多年探求却未及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宋庆龄对“扶助农工”政策的实质性的发展。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忠诚，体现在她勇敢地捍卫他的事业，按照他的革命原则发展他的思想，使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在孙中山逝世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仍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坚持、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中的重要部分。她对祖国、对革命和对孙中山的忠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祖国的忠诚，使她像孙中山一样，自觉地以“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不断进取精神，永远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她英勇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根据革命的发展而发掘、赋予三大政策更丰富的内涵，使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使宋庆龄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宋庆龄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使孙中山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事业中。

（原载《宋庆龄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11年2月修改于北京）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页。

孙中山与宋庆龄

在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孙中山和他的战友、学生、伴侣——宋庆龄，宛如黑暗天幕中的一对“双子星”，给灾难深重的民众带来希望、信心和力量，使他们感受到温暖和慰藉。

正像“北斗”一样，其中的一颗巨星光芒四射，引导人们走出中世纪的牢笼。当这颗巨星释放和耗尽了全部能量后，殒落在风雨如磐的故国大地。

“双子星”的另一颗星星依然高悬天际。岁月的流逝使她更为明亮璀璨：既蕴含着已经消失的巨星的光和热，又接受了初升的太阳的强力照射。这颗星星辉耀着民众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激励他们迎接曙光和创造新的生活。

第二颗星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消逝在祖国改革开放来临的时刻。然而，这对“双子星”长存于人们的心中：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抑或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进程，不仅未曾淡化他们的光辉，而且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

他们的英名青史长存！

他们的业绩永垂不朽！

(一)

伟大的时代，孕育和塑造了伟大的人物。

当然，人物总是环境的产物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活动离不开历史的舞台，是以“时势造英雄”。但是，杰出人物又是一定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代表，从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并且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因之“英雄造时势”的论断也

反映了这种双向关系的另一面。

在19—20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两位伟人——孙中山与宋庆龄。他们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宛如天幕中光辉灿烂的“双子星”。他们是时代和民族的精英，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社会从封建末世进入近代。然而新时代帷幕的开启，既非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所致，亦非因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使然。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强行轰开天朝已锈蚀的铁幕，此后，西方列强用侵华战争的炮火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华民族的身上。这种强烈的外铄作用，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进程。清朝政府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日益与列强相勾结，互为靠山和墙脚。这种极端反动的联盟，严重桎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粉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再继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祖国臻于富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作为第一步的民主革命又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持续了数十年，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样正规的、全国范围的革命斗争均以悲剧告终。事实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备受压榨的、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必须继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还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才能上升为民主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

孙中山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近40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战斗历程跨越两个世纪，贯串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前后阶段。他的足迹和活动涉及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他力图使自己的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并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孙中山不愧为一位巨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多方面而又内涵丰富的。他几次环行世界，具有广阔胸怀和世界眼光；他求索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库以锻造救国拯民的真理，同时他也不断思考宇宙和人生价值的真谛；他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中故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睹共和制诞生于封

建君主制的废墟；他更经历了无数的顿挫，迭遭通缉和绑架；他曾有过“槁木死灰”的心境，却又能够“愈挫愈奋”……当然，他的形象并非完满无缺，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的神祇，只是一位“大写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先驱的重要角色。他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因为严峻的现实是：无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他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前行者——制订了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政纲，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了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其辉煌的结果是推翻了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当革命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了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在时代上升的阶梯上攀登不已，无论是声望、威信或年龄的增长，都未曾导致他思想僵化和盲目。他从爱国和热衷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民主革命领袖；又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一直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展。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使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认同。

孙中山的战友、学生和伴侣——宋庆龄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堪称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样，她也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她是以孙中山的战友、学生与伴侣的身份参与、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则是由于她在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衰的生命力。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不同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群体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中国革命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导引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她的崇高品格和魅力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应当指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着师生之分，但影响却是双向的。在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征程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砥砺和促进。孙中山作为宋庆龄的战友、导师和伴侣，对她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会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现实的舞台，继续鼓舞人们奋进，以完成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宋庆龄的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时代与斗争的要求，也是他们的共同思想与相互关系逻辑发展的结果。

宋庆龄与孙中山生活在矛盾错综复杂和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跨世纪的峥嵘岁月包含了两个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而前者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两个革命阶段之间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重要的区别。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几乎浓缩了西方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往往一次革命运动方才失败，另一次规模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运动又随即而起；一种新思潮、新理论刚刚出现，很快又被另一种更先进的思潮和理论所代替。因此，现实便向站在时代前列指导潮流的人物提出了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及时总结、不断扬弃并自我超越，以便与时俱进。任何停顿都会使自己沦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倒退为潮流的障碍。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还须非常注意保持革命新旧阶段的连续性——将前一阶段革命成果在下一阶段加以发展，把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作为下一阶段的借鉴。先前的革命队伍则往往由最有能力、威望和凝聚力的先进人物率领，经过整顿后投入新的斗争。这种承诺在很多方面都是必要的，对新阶段的斗争大有裨益。宋庆龄不愧为炽烈的爱国者和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楷模，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感使她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反顾地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孙中山忠实的、亲密的战友、学生和伴侣，她的奋进成为连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她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赋予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以时代精神，使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显示了不同革命时期和阶段的不可分割的连接性和贯通性：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是后来的、高级

的革命阶段的准备；后来的高级革命阶段，则是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的发展。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为后继者们所推进。他的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计划，已经和正在实现。这种连接和贯通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使过去革命斗争的传统、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革命所吸收，并使更高层次的革命斗争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正是在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许多仁人志士从孙中山的旗帜下出发，走进了新的革命行列，跨入了新的革命斗争时期。

(二)

孙中山在19世纪末叶踏上了社会政治舞台。

他面临的现实是：在西方，1789年的汹涌澎湃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早已过去，1848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则告一段落；在东方，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凭借自上而下的农奴解放发展资本主义，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具有渐进的性质。只有1871年异军突起的巴黎公社，预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日益投靠外国侵略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甚至不允许温和的社会变革，对戊戌变法进行了血腥镇压。然而，许多殖民地附属国终究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觉醒。而由于“‘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化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中山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超越了同时代中国所有的进步思潮和运动，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的第一次重大飞跃。这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青年，很早就想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他曾经受过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早年经常以洪秀全自况，并同许多著名的维新人士相结交，在他的最初的政治活动中很明显地留着农民战争和维新思潮的印记。但是，他的出身和教养又不同于农民战争领袖和维新志士，使他的思想中蕴蓄着更多的民主主义因素。1894年夏，他怀着改革的热望上书清朝权臣李鸿章失败后，便毅然跨出决定性的步伐，立志实行革命以改造中国。从此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上书的挫折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刺激，使他“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前往檀香山，并在这年11月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宣言号召人民奋力“振兴中华”，拯救危亡。入会誓词则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已具雏形的民主革命纲领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首次出现了共和国

方案。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纲领相较，孙中山的政治构想可更切实地解答历史的课题——它继承了农民战争对封建暴政的不妥协精神，却摒弃了“皇权主义”的藩篱；它接受并发展了维新人士仿效西方、重视社会改革的主张，却突破了“君主立宪”的局囿。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首次飞跃不仅使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新的内涵，也使他成为亚洲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家。

在兴中会的长达10年的征程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展开了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1895年的广州之役虽然流产，却是他的革命的“战争事业”的发端；1900年惠州之役再次失败，但革命党人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令人感奋，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孙中山在战斗历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纲领，形成了以独立、民主和富强为主题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扩大了革命民主派的影响，并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样，当革命浪潮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开始高涨时，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纲。同盟会的成立，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度。从此，“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

同保皇派进行一场原则性的大论战，是同盟会在政治、思想上的重大功绩。这场论战围绕着革命与保皇的根本性问题展开，革命党人有力地批驳了保皇党人的各种谬论，“扫除保皇邪说”发展了三民主义政纲，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为“反满”和力求避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共管”；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为经由“国民革命”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以建立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为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使中国臻于繁荣富强。论战以革命民主派的胜利告终，致使它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从而，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政治、思想上的条件。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旗手。

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则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主要革命实践活动。从1907年到1911年，他在两广和云南地区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或是依靠会党、新军和防营，或是借助群众的自发斗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其他条件而失败，却在政治上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人民觉醒，激励群众斗志。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不断扩大的保路风潮，又把斗争推向高峰。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到来。

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举义帜。各省纷纷响应，形势迅猛发展。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这是革命党人流血牺牲和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和主持了临时政府。新政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与宪法等同”的《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除旧立新的法令。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的步伐；打倒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在政治、思想领域中造成了一次民主主义的启蒙。从此之后，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一幕短命的闹剧！

然而，共和制度的实际生存期非常短暂。反动势力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形势的逆转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夺取了政权，旧秩序在新形势下恢复。这个窃国大盗肆无忌惮地践踏和毁弃共和制度，乃至公然称帝。在他同他的洪宪残梦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后，把持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头子们又继承了死去的独夫民贼的衣钵。民国依然徒具虚名，政权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民犹斯也，国犹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当年流传颇广的这副对联，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徒有其表的“民国”和走马灯式更迭的“总统”的鄙视。

孙中山被迫展开捍卫共和制度的持续斗争，再次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由是有“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这些艰苦的斗争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成果，但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相对强固的统治，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把共和国方案付诸实现。西方共和制在中国的翻版，只能是形似而非神似，以致在长达10年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战斗历程中，几乎每个回合都充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是在捍卫共和制度遭到第一次严重挫折后，宋庆龄来到流亡于东京的孙中山的身旁。他们的始点颇不相同——一位来自濒海的南粤山村；一位诞生于正在崛起的大都市上海，民主革命浪潮使得他们得以相聚。

对于宋庆龄来说，历史在她的生活历程中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把目光投向世界，吸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决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趋于近代化，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开放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少见的，使她在少年时代就得以留学海外，走向世界，接受了

“欧洲式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受到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洗礼。还在负笈异域的少女时期，宋庆龄就憎恶中世纪的观念和陋习，认为清帝国的统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切望祖国挣脱桎梏而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炽烈的爱国主义成为这位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留学生的思想的主流。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所有先进人士救亡图存的热望。因之，爱国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事实上，还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就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掠，中国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她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灾难，为祖国遭受到“瓜分”、“共管”的厄运而悲愤。她的民族自尊心使她不能忍受在课堂讨论中那种“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的观点，因为她确信只要“唤起全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就会有“真正的进步”。

封建专制制度的朽败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由是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日渐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要求更新和进步，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

正像许多同代人一样，宋庆龄从爱国走向变革。这是合乎逻辑的，具有完全意义的爱国主义应当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激情促进了理性，理性升华了激情。挚爱祖国的山川、历史、文化和人民，必然会奋力探索救亡和富强之路。宋庆龄满怀爱国激情和变革热望进入了青年时期。迎接她的是剧变的中国乃至世界。然而，被她满怀激情所称颂的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斗争的果实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所攫夺。

“二次革命”未能获得广泛的响应，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他的少数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再次流亡日本，在十分艰苦的处境中策划新的斗争，以捍卫共和制度。宋庆龄未能从大洋彼岸回到离别六载的祖国，辛亥革命——她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并没有如她所期望的那样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真正的生机和活力，学成归国后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更是无从施展。宋庆龄只得于1913年夏从美国径直前往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革命家的学生和战友。年青的文学士在政治生涯开始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心”。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最早的同志和战友，这则是宋庆龄踏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由于父亲的影响，孙

中山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更结成为生死不渝的同志和伴侣。

(三)

历史的航船并不因“顿挫”而停滞。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趋于尾声。随着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正在到来。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历史的新纪元。两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和领导阶级迈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革命阶段新旧交接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伟大革命家的卓识、气魄和胆略。他对自己先前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使长期以来从事的斗争适应历史的潮流。他自觉“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积极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孙中山热烈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初就曾致电列宁，表示对他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战斗”。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青年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定会“收绝伦之效果”。当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时，他把他们引为战友和同志。事实上，孙中山于1921年底在桂林就已会见经由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马林提出的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个进步阶级和阶层的政党，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而当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从广州抵达上海时，刚刚参加了确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方针的中共中央二届二中全会的李大钊便来拜访，双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中心内容是“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1923年初，孙中山和廖仲恺同苏俄代表越飞又进行了多次会谈，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宣言”，确定两国密切合作以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原则。此时，讨贼军与滇桂联军逐走了盘踞广州的叛将陈炯明部，孙中山于2月下旬回粤，在穗设立了元帅府。他致力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培训革命军队，镇压了反革命的买办武装——商团的叛乱，巩固和扩展了广东革命基地，开创了实行北伐的大好局面。可以断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初期，孙中山已经把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进步性，在新的时代建树了新的业绩，并为后来的斗

争开拓了道路。在持续的战斗过程中，宋庆龄给他以积极的支持、鼓励和影响。

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征程，是“艰难顿挫”和奋进不已的10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主要是反袁与两次护法运动——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与时代的大潮俱进。年青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宋庆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进了革命队伍，当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他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流亡异域，开府广州，颠沛流离，战祸频盈……正是在这艰苦备尝的日子里，孙中山成为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深化对“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和其他方面的认识，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大大有助于日后宋庆龄正确判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一系列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他带领宋庆龄为捍卫共和制度而奋斗，使她在不断的失败与探索中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磨砺，而得以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但是，作为学生的宋庆龄，与她的导师孙中山的相互关系并非单向，她对孙中山的支持和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在革命低潮中，在孙中山处于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的朝气、爱国主义的情怀与民主主义信念，满怀温柔和深情来到孙中山的身旁，给孙中山以支持和慰藉，无疑成为激励他在挫折中再起的动因之一。这种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尤为明显。

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临绝境；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并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大希望”，他们自觉地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历史的大潮中与时俱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由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新阶段又涌起了高潮。

革命形势的迅速深化和发展，导致队伍的分化及思想冲突愈趋激烈。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更替，他的主要助手往往有所变化。从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直至他逝世，对他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始终支持的成员并不很多，而参加革命较晚的宋庆龄，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她在革命的低潮中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从此义无反顾。对于孙中山后期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许多实际工作，更重

要的是在思想领域方面相互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翼的干扰。在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时刻，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和促进日益强化。宋庆龄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著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这一切对于孙中山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和决策的形成和制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正是在相互扶持及砥砺中，他们合着时代脉搏走向了更高的革命阶段。

(四)

然而，正当国民革命的风暴从南方升腾起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使极度悲痛的宋庆龄更为忧虑的，则是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以不妥协的战士的精神面貌，独立地投身于时代的激流。

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的叛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错误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的路线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攫取了革命的果实。1927年春夏之交，革命在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不再重演，革命只是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因之，革命在退却中向着纵深发展。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旗帜，向叛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在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她竭尽全力揭露和批判那些自称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们的叛徒嘴脸，指出他们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事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她断言“目前已经进入反动时期”，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们”。他们倒行逆施，所依赖的是“新军国主义”。这些人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推行的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相反的政策”。她愤怒谴责叛徒们“操纵利用国民党”，打击残杀“农民、工人、共产党”，断言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反面，“丧失了革命性”而“不再是革命的党”。为了同国民党右派划清界限，她表示“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她当时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切盼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继承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因为她确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相信“正确地配合运用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这样的国民党才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承受孙中山留下来的革命称号的党派，是唯一忠于他

的主义和政策的党派”。她呼吁“用革命的方法改正错误”，把右派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将革命力量重新团聚起来，继续和推进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大有助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走向。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学习与反思，使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辨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异，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再生，确认它已变质和崩解。在1929年从欧洲返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时，宋庆龄为新军阀的暴政所震惊。她斥责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全部“出卖”了孙中山的遗嘱，相信任何了解真相的人都不会再“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稍后，她明确地断言：“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从此，她把目光集注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她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确定了工农阶级的地位，“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她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的奋起，视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认为“全国工农参加革命”才能使“革命具有生命力”，坚信“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出发，终于科学地确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这对曾在西方民主主义的熏陶下成长的宋庆龄，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深刻转变。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宁汉合流”后立即向全党发出通告，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不久后的“八七会议”再次肯定了这个通告，重申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有着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并且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目标调整斗争的步伐和策略。她在1927年9月访问苏联时于莫斯科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决策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和坚决的支持，明确表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她确信“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这是为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

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宋庆龄强调必须使用的“革命的方法”，就是正在开展的土地革命。在新的革命阶段到来的时候，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旗帜，把握住民生主义核心问题——土地问题与实现耕者有其田，加以丰富和阐发，号召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支持和投入土地革命。这样，宋庆龄便将孙中山作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民生主义——他曾经将这种经济改革称之为“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纲领。确信中国社会革命应该是“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刚刚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等）的论述和与之相应的创举还未被广泛认同的时候，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示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支持，这正是宋庆龄忠实于爱国主义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必然表现。

经过了大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考察了苏联和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宋庆龄的思想产生巨大的飞跃。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她已经完成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她以新的思想与风貌，迎向新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风暴。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她的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拥护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凝聚了广泛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她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争取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至于妇女运动和少年儿童的保育、教育事业，始终为她所关注。在此期间，她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打击，身心遭到摧残，甚至危及生命。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更使她感到痛楚和困惑。然而，“在风雨飘摇的30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媚外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

中国的大地。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政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指出正是“蒋介石政府奉行的政策……使今日中国濒于全部分裂、沦为帝国主义属国的境地”；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从来就不曾作过认真抵抗的准备”，“它总是想对帝国主义妥协。因为它怕武装的人民甚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正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豆剖”，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起而革命。孙中山逝世后，救亡任务迄未完成。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旗帜，把握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反对帝国主义，指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必将“是一个广泛的反帝斗争，最后将汇合起来成为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当中国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厄运的时候，宋庆龄认为实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标志就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促使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为实现全民抗战而努力。她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和妥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宋庆龄清楚地认识民族独立绝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和阶级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指出：“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是应该同时并进的。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因此，她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不断地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作斗争。她反复指出必须马上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抗战的全过程中，宋庆龄不断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进行阐发，使其成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起到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重要作用。同时，她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从事的斗争中，总是密切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为促其早日实现而奋斗。她更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绩，并阐明它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中国不仅是为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全人类而战斗”，努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之间架设相互支持的桥梁，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积极争取各国和各方面的援助，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不愧为英勇的民族斗士和伟大的国际

主义者。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饱受战乱苦难的广大人民热望早日实现和平统一，重建家园。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实行独裁统治，决心以暴力手段消灭共产党。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临近，国民党统治集团越来越把力量放在反共和反对国内其他民主力量方面。蒋介石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赤裸裸地表达了发动内战以消灭共产党的罪恶企图：公然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美国则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考虑，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以便在中国建立一个听命于美国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为实现和平建国作了巨大努力。宋庆龄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则成为她动员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实现人民民主的武器。她坚决反对罪恶的内战，认为“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宋庆龄尖锐指出：“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否则，“就要负担掀起内战的责任”。宋庆龄的声明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使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相一致。这个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推动了国内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的高涨。当蒋介石将中国人民推入内战的血海的时刻，宋庆龄更以全部热情和力量投身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她在自己熟悉的战线上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经历了三年的奋战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使宋庆龄深感快慰的是，由于新中国的诞生，“使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可靠的保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使得“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宋庆龄以她近40年的光辉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不长的过渡阶段，又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前进的道路仍然存在曲折和顿挫。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等

职，还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等。宋庆龄从事了大量的国务和社会活动，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争取广泛的世界支持依旧是她的主要任务。与过去的岁月一样，她仍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作为己任。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儿童教育工作中——这些工作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关乎祖国的未来。

在孙中山逝世半个多世纪后，宋庆龄近 90 高龄时离开了她所挚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毕生梦寐以求和为之奋斗的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及造福人类的理想，今天正在实现着。正如孙中山所预言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真挚深情，他们对革命的“不息的热忱”，他们“愈挫愈奋”的坚毅意志，他们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他们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执著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辉耀着人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时光流逝，物换星移，他们的形象和业绩，却未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的人们的广泛认同。

孙中山——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原载《孙中山与宋庆龄》，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2011 年 10 月修改于北京）

抗战与民主

——宋庆龄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指导思想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近七年中，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全力以赴，领导着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并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斗争。

关于抗日救亡，宋庆龄一贯的指导思想是：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能取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只有实现国内民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以全部力量参加神圣的抗战。

宋庆龄同时认为：国共合作是实现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战的核心；蒋介石政权放弃“剿共”及镇压民众抗日的政策，实现国内民主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条件；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以下简称“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实现国内民主和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宋庆龄深切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民主革命的总任务。因而，她认为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和民族危亡，抗战与民主，是中华民族得到拯救和发展的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为此，宋庆龄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担负着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活动，对于民主与抗战的关系，进行了大量而深刻的系统论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做出卓越的贡献。

（一）“九·一八事变”后，号召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民主权利夺回来”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宋庆龄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

判定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政权是抗日救亡的最大阻力。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国内民主，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民主权利夺回来”，是抗日救亡的先决条件。因之，宋庆龄自觉地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一致的“抗日反蒋”立场。在此期间，她不断撰文及发表公开谈话，反复论述反蒋是因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而中华民族要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必须在国内实现民主。在她连续发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上的讲话》、《告中国人民》、《中国的自由和反战斗争》等政论中，集中反映了她的抗战必须实现国内民主的观点：

1. 宋庆龄认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国内民主是抗日救亡的先决条件。她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建立和维护独裁统治为首要目的的蒋介石集团本着“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立场，致使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东北四省全部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战，蒋介石政权此时却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协定及附议中规定诸如取缔全国抗日运动、调离英勇抗击日军侵略的十九路军、中国军队不得在浦东、苏州河以南以及龙华等地驻防，而日军可以长期留驻闸北、吴淞、江湾等等。在这种退让妥协的反动政策的怂恿下，日本侵略的战火从东北烧向华北并一步步烧向内地。与此同时，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五次“围剿”，以图消灭之。从第一次围剿的兵力十万人，到第五次围剿的兵力达到五十万，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随着内战的升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也愈烧愈旺。

宋庆龄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自己身上”。因为“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制日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更有甚者，“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②她声讨蒋介石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痛斥“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广大劳动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①。

宋庆龄认为，蒋介石政府的所有这些倒行逆施，是由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这个政权“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所以它“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②。同时，这个政权又是“地主及资产阶级联盟的代表”，因而“它怕武装的人民比怕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还厉害”。据此，她断言国民党政府“绝不能统一中国，绝不能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③。蒋介石政权的媚外政策在日本大举侵略的时候，只能助纣为虐。

为了扫除抗日救亡的障碍，必须对一贯对外退让妥协、对内专制独裁的南京政权进行坚决斗争。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于中国的统一完整”而奋斗，“这个奋斗与中国劳苦民众反对剥削的奋斗是不能分的，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也是不能分的”。换言之，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可分的。在当时，进行抗日救亡与争取人民民主是不可分的。“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因之，宋庆龄号召中国人民，“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④。

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已成为斯大林为主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成员。第三国际以“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指导者的身份，执行革命输出的政策。宋庆龄此时的观点，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国际的观点。

2. 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社会解放的中流砥柱，确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同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9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国内率先公开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响亮口号；11月刚刚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动员全民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路线的明确表述。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特别是1931年以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明多年生活在苏联，对国内的阶级和政治形势并不了解），不作科学分析，盲目教条地执行第三国际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导致对形势和阶级关系的错误估计。他们孤立片面地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盲目地作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判断。“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还导致在国统区工作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则采取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在阶级分析上，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的反革命”；把反蒋的中间势力看成是“帮助国民党维持统治的”敌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左派因为可以“欺骗”群众而比右派更危险，他们对宋庆龄亦采取不信任、不联系的错误态度。因之，尽管许多共产党人在东北、华北以及华东等地组织领导着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被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没有及时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反而指责“统一战线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①。对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缺乏支持，因而没能争取群众的绝大多数而成为举国上下团结抗战的领导核心，反而使革命陷于濒临失败的险境。

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宋庆龄感到困惑与痛苦，但炽烈的爱国情怀使她置个人恩怨荣辱于不计。基于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内涵的科学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性质与规律的科学认识，她深知无论是挽救民族危亡，抑或是帮助危困中的中国共产党以继续推进中国革命，她都不能不高举抗战与民主两面大旗。

当宋庆龄于1931年12月公开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②，表示与完全堕落的国民党决裂的时候，她把全部的希望和信任寄托于处境十分艰危的中国共产党，确信“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

^① 刘晓：《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一辑。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页。

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开辟了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② 宋庆龄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国民党高压政策造成的万马齐喑中，听到了民族得以复兴、人民获得民主自由的阵阵春雷。她满怀激情地宣布：“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③ 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危急时刻，在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困惑、失望的时候，宋庆龄以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的身份，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积极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3. 呼吁“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朝鲜人等等）作友军”，以“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④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应该指出，宋庆龄在与中国共产党协调步伐，进行“抗日反蒋”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她认为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她号召“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⑤。

民族统一战线，是一切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重要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也就是向蒋介石独裁政权发动冲击，推进国内民主的过程。因之，对于统一战线的认识与实践，成为衡量政治家、革命家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宋庆龄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逐步发展，她在“国民御侮自救会”筹备大会上的演说及领衔发表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表明她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已经形成，而且开始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在实际斗争中，宋庆龄参与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2—93页、8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页。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救亡团体，是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尝试、宣传和实际组织工作。只是在当时情势下，还不可能建立包括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妥协投降的蒋介石集团在内的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华北事变”后力促实现民族团结共同抗日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宋庆龄力促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进而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坚决抗击日本的侵略，并且明确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使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实现国内民主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

日本侵略者继占领东北四省以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陕北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使蒋介石不能不面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剿灭的现实；而日本侵略势力的深入，已经影响到蒋介石政权的稳固存在以及它所代表的美、英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蒋氏政权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领导，对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及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有了科学的分析和估计。还在北上抗日途中，于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确立了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

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①

由于各方面的合力，组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有了极大的可能，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有力地把可能性推向实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建立的可能性的时候，作为成熟的革命家，宋庆龄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武器，全力以赴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 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促国共两党携手合作，进而实现全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其核心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这不仅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而且南京政府统治着大部分国土，没有其参加便不可能实现全面抗战；而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当代最先进的思潮与运动，她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胜利之路。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便会使抗战失去正确的方向和中坚力量而归于失败。宋庆龄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因此，她首先着力打开国共两党沟通的途径。她及时转达国共两党谈判的意愿，协助安排双方的磋商，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她还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起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②的建议，恢复了已中断十年的与国民党的关系，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利用国民党的讲坛，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为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穿针引线。

同时，宋庆龄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渠道，反复阐述她的联合抗敌的思想。她指出：在国际上“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在国内“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③

宋庆龄特别强调，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④。她提醒国人和国民党中枢注意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共产党希望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他们

①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7页。

曾尽一切努力来维持中央政府与东北军之间的和平。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进行了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十年内战，“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锋。”^①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中流砥柱。可见，国共两党是否能合作，关键在于国民党方面。宋庆龄痛斥国民党当局仍然执行反共政策，不断散布“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是极为“荒谬”的，造成了“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的惨痛后果。她大声疾呼：“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②

2. 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建设国内民主和实现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宋庆龄关于抗战必须实现国内团结，实行民主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而为实现国内民主，“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国共合作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关键也在于“要与共产党讲和，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③

关于实现国内民主。宋庆龄强调必须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两方面给人民以彻底的民主权利。

经济上的民主：在人民如此贫困、国力如此孱弱的中国，必须“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尽快振兴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才能造就打败日本物质力量。因此，“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钳制，发动群众对建设的主动性和热情”，以“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使国家经济“高速度向前迈进”。^④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实施，有赖于“允许人民群众性运动的自由发展”。宋庆龄把在经济上实现民主，视为“建设国家、稳步发展工业和交通以及改善农村经济的一个先决条件”^⑤。

政治上的民主：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国民党“必须结束训政时期”还政于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7、11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11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10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8页。

民。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具体步骤即“尽速召开国民会议”，实行“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以便“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国民政府必须放弃对人民的高压政策，“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①。宋庆龄要求马上建立的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是体现了全民抗战和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发展。

宋庆龄进而指出，要实现国内民主，就要“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因为三民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而“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她特别强调：“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②

宋庆龄在这个时候重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此作为促成国内和平、一致对外的理论根据，作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是适时的、切实可行的。这不仅由于新三民主义曾经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思想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而且还因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孙中山的旗帜，才能成为团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各阶级、各阶层、各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战斗旗帜。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一直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继承者，毛泽东当时也曾经申明：“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毛泽东强调：“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③

宋庆龄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者、参与者，作为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坚定继承者、捍卫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呼唤实现国共合作和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反抗侵略，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促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起着不可代替的积极作用。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0页。

（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巩固的理论活动

宋庆龄既然提出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那么，她就必须对其内涵加以阐发，捍卫其革命民主主义的内核，使确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的三民主义，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精髓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非被蒋介石们所歪曲、阉割及儒教化了的“三民主义”。

宋庆龄这个时期对新三民主义革命内涵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儒教的批判而进行的。1937年4月，宋庆龄发表了题为《儒教和现代中国》的长篇政论，这是她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重要理论活动之一。

1. 宋庆龄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封建专制的阶级属性的分析，揭露当时极力推崇儒教的蒋介石政权的反民主的独裁倾向，指出儒教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彻底扫除。

被宗教化了的孔子学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历代统治者作为钳制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九一八事变”后，则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攘外”专“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遮羞布。

蒋介石不顾华北倾将遭到与东北沦丧一样的厄运，亲自在南昌督率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在国统区实行严苛的文化“围剿”的同时，又在南昌发起了一个以宗教化了的儒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并亲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以后又任“总会长”。“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人以礼、义、廉、耻为行为的准则，规定了十分繁琐的内容，但中心都是围绕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要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目的是如此之清楚，那就是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使其绝对服从于蒋介石的统治，并消弭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斗争。

毋庸置疑，“新生活运动”是作为尊孔崇儒的载体而存在的。

宋庆龄对蒋介石鼓吹尊孔复古，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看得十分明了。在全民抗战即将实现的时候，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正是基于警惕并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倾向，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获得巩固和健康发展而进行的。

首先，宋庆龄从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对儒教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指出它的封建的、专制的本质。她从孔子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以及孔子的复杂言行中，分析他的阶级属性，考察他活动的社会功能，明确判定维护和强化封建秩序，是孔子毕生思想和实践的主流。宋庆龄确认孔子是“为封建社会创建了礼教”，并为“加强这种封建秩序”而“根据历史的传统创立了他的学说”。孔子及其门徒认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须“由贤明的官吏统治”才能保持稳定与安宁。因之儒教是以“服从”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核心，主张“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具体说来，“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使人民服从”，孔子及其门徒还“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①由此，宋庆龄对儒教的实质，作出明确的界定：“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②而且，孔子的学说被历代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更加强化其封建专制的消极与反动方面，并使其宗教化，以此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宋庆龄判明儒教的封建主义的阶级属性，便断言：“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之道。”^③宋庆龄正是通过对儒教的批判，从而揭露以“封建主义哲学”——孔子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蒋介石政权的封建专制的本质，指出他们“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所谓安定社会只是一个幌子”^④。揭露他们鼓吹尊孔崇儒，不过是为了“安内”与独裁而已。

宋庆龄特别指出：“孔子强调对家族的义务，而很少提到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义务。”^⑤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儒教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障碍。为了团结抗战，挽救民族的危亡，“我们必须清洗中国人的头脑”，把儒教的影响“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的每一个角落里根除出去”，“从我们的头脑、教科书和我们的内心清除出去”^⑥，而代之以“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2. 论述儒教与三民主义的本质区别，指出新三民主义“适合目前中国的情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107、110页。

况”，着力阐发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义。

蒋介石们既要以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自况，声称要尊崇孙中山的遗训，以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本，又要借重于宗教化的儒学作为其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他们就必须对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进行阉割与歪曲，并强行把它纳入儒学的轨道。

针对蒋介石们对孙中山思想的歪曲篡改，宋庆龄在批判儒教的过程中，着力驳斥那种把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与儒教混为一谈的谬论，切中要害地指出两者的本质区别：“正如孔子的儒教代表着专制、压迫和人民的痛苦，孙中山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① 因之，为促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清除儒教，而“需要另一种思想意识”。这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这些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②。

宋庆龄着力阐发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义：

她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当前即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保卫现有的国土”，“收复所有的失地”。^③ 为此，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④ 而统一战线是否能建立、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

对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宋庆龄坚决捍卫其“普遍民权”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原则。她说：“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国民党更应该“帮助促进工农运动，邀请工人农民入党，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因此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立即召开有广泛群众性的，而不仅仅是只有“国民党官吏和官僚参加”的国民会议。为了切实保证工农能够参加政府，“必须立刻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⑤。宋庆龄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定历史时期，人民民主的特定内涵。

最后，宋庆龄还指出，“为了提高民族意识并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就必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须大踏步地实行民生主义”^①。根据当时的历史要求，宋庆龄此时所指的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特别是发展农业经济——“我们必须组织全国性的运动，来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中的近代技术”；要求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取消“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改进农民生活”。^②这实质上是要求发展经济，为抗战胜利打下物质基础的同时，给广大人民群众以经济和生活上的改善。

对于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抗战与民主，宋庆龄认为：“儒教不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实际价值。”^③作为儒教的载体的“新生活运动”，也“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因之，用以武装全国人民思想的，应“是一种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儒教”。^④

3. 论述只有实现国共合作，才是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训。

宋庆龄把蒋介石国民党是否实行国共合作，作为衡量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是否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她在呼吁坚决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时候，特别强调：“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⑤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宋庆龄以相当的篇幅，反复论述只有实现国共合作，才是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训。在这里不妨详引她的一段话：

“我们回忆一下孙中山所说的关于共产党的话，是有好处的。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即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在一九二四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纵然在今天，孙中山的话还是多么真实！”^⑥宋庆龄严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口头许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给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但这些事情却“一件还没做”，虽然“内战已经停止，但是关于与共产党和解的事情，尚未得到任何官方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消息”^①。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倾向，仍然阻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庆龄痛心于“过去五千年来，中国受专制之害太长久了”，为了抗日救亡，她强烈呼吁：“让我们终于民主起来，创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②。

宋庆龄在全民抗战将要实现的前夕，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对在封建社会中几乎总是作为官方哲学而处于“独尊”地位的儒教发起冲击，对蒋介石们“怀着别样的目的”而鼓吹尊孔崇儒进行了清算，这不但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而且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仍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高举抗战与民主这两面旗帜，表明宋庆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有着科学的认识。因之，她在努力完成抗日民族解放这一特定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为推进革命总目标的完成，进行着多方面的奋斗，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原载于“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2011年5月修改于北京。）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两次重大抉择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腾向前发展——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迂回曲折。先辈们一代接着一代，前赴后继，壮怀激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历史的新篇章，使中国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不但摆脱了帝国主义附庸的积贫积弱的困境，而且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然而，无论历史是如何多姿多彩，近代中国的主题只有两个，就是救亡和发展。任务如此明确，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由封建末世进入近代。但是，鸦片与大炮并未能使近代中国实现近代化——资本主义化，反之，却将中国沦落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国家几被瓜分，民众被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所桎梏，贫穷落后成为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的主要特征。现实如此严峻，以至于除了统治阶级内部极少数顽固分子外，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思潮和活动中。爱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一切先进人物和进步社会思潮的主导，而救亡和发展，则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拯救和发展中国的进程，由多个互为先导与继续的革命阶段所组成，这就是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并且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只有循着这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梯不畏险阻地攀登，中国才能走出苦难的深渊，进入光辉的未来。

宋庆龄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她把毕生奉献给拯救和发展祖国的伟大事业。从青年时代起，她就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低潮中，在孙中山的前途难以预卜的情况下，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并且在斗争中从一名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当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她跟随历史潮流前进，对以往的革命理论进行总结与扬弃，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遇到重大挫折而濒临危机的严重关头，毅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从而，她自己也由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并得以在拯救和发展祖国以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这两个历史舞台上，充分发挥她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宋庆龄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进击，在革命实践中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两次作出重大抉择，以坚实的步伐跨越了三个上升的革命阶段，总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宋庆龄的道路，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和探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同时，历史给宋庆龄提供的机遇以及她所处的特殊地位，她的抉择，特别是第二次，对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独特的、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一）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选择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1913年夏，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她原本打算回国度假后，继续返美国深造，将来作为一名医生为国人服务。她对辛亥革命后的祖国充满憧憬：想象着“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已经完成了“在暴君统治下不可能完成的种种改革”，而且“还进行着其它无数的改革”。^①然而，曾几何时，还在宋庆龄为辛亥革命而欢呼的时候，革命果实却已落入了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的手里，共和国还在摇篮中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扼杀，革命领袖孙中山和他的许多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母，再次作为流亡者而走避国外。宋庆龄回国旅途的欢欣，很快就蒙上了革命失败的阴影：她的父母通知她赶赴日本与他们相会。辛亥革命以“二次革命”的失败而画上了悲剧的句号，孙中山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新积聚力量，策划新的斗争，以捍卫共和制度。宋庆龄因为探望双亲而得以会见自己崇敬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开始在父亲的引导下协助孙中山处理文件信函，继而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不久，即以“委身于革命”的纯真和虔诚，成为孙中山的战友、助手和伴侣。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与孙中山的相遇和结合，对于宋庆龄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机缘。孙中山是宋庆龄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导师，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分析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特别是深化了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认识，使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核心问题和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系列重大问题；他是宋庆龄正式踏上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路人，引导她投入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实践，使她在不断的失败、挫折与探求中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磨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孙中山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他“亲近人民”的真挚感情，以及他对革命的“不息的热忱”，成为宋庆龄毕生的楷模，激励着她在革命道路上不断攀登。

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在孙中山身临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的朝气，带着西方民主主义的传统，带着温柔和深情来到他的身旁，给孙中山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在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十年中，顿挫大于发展，失败多于胜利，但不论在任何艰危的情况下，宋庆龄都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抚慰他的伤痛，分担他的压力，协助他工作……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革命奇妙的产物。因此，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更显而易见。在他们并肩战斗的艰难顿挫的十年中，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时代大潮中奋进不已。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表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濒临绝境；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时期，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和宋庆龄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为着进行“彻底之革命”，他们自觉地进行反思和总结，对于孙中山后期活动中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她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联络与大部分会谈，承担了许多实际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领域中的互相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边的干扰，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日益强化。宋庆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著的进取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同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这一切，对于孙中山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及政策的制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促使孙中山在他的晚年达到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度——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宋庆龄是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走进革命队伍的，在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的。

宋庆龄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时候，形势极为险恶：在国内，袁世凯借助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并企图复辟帝制，政治空前黑暗——“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① 国民处于“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② 的迷惘之中。革命队伍发生了分裂和分化，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谮，三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③。那位曾以谋炸摄政王的惊人举动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而激励过不少人的汪精卫，“从容”地成了窃国大盗的袁世凯的座上客；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黄兴，也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而远走美国；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终因这个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促使宋庆龄在革命低潮走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的，是她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挚的民族责任感以及对广大苦难民众的无限同情。在大洋彼岸留学的时候，她就自觉地把自已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忘记了祖国，“人生就失去其意义”。她憎恶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痛斥清政府是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④，她更为祖国遭受瓜分、“共管”的厄运而悲愤。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她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以后，使她深信西方的民主主义和共和制度，是使祖国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人民摆脱残酷的压榨与奴役从而获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途径，因此她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并毫不犹豫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彻底的爱国主义同时使宋庆龄充满了革命激情和献身精神。她追随孙中山，是因为“想为拯救中国出力”，在她心目中“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想帮助他”^⑤。正是在“献身于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她毅然放弃了金钱和安逸的生活，不顾亲友的反对，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合，跟随孙中山为拯救中国而奋斗，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的艰危的道路，义无反顾。

①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6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⑤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034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主义必然导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而革命民主主义，必然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宋庆龄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有怀抱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二）在土地革命挫折之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抉择，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她在对前阶段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明确宣布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完成了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她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总的战略部署，战斗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孙中山逝世以后，他的事业被他的“学生”和“信徒”——国民党右派所出卖，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这是宋庆龄参加革命以后所遇到的最惨痛的失败。她愤怒、痛楚，但没有丝毫气馁。她忠实于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原则，继续沿着漫长的救国之路上下求索。宋庆龄在“宁汉合流”一个月后即出访苏联，先后在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旅居了四年。在苏联和德国，聚集着一批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学习革命经验，锤炼革命意志的中国青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流亡到这里，以便总结经验，重振旗鼓。宋庆龄在旅欧的四年里，目睹了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及伴随产生的空前社会危机——资本主义成为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土壤。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生产及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她经常整天“沉湎于书籍之中”^①，除阅读理论著作外，还大量阅读各种报纸杂志，包括国内出版的《新青年》及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克拉拉·蔡特金、多列士等德、法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宋庆龄时相过从。同时旅居德国的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几乎每天都往访宋庆龄，共同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着重分析中国的土地与农民问题。在邓演达致国内同志郭冠杰的信中，曾述及这时期他们的有关情况：“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意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政治、军事工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4日。

作，都应建立在这种力量上面，望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① 宋庆龄亦曾忆述当年的生活：“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演达——编者注）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地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的处处引人叹服。”^②

当宋庆龄 1931 年夏返国时，面对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和人民的苦难，加速了她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飞跃，她以全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

首先，她在欧洲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对德国的侵略政策采取绥靖主义的时候，公开宣布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她提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并且“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③ 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发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取得了领导地位”，正在“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④ 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诞生——“俄国工农革命获得胜利，奠定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⑤ 宋庆龄满怀激情地讴歌苏联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专政机构……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机构”。宋庆龄同时揭露像英、美、法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虚伪实质，指出它“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形式的民主”，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当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⑥ 宋庆龄通过这些精辟的论述，表明她的

① 刘家泉：《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6—347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0、131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1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2 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7—109 页。

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已经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待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革命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武器。

因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来分析总结中国革命，宋庆龄便可正确地判断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革命的对象、主力军、领导者，革命的道路以及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她根据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判定它是“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既要“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又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挣破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枷锁，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她同时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进行，而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指出：“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① 宋庆龄以她特有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她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拥护和认同：“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②

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信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宋庆龄以她的理论与实践证明，她在30年代初期已经实现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如同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选择一样，宋庆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从信仰新三民主义发展至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因“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而濒临失败的形势下，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然而，这次选择较之于第一次，则更为困难和艰辛，必须通过总结、自我否定和扬弃。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才能从旧的营垒中脱胎出来，跨进新的革命行列。

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宋庆龄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不断奋进的思想基础和原动力。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曲折而又迅猛地向前奔驰发展。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经历了近300年的时间，而这样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浓缩”于仅仅一个世纪。从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3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到正规的民主革命——包括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前次革命运动的失败，却孕育了新的、规模更大的、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一种新思潮、新理论刚刚出现，很快又被另一种更先进的思潮和理论所代替，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如此，便向一切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导潮流的先进人物提出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不断自我超越，与时俱进。任何的停顿，便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倒退到革命的反面。宋庆龄无愧为爱国者的楷模，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人民的义务感使她永不终止前进的步伐，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是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概括。

丰富的革命实践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宋庆龄的正确选择成为可能。宋庆龄自与孙中山结合始，便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之后，他们在探索中自觉而积极地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目睹了昔日的“战友”如何用屠刀腰斩了孙中山的事业。她虽然力挽狂澜于即倒，然而大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鲜血与生命积淀的惨痛教训使她深知，要真正挽救和发展中国，必须改弦易辙，走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如“酵母”般遍布国内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使宋庆龄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①，也给宋庆龄以鼓舞和信心，于是她合乎逻辑地、坚决地接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宋庆龄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论述，处处体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

优秀的个人品格及睿智卓识，使宋庆龄的正确选择得以实现。宋庆龄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所有的精华。热爱祖国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宋庆龄优秀品格的核心。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解放幸福，她可以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她不因访苏期间由于与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的歧见致使遭到冷遇而放弃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也不因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自己的误解而离弃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反而在中国共产党濒临绝境的危难时刻公开宣布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申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她的睿智卓识使她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之后，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掌握了历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史的发展规律，这是她作出科学的选择的保证。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曾一度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认为它是“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代表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团体，她希望把他们团聚起来，加以改造和整顿，重振国民党以复兴中国革命。因此她在流亡苏联期间，与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希冀其继续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但国民党左派的涣散使她很快失望，终于不得不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而将目光集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斗争。

在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时候，个人成长的阅历、斗争的经验以及自身性格特质的不同，往往导致得出不同的结论。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革命派的旗帜，他为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统治并为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但他始终停留在革命民主主义阶段，没能迈出向共产主义者过渡的决定性的一步。这首先是因为他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过分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所以在革命任务、领导者以及革命的道路以及前途方面，得出错误的结论；褊狭的感情及易于激愤的性格妨碍了他冷静的思考，影响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尽管他充满革命的激情和献身精神，却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救国良方。宋庆龄与邓演达曾长期并肩战斗，相互扶持，但由于政治上的歧见致使在革命路途上分道，这是如此的发人深省。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重大抉择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奋进成为连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她所带来的前一革命阶段的斗争传统以及经验、教训，成为新的革命阶段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她把前阶段的革命队伍聚集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进行整顿和改造，并率领他们投入新的革命斗争。她的巨大影响和感召力，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

宋庆龄一生的两次重大抉择，使她完成了从爱国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至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宋庆龄走过的道路昭示我们：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者，首先必须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这点至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宋庆龄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宋庆龄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卓越的前驱和领导者。她为中国真正的独立、自由和人民的民主、解放而英勇奋斗的一生，也是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一生，即在思想及实践两方面领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生。

宋庆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把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作为妇女解放的前提，确信只有全人类解放，妇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思想；双重枷锁的挣破——在砸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枷锁的同时，必须解除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精神枷锁——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争取实现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重要内容。

（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

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要求，伴随着天赋人权及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提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进程中萌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而进入高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等各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男女平等成为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千年来封建思想意识的逐步消弭，随着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妇女必将获得彻底的解放。

在近代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而中国妇女的头上，更有封建宗法势力及封建纲常礼教这座大山，她们长期受着政权、神权、族

权、夫权的重重压迫，情况极为悲惨。不少妇女曾经为着自身的解放而进行抗争，但是在相当长的阶段中，没有形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行而展开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曾经提出过体现朴素的男女平等精神的妇女理念，并有相应的政策。在这个农民理想的“天国”里，“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①。这些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魂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②根据这种平等的思想，在军队中成立了女军，设立了女营。定都天京后又设立女馆，作为从事生产的单位，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从事社会生产。在行政管理方面，还设有女官，表明妇女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但是，农民阶级不是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的制订，一方面是接受了外来原始基督教义中的平等观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战争的实际需要：面对清朝政府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动员男女老少一起投入生产与战斗。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仍然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来规范妇女的行为。所以，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不能体现以争取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而要求“变法”，他们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曾历数封建专制制度对于妇女的迫害摧残，谴责这个制度使人们对妇女“忍心害理”：实行“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由，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③他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处于奴隶地位的广大妇女的境况，认为这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④的，表示要为女子“呼弥天之冤”，“拯沉溺之苦”。^⑤他还发起组织

① 《原道觉世训》，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② 《天情道理书》，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③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书店1956年版，第126页。

④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书店1956年版，第146页。

⑤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书店1956年版，第146页。

了“不缠足会”，以反对妇女缠足，作为妇女争取解放的一项措施。康有为关于男女平等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们。“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谭嗣同在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时，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的总代表——封建君主，斥之为“独夫民贼”和“无复伦常”的禽兽，是残害妇女的元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使他们政治上保守倾向，在妇女问题上亦有同样表现——他们不敢提倡男女平等，更不可能发动妇女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与他们在政治上的改良主张一样，在妇女解放方面只限于要求采取“不缠足”、“办女学”等等改良措施，未能具有更为深切的内涵，因而没有促成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然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于残害妇女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对于长期封建思想禁锢的中国，无疑在妇女解放的课题上起到了石破天惊的思想启蒙作用。

真正的、比较完全意义的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只能伴随着真正的、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而开展。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伟大代表孙中山，一贯提倡男女平等。早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在其宣言中即明确主张男女平等：“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①“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②。并且宣布要取消蓄奴养婢和缠足的恶习。孙中山把男女平等作为他的民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③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声讨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常常同时提倡男女平等、开放女权。这固然是民主主义课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激励下，不少女留学生和知识妇女创办女校、女报和女刊，培养妇女人才，为妇女解放而呐喊。她们鼓吹妇女应该参加救亡，要求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争取经济自立、工作权利和婚姻自主等等。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妇女更直接参加反清武装斗争和战地救护工作，表现英勇，不让须眉——秋瑾、何香凝、徐宗汉等，是她们中的光荣代表。诚如孙中山所赞誉：“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53页。

响，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① 民国建立以后，以争取妇女参政为主要目的的女权运动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流。随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国内政治走向反动，思想领域中泛起复古逆流，妇女解放运动亦遭受挫折而逐渐沉寂下去。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猛烈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抨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及传统道德观念，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它从妇女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丰富和深化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个时期的妇女运动没有与业已存在和逐步开展的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女工反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斗争结合起来。妇女运动大抵局限于部分上层妇女和知识妇女中，她们还未能认识妇女的解放必须与整个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结合起来，也没有找到妇女解放可资凭借的可靠的物质力量——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与主力军。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广大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可靠的力量，从此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并最终获得胜利。

宋庆龄在投身革命的时候，便卷入了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她在前辈妇女解放斗争的成果上，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她的妇女解放的理论，并予以之指导妇女解放运动。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制度和反对封建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统一完整的斗争中，宋庆龄为动员妇女投身革命作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她与时俱进地自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过渡以后，她对妇女问题的实质有了明确的认识，理解到妇女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阶级压迫的问题，而妇女的解放，必须与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相联系。妇女必须在民族与社会革命中求得自身的解放，并在对祖国和人类履行义务的过程中体现妇女的人生价值。因此，在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宋庆龄自觉地与中国共产党同步，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和各个革命阶段的具体任务，领导中国妇女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和自身的解放而进行斗争。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宋庆龄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无愧为中国妇女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53页。

解放运动的卓越领袖。而她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妇女解放的理论，在其后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论证妇女解放必须与阶级解放及社会解放同步

宋庆龄从投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始，便突破了女权主义的局囿，把中国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她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更把妇女的解放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因之，她实际上便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出了最终的奋斗目标，并根据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提出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同时为妇女实现真正彻底的解放而指明了途径。

与同代人相比较，宋庆龄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起点是相当高的。她的青少年时代在美国度过，接受了完整的近代西方教育，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熏陶，还在学生时代便确信男女必须平等。1913年4月，她在就学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专论《现代中国妇女》，表明她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极为关注。文章论述了男女平等的必然性，表达了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期望与信心：“深信用不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① 文章指出妇女，尤其是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妇女，必须进入社会生活，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并为民众谋取福利。妇女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工作 and 斗争去获得与男人同等的权利，而不能靠别人恩赐。这篇论文表达了宋庆龄的妇女价值观和男女平等观——妇女首先是社会的一分子，男女平等应该表现为妇女对社会进步负有同男子一样的义务；妇女必须通过为社会服务体现自身的价值，确立自身的地位和作用。论文也表达了她对妇女取得解放的途径的理解——通过工作与斗争求得解放，不能等待施予。宋庆龄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表现了比同代人更为超前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在她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后，她除了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和秘书，负担着繁重的文电往来、对外联络等工作外，还从事妇女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如1921年6月，在孙中山挥师广西讨伐桂系军阀的时候，她和何香凝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自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她们向社会各界募集款项和慰劳品，并亲自携带款物赴梧州前线慰劳讨桂将士，官兵因而大受鼓舞，增强了战斗力。她带领广东妇

^① 院刊《威斯理安》1913年4月号。

女为实现两广的统一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讨桂战争胜利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伐，先后设立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和韶关。为了支持北伐，宋庆龄在“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的基础上组织了“红十字会”，并亲率红十字会会员多人先赴桂林，后至韶关，准备进行战地救护。

在宋庆龄发动妇女支持孙中山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的时候，以参政为目的的女权运动又有所高涨。一方面，是因为在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口号的冲击下，男女平等思想影响日益广泛；另一方面，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对压迫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有力的批判，使辛亥革命失败后一度低沉的妇女运动有所复兴。但是，在妇女解放运动还未曾真正汇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洪流的时候，局限难以逾越，路子必然越走越窄。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还有相当革命性的话，那么在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及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由上层妇女为主体的女权运动，越来越失却其革命的生气而走进了死胡同。到后来，甚至成为反动派用以粉饰腐朽制度和抵制革命运动的工具了。

宋庆龄早期从事妇女运动的实践表明，她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同时是一名妇女工作者，她是围绕着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开展妇女工作的。虽然妇女参加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在当时还没有发展成为广泛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没有和五四以来先进的知识妇女的反帝爱国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劳动妇女反对中外资本剥削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但把妇女运动与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正确方向。宋庆龄正是从这个正确的方向出发，并坚持了这个方向，因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迅速提高和深化，并为她在以后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指导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在北京推翻了曹锟政府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的邀请，怀着“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热切愿望，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以病弱之躯犯难北上，宋庆龄从行。途经日本神户时，应县立女子高等学校之邀，宋庆龄对教职员生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在演说的开始，她引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言：“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继而指出“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妇女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取得社会的承认，“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①。也就是说，

^① 刘宗孟：《在神户留下的革命足迹——记孙中山、宋庆龄1924年6月在神户活动的片断》，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

妇女要在社会上取得平等的地位，必须参与社会生活，为社会服务，尽国民的职责。她认为妇女为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斗争，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世界运动”。为此，她发出“恳切呼吁”，希望“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她深信：“我们妇女一定会取得成功。”^①这是宋庆龄成为革命者以后第一次向公众发表的演说，也是她就妇女解放问题首次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表达了她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解：妇女是国民的一分子，是社会的一分子，妇女负有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和争取自身解放的双重任务；东、西方的妇女必须携起手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解除压迫与歧视而并肩战斗；世界妇女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妇女只有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求得自身的解放。宋庆龄的这篇重要的演说，反映了她对妇女问题认识上的长足进步：把妇女解放与“改造世界”联系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体现了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她呼吁东西方妇女为改造世界，为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而联合起来，体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要求。宋庆龄这个时期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观点，表现了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对妇女问题理论的重大发展。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而蓬勃高涨的大革命浪涛的推动，加以中国共产党对妇女，特别是劳工妇女工作的出色领导，使妇女运动重新高涨，并获得了新的内涵。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解放问题极为重视，把妇女解放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把发动妇女参加革命作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因而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决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党的妇女工作的总任务及相应的政策，分析了中国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的极为悲惨的景况，申明：“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②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又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根据即将实现的国共合作的形势和国民革命的要求，明确提出“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引导占国

^① 《孙逸仙夫人激励神户女学生的讲话》，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1924年12月4日；中译文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第288—289页。

^② 《“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4页。

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方针，并且认为一般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等等）亦很重要，要求“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利益而奋斗”^①。1925年1月，中共“四大”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必须取得领导权的问题，因之，也就确定了它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决议确认妇女运动需“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②。中共“四大”承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必须对诸如“贵族妇女运动”（指女子参政运动）、教会妇女运动等等加以切实的指导。中共“四大”决议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主力军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终极目标、统一战线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指示，体现了国共合作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内涵和特点。在国民党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民主派一贯承认和继续阐发男女平等的原则。孙中山多次申明：“国民有四万万，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大家都可以问国事。”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中，更规定了“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③。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国民党对妇女运动表现了比以往较大的热情，它在党内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以调查妇女状况和研究妇女问题的解决办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建立了妇女部，在海内外各级党部下面也设立妇女科从事妇女工作。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中，形成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联合推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局面。

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是”，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国民革命围绕着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两大目标，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与压迫的革命高潮。妇女解放运动，因此蓬勃高涨。在上海，共产党人向警予领导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联络十五个妇女团体，于1924年12月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应允许妇女团体参加，以便提出解放妇女问题的各种要求和办法。稍后，又提出有关男女平权的十三项要求：（1）男女社会地位平等；（2）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3）女子应有结婚自由权；（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职业为女子开放；（6）女子应有参政权；（7）男女工资平等；（8）保护母性；（9）废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

① 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研究室编：《妇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② 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研究室编：《妇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婢纳妾；(11) 禁止溺女；(12) 禁止缠足；(13) 凡有碍女权之法律，一概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与宪法。^① 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广州、温州、河南、山东、江西等省市相继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妇女运动与民主革命密切融合，表现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指引下，劳动妇女的自发的反抗经济剥削压迫的斗争，逐渐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相结合。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女工同男工一起并肩战斗，从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开始，发展到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在斗争中还根据妇女的切身利益，十分明确地提出男女平等的要求。广大妇女逐渐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妇女解放运动在大革命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庆龄深深感受到妇女在国民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和巨大作用，同时也体会到革命是妇女觉醒的“催化剂”。她与孙中的亲密朋友李大钊一贯提倡妇女解放，并且早就指出“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而“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②。应该“一方面要合妇人的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③。李大钊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对宋庆龄无疑是极有影响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负责人向警予是宋庆龄的亲密战友与同志。在孙中山逝世后的那段极为悲痛的日子里，她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常去看望宋庆龄，向她介绍自己熟悉的妇女工作，尤其是女工的斗争情况，她们给宋庆龄以极大的安慰与鼓舞，使她在悲痛的日子里也没有离开火热的革命斗争。宋庆龄以忘我的热情投入“五卅”运动，并初露领袖才能。她出席各种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说，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鼓舞人们的斗志。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宋庆龄目睹各界妇女反帝爱国热情的高昂，并在斗争中走向联合，感到极为欣慰。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庆龄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民革命的时候，宋庆龄与她的老战友何香凝同共产党的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亲密合作，推动妇女运动向前发展。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为斗争中心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锻造和发展了宋庆龄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使

①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记》，载《妇女周报》第67期。

② 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载《国民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

③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

她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原来持有的关于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观点更为明确，内涵更为丰富和理论化。

宋庆龄深刻理解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同时只有广大妇女的参加，国民革命才能获得成功。她确认“妇女解放运动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而“中国国民革命是要全体国民来参加共同奋斗，方才可以成功的”^①。如果中国妇女“这样广大的、占中国人口一半的群众一天得不到解放，不但国家的机构，就是一般的人民生活 and 思想，也就一天不会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②。中国妇女“受了二千多年的专制压迫”，她们“对于眼前的革命工作当然不能置身事外”。^③因之，“为求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④。宋庆龄强调参加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天职”，妇女只能在斗争中获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妇女必须在国民革命中争取自身的解放。权利与解放“是要自己奋斗来做代价的，指望别人恩舍是靠不住的”^⑤。妇女“不仅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贤母良妻”，同时必须要知道“在社会上的责任”，要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与男子并肩“努力奋斗，完成国民革命”。否则，“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⑥。宋庆龄把妇女与革命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明白精当：只有中国革命获得胜利，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只有广大妇女的参加，中国革命方才可以成功。正是从国民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双重意义出发，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引导妇女解放运动围绕着国民革命进行。她认为要使妇女成为一支自觉的革命力量，必须使妇女首先在政治上觉醒。因之，启发、培养妇女的政治觉悟，提高她们的政治素质，成为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的首都从广州迁往武汉，宋庆龄等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临时联席会议主持迁都及日常工作。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了举办妇女训练班的决议，并“推定孙夫人为妇女训练班班主任”。经过紧张的筹备，由宋庆龄担任班主任的“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于1927年2月在汉口开办。她强调训练班是“妇女国民革命军的预备（队伍）”，是培养妇女“政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页。

⑤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页。

治领袖”的“政治训练学院”，在这里主要是给妇女“授以政治知识”，使她们明白“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实现……‘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更可以解放我们自身”，^①懂得自己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并要使“姊妹均有世界眼光”^②。为此，她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张太雷、刘清扬等为学员讲授“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不平等条约的来由”等课程，并授以女学员军事知识和进行战时通讯、救护的演练。总之，目的在于为国民革命培养实用人才。在大革命时期，宋庆龄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和解放，作为妇女运动的首要任务，反映了时代和革命的要求；她把谋求妇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作为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把握了妇女解放的要害；她把动员妇女投身革命斗争，以实现妇女自身的解放，找到了妇女解放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与妇女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反映了她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以及在妇女解放的实践和理论方面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为她在以后新的革命阶段中领导广大妇女群众，踏上为民族谋独立，为国家争民主，为人民求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争取妇女自身解放的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在这个时期，宋庆龄对于妇女问题的实质，妇女解放的领导者及主要力量等方面，还未能作出完全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国民党在成立的时候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经过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作为各个进步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而负担着领导国民革命的责任。此时，它还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她对国民党寄以希望和负有义务。在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和中、小资产阶级游离于革命以前，他们仍然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宋庆龄期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革命力量团聚在国民党周围，以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但当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经过短期的反思、总结与探索，很快就实现了思想上的自我超越，对中国革命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由此对于妇女问题的实质也有了科学的理解和判断，关于妇女解放的根本任务和途径、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军等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之，在新的革命阶段中，宋庆龄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领导着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页。

（三）宋庆龄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双重枷锁的挣破

挣破双重枷锁，是宋庆龄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要推翻剥削制度，粉碎阶级压迫的枷锁，同时要砸烂封建传统思想束缚这副精神枷锁。她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要使“千千万万的妇女从中世纪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①，同时“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使两万万以上的妇女从半封建的、中世纪的社会意识和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②。双重枷锁的挣破是相辅相成的：不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精神枷锁，难以动员妇女参加推翻剥削阶级压迫统治的伟大斗争；剥削制度未曾铲除之前，妇女无法得到彻底的、包括解除精神枷锁的解放。

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使革命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在中国革命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时候，宋庆龄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并且在新的革命阶段最终形成了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科学理论——双重枷锁的挣破。同时也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归纳了基本的内涵和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首先，宋庆龄已经深切理解妇女被压迫的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妇女被压迫就其本质而言是阶级压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妇女解放运动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消灭剥削制度的伟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妇女和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有着共同的总目标。在国民革命时期，“我们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将妇女的解放列为它的基本要求之一”，它“从一开始的时候起，我国妇女就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④那么，在新的革命阶段中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妇女群众必须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6页。

大山的人民革命事业中，在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中获得自身的解放。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宋庆龄确信“妇女解放和世界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①，因之，妇女解放运动必然是世界无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伟大的革命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为着全女性的解放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与“为着全人类的理性与幸福”^②所进行的斗争相融合。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定要和全世界妇女的解放运动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统一步调，为使全世界妇女和广大人民获得彻底解放而共同努力。

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前夕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宋庆龄已逐步看清妇女被压迫的问题，本质上是阶级压迫的问题。所以她要求广大妇女“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举动”。她指出妇女的平等地位，首先应该是阶级的平等：“妇女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③如果妇女只反对“男子的压迫”，却又“凭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们同类的贫苦妇女”，就只有“使妇女的地位愈加堕落”。^④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宋庆龄反对那种只提倡反对“男子的压迫”的女权主义。因为当“女子压迫女子”的情况还存在，妇女就不算真正获得解放。她坚决主张在妇女解放运动中，首先应该反对阶级的压迫，要使“贫苦妇女”尽快从被压迫被欺凌的悲惨状况中解放出来。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出访苏联，她亲眼看到曾在资本家和农奴主压迫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的广大妇女，在摧毁了剥削制度之后的“社会新时代”获得了“令人惊羨”的解放，她们首先成为自由的人，“而且还可以做一个自由的妇女”^⑤。因而，更加坚定了她在妇女解放斗争中“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中国妇女决心为“争取同样的解放而努力”^⑥。从此，她忘我地投入了为使“中国千千万万的妇女从中世纪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所必须进行的“根本的社会革命，这就是‘苏联的布尔塞（什）维克革命’。她认为像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单纯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治革命’；法国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1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1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页。

的大革命等等，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它们都不是为推翻人类有史以来的剥削制度，也不能使广大妇女从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革命“没有本国的妇女群众直接参加，是可以成功的”。^①但是“苏联的布尔塞（什）维克革命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革命，而不只是政治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很自然而且合理地苏联妇女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革命工作”^②。在中国，只有实行“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社会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枷锁”，并且使人民“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③中国妇女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宋庆龄认为在世界上革命的苏联妇女已经提供了“自由的妇女”的榜样，而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斗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边区妇女，则为中国妇女摆脱剥削和压迫作出了表率。她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抗击反动军队的“围剿”中，以及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因而她们“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这种地位只有在将来才会达到。”^④把妇女解放与推翻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是宋庆龄在妇女问题理论上的一个本质性的飞跃，也是她的“妇女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重要观点的深化和拓展，从而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切实的、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根本任务。她号召并团聚各阶级、各阶层的妇女组成一支妇女解放的力量，汇入祖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洪流。

不言而喻，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既然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它的主力军必然是广大工农群众和劳动妇女，妇女解放的道路必然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⑤。当然，在从封建末世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妇女还必须为争取自己的切身权利，如婚姻自主、教育平等、财产继承、职业自由、同工同酬等等而进行斗争，但这些斗争也必须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中心任务而展开。

对于曾经作为近代中国妇女觉醒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妇女解放中起过启蒙作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6页。

用，后来又一直存在于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宋庆龄认为它从来不能代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流。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女权主义运动更显得“内容贫乏”：它既不能反映妇女解放的时代特点和要求，更不能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出根本的任务和指明正确的道路。宋庆龄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在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解放以前，“女权”既不可能真正实现，也是没有根基的。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堕入贫困……使人们过着最低级动物一样的生活”，而且“妇女与儿童总是首先遭遇到这些灾难”。对于有钱的男子，“妇女只是装饰品”；对于其余的男子，“妇女不过是女仆或是劳工”。单纯向男子争权的女权主义运动，怎能使妇女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和恢复首先作为人的尊严呢？在没有丝毫民主可言的旧中国，“女权”是最不受保护的。即便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民国刚刚成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相当革命性的时候，“当两位国民党女领袖，唐群英和张昭汉，在民国首次成立的国会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议案时，反动派所操纵的多数轻而易举地把这提案否决了”^①。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斗争”^②。在没有彻底推翻剥削制度，使社会获得彻底解放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点缀的“女权”，随时都可能被取消和被剥夺：“每一个被本国法西斯主义所统治的国家里，妇女们被推回到中世纪的奴隶制度中间去……数十年斗争换来的妇女公民权利，在法西斯国家中已被完全摧残。”^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妇女正被有计划地从大学、从各种职业中排挤出去，经济独立的机会也被剥夺。每天，官方不断地侮辱她们，说她们只配做养育炮灰的机器……每一个妇女在少女时期就受到这种教育：她最高尚的命运就是永远做男人的柔驯的奴仆”^④。在法国，“当妇女们进行活动以支援矿工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时，她们甚至被逮捕、控诉、判刑。她们或因保卫世界和平的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⑤。在号称自由世界的美国，战后绝大部分工会和反动力量勾结起来，迫使在战时代替男工进行生产，并且已经“成为一支稳定而可靠的劳动力量”的妇女们回到厨房去。在英国，“女教员们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55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9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9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9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06 页。

的所得，总比男子低百分之十到十五”^①……这一切都说明，“妇女和儿童的待遇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牵涉所有其他问题”，对妇女的压迫，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因之，妇女的解放绝不是女子向男子争权的女权主义所能解决的。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群众的解放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全世界妇女有着共同的斗争任务，必须相互支持。因此，宋庆龄号召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争取全人类的解放！”^②对于正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进行艰苦斗争的中国，妇女们必须冲破女权主义的局囿，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砸碎阶级压迫的沉重枷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然后成为一个“自由的妇女”。“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真正独立、真正民主的中国，同时，妇女也将得到解放”^③，这就是宋庆龄的结论。

其次，宋庆龄把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提高到与经济解放、政治解放的同等高度。使“两万万以上的妇女从半封建的中世纪的社会意识和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备条件，还是中国妇女解放程度的重要尺度。

宋庆龄把彻底批判集封建传统思想观念之大成的儒教，砸碎束缚中国妇女精神的旧礼教枷锁，提高广大妇女的政治觉悟，作为争取妇女思想解放的主要内容；并把动员广大妇女从狭隘的、封闭的小家庭中走出来，投入革命斗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伟大实践，作为实现妇女思想解放的主要途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她为动员广大妇女投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并就关于妇女解放的基本涵义的问题，与反动封建势力展开了多次论战，捍卫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正确路线与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她认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更具有突出的意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提高妇女政治觉悟、科学文化知识及生产技能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并从各方面为妇女思想的解放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拓展更广阔的天地。直至晚年，她仍然把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不断告诫广大妇女注意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相适应的落后思想因素，培养自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

几千年来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畸形道德观念。宋、元以后，体现封建伦理道德的纲常名教日益严苛，不仅成为男子压迫奴役女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8页。

性的工具，也成为女性自我束缚的绳索。社会不承认她们的平等地位，女性大多也认封建压迫奴役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难以认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应尽的社会义务。宋庆龄深切感到不砸碎传统封建思想的精神镣铐，就难以动员妇女投入推翻民族和阶级压迫的伟大斗争，难以实现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而没有广大妇女的参加，铲除旧制度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所以，在整个漫长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她一方面发动和率领妇女参加实际斗争，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对于戕害妇女的封建礼教同时开战。她认为：“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① 妇女从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及“男权”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个总体的战略任务。还在大革命时期，她所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即把向学员“授以政治知识，使其有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作为主要目的，启发妇女从家庭的小天地里走出来，投入革命斗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

对于禁锢中国妇女思想的牢笼——儒教，宋庆龄深恶痛绝，从未放弃过对其批判。

集一切封建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之大成的儒教，从来是封建统治者维持其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随着政治上的逆流滚滚，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浊浪。妇女解放被视为“叛道”，“贞妇”、“节妇”、“烈女”被统治者抬出来作为妇女的最高德性规范。北洋军阀把持的政府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颁布了《修正褒扬条例》，将“妇女烈节贞操可以风世者”作为褒扬的对象，在辛亥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封建礼教卷土重来。但历史潮流毕竟不可能长期逆转，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传统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发起空前猛烈的进攻，揭露了几千年来的“仁义道德”的底蕴不过全是“吃人”。此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汇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潮。大革命时期的妇女不但参加了革命斗争，并且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成果。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血腥屠杀使革命被迫转入地下，但革命者并没有被杀绝和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绝没有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② 革命向农村纵深发展，并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重新高涨。蒋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5页。

介石为了巩固反动独裁统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妥协投降，同时强化国内的法西斯恐怖，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加紧军事“围剿”。而在思想领域中，又祭起了“尊孔”的大旗。1934年，蒋介石在“崇儒”的鼓噪中发起了一个旨在消弭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儒教化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人们的言行，从儒家思想中寻求巩固封建法西斯统治的理论根据。“妇女新生活运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成为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股逆流。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批封建买办文人及国民党的御用团体，纷纷撰文演说，宣传封建的贤妻良母主义，鼓吹妇女的“职责”只是生儿育女，主持家政。发出“妇女回到厨房去”的叫嚣，公然攻击参与社会生活和为民族、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妇女是“政治上最出风头的女性，最是坏蛋”。在中国将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难时刻，国民党“五大”的宣言中非但没有动员全国妇女和广大人民进行反对侵略、拯救危亡的斗争，反而仅只提出“发展女子教育，培养仁慈博爱、体力智识两俱健全的母性，以挽种族衰亡之危机，奠国家社会坚实之基础。”所谓“贤妻良母教育”，一时甚嚣尘上，只做贤妻良母，甚至被指为“女子生活的终极态度”。

由宋美龄亲自主持的“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也致力于指导妇女治家、教养，甚至细致到指导妇女每天洗澡、常剪指甲之类，却无视广大妇女群众甚至不足以温饱的惨况。这是妇女运动中的沉渣泛起，恰如鲁迅所说：“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①也是那种早已被批判过的“自己是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的“畸形道德”^②的变种。目的在于让妇女脱离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脱离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并用封建礼教把她们重新禁锢起来。对于有悖于妇女解放运动正确方向的这股逆流，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者和社会进步妇女奋起回击，她们纷纷组织各种爱国妇女团体，出版进步妇女书刊，说明妇女必须在救国与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解放自己。她们揭露“妇女回家论”、“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实质，是“要强制妇女实行希特勒主义”^③，痛陈“国亡了，妇女所受的摧残与蹂躏会上百倍的超过男子”，重申“我国民族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所谓妇女问题也无从解决”。指出新的妇女运动“是坚决站在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立场，参加现阶

① 鲁迅：《我之节烈观》，载《鲁迅全集·坟》。

② 鲁迅：《我之节烈观》，载《鲁迅全集·坟》。

③ 南京《新民报》副刊《新妇女》1935年11月号。

段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运动”^①。号召妇女“为国家、为民族、为我们自己”去尽“我们应有的责任”。在1935年9月创刊的北平《妇女周报》的发刊词中，更是明确提出：“女人有一条路线两重使命，就是从反帝民族斗争的路线来努力个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宋庆龄十分清楚这次斗争在妇女解放运动进程中的严重性，它不仅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亦与妇女本身的解放攸关，因此必须对“新生活运动”和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儒教加以揭露和批判，进而对长期毒害中国人民特别是禁锢广大妇女思想的封建礼教，进行一次总的清算，以求“清洗中国人的头脑”，使人们从“儒家思想的蛛网中解放出来”^②。1937年4月，宋庆龄发表了《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指出：“三年以前，国内开始了一个名叫‘新生活’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这使得我们在实际上有很大的必要寻觅对儒教正确的认识。”^③她准确地论述了孔子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科学地评价了孔子在他的时代以及后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特别对孔子学说核心之一的封建礼教一一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她首先揭示了孔子创制封建礼教的目的是在于“加强封建秩序”，即是让人民“服从”——“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因此，可以充分肯定“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儒教“是封建主义的哲学”，它只代表“专制、压迫和人民的痛苦”。儒教之所以长期延续下来，只是因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和需要，“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之道”^④。同时，宋庆龄指出“孔子是保守的”，因为“他的学说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孔子思想的保守主义“阻碍了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发展”。他的基本观念是“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可以断言，孔子“与革命毫不相干”。因之，作为曾经扮演过“伟大的历史角色”的“改良家”孔子，“只会活在我们的史书当中”。如果以他的思想指导当代中国，只能起着反对革命的作用。在宋庆龄看来，“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⑤。通过这些分析，宋庆龄揭露了鼓吹复活儒教的国民党政权的封建性，指出他们鼓吹儒教的全部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宋庆龄剥下了那些打着漂亮幌子的儒教鼓吹者的假面具，并使以儒教为指

① 《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儒教的全部内涵，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对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的不断追求，特别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对民主与科学的强烈追求，在总体趋向上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它是“要使历史倒退回去……而且阻碍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不合时宜的反动思想，宋庆龄一言而蔽之：“只有那些头脑反动的人，才要想法恢复它。”^①面对因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还特别指出：“孔子强调对家族的义务，而很少提到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义务。”^②从这个角度揭露蒋介石政权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鼓吹儒教的险恶用心。指出他们企图从儒教中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并以“学究式的运动”将全国人民包括广大妇女引向脱离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现实斗争，达到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她号召人民必须挣破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专制”和让人民“服从”为目的的儒教精神枷锁，把儒教“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的每一个角落里根除出去”，“从我们的头脑、教科书和我们的内心清除出去”^③，“我们不需要儒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是让国内政治“民主起来”和对外“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宋庆龄认为必须以发展了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作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④的思想基础。目前所迫切需要做的，是“停止一切内争，准备收复失地”。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必须在民族民主以及发展生产的“伟大运动”中，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儒教”^⑤。《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实际上是对已经进行了若干年的关于以什么理论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的论战的总结，也是对用以禁锢、毒害妇女和人民的儒教进行的一次总清算。宋庆龄继承五四运动的反封建传统，消除了两千多年来环绕着儒教的神圣光环，还它以“专制”的本来面目；剖析了那一向规范人们的封建礼教，显示其“压迫”的本质；更痛斥那些封建卫道士“头脑反动”。宋庆龄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砸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教育并指引广大妇女从封建礼教中挣脱出来，鼓舞她们投入民族民主解放斗争。宋庆龄为了捍卫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流，为砸碎妇女精神上的封建枷锁，迎向国民党反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动派掀起的尊孔复古的逆流，进行无畏的斗争，为广大妇女的思想解放冲锋陷阵，为广大妇女参加全民族的抗战扫除思想障碍。宋庆龄的不懈奋斗，为中国妇女争取解放树立了光辉典范。

随着全民抗战的爆发，以救亡为中心任务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逐步高涨。广大妇女活跃在后勤支援、战地救护、战地服务以及直接参加作战的保卫祖国的战线上，尽着一个公民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体现了妇女自身的价值。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从1939年冬至1943年，随着国民党制造的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反动的高压政策下受挫。国民党妇女委员会通过《非法妇运活动防治法》，禁止妇女团体救亡和其他进步活动，许多进步妇女团体被封闭，不少进步妇女刊物被查禁，“妇女回到厨房去”的陈词滥调，一时又甚嚣尘上。一些反动文人玩弄新的辞藻以兜售陈旧货色，鼓吹妇女应该“安于治理一个家庭”^①；“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女人的地位是为妻为母，为妻为母而做到‘贤’与‘良’，则女人的真正平等得到了。当其为妻为母时，她不怕丈夫以不平等待她，因为她常具特有性的武器，可用以强迫男子就范，他就范时，‘平等’——生物的，真正平等就得到了。……她们的真正自由是在丈夫的自由里，真正的个人职业是在婚姻里。”^②真是堕落如故而无耻有加。企图麻醉妇女的民族、民主意识。妇女运动又陷入相对的低潮期。尽管这股逆流来势似乎凶猛，但在人民革命的洪流前，连那些封建道德的鼓吹者们也感到儒教已成为强弩之末，不得不以“非礼”的暴力作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后盾。

为了进一步扫荡那吃人的封建礼教，引导妇女解放运动冲破反革命逆流，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宋庆龄再次与封建的卫道士进行论战。她在1942年7月发表题为《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的长篇政论，对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科学总结。她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中国革命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需广大妇女参加斗争；中国妇女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砸碎精神上的封建枷锁。而参加革命斗争、社会生产斗争和走向社会生活，才是妇女思想解放的必由之路。她以广大妇女参加抗战为例，说明妇女参加革命斗争“不仅带给她们以新的负担”——对祖国、民族以及社会的义务——“而且增加了她们的自尊以及对未来的信心。”^③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妇女砸碎思想枷锁的最重要的方法。

① 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黯淡》，载《大公报》1940年7月6日。

② 尹及：《谈妇女》，载《战国策》1940年第11期（昆明出版）。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页。

但是冲破封建的牢笼，走出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小天地，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也是妇女思想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宋庆龄把广大劳动妇女政治上的觉醒视为妇女解放和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且认为他们只有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中，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还在大革命刚刚失败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她就确信“过去两年来，在广州、长沙、武汉和华南、华中数十个大大小小城市的街道上游行的妇女，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妇女了”，包括妇女在内的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工人游行队伍中的“缠足妇女们”是中国伟大的群众已经觉醒的“生动例子”，“是中国已经不同往昔的最有力的明证”^①。宋庆龄追述那段历史并且加以总结：“成千成万的女工、农妇和女学生参加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打倒北洋军阀的伟大斗争”，正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工厂里来的妇女，脱离了半奴隶的地位和日夜劳作的苦海而成长为十足的人和领导者了”。^②宋庆龄还以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边区妇女的觉醒和解放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她指出：“只有在陕甘宁、晋察冀和其他的边区，才产生了承继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③他们不但因此而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边区的妇女已成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战士了，她们不仅比得上男子而且时常超过男子”^④，取得了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说来，“只有将来才会达到”的地位。而原来边区的许多地方，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由于长期的苛政变得死气沉沉，日寇的占领使他们复遭进一步的蹂躏，如在陕西和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妇女仍旧缠足，文盲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压迫与痛苦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采取了无限专横的态度，来补偿自己在生活上的绝望。出卖或溺杀女婴几乎成为习所当然的事”^⑤。但当八路军到达以后，对妇女“进行了耐心和一点一滴的培养”，使她们认识“作为妇女的权利”以及“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些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的妇女除了参加生产和军事斗争外，还“参加了各种行政的工作……妇女担任县长、镇长和村长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35—36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56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61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62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61 页。

是很平常的事”，并且“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①正是参加了革命斗争使边区妇女从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封建的精神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宋庆龄同时评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②在抗战期间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论证参加社会生产和走向社会生活是妇女思想解放的重要途径。“工合”开办纺织合作社，收容从沦陷区撤退下来的妇女，“使大量妇女免于乞食”，还为妇女成立了识字班，给妇女开办学习自治和共同生活的俱乐部，对妇女进行独立的技术培训，设立妇婴医疗所等等。许多妇女由于参加了生产和受到培训，并在社会生活中扩大了视野，思想上迅速提高。她们从过去出卖劳动力的“奴隶”和流离失所的“难民”而变为“本身有价值而对于国家的目前与未来也有价值的人了”。她们不再仅仅是“女人而已”，而是“受人尊敬的十足的公民”。^③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了一县的组织人员并且领导了一些最好和效率最高的单位”^④。事实说明，参加社会生产和公众生活，与投入革命斗争实践一样，成为妇女解放和综合素质提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宋庆龄以事实为依据，抨击在妇女运动中随着反共高潮而涌起的恶浪。她指出自1940年夏天开始，妇女又“遭到战前的那种歧视。……当反动浪潮达到顶点，进攻新四军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逮捕事件”，许多妇女工作者遭到迫害。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将妇女公然逐出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它的中央组织部在1941年春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上竟然公布了极其荒谬的文告，声称“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加政治，那是很有害的……妇女运动应该在普及教育、职业训练、妇女服务、以及社会福利和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2页。

② 宋庆龄倡导的、由国际进步人士路易·艾黎、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和埃德加·斯诺为主要发起人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8月在汉口成立。以发动并领导旨在“引进外援，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战时生产自救运动。目的在于组织“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日占区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工业生产。”“工合”也是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组织。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任首席技术顾问，国共两党人士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及爱国人士沈钧儒，黄炎培等分别担任理事。1939年1月，在香港又成立了“工业合作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担任该会名誉会长，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为执行秘书，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艾尔达·普律德、何东、宋子文等为委员，毛泽东认为：“‘工合’在恢复后方工业生产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占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3页。

家庭问题等方面进行工作。只有当妇女在德育、智育、体育和技能上达到了男人的水平的时候，妇女运动才会成功”。^①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理论”，宋庆龄坚决揭露其虚伪性与反动性：“一方面要求妇女有同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不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他坚决主张人人都有责任积极参加并改进政府的工作），也违背了中国所艰苦赢得的整个进步趋向。”^②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场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关于妇女解放基本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视。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发表《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的批判》一文，痛斥“妇女回家去”的论者是“麻醉妇女的民族意识……客观上亦正和敌伪玩弄奴役妇女的办法，起了应声”。着重阐述中国妇女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中，相辅为用，有机构成的一部分，是现阶段全民抗战民族独立解放现实生动的一部分”^③。周恩来也发表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揭露“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实质，他表示“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誉，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但是，‘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接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为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那种“以妇女应尽母职为借口而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④。

在这场延续下来的论战中，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人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正确路线，即广大妇女必须在革命斗争与生产斗争中，谋求自身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完全解放。《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是宋庆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反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击妇女解放运动的逆流而作的。如果说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所写的《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在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内容和方向的论战中，从理论上彻底清算封建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对广大妇女的毒害，以解除她们的精神枷锁，也是为了动员人民和广大妇女为挽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4页。

③ 《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1940年8月12日。

④ 《妇女之路》第38期1942年9月27日。

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民主进行斗争，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的《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国妇女》一文，则更多地以事实为根据，雄辩地论证妇女思想上的解放与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同等重要，相辅相成。鼓舞广大妇女巩固已经取得的斗争成果，并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新的斗争中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中国妇女思想上的解放，比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历程更为长远和曲折。与传统观念和陋习的决裂，比与剥削制度的决裂，内涵愈加深刻，任务益发复杂。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彻底粉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的任务也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不仅由于保护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平等的法律、政策还有待完善，更重要的是两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宋庆龄深知“要解除这些锁链，并不是容易的事”^①。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人民解放奋斗了大半生的宋庆龄在担任了新中国的领导职务和全国妇联领导职务以后，为妇女的彻底解放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特别是为使妇女彻底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而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她不断告诫广大妇女和全国人民：虽然新中国的法律“已确认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地位”，妇女们“已经享受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给予的权利”，并且“在铲除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关系方面已有了伟大的进步”，但“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②。

宋庆龄认为新中国妇女思想解放任务之所以如此艰巨，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诸如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的“根深蒂固……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二是“妇女们到处都受到家庭繁重工作的束缚”。扫除封建传统思想观念，只能主要靠教育来进行。要加强对妇女的教育，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使妇女理解自身解放的内涵、必然性和途径。宋庆龄强调“首先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我们妇女的政治水平。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懂得基本的胜利以及我们的胜利的必然性。我们也不能懂得，为了要获得这些胜利，我们必须采取怎样的方法。”^③对妇女进行教育，主要是提高妇女政治素质，使她们“在政治上能够保持警觉，而且真正了解世界局势及我们自己的情形”，这才能使妇女“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她谆谆教导广大妇女姐妹：“‘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我们必须自己争取解放，而没有政治觉悟就不可能得到解放。”^④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6页。

其次，要对全社会进行关于解放妇女的教育。宋庆龄认为打碎束缚妇女的封建枷锁是全社会的责任。固然，在包括为国家与人民而进行战斗等方面“有许多责任是男女需要同样分担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解放，“男子却有一项独有的对他们自己和女性所应负的义务”^①。虽然法律上已经规定男女平等，妇女在取得男女平等权上有所进展，但是“除非男子完全理解，而且坚持男女平等，否则这一切都会落空”^②。她预料到清除陈旧的传统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多么重要”。她指出诚如列宁所说：“一个妇女的家庭生活就是她每天被牺牲在千百件微小的琐碎事务上。古代男子当家长的权利，至今还暗地存在着。我们在妇女群众中间的政治工作包括用相当大的努力来教育男子，我们必须在党内及群众中间彻底铲除这种陈旧的当家长和主人的观念。”^③ 唯其十分困难，唯其密切关系妇女及全社会的解放，宋庆龄更感到在中国、亚洲——过去多数沦为殖民地附属国的“落后的”亚洲，必须把“使男子消除这种‘陈旧的观念’”和“男女并肩走向人民的胜利”，作为社会解放的一个“基本原则”。^④

使妇女从封建的、闭锁的旧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是生产实践，是宋庆龄为新中国妇女指出的实现思想解放的主要途径。作为中世纪自然经济基础的社会细胞——家长制的封建家庭，是妨碍妇女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障碍。在封建的家庭中，“除了家长以外，其他的人都受到这种‘家庭’的压抑。……这种气氛使家庭成员老是往‘里面’看，而从来不‘向外’看。因之，它使人眼光狭隘”^⑤，这样的家庭“绝不能使人养成适合于当前世界局势的思想……不能了解为整个社会谋美满生活而积极行动的理想”^⑥。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分散、封闭的旧家庭宛如牢笼，只能把妇女的观念局囿于狭小的家庭或家族的义务上，绝对不可能产生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早就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⑦ 列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5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5页。

⑦ 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马恩列斯论妇女》，东北书店1949年印行，第128页。

宁同样认为：“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他们真正与男子平等，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公共劳动，这样，妇女才能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①因此，宋庆龄反复地向国家、向全社会建议增加公共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投入广泛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去。

双重枷锁的挣破，是宋庆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的核心。在旧中国，她为了中国妇女获得社会的解放和思想的解放，在实践和理论两条战线上英勇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她不懈地号召“必须对数千年的积习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②，直到晚年，她还谆谆教导广大妇女不断“克服旧社会遗留在我们身上的缺点和弱点”，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宋庆龄的英名，永远和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

（四）争取实现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

争取实现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重要内容。她把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作为砸碎压迫妇女的双重枷锁的具体措施。

在旧中国，当妇女还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之下，他们首先要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解放，谋求“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但是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由于中国妇女长期处在社会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之下，妇女的婚姻自主权、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职业自由权、对子女的保护权以及同工同酬权等等一概被剥夺。恢复妇女这些应有的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妇女解放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已经享受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给予的权利”，但宋庆龄提醒全国人民和广大妇女：“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诸如“男尊女卑”等等封建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妇女们还“受到家庭繁重工作的束缚。不仅使她们无法参加生产，甚至阻碍了她们的的发展，使她们既不能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又不能依照社会对于公民的要求来使自己前进”^③。但是“没有一个革命运动是没有妇女参加而能成功的”，对于

^① 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马恩列斯论妇女》，东北书店1949年印行，第12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7页。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一样，“除非中国的妇女大量参加工、农和文化工作，把人口中的一半劳动力完全解放出来，就不容易按照必需和可能的速度推动我们国家的前进”^①。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便担任国家副主席和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的宋庆龄虽然国务繁忙，却以更多的精力关注妇女解放运动，并从政府的角度为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尽力创造条件，为广大妇女冲破原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家庭的局囿、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提供更多的机会。

当中国人民刚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宋庆龄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即指出，中国以及正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妇女，除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的发展”以外，还要为下列权利而奋斗：“一、妇女婚姻应有平等权利。二、妇女在家庭中与财产继承上，一切权利与男子完全平等。三、母亲对儿女的权利。四、增加托儿所、保育院、幼稚园、卫生设备与个人卫生教育来保养儿童。五、立法规定同工同酬，分娩假期照付全部工资，禁用童工。六、所有儿童必须受强迫免费教育，并展开“小先生”运动以扫除文盲。七、设置妇女及儿童高等教育基金。”^②她呼吁：在已经将这些妇女权益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和保护的国家中，“应该督促其实施”；在那些妇女权益还未得到法律承认的国家和地区，则应“努力奋斗使这种权利得到明文规定”。当新中国从经济恢复时期进入经济建设的发展时期后，针对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实际状况，宋庆龄在加强妇女的政治和专业技术培养，扩大社会服务以解放妇女沉重的家务劳动，重视妇女儿童保健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认为在如下几方面必须加紧进行：“一、我们必须继续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二、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备，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三、我们必须加紧扫盲工作，并多设训练机构，使妇女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四、我们必须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和加强她们的组织联系，保证她们尽量地积极地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③宋庆龄不仅推动和主持各种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法令、措施的制定，督促保护妇女权益的法令的切实实施，协助组织从全国到地方各级妇联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使得这些妇女组织成为“妇女的娘家”，更好地发挥培养和教育妇女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4—21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7—328页。

作用。她还将自己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给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这笔捐款后来用于在上海建立“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①。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宋庆龄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深刻理解和对广大妇女的关怀爱护。她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民族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去理解和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稳固坚强”，而一个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前进中的中国，“就是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②她在晚年仍然表现了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不息的热情”，不断教导广大妇女：“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③因为“没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为了使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减少后顾之忧，全力投入振兴中华的大业，她多次呼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④她以永葆的青春要求自己与全国的妇女姐妹们一起，为祖国的富裕、民主、文明和强大“竭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宋庆龄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在大半个世纪的时期中，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而战斗，同时，也为妇女的解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她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妇女解放的科学理论：只有人民大众解放之日，方是妇女解放之时。中国妇女必须在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获得自身的解放；中国妇女还必须砸碎封建思想束缚，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在生产及社会的实践中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真正自由的妇女；当一切剥削制度被消灭后，男女必然在世界上“并驾齐驱”。

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直至今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始终是她的毕生活动的主要部分。在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卓著的伟大业绩中，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无疑是她的一座丰碑。

（本文原载于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庆龄论》，2011年9月修改于北京。）

① 《纪念宋庆龄同志》（图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215，影印件。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8页。

③ 宋庆龄：《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载《中国建设》1979年第2—3期。

④ 宋庆龄：《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载《中国建设》1979年第2—3期。

论宋庆龄与青少年儿童教育

当宋庆龄将要度过她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的时候，她回顾了自己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七十年的岁月，无限深情地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① 她最后的、最美好的祝愿——“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②——送给了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及家长；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两篇文章，两首教育诗篇——《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愿小树苗健康成长》，是送给自己挚爱和眷恋着的孩子们，留赠给她寄托着信任和希望的少年儿童工作者的最后的礼物。

宋庆龄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孙中山，因为“四十年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加以革命营垒的叛徒“从背后破坏”，使他在国民革命高潮临近的时候过早地逝世；她唯一的孕育中的孩子，贡献给了反对新军阀叛乱的斗争；为了换取一个不受欺凌、平等、自由和幸福的新社会，她抛弃了财产、地位、权势和舒适的生活，离开了那个在旧中国最为显赫的家族，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艰辛的革命道路。而长期危险而紧张的斗争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身心健康。只有祖国的富强繁荣和人民的安乐幸福能使她激动和鼓舞，唯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天天向上能使她欢欣和快慰。

在苦难的旧中国，受压榨最深的妇女和儿童在她博大的胸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她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祖国未来的新一代。她无时

① 《人民日报》1981年5月2日。

② 《中国妇女》1981年第6期。

无刻不流露出对广大青少年的深情：“每当我在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看到少年先锋队的队伍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心就激动起来……使我想到了我们祖国无限美好的未来。”^①“每当我听到你们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在家长和老师们的培育下，正在活泼成长；听到你们在学习上不断获得好的成绩；听到你们不断养成好的品德；听到你们大唱革命歌曲；听到你们在回答‘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个呼号而高呼‘时刻准备着！’的时候，我心里感到极大的喜悦和兴奋。……英雄的革命长辈们把革命传统这一份宝贵的财富交给了你们，为你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你们能够迅速地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后代。我常常骄傲地想：我们有多好的后代！”^②当她的生命之舟将驶及彼岸，她的万千思绪，仍然萦绕在代表着祖国未来的少年儿童的身上——向他们表达她深沉的爱和最后的嘱咐：“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可是，我要提醒你们，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生长。对那些长的歪歪扭扭的小树，还要进行矫正、修剪。同样，社会上某些坏思想、坏作风和旧的习惯势力，也是对你们的危害和污染。”她嘱咐孩子们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要学会“在这个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上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她祝愿孩子们“象小树苗一样，长成大树，聚成森林，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材”^③。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每逢“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她都忘不了向孩子们及他们的老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并赠送节日礼物。她自己也“分享了孩子们的欢乐”，她的住所成为小客人节日游乐的场所，孩子们的欢歌，和着宋奶奶的笑语在空中荡漾；宋奶奶的笑脸，和新中国的小主人的笑靥如鲜花般地一起绽开。她从健康成长的新的一代的身上，看到孙中山理想的实现，看到“我们的后代大有希望，革命的前途大有希望”^④。

宋庆龄对于青少年儿童炽热而深沉的爱，主要表现在她全面关怀他们的教育培养，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而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

“缔造未来”是宋庆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主导思想；把青少年儿童培养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473页。

③ 宋庆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载《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期。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3页。

成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祖国和世界充满义务感和献身精神、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有健康体魄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即培养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新一代，是宋庆龄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学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是宋庆龄倡导的科学教育方法。宋庆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理论和在实践中的示范，既体现了她教育思想的总原则，也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现在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的重要依据。

（一）“缔造未来”是宋庆龄教育理论的指导思想

宋庆龄从来把对青少年儿童的培养教育与革命事业的前途和祖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把教育事业提高到与革命事业成败攸关的战略高度——称之为“缔造未来”的事业。

儿童是“世界之宝”，又是“人类的至宝”，^①言简意赅，概括了宋庆龄对儿童问题本质的理解和她的教育思想的基石。正是着眼于祖国和人类的未来，所以，在她为新中国奋斗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密切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和儿童，为拯救他们而奔走呼号，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为儿童的生存与教育尽可能提供条件。而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宋庆龄更深切理解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具有独特的现实与战略意义，这是因为“离开了教育，即使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孩子不会因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自然红’起来”。正如“幼苗纵然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细心的培育，不去锄草、施肥、灌水、除虫、修枝，就很难长成茂盛的庄稼”。“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②在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上，宋庆龄既反对了“血统论”，也反对了“先验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孩子降生在社会主义的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是“他们生长在和平的环境中，没有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没有经历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不了解旧中国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不了解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加上他们年轻幼稚，知识不足，因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缺乏抗毒的能力”。他们面对的是“千方百计

① 《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2页。

地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们和“把消灭共产主义的企图寄托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国际资产阶级，因而教育好下一代乃是“‘百年树人’的重要工作”，它的战略意义在于“关系到我们革命事业的成败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保得住社会主义江山，我们的革命在今后几代人手里会不会变质，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重大问题。”^① 因之，宋庆龄不得不为此而倾注绝大部分的心力。这个伟大的“缔造未来”的系统工程，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只能在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的间隙中艰难地进行。在新中国将要成立前，宋庆龄透过黎明前的黑暗，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因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已着手领导“工程”的设计，并且付诸了初步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这个伟大的工程的设计才得以不断地完善和大规模的展开。

对于教育事业的认识是衡量政治家战略眼光的重要尺度，也是一个党、一个国家文明的根本标志之一。宋庆龄在教育事业方面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证明，她堪称革命教育家的楷模。

宋庆龄对青少年儿童问题的关注，发端于革命走向高涨的年代。那些怀着共产主义信念的年轻人，以火一样的爱国热情，帮助孙中山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促成他思想发生伟大转变，他改组了国民党，给“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注入了“新血液”，使她认识到“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②。孙中山在这方面给她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甚至在他最忙碌的日子里，他也从不拒绝那些成群跑来找他谈话的男女青年们。他时常不得不请那些事务繁忙的人等上几小时或几天，但从来不让青年学生或那些年轻、热情而纯朴的工人和农民等候他。对于这些人，他的门永远是敞开着。”^③ 在革命战争年代，宋庆龄深切了解革命的青少年在反动环境中建立抗敌组织的事迹，为他们“在火线前后的自我牺牲”以及在争取人民应得的利益中所表现的“国际主义勇气”而骄傲。在上海，宋庆龄目睹了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站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如何冒着被逮捕和杀害的危险，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看到他们“正为了将来而天天在准备着自己”^④，并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在力量，因而深信在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0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的斗争中，“少年人是异常重要的”^①。但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培养无数的下一代，只有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在革命战争的年月，宋庆龄则不得不为拯救和保护儿童而全力以赴，在为新中国奋斗的伟业中，为“缔造未来”打下基础，扫清道路。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宋庆龄就不断地在海内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战灾儿童寻求保护，这些孩子很多是被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不少是烈士的遗孤，“他们代表着未来的一代。他们将要在他们父母正在战斗、受苦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②。她发出“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的呼吁。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的1938年，她亲自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救济战灾儿童，“以便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存下来”，^③并且要尽量创造条件对他们进行教育，绝不能让他们成为“迷失的一代”。“保卫中国同盟”为保护“中国未来的一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在“任何正在进行着为实现一个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的地方进行救济战灾儿童的工作”，建立了许多孤儿院和其他机构，给孤儿和流离失所的难童提供生活保障和医疗、教育，组织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生产并进行技术训练，使他们在自救的同时，获得了知识与技能，使他们成为将来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重要力量。如在陕西三原建立的一个孤儿院，收养了500个孤儿，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常规教育，“训练他们成为未来有用的公民，能够担当起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④。这是当时的儿童救济工作的一个缩影。

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主要业务之一，理所当然地“就是儿童工作”。宋庆龄这样介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在解放前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使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儿童命运更加悲惨。战争、饥馑以及蹂躏所带给他们的苦难是令人痛心的。当时，中国福利会集中主要力量支援解放区人民革命斗争，为儿童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也在反动派统治区进行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0页。

②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③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④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救济儿童和教育儿童的工作。”^① 经过短短的一年，到1947年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儿童工作已取得很大的成效。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建立了三个儿童福利站和一个儿童剧团，儿童福利站设在工人的居住区。仅仅在一年当中，福利站为大约5000名孩子“提供文化、医疗和补充营养”。儿童剧团在这期间排演了两个儿童剧，免费为15000名小观众演出，使“贫苦儿童得到健康和富有教育意义的娱乐”。^② 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一支革命的少年先锋队队伍。在儿童福利站受过教育培养的儿童，又在上海的贫民窟里主持由福利基金会开办的数十个识字班，向劳动人民的孩子及他们的父母传授文化知识，以歌咏、舞蹈、戏剧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为迎接上海的解放而秘密地进行各种准备，表现了“他们所担负的责任的重大和他们所经过的锻炼”^③。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十分艰难而且危险的情况下，进行了“缔造未来”工程的早期试验与实施，并以卓越的成绩显示了这个工程的伟大意义。从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到上海解放的短短3年多时间里，它还对上海10个文化教育机构和13所贫苦儿童义务学校捐款和分发食品衣物，使这些学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得以维持下去。1946年，当国民党反动派重开内战以后，原来收容在湖南四所孤儿院内的1200名孤儿面临被抛弃、流落街头的厄运。中国福利基金会得知情况后，马上进行紧急救济。中国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响应宋庆龄号召，进行义演，全部收入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转交四所孤儿院，使孤儿们获得温暖和照顾。与此同时，原有的革命根据地（如华北等地）的孤儿院、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医学院等机构和单位，继续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大量款项和物资的捐助。而这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尽力拯救和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为“缔造未来”的工程而打下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及时向将要获得新生的祖国输送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国福利基金会除了继续给解放区的托儿所、幼儿园、孤儿院提供支持外，还在国统区加紧进行儿童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工作，使他们具备健康的体魄和文化科学知识以等待祖国的召唤。宋庆龄认为这些工作是为“迎接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创造了一些条件”——为新中国培养各条战线所需要的人才，这是“缔造未来”工程的早期实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宋庆龄马上适时地将“缔造未来”的伟大工程纳入议事日程，为它的大规模开展在短期间内做好紧张的准备。当务之急，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7页。

②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84—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9页。

是把广大的劳动妇女和儿童从贫病交加的情况中解救出来，将大批流浪儿童作妥善安置。宋庆龄认为：“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措施。”^①从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的战略高度，宋庆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新时期的工作所制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②。根据“保卫中国同盟”的“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③的原则和传统，中国福利基金会集中力量去“做工、农、兵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努力解决“有关提高我们儿童生活的问题。”^④在上海解放后短短一年时间中，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朝气蓬勃，硕果累累。宋庆龄在总结这段时间的工作时，是这样向全国人民汇报的：“这时中国福利基金会全部工作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举办了夏令营，对于来自上海工人区的一百多个小先生施以集体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准，使成为当时建立上海少年先锋队的基础。……我们重新组织了上海儿童工作组，计划的中心在通过集体活动来提高工人及贫民子女的文化水准。儿童剧团扩大了，以便为这个将来在全国发展起来富有儿童文化教育意义的工作创造经验并起示范作用。……帮助许多儿童教育或教养机构，使他们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需要。……收容乞儿及贫苦儿童，把他们转入生产中去。”而对于原来老解放区的儿童福利机构和国际和平医院，则继续“捐募款项及物资”。^⑤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围绕着“缔造未来”的战略计划而展开的。

为适应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50年更名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及时指示中国福利会的包括儿童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必须要“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⑥，儿童工作的重点逐渐移到“儿童保健、儿童教育、儿童戏剧、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和儿童读物的出版方面”^⑦，积极开展“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⑧，并“将从事科学研究”^⑨。她自己首先在这方面作出表率，亲自关怀和指导妇女儿童卫生保健制度的制定和医疗机构的建

① 《解放日报》1950年6月1日。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页。

③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29页。

④ 《宋庆龄选集》，第263页。

⑤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04页。

⑥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0页。

⑦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0页。

⑧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0页。

⑨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0页。

立。她在百忙中经常到妇幼保健院视察，检查病案，慰问病人，从医疗器械的添置到病人的伙食等等都亲自过问。她对少年儿童的学习及校外教育考虑得那样细致周到：“我们要在工人区中心建立一个儿童文化站，举办民众识字班、课外文娱活动和其他工作……”^①在扩大发展了儿童剧团的时候，又出版了专门为儿童服务的刊物《儿童时代》，决心通过举办儿童校外教育事业，“为儿童文化工作开辟一条道路，在各地发展起来，一直到中国有了上千个儿童文化宫为止”。此外，“其他类似的计划也正在考虑中”^②。宋庆龄深刻理解“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儿童不仅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后备力量，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争取人类正义与进步的后备力量。她深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培养教育儿童的工作做好，是“履行我们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责任”^③。

“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④，这是宋庆龄对青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本质与巨大意义的理解与高度概括。因此，她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规模开展以后，虽负担着繁重的国务活动，仍以大量精力用于指导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阶段，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人民的幸福，宋庆龄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团聚和率领各阶级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洪流；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热潮中，她又高瞻远瞩，为另一个更高层次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默默耕耘。她的生命之火为“缔造未来”而燃烧，发出灿烂的光辉。

（二）着眼于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劳动者

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⑤，是宋庆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宋庆龄认为教育工作的全部目的，在于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坚强的革命后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0页。

②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47页。

④ 《中国建设》1963年第6期。

⑤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0页。

代，成为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①。教育工作必须围绕这个根本目的而进行。共产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宏大伟业，需要经过无数代人不懈的努力方能完成，这桩事业对接班人的条件要求很高，他们“必须是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的人，是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新人”^②。因之，对青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品质、体魄以及文化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全面培养，使他们成为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一代，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发展和胜利创造可靠的现实条件的长期战略任务。宋庆龄对于培养接班人的意义有深刻的理解，在她为新中国工作的30多年里，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洪流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岗位——“更好地为培养革命后代服务”^③。她虽然因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而国务活动繁忙，但仍以最大的热情、最多的心力关怀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并动员全社会“为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努力”^④，从国家的角度，为新一代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为伟大的现代教育家，宋庆龄既高瞻远瞩地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提出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理论；又切合实际地指出了近期的任务和实施方法，甚至在实际进行中，她亲自指导并作出示范。宋庆龄认为新中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刻不容缓，她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必须立即帮助他们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⑤ 她认为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应该在如下这几个方面加紧同时进行：

第一，要努力培养青少年儿童正确的人生观。

青少年儿童处于可塑性最强的时期，正确的人生观正是培育他们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础。根据当时时代的特点，她要求新一代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跟着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应该有任何犹豫、怀疑”，因为这是“一个人具有革命人生观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主要标志”。^⑥ 她以自己“经过两个时代”的经历和体验谆谆教导孩子们：“旧社会旧制度不能给青年以任何的出路”，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1页。

② 宋庆龄：《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2日。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7页。

⑤ 原载《中国青年报》1979年6月1日。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10页。

“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①。因之，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有革命志气，不怕吃苦，不怕任何困难，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②——是革命人生观的主要内涵。

其次，宋庆龄认为革命人生观应该体现在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之中。

她强调革命者“真正的志愿不是选择什么职业，而是和树立什么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③革命者的大志表现在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深切责任感。在全世界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解放的政治斗争中”，青少年一代“不是没有责任的”。革命后继者的大志应该是革命，立志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终生奋斗，至于职业的选择，则要服从前者：“只要是革命工作，不管是哪一行，都要认真做好。”^④宋庆龄把雷锋当作为人民服务的楷模，赞扬他的“螺丝钉精神”是为为人民服务精神的集中表现，要求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该把“革命者的大志”与“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雷锋精神结合起来：“雷锋提出‘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正是革命者的大志”，“螺丝钉”虽然极为平凡，但“这样的螺丝钉愈多，革命的火车头愈能飞驰前进！”^⑤她批判那种对“螺丝钉精神”不以为然甚至挖苦的错误态度，指出那是“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看问题”^⑥，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判断生活”^⑦，它使人们把“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个人享受占第一位，结果就产生道德败坏现象”^⑧。“螺丝钉精神”是以高度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体现，只要“把孩子炼成革命的优质钢，不管把他们制成什么成品，都能永远锋利、坚韧、不生锈”^⑨。

胸怀革命大志而又具备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宋庆龄指出的革命人生观的另一个含义。

再次，必须使青少年一代认识他们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世界和平事业负有重大义务。要求他们正确理解自己“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尤其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1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1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6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6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9页。

⑧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9页。

⑨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7页。

是认识自己“同劳动人民和一切地方的正在为反对压迫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①。必须教育他们懂得“三分之二的人类还没有解放”，他们“有责任全力支持现在正在进行的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斗争”^②。她谆谆教育孩子们在“认识到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快乐时，不要忘记，今天还有好些国家的孩子处在帝国主义所制造的战争和压迫剥削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在那些地方，战争的乌云遮盖了孩子们的欢笑，飞机、原子弹和军事基地夺去了孩子们的面包、书本和玩具，甚至幼小的生命。”中国广大的青少年儿童“必须对于那些处在帝国主义魔掌下过着悲惨生活的孩子们，给以深切的同情。”并且要立下志向，“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③ 宋庆龄说，儿童是人类的未来，他们是否能够健康成长“关系着人类命运”。因此，她把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使他们从小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自觉地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培养坚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不可少的课题之一。

最后，革命人生观还体现在献身精神之中。忘我的献身精神建立在对幸福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宋庆龄为此十分欣慰、自豪和骄傲。她说：孩子们还必须理解“什么是幸福”，中国儿童之所以幸福，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要“在我们的古老的土地上亲手建设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④；他们的父辈以劳动、战斗，流血、牺牲而开创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历史时期”，给他们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在他们面前“展现着无限广阔的道路”，他们将要“加入到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队伍中来，继续高举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走到最终的胜利”^⑤。她还勉励孩子们要正确对待幸福。她说：正确的、崇高的价值取向是“不但享受幸福，而且要准备将来为大家创造幸福”^⑥；“绝不能满足于享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⑦ 她教导新中国的年青一代，他们既有享受幸福的权利，也有为人类创造幸福的义务。“不怕困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1—51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2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2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23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13页。

难，不怕牺牲，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切为了革命……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出一生的精力”；“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①这就是宋庆龄教导孩子们树立的充满奉献精神的幸福观。既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又有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这是革命人生观的完美体现。宋庆龄对教育事业所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必须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对祖国和世界充满义务感和献身精神的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第二，要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武装年青的一代。

宋庆龄指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空前伟大的事业，“不但要改造社会，还要改造自然，征服宇宙。”^②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不仅要使人民摆脱侵袭和压榨，还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这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提出了很高的文化科学知识的要求：“必须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③。要把我们的不发达的祖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强国，必须要有一支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队伍，如果我们的接班人不学好知识和本领，那么，“社会主义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远景始终是远景，成不了现实”^④，而社会主义接班人也就不“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名词，没有任何意义”。宋庆龄把文化科学知识，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的高度：人们只有在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和劳动生产技能，才能成为先进的生产力因素。她反复重申：“在建设中同样也必须拿起武器来……就是劳动的本领，就是知识。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⑤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武装年青的一代，就是授予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先进的生产力。在十年浩劫的岁月，她目睹“四人帮”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忧心如焚，痛斥他们对下一代“严重摧残”。她历数“四人帮”的罪行：“……疯狂地破坏少先队组织和幼托组织，撤销儿童出版机构，打击和迫害儿童读物的作者。他们唆使青少年不读书，光捣乱；煽动学生反老师，妄图把学生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⑥当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2、44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5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3页。

⑥ 宋庆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载《宋庆龄论青少年儿童教育》，第79页。

的航船以空前的速度开始了新的长征，无限欢欣鼓舞的宋庆龄又不断地提醒孩子们：“要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要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聪明智慧。你们要通过学习，掌握古今中外的文化科学知识，并且要创造更高的文化科学。”^①

宋庆龄对于文化科学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建立在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她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提出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严格的要求：“为了革命而勤奋学习，用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知识武装你们的头脑，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你们的头脑，立志做文化的主人，做自然的主人，做宇宙的主人。”^②

第三，要高度重视对青少年儿童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的培养。

宋庆龄强调优良的品德及高尚的情操，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对年青的一代从小就在这方面进行培养，是为了他们今后能够顺利接过父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的重担，而且在“思想上、精神上做好准备”。她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道德情操的主要内涵应是：具有“崇高的生活理想”，即“一个能够把他们个人的前途与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的理想”^③，“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勤劳朴素”和“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诚实，公正，坚忍和负责的品质”^④以及有文明礼貌的行为、“健康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力”。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实现这个过程只能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完成。宋庆龄说：“在封建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旧世界正在崩溃，但还没有临到末日”^⑤，我们伟大的祖国虽然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曲折复杂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还有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艰巨的工作”，当孩子们长大以后，“将遇到更为宏伟，更为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这就要求

① 宋庆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载《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期。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5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1页。

他们要有不息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的革命理想”^①。当代世界，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帝国主义、反动派、敌对阶级千方百计地用他们的反动思想腐蚀青少年一代，妄想实现‘和平演变’，以颠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②。这就要求革命接班人要具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绝不因历史的曲折而迷惑；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也不因暂时的顿挫而颓唐。共产主义事业是人民大众的事业，共产主义者应该是集体主义者。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认识“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崇尚“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的原则。只有“从小树立集体主义精神”，才能服从革命的大局，“团结友爱，先人后己，服从纪律，维护公共利益”，^③加以诚实、公正、互助合作等等优良品格，方能增强革命队伍的凝聚力。而目标一致、步调一致的革命队伍，是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在历史航船向着预定的方向前进时，难免遇到逆流、碰上暗礁或搁浅，共产主义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已为历史所证明。因此，她说：“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仍然是漫长的。老一代的革命者肩负着沉重的纤绳，牵引着革命的航船，已经走过了最艰苦的一段：今后，应该是年青一代驾着现代化的征轮，继续冲破惊涛骇浪，奔向我们伟大的目标。”^④顶逆流、闯恶浪、越险滩，就要求接班人必须从小经风雨，见世面，并在参加力所能及的各项劳动中培养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德和作风。宋庆龄尤其关注青少年儿童高尚情操的陶冶和培养，要求他们成为“有教养的人”——“就是有文化修养和文明行为的人”。她深信文化艺术对陶冶性情有着“重要作用”，它使孩子们“活泼开朗”，“积极向上”，“愉快乐观”，文明礼貌，并能够“抵制那些不健康的有害东西，养成优美高尚的情操”。^⑤还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宋庆龄亲自组织和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通过音乐、舞蹈、戏剧“这些美妙的东西”去教育和感染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孩子，让他们“懂得艺术的价值”，使那些“小生命”不会因“缺少生活的乐趣而感到空虚”^⑥。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剧团扩建为儿童艺术剧院，宋庆龄一如既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3页。

④ 宋庆龄：《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载《人民日报》1981年2月2日。

⑤ 宋庆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载《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期。

⑥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84页。

往地对儿童剧院的工作极为关注，要求他们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能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这既表达了她对中国儿童的无限钟爱，也反映了她对下一代综合素质的培养的高度重视，更体现了她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而创造“精神力量”。

第四，要培养青少年健康强壮的体魄。

这是全面发展的人的要素之一。因为“新的建设任务，要求一代健壮的新人来接班”。革命的后代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他们将要“攀高山、涉大海、深入地层、飞向宇宙。这绝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办得到的”。另外，“身体健康的人，精神往往是愉快的、乐观的，能够适应任何环境，而不会被困难吓倒”^①。为此，宋庆龄要求青少年儿童要参加体育活动以增强体质、锻炼意志，讲究卫生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以健壮的体魄和心理素质，准备承担艰巨而光荣的革命与建设任务。

第五，为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建设一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及少年儿童工作者队伍。

既然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百年大计”，那么，建设一支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及文化科学知识各方面都具有较高素质的少年儿童教育工作者队伍，是这个“百年大计”的重要保证。宋庆龄对这支队伍的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又细致入微地指出他们所应努力的方向。她首先要求教育工作者深刻认识自己工作的重大意义，不能“单纯把儿童工作当做一种职业”，而是承担了“培养我们的儿童成为新中国优秀的公民”的“光荣任务”。^②因而“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儿童的观点，下定决心把儿童保教工作当做自己的终身事业”^③。只有这样，教育工作者才会自觉地努力提升自己，并以“高度的责任心，以充满了对儿童的真诚的爱”，去为孩子们“做出在质量和上都是无可比拟的工作”。^④其次，宋庆龄要求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在各方面提高自己的素质以适应教育工作的需要，勉励他们要“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批判和清除儿童教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用自己的

^① 宋庆龄：《孩子们，好啊！》，载《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

^② 宋庆龄：《致全体儿童保育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同志们》，载《人民日报》1953年5月31日。

^③ 宋庆龄：《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载《人民日报》1960年6月2日。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47、346页。

模范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儿童工作者还必须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类积累下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儿童，他们长大以后再加以更大地发展和提高，成为真正的文化、科学、技术的主宰，把社会不断向前推进”。^① 宋庆龄把教育工作者自身的提高称作制造“我们未来生命的血液”，可见对其任务是何等的重视。宋庆龄认为，培养接班人“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我们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②，因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很好的结合起来”^③。关于家庭教育问题宋庆龄认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孩子们长身体、长知识，培养性格、品德，为形成世界观打基础的时期，父母的一言一行都给孩子深远的影响。”^④ 她呼吁社会各方面人士要“以对党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参加教育下一代的工作”^⑤。在如何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宋庆龄对包括家长在内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他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点”，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教育下一代，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象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象雷锋那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象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把我们的孩子们培养成能够继承革命传统，成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成为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战士”^⑥。其次，在正确的教育观点指导下，教育工作者以致全社会都应该“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宋庆龄详述了这个要求的含义：“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就是说要为了使儿童健康的成长创造各种条件。著名的作家们要为儿童写作；先进生产者要经常和儿童见面；一般的生产单位要欢迎儿童去参观，帮助学校进行整套的生产技术教育；应该把最好的建筑物作为儿童校外活动的场所，并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充实儿童活动场所的设备；应该在最好的风景区设立夏令营和儿童疗养院。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就是说要用很多的精力去培养、教育儿童。……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就正确地形成观念、行为和性格的基础。教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并且让他们获

① 宋庆龄：《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2日。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5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2—49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9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3页。

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把最宝贵的东西给儿童，就是说要从各方面给儿童做个榜样。……要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找到为共产主义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找到智慧和经验，找到道德标准，找到吸取力量的源泉……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也就是说要尽量地努力保卫和平。战争将破坏儿童的幸福生活，将夺取千万个幼小的生命，将使无数的儿童无家可归而成为孤儿。……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即使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我们也要把保卫和平的任务担当起来。”^①“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是宋庆龄向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提出的神圣而庄严的要求，那就是全社会都责无旁贷地要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平幸福和积极向上的环境。

归根结底，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宋庆龄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愿小树苗健康成长”既表达了她对青少年儿童的深挚的爱，也概括了她的教育理论的全部内容。

（三）倡导学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为了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新一代，宋庆龄倡导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教育方法。

这不仅仅因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千百万人民的忘我劳动，而要劳动，就必须有文化知识，有从事生产建设的本领。”^②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向教育事业提出的必然要求。共产主义要求实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使劳动成为人类“乐生的第一要素”，因而必须“从教育的最早阶段起就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并且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③。宋庆龄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服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为社会主义培养具有文化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后备力量。她指出“劳动生产需要后备军，发展文化科学需要后备军”，因此必须要求下一代“从小热爱劳动、热爱科学，从小学习生产技能，从小用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④。在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学

① 宋庆龄：《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31日。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0页。

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能获得一个“用自己的手和革命意志创造新世界的机会”，从而“懂得把改变社会、改变自然的思想化为实践的意义”。^①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才能使青少年儿童掌握文化科学知识 with 劳动生产技能相结合的比较完全的知识。二是使“学生们在思想和体力方面受到一系列的锻炼”，以便将来“负担起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②。她要求青少年儿童在“生产战线和科学技术领域中去进行艰苦劳动，去创造、革新、发明”，并迎接“困难、失败、犯错误等的考验”，通过艰苦的劳动，“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坚韧不拔的意志，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以便“能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保持旺盛的、乐观的革命精神”。^③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具体体现。她提出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建设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因此，“知识和劳动必须结合起来，劳动人民必须知识化，知识分子必须成为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思想的工人”，以便逐渐达到“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④。宋庆龄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及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未来共产主义目标所必需，是伟大的“缔造未来”的总体工程的重要实施手段。

教育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主张，是宋庆龄一贯的教育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有关儿童工作中，首先倡导了综合培养的科学教育方法。旧中国穷苦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缺少医疗卫生的保障，福利会的儿童站主要从扫除文盲入手，给孩子们“提供文化、医疗和补充营养”。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孩子们自己去干，极少的几位成年人只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指导，让先受教育的孩子在“上海贫民窟的每个角落”开办识字班，组织贫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进行学习。在这些识字班里，“小先生”们不仅传授文化知识，而且宣传“劳动的价值”，宣传“社会的病根何在……为什么一个尊重劳动和工人领导的世界是能够建立的”^⑤。教育他们“认识群众力量的价值和作用，并以这个力量做基础，把革命的真理灌输到这整个人群中去”^⑥。儿童剧团也主要由孩子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1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9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8页。

们自己管理，他们在老师的辅导下，创作了许多歌曲、舞蹈和戏剧，“通过歌咏、舞蹈与戏剧来教育千千万万的儿童和成人”^①。通过这些方式对苦难中的中国儿童进行高尚情操的培养，使他们知道这些“美妙的东西”和“懂得艺术的价值”。儿童剧团“也把许多被禁的民间舞蹈和歌曲带到工人、学生中间去，并告诉他们这是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中来的”^②。这些“在最艰苦的情形下接受革命教育”的孩子们活跃在上海的穷苦儿童和劳动人民中，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在锻造自己。“小先生”们分别组成“民主小组”，他们讨论知识和时事，进行互相帮助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各方面都健康地成长。“他们很成熟地带着坚定的信念而行动”，在上海解放的前夕，冒着被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和屠杀的危险，秘密组织起来“迎接瞬将来临的解放”^③。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愉快的儿童们立即认识到人民所获得的胜利，迅速地组织队伍向大家宣传。”^④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将来而天天在准备着自己”^⑤。这些通过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而培养出的孩子们，正是宋庆龄倡导的科学教育方法的成功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怀和支持下，宋庆龄对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教育方法更加积极倡导，身体力行。她鼓励孩子们不但要在学校里学好书本知识，而且要“参加除四害、讲卫生、种植、绿化和推广普通话的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从在学校所办的小工厂、小农场、小牧场里参加的劳动中“学到了生产知识，增强了办事的本领”，使得自己更爱劳动、更加团结友爱和更能互助合作。在和平建设的那些珍贵的年月里，宋庆龄继续通过福利会的工作对儿童的校外教育给予指导和帮助，中国福利会建立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为儿童的培养教育提供科学的示范；全国各地数千万的少年儿童在少年宫里受到科技、文学、艺术、音乐、绘画、雕塑和体育方面的良好训练，她也常到那里去和孩子们欢聚，检阅他们的成果，给予督促和鼓励；她亲手创建的儿童剧团在1957年扩建为儿童艺术剧院，“培训了一批专门演出儿童剧的演员、剧作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8—22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0页。

家和舞台美术工作者，并积累了一批保留剧目”^①。儿童剧团是宋庆龄珍爱的一颗明珠，是她用以培养儿童高尚情操的重要阵地。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称赞儿童剧团一方面使孩子们“有了有益的活动”，另一方面孩子们“通过演出，又学会舞台管理和表演技能”。她常亲自审查剧院的剧目，对剧院的工作给予亲切的关怀和具体的帮助。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遭受严重摧残的儿童艺术剧院恢复了生机，“仅在一九七七年它就为三十七万九千八百九十一名观众演出了二百五十九场”^②。当宋庆龄得知仍然有人想把儿童剧院移作别用时，她于1979年2月12日和13日，连续给儿童艺术剧院去信两封，强调：“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实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指示为儿童服务的“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她批评把儿童艺术剧院改作别用的意见是“大错”，^③勉励工作人员“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④。坚持向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和试验园地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直到她80多岁的高龄，仍然以敏锐的目光，细致的关怀注视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谆谆嘱咐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长征中努力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勤奋学习”，从小就“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将来还要创造发明，开辟科学的新天地”^⑤。特别要求他们为了祖国和人类美好的明天，把“头脑和双手武装起来”^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实践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宋庆龄倡导的科学的教教育方法。

培养教育青少年儿童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这是宋庆龄设计的“缔造未来”的伟大系统工程出发点和核心。她为这个伟大的工程找到了实质性的位置——革命事业的“一个伟大的部分”。这个工程与我们祖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密切联系，而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成败攸关的关键之一。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和人民的解放与幸福奋斗了大半生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为自己“找到了最适当的一个工作岗位”——为祖国的未来，竭尽全力，默默耕耘，继续发挥她的独特

① 宋庆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4日。

② 宋庆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4日。

③ 《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

④ 《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

⑤ 宋庆龄：《孩子们，好啊！》，载《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

⑥ 宋庆龄：《孩子们，好啊！》，载《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

的、优长的作用。在垂暮之年，她仍然以生命的最后的光辉，映照着“缔造未来”的事业，号召全社会“更好地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①。她向孩子们表达美好的祝愿：“愿你们和小树苗一同成长，成长得挺拔、旺盛，经得起任何暴风雨和病虫害的考验，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②而她自己则“想象着葱绿的大地和鲜艳的红领巾将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多姿，更加欣欣向荣”^③，因而无限快慰。

宋庆龄倡导的教育指导思想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及科学教育方法，构成一套完整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在她的“缔造未来”的理论中，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科学性。她希望青少年儿童成长为爱祖国、爱人类、爱和平、充满献身精神、有能力、有高尚情操的服务者，并且指出了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具体内涵也有所不同，但她所提出的原则，在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今天，当“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腐朽思想泛滥，青少年一代成长过程中，面临许多诱惑，宋庆龄的教育理论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教育事业不断踏上新的台阶。当我们重温宋庆龄的教育理论时，深感它不仅关系对青少年儿童的教育，而且成为提高中华民族综合素质的具有指导性的科学教育理论。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这样突出。对“缔造未来”的事业，是否有足够的认识，足够的重视，足够的投入，成为对当代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严峻考验。让我们都以宋庆龄为榜样，用革命者的精神和责任感为“缔造未来”贡献我们的心力。

（原载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庆龄论》，2011年1月修改于北京。）

① 宋庆龄：《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载《工人日报》1981年5月2日。

② 宋庆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载《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期。

③ 宋庆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载《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期。

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包括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孔子的哲学——儒学几乎总是作为官方哲学而处于“独尊”的地位。被宗教化了的儒学，长期起着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但是，反对儒教的文化、政治倾向也常常存在着。在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批判儒教与尊崇儒教的论战，总是随着旧与新、保守与前进的斗争的起伏而展开，蕴含着深广的社会政治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切真正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为争取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往往以批判集封建道统之大成的儒家学说，作为思想理论的前导；每当变革或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或失败，尊孔崇儒的恶浪总是伴随政治上的逆流卷土重来。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民主革命准备阶段重要环节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其发轫阶段，就将矛头指向儒教，斥孔子“教人之书多错”，后又毁孔庙，禁儒教著作。但是他们不可能挣脱封建思想的局面，以致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呈现出复旧的现象。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封建儒教进行了冲击，但“跪着的造反”使他们仍然摆脱不出封建主义的窠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否定以封建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对于封建的法统和道统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虽然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曾掀起尊孔复古的鼓噪，但辛亥革命在政治思想上的民主共和的启蒙作用，直接表现为稍后发生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矛头直捣“孔家店”，空前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传统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其政治上的结果是唤起

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而斗争。五四运动因此具有划时代意义，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也曾有过两次关于儒教的论战。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民主必然是世界的潮流，科学定然战胜迷信。与尊孔崇儒论战的结果，先是促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爆发了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继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宋庆龄在五四运动中坚决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和反封建的斗争，并从中受到激励与鼓舞，促使她的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方向转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宋庆龄，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时候，坚决捍卫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对儒教进行批判，在论战中充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的“清道夫”的光荣角色。

（一）宋庆龄对儒教批判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和他所把持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不断扩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围剿”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为着政治上的需要，于1934年发起以“礼义廉耻”为核心内容的、旨在“提高人民道德水平”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宋美龄是这个运动的实际指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她负责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担任指导长。在“新生活运动”开展一周年的时候，宋美龄撰文纪念，谓“新生活运动的概念，是蒋委员长在剿匪期中所悉心考虑而成的……相信我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就以礼义廉耻四维为基础，创导新生活运动”。具体的做法是“第一步先把那四种原则实施于衣食住行”，换句话说，就是“先实施于生活中最普遍最必需的事项”。^①“我们第一步只是鼓励大众，养成有秩序的习惯，所有居室和环境都保持清洁，然后大家的思想，也就跟着纯洁了”，举凡“吐痰用手巾，出门扣好衣纽等等，大家严格奉行”^②等等，不一而足。概括“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主要有：

^①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②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5页。

(1) 以礼、义、廉、耻作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即要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2) 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纽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3) 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4) 推行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强调军事化，要求人民随时准备“尽忠报国”。

“新生活运动”虽在全国提倡，但当时主要是在“匪区”推行。宋美龄谓“匪乱实是破坏法律、秩序、公正、忠信，以及一切人类美德与国家道义的无上利器。它降低了人民的人格，剥夺了他们的生活乐趣。委员长鉴于这种可悲的现象，决计发起新生活运动。”在第四次“围剿”的大本营南昌，“新生活运动就在江西省会南昌发起。”^①

蒋氏政权极力推行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由此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思想理论上的反动，是因为政治反动的需要。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独裁政权。随着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新军阀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但是，国内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仍不断开战，中国在表面的统一下仍然四分五裂；国民党内也是派系林立、争权夺利，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还在广州建立了公开与南京政权对峙的“国民政府”。另外，蒋介石认为更严重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在广阔的农村向纵深发展，经过短短的几年，相继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豫赣、左右江、琼崖、湘赣、陕北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运动又高涨起来。为了维护和巩固独裁统治，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侵略者步步退让妥协，对内则调集重兵“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内加紧排除异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方面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同时在舆论上鼓吹尊孔复古，以封建道统和法统规范人民的言行，“新生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目的在于企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然而，既要“尊孔复古”，又要以孙中山事业继承者的姿态自诩，那么，除组织御用文人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进行阉割歪曲，把它纳入儒学之中，就别无他法。因此，宋庆龄在20世纪30年代

^①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对儒教的批判便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她要通过
对儒教的剖析，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儒教的本质区别，从而进一步揭去以蒋
介石为代表的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的叛徒们的伪装；另一方面，以孙中山
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号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挽救迫
在眉睫的民族危亡。无论是为捍卫孙中山思想的纯洁性，还是为了救亡，宋庆龄
都不能不参加到批儒的行列中，并把笔锋指向儒教。她在1937年4月，发表了
《儒教与现代中国》的长篇政论，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依据，经过缜密的科学
分析，得出了鲜明的结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主主义范畴，而儒教体现了封建
主义，现代中国不需要儒教，应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指导思想和
理论基础；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进而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二）对孔子及儒学的分析和评价

宋庆龄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以科学的方法论对儒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指出它的“封建的、专制的”本质与属性。

宋庆龄认为儒教的始创者孔子所处的时代，有着鲜明的特征：“封建的诸侯
列国互相猜忌，经常互相斗争，为争夺霸权而战，以致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
系都发生动摇。”^①“广大人民群众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有增无已。他们不仅要作
强迫劳动……还要加上兵役的重担。”因之，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
中国社会里“就存在着阶级斗争”。她确信那是一个“流血、洪水、瘟疫和饥荒
的时期”，不仅“封建诸侯之间发生战乱，农民也起来暴动，封建诸侯则对这些
暴动加以镇压”。^②对于孔子所处时代特征的本质的把握，使宋庆龄获致科学地
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前提。任何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历史的舞台，他们的思想为
实践所制约，然而，他们的思想又能动地对历史进程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庆龄从孔子的复杂言行中分析他的阶级属性，考察他的活动的社会功能，
明确判定维护和强化“封建秩序”是他毕生思想和实践的主流。她确认孔子在那
样的一个动乱时代“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并为“加强这种封建秩序”而
“根据历史的传统创立了他的学说”。在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孔子及其门徒认为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3—104页。

“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得“由贤明的官吏统治”才能保持稳定与安宁。因之儒教以“服从”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核心，主张“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具体说来，“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了“使人民服从”；孔子及其门徒还“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他们特别着力于“替父权辩护”。因为，“在实行儒道的国家中，主权就建筑在家庭中的父权之上；家长制的家庭是封建统治的细胞和下层结构。”^① 儒教“强调家族关系”是合乎逻辑的，完全与自给自足的“古代中国的经济条件相适应”。正是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时“社会被划分成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地主，与被统治阶级——农民，在两者之间的是士大夫。”^② 宋庆龄指出《礼记》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记载，足以证明当时的阶级的对立。在这种剖析的基础上，宋庆龄对儒教的实质作出明确的界定：“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③

宋庆龄对儒教的评价，严格地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她从特定的历史范畴出发，确认孔子在封建社会的动荡时期，是一个“改良家”，他在他的时代，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而“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④，对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自应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孔子的学说不断因人为而变化，“已经堕落成为纯粹的繁文缛节”^⑤，它已“完全失去了实际价值”。因之，在批判儒教的基本内容和揭露利用儒教的当今反动统治者的伎俩时，应当承认“很有理性”的、“鄙视迷信”的孔子“只会活在我们的史书中。并且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上所起的一定作用而占了很多重要的篇幅。”^⑥

（三）揭露“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崇儒的居心

在判定了儒教的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宋庆龄指证了鼓吹尊崇儒教的蒋石政权封建专制的性质，揭露了这个政权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对“新生活运动”进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呼吁全国人民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团结救亡，为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儒教与现代中国》的篇题，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儒教的考察主要是以现代中国为立足点。她对儒教的批判，既从中国的历史存在出发，又服务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既然已经判明儒教的社会阶级属性是“封建主义的哲学”，所以“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之道”。^①由此，宋庆龄便从哲学意义上确认了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性质和他们鼓吹尊孔的要害。由于孔子的学说“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所以“孔子是保守的”。他的思想具有严重的消极作用：“束缚了学者们的智能，限制了学问的范围，并且使大众陷于愚昧……阻碍了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发展。”^②在政治上，孔子“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因而“他与革命毫不相干”。^③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儒学的复活”，并且要引入“新生活”，这是十分明显的“堕落”。对于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中国，“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④一部中国近代历史，足以证明。在五四运动之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内涵。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即所谓学校、新学、西学等等，“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⑤。资产阶级——无论是维新派或者是革命派，为了实现近代化，必须以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首先必须批判旧文化的核心——儒教。这是因为“儒教的思想意识所统治的时期，比其他哲学体系都更长久……它深深地渗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⑥，新文化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尽最大的力量”把儒教“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的每一个角落根除出去”^⑦而得以实现。批判儒教是为了变革和发展，尊孔崇儒的目的在于守旧和复辟，这就是新旧文化斗争的关键和要害，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6页。

⑤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⑦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思想、文化论战后面掩盖着尖锐的政治内容。只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斗争软弱无力，未能给儒教以致命的打击，甚至孙中山在前期活动中也“没有提出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以致“上阵打几个回合”，很快“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的同盟所打退了”。^① 战斗未有穷期，反对封建儒教的任务依然繁重。五四运动以后，新旧文化的斗争因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相适应而深化和拓展。五四运动时期“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②。“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直上云霄，儒教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尽管批判难免有偏颇之处，但启蒙意义是巨大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场文化革命继续发展，以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为主要阵地，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大革命的巨流推波助澜，社会思想领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然而，北伐战争遭到腰斩，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起来，于是沉渣再次泛起。以“新生活运动”为载体的儒教，重又被抬高到吓人的地步。1934年，蒋介石在“围剿”工农红军的南昌行营中提出“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宣称此乃“目前救国建国复兴民族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革命运动”，^③ 它的根本任务为“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使人们“作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能作一个守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作一个守礼法的君子”。^④

对于冠之以“新生活”之名的“运动”，宋庆龄是深刻洞察其险恶居心的。认为它不过是打着“安定社会”的幌子，掩盖其独裁统治的本质而已。正如当年鲁迅所指出：那些权势者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⑤。宋庆龄首先剖析了“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儒学，指出它是以“服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93页。

③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转引自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④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转引自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⑤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为核心的一套封建思想和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①，而这正是蒋介石政权所需要的理论，是他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的依据。“良民”、“肖子”、“规矩的学生”，无不体现着“服从”的要求。这种“彻头彻尾的封建的、专制的”理论钳制了人们的智慧和妨害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在急剧的变化，改造以及重建”，新的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意识、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关系”。当“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大变化、带来了种种问题”急需解决的时候，儒教却因“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而丝毫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之，儒教绝不适用于现代中国，只有那些头脑反动的人，才要想法恢复它”^②。其次，宋庆龄特别指出：“孔子强调对家族的义务，而很少提到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义务。”^③这在以封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尚且可以理解。当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经历了两千余年而进入近代，而且国家面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危机，继续鼓吹不以国家民族为念的儒教，无疑是为妥协投降寻找理论根据。正是“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④。儒教也就成为了蒋介石“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的遮盖布。宋庆龄指出，当今应该大张民族主义精神——“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⑤。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宋庆龄向国人昭示：“在‘新生活活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⑥从而揭露了“新生活运动”的策划者的恶毒用心——借“新生活运动”之“尸”还儒教之“魂”，瓦解革命思潮，消弭革命运动，以期达到维护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目的。

（四）驳斥把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与儒教混为一谈的谬论

针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叛徒们对孙中山思想的歪曲与篡改，以及他们居心叵测地将孙中山的学说归入儒学体系，宋庆龄在批判儒教的过程中，驳斥了把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④ 鲁迅：《算账》，引自鲁迅：《花边文学》。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8页。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与儒教混为一谈的谬论，指出孙中山思想的本质是民主，孔子的学说的本质是专制，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髓，并且揭去了那些叛徒们的伪装。

以蒋介石为首的叛徒们腰斩了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建立起新军阀的统治以后，为了巩固封建买办性的反动政权，只能向中世纪的官方哲学求助，乞灵于封建儒学。但是，这种开倒车的伎俩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毕竟过于露骨。而孙中山的旗帜因其革命民主主义的本质及不断进取的精神，在他逝世后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使他的叛徒们不得不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他的事业的继承者，采取把孙中山的思想儒学化的卑劣手段兜售儒教。以戴季陶为代表的蒋介石政权的“理论权威”们在孙中山刚刚逝世，就开始“怀着别样的目的”而把他儒家化。他们别有用心地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是“道统直承孔子”，把他争取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称作“祖述尧舜，弘扬周孔”。在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竟然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把孙中山打扮成儒家的门徒。伟大的人物身后的这种悲剧性遭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因为“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①。

然而，孙中山的思想与儒家学说风马牛不相及。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过程和本质来考察，孙中山的理论是在对儒学的离异、否定和批判中形成的。孙中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欧洲式的教育”，沐浴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潮，服膺于进化论，赞颂法国十八世纪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尊崇自由、平等、博爱准则，并力图效法林肯，创造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国家。孙中山正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锻造了自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精髓，即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孙中山自己曾多次明确表示：“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②“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③当然他也同时表示过自己“所持主义”的形成，“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④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中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国的传统思想并非没有可以继承的优秀部分，但是中国的社会土壤——无论是在中世纪时期或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不可能产生具有正规完整形态的民主主义。孙中山确是在不少的情况下援引过孔孟的语言，这种情形在他的晚年更多，对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加以肯定，甚至说过“复三代之规”。但是，这种现象并非意味着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盘地从离异到回归，因为思想的时代精神与传统形式不是绝对排斥的。孙中山绝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孔孟的思想，实际上是借用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古老的观念表达另外一种新的思想。事实上，这是对儒家思想优秀部分加以传承并革新，赋予民主主义的含义。例如，他认为共和制度是“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甚至断言：“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所谓大同也。”^①对于“固有道德”——“主要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给以新解：“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②当然，这正好说明孙中山对于传统文化并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也多少反映了孙中山在他活动的后期对西方政治文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正如宋庆龄所理解那样，孙中山是以坚定的反封建斗士的姿态踏上了革命道路的，在他活动的后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为激进。他坚决批判封建主义的道统和法统，对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始终保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以千年专制之毒而未解”：一方面，“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另一方面，“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③。因之，他以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儒家政治学说，认为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陈腐过时，因为人们“已经成长”，“已将治人与治于人底阶级打破”。他以欧洲为例，指出“已将皇帝治人底阶级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较底自由。”^④而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不能为“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认为这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成因在于“特殊阶级的人，过去暴虐无道”。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无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他赞颂“主权在民”的原则，并倡导经过“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纯粹之民国”。十分清楚，孙中山是封建道统和法统的坚决反对者。

①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2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不仅对封建纲常之首——君权，大加挞伐，而且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还在青年时期，他对儒家经典就表示了怀疑和否定：“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意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① 他批驳了所谓“阳明之学”推进“日本之维新”的论点，指出二者“实风马牛不相及”。孙中山的思想及其全部实践都足以证明，他是反对儒教的斗士。

宋庆龄与孙中山一样，有着从少年时代就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教育的经历，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熏陶，对孙中山的思想理解得最为真切。因之，她曾经对朋友谈及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在孙中山的晚年，她亲眼看到并与他共同感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又一起从西方无产阶级及其导师处汲取思想精神的营养，并深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大飞跃，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所有这些，都与儒家学说“毫不相干”。宋庆龄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将儒教与新三民主义作了比较，特别从最能反映学说的社会本质的政治思想方面去对照，指出孔子和他的门徒们宣称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必须由贤明的官吏统治；又鼓吹“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了加强封建集权，“孔子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②。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恰恰与封建集权相反，他要求实行“民权主义”，企望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在他活动的后期，他的共和国理想发展至认为国家应“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高度，并对“人民独裁”颇感兴趣。他反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宋庆龄特别推崇孙中山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她说“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③ 她还引用孙中山的话，表达孙中山对广大人民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孙中山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的组织不能改良，道德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级战争和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压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迫，都要发生，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① 不管孙中山对社会病根的分析是否完全符合科学，但是他的“民本”思想与孔子主张的封建等级制度截然相反。经过比较，宋庆龄的结论是：“正如孔子的儒教代表着专制、压迫和人民痛苦，孙中山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② 宋庆龄指出那些自诩为孙中山的信徒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与孙中山的思想背道而驰，他们进行“十年反共战争……忘记了抵抗日本侵略，保卫祖国”；他们压迫工农，拒绝工农参政，反对实行“普选”，召开只有“国民党官吏和官僚参加”的“国民会议”，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在“国民党当政的这些年中，我们还没有做过任何事来改善群众的生活。农民生活贫困；许多省份在内战中受到重大灾害”。^③ 一句话，国民党的当权者，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他们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他们鼓吹恢复儒教，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建立的“封建的、专制的”制度而已。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宋庆龄指出：这种“封建主义的哲学”根本区别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有悖于中国的现实，从而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髓，戳穿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叛徒们的阴谋。

宋庆龄反对把孙中山儒家化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当时的人民斗争事业有着密切关系，恢复孙中山理论的真实面目，使其成为团聚各阶级与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旗帜，是当时正在进行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对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

（原载《宋庆龄论》，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版；2011年9月修改于北京）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110页。

宋庆龄与基督教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较早便传入中国。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亦有相当部分受到这种舶来宗教的影响。孙中山在少年时代就受过洗礼，而宋庆龄亦复如此。在他们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基督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精神，成为他们民主主义思想的元素之一。

(一)

宋庆龄的青少年时代，较为深切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她的母亲倪珪珍的先祖徐光启，是著名的天主教徒，他在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研讨教义的同时，亦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他陆续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给国人。至于他的宗教信仰，显然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即借以“补儒易佛”而“教化风俗”。徐光启的后人几乎每代都有男性充当传教士，有一些成员则改信了基督教。

宋庆龄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宋耀如少年时代即随亲戚赴美国，14岁受洗于北卡罗莱纳州卫理公会，后入美国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一年后转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继续研修神学直至毕业。1886年，他回到上海继续从事传教活动，两年后成为正式牧师。母亲就读于上海美国圣公会开办的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后曾任教于教会学校，毕生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

宋庆龄受教育的过程也与宗教有关。少年时代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宗教课程及活动占有一定比例。她的大学生活是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私人性质学院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度过的。因之，她的思想与活动在一定阶段带有明显的宗教印记。博爱精神——在宋庆龄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然而，宋庆龄的家庭并非纯粹的宗教家庭。在宋庆龄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已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母亲亦承担了秘密任务。曾受到善良的美国人民关怀、爱护和帮助而深信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宋耀如，在神学院毕业后，即初尝种族歧视的苦果。神学院及其所属教会的领导人拒绝他继续留美学医（他希望在传教时也能劳苦民众治病）的要求，令他马上返国。他在上海传教时，这种歧视变得更为赤裸裸，以致这位有美国学位的神学院留学毕业生，只能在农村赤脚巡回布道；所得工资大大低于一般外国神职人员，绝对不足以维持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他的许多合理要求——如短期回乡探望多年未见的父母等，仅仅因为他的黄皮肤而被他的上司——美国卫理公会在上海的负责人林乐知——通通拒绝，他不得不同时开办实业以维持生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教义中描绘的美好天国的向往，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祖国的残酷现实的矛盾，使他不得不思考探索通向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真正途径。在此前后，他结识了正在为反对外国侵略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的孙中山。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很快成为挚友和同志。宋耀如的印刷所在印制圣经的同时，也印刷反清的革命传单。他的居所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地点。在创建和捍卫中国共和制度的斗争中，宋耀如长期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信任，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隐君子”。与孙中山一样，在宋耀如的思想中，平等与博爱成为基督教义与社会变革观念的交融点。

（二）

宋庆龄深受父亲的影响，使她深信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正义性。当宋庆龄留学美国，浸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后，她更坚信孙中山是使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的祖国通向平等、博爱的彼岸的导师。因之，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国并建立了共和制的时候，她欢呼这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宋庆龄天真地以为共和制度的建立即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已获得了自由和平等，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促使博爱得以实现。她企望着自己祖国的人民彼此以兄弟相待，因为，“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她认为“博爱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而“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身上。”^① 此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时，宋庆龄更多的是接纳基督教义中有关伦理道德的原则以及博爱的思想，而对于教义中其他部分繁琐的宗教仪式确是比较淡漠的。她曾向孙中山述及在美国学习时的一些情况：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①。可见她对宗教并不迷信，只是作为自己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宋庆龄愈益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她不得不进行新的思索并作出相应的选择。她给自己一直尊奉的基督教教义所提倡的献身精神，赋予了时代和社会的内涵，不再仅仅认为留学生只应在教育及扫除社会陋习方面为国家尽力，明确认识到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为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而战斗。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为大地主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攫夺，孙中山再次成为流亡者而在国外惨淡经营，但宋庆龄仍然深信只有孙中山才能拯救中国。基督教义中提倡的平等与博爱，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宋庆龄对于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甚为理解——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②

(三)

在宋庆龄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基督教无疑对她有过较深的影响，甚至在她晚年，她仍然十分坦率地剖析自己说：“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但是在她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道理，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后，她的宗教观念不断淡化，科学与民主成为她思想的主流。与此同时，她对于宗教的消极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她曾不止一次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宗教的伪善：“因为我不去教堂，传教士认为我不是基督教徒了。但是，他们说（蒋）委员长是基督教徒。”而恰恰“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蒋介石“应对所有的屠杀事件负责。……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③。她指出在标榜自由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教徒。”由此，可以看到宋庆龄从一个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中对于宗教的认识演变

① 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②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③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的轨迹。正如她的挚友爱泼斯坦所分析：“宋庆龄是个无神论者。……不能说基督教的思想对她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至少在二十岁以后，她不信基督教了。”^①当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奋进不已，不断自我超越，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以后，合乎逻辑地将原来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奉献等原则，加以吸收改造和拓展，赋予新的社会涵义，使其成为谋求中国民族独立、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为全人类求解放的国际主义精神。

(四)

宋庆龄对于宗教的认识过程，与孙中山有着十分相似之处。

年青的孙中山在香港拔萃书室读书时，曾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持受过洗礼，皈依基督教。后来，他在革命过程中愈来愈感到“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因（此）不安于心”。结果，“大倾向于进化论”。^②他后来绝少参加宗教活动，他的战友们几乎“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但他在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锻造自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的时候，却吸收了基督教教义中提倡的平等、博爱的精神。特别是在他的民权及民生主义中，博爱精神尤为明显。他认为博爱精神应理解成“为公爱而非私爱”，因而应加以推崇而造就真正的平等、自由。基督教义已经被他“非神化”并赋予民主主义的内涵。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与宗教的关系上竟如此相似，其实并不奇怪。当中国的革命者们决心起来推翻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候，他们必定要从外部吸收一切新鲜思想和理论，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爱国者、革命者们所掌握以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以及基督教的博爱等思想理论，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和口号。这种情况恰恰从一个角度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与多姿多彩，并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律。

（原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① 《爱泼斯坦的证言》。见《关于宋庆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载《辛亥革命研究》（日文版）第4号。

^② 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载《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宋庆龄关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实践

迄今尚未见到宋庆龄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直接论述，但宋庆龄毕生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为人民的自由、平等、富足，为世界和平而奔走呼号，则是她在为祖国乃至全世界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实践。也是她一生的最主要的实践。

“博爱”是宋庆龄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博爱”这一宋庆龄从小就笃信和追求的理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宋庆龄世界观的转变，宗教色彩越来越退色而被赋予越来越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乃至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她的“博爱”理念不断与时俱进，思想愈深厚，内容愈丰富，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合乎时代的需要，体现了她对广大人民的大爱、真爱。

保卫民族独立，反对独裁专制、争取政治民主和改善民生，是宋庆龄为实现“博爱”始终奋斗不息的主要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的专制统治，是实现“博爱”的最大障碍。因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是实现“博爱”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完善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改善民生，是宋庆龄“博爱”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实践。

毕生对于劳苦大众、妇女儿童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关注和帮助是宋庆龄“博爱”思想的又一体现，是宋庆龄为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一）“博爱”是宋庆龄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

“博爱”是宋庆龄从小就笃信和一生追求的理想，是她的人生观。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宋庆龄世界观的转变，她对“博爱”的理解，思想愈深厚，内涵愈丰富，世界观愈趋向科学。

1912年4月，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留学的宋庆龄在校刊上发表了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文，欢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祖国，建立了体现近代政治文明的共和制度。在论及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她说，“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在宋庆龄看来，辛亥革命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因为“推翻满清政府就是铲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革命使“在暴君统治下不可能完成的种种改革”得以完成并“取得了光辉成果”，同时许多伟大的改革“还在进行中”。更重要的是“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篇政论中，宋庆龄第一次正式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社会与伦理道德的理念——“博爱”。她称：“博爱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因此二十世纪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实现这个理想。”^①

宋庆龄写这篇论文时刚19岁，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已在美国留学近六年，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她认为仅仅只有政治上自由平等的社会并不是完美的社会——年轻的留学生政治上还相当幼稚，相信“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她认为美好的社会必须是全人类充满博爱精神的世界大家庭。宋庆龄认为虽然辛亥革命为中国建成美好和谐社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只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她引用美国科尔盖特大学的教务长克劳萧教授的观点并加以论述，称：“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人类社会“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②。宋庆龄断言二十世纪是人类为实现博爱而奋斗的世纪。

宋庆龄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页。

她指出“中国是首先创建了刑法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作出过某些最宝贵的贡献，她的浩瀚的文献赢得了学识渊博的、终身从事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的赞赏，她的社会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几乎是任何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这些品质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个别事件中，而是全民族的特征。’”因此，她深信“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的祖国“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①对人类充满义务感的宋庆龄深感自己和自己的祖国肩负着在全世界建成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好大家庭的崇高责任——“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他方面起作用。”“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出来。它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②在这篇论文中，宋庆龄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①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②自由、平等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③博爱是自由平等的基础，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④二十世纪的奋斗的目标，是在全人类实现博爱；⑤中国是世界建成和谐美好的博爱大家庭的巨大动力；⑥在如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为建成博爱社会，革命是合理的，是“造福人间的喜事”。

平等、博爱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教义中的基本精神之一。宋庆龄的青少年时代较为深切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她出生于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先祖徐光启是著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在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研讨教义的同时，亦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他陆续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给国人。他的后人几乎每代都有男性充当传教士，有一些成员则改信了基督教。宋庆龄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宋耀如少年时代随亲戚赴美国，14岁受洗于北卡罗莱纳州卫理公会，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后回国传教。母亲就读于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的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后曾任教于教会学校。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氛。父母经常要求孩子们以宗教戒律自省，教育她们要按“主”的旨意“行善、敬人”。宋庆龄受教育的过程也与基督教相关：少年时代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这是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收费女子学校，宗教课程及活动占有相当比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例。她的大学生活是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隶属于联合卫理公会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度过的。因之，宋庆龄的思想与活动在一定阶段带有明显的宗教印记。但宋庆龄更多的是接纳基督教义中有关社会伦理道德的原则以及平等、博爱思想，而对于教义中其他部分及繁琐的宗教仪式则比较淡漠。还在作为留学生时即已如此。她曾向孙中山述及在美国学习时的一些情况：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①。这客观地反映了宋庆龄年轻时对宗教的态度。博爱精神在宋庆龄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无疑曾起过重要作用，甚至对她终生都有影响。她在晚年，曾十分坦率地剖析自己：“在我的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②她对宗教并不迷信，只是作为自己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宋庆龄逐渐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建设一个人们“彼此以兄弟相待”的、“真正的平等”的、博爱和谐的祖国乃至世界，成为宋庆龄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当然，宋庆龄的家庭并非纯粹的宗教家庭。在宋庆龄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已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母亲也承担了秘密任务。受父亲的影响，宋庆龄深信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正义性。当她留学美国，浸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后，更坚信孙中山是使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的祖国通向平等、博爱的彼岸的导师。所以，在大学毕业后，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宋庆龄合乎情理地很快就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当时，宋庆龄对于作为革命领袖和又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是这样理解的：认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说来，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③。当宋庆龄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后，她思想中的宗教观念愈益淡化，而且对于宗教的消极作用有了愈益深刻的认识，科学与民主成为她思想的主流。当她在革命潮流中奋进不已，不断自我超越，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合乎逻辑地将原来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奉献等原则，加以吸取、改造和拓展，赋予新的社会涵义，使其成为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彻底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为全人类求解放的国际主义精神。

① 爱泼斯坦：《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②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③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二）捍卫民族独立、争取政治民主、促进改善民生、保卫世界和平是宋庆龄“博爱”的主要实践

捍卫民族独立；反对独裁专制、争取政治民主；推动生产发展、促进改善民生，是宋庆龄为实现社会“博爱”而始终奋斗不息的主要实践。保卫世界和平，则是宋庆龄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博爱”的重要实践。

不言而喻，在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的专制统治，是实现“博爱”的最大障碍。因之，宋庆龄致力于反侵略、反专制的斗争，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奋力扫除障碍，始终站在指导历史潮流的前列；新中国成立后，完善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改善民生，成为建设和谐、博爱社会的主要内容。宋庆龄是这伟大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并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设友谊桥梁，为在全世界铲除剥削制度，实现世界和平，使人类“彼此以兄弟相待”而共同奋斗，是宋庆龄在更高层次上为实现社会“博爱”的另一重要实践。

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人类博爱？宋庆龄的思想有着一个符合科学认识论规律的发展过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曾使宋庆龄对人们“彼此以兄弟相待”、“人人助我、我助人人”和谐博爱的社会前景，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她天真地认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通向博爱的道路已经打通；共和制度为以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开辟了前景，人们应该努力为国家服务，特别是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更应“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回国后“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①，至于世界上战争已被消灭，“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而“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②。

然而，宋庆龄善良的愿望很快就被严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辛亥革命犹如昙花一现，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扼杀，斗争的果实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攫夺，旧秩序在新形势下恢复，民国徒具虚名。国内已毫无自由平等可

^①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里安》1911年11月号。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言，更遑论博爱了。独裁者以屠刀对付革命者及不同政见者，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和他的不少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迫于形势，满怀报国抱负的宋庆龄也未能从大洋彼岸回到睽别六载的祖国。她径直去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在父亲的指引下，追随孙中山踏上了革命道路，为捍卫她所无限珍视的共和制度而斗争。不久即成为孙中山的学生、助手、战友和伴侣。宋庆龄的这种选择是必然的：在她的学生时代，在期待祖国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在中国“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即已认识到革命有时是通向自由平等博爱的必要手段。

在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里，失败大于胜利，顿挫多于顺畅，宋庆龄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和磨砺。为了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维护共和制度，她与孙中山曾经流亡异国、开府广州和寓居沪滨租界，颠沛流离，备尝艰苦。但是，终于回天乏术。而宋庆龄却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饱经挫折，在孙中山的教导下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由先前歌颂辛亥革命的留学生，转变成为以革命手段捍卫共和制度的无畏战士，并且与孙中山一起，随着历史潮流与时俱进。

孙中山逝世后，他昔日的“学生”和“战友”背叛了他的思想与事业。虽然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希望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叛徒用屠刀对付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大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建立的仍然是封建独裁的专制统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反思和艰苦的探索，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认识到辛亥革命的目的并未达到，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①。她坚信要实现孙中山的理想，“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②。革命的目标是“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宋庆龄终于认识到，只有以革命的武力对付敌人的屠刀，才能使自己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到达真正的自由平等、和谐博爱的幸福彼岸。于是，她把目光投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寄希望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这时，她进一步认识到，工农“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①。她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的奋起，视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认为“全国工农参加革命”才能使“革命具有生命力”。宋庆龄此时已经坚信革命必胜——断言“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②从此，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旗帜，率领广大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各阶层爱国人士，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她的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尊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凝聚了广泛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她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的斗争，争取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在此期间，她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打击，身心遭到摧残，甚至生命危险。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更使她感到痛楚和困惑。然而，疾风知劲草，“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③。

当日本军国主义将侵略的战火燃向中国大地，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剧变的形势，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④。她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为实现全民抗战而努力。为此，她号召以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为基础，团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③ 廖承志：《我的回忆之二》，载《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④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6页。

结御侮。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和妥协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宋庆龄同时清楚地认识民族独立解放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和阶级解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她指出“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动员全民抗战，才能实现全民抗战。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不断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作斗争；呼吁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要求实现人民真正的自由平等，以便“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①。抗战时期的民权、民生的主要内容包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发言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结社与集会自由，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② 她强调：“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③ 在八年抗战中，宋庆龄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斗争的同时，密切结合革命的总目标——建立真正的自由平等、和谐博爱的社会——为促其早日实现而奋斗。

她还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以及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中国不仅是为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反侵略斗争积极争取各国及各方面的援助。她努力在中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架设相互支持的桥梁，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

宋庆龄此时期的言行，表明她的博爱思想达到了一个科学的新高度。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饱受战乱苦难的广大人民群众热望国内实现和平统一，重建家园。宋庆龄坚决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她一方面不断警醒国人注意在消灭外来敌人以后，“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坚决表示“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④ 另一方面绝不放弃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任何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416页。

努力。她在1946年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中，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刻结束“训政”，呼吁：“宪政时期必须开始……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要求在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的同时，同时改善民生——“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宋庆龄强调指出，“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①。宋庆龄的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这个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推动了国内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的高涨。从抗战胜利到内战战火重燃，时间不到一年时间，这时期宋庆龄的所有努力，都表现了她对建立和谐社会的不倦追求。

当蒋介石决心将中国人民投入内战血海的时候，宋庆龄亦以全部的热情和力量，投入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经历了三年的奋战，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宋庆龄在推动祖国向自由平等、博爱和谐的社会迈进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宋庆龄始终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所以全世界人民必须携起手来，为这个理想的实现共同奋斗。还在1924年12月，她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讲演时——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发表演说——即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宋庆龄自己为了这个理想得以早日实现，披荆斩棘，不倦奋斗，以扫除人类通向幸福彼岸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为己任。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与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宋庆龄毕生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人类进步正义事业的前列。新中国建立以后，她作为国家重要的领导者，在这一神圣事业中，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恫吓，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418页。

名誉主席和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的宋庆龄根据我国外交的总方针，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她参与策划和发起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的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她多次参与组织和主持在我国召开的区域性和洲际的和平会议；她也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多次担任大会主席。她通过各种可行的渠道和有效的手段，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传达至全世界。她代表新中国庄严地号召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让“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和平的基础上共处和竞赛”。

宋庆龄始终认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她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为铲除殖民主义，谋求独立解放的事业，为他们的任何进步与成就欢呼。一切受到迫害或遇到困难进步人士，不管他们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得到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宋庆龄的支持。例如，1950年12月，日本发生了吉田内阁陷害日本共产党和打击进步工人的“松川事件”，宋庆龄立即致函日本劳农救援会，对被捕和被迫害的工人给予声援，并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指示救济总会对“松川事件”受害者的家属给予物质上的援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在外国朋友中传颂：上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得知曾在抗日战争中支援过中国人民的美籍日本友人吉幸治受到美国反动的“麦卡锡法案”迫害，被捕入狱。她马上伸出救援之手，甚至向有吉的家属捐出自己与孙中山结婚时母亲赠送的锦缎绣花衣裙，供其变卖以筹措营救之资。当时，不少受到“麦卡锡法案”迫害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曾得到宋庆龄的包括道义和物质上的多方援助，事例不胜枚举。她用自己的行动，真切地表达了她对人类社会的期望——人们应“彼此以兄弟相待”，美好的世界应该充满“兄弟情谊”。

为了睦邻友好，60多岁的宋庆龄多次出访欧亚各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的许多邻国，几乎都与中国一样，曾经有过被帝国主义宰割和奴役的不幸的遭遇，也有着反抗殖民主义的共同经历，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曾给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以鼓舞和借鉴，许多邻国的领导人熟悉孙中山，而且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的出访既探访了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在给各国人民送去中国人民的友谊的同时，充分表达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进步力量必须携手合作互相支持的理念和愿望。

宋庆龄始终坚持并贯彻这样的信念：“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

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此，她毕生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设友谊的桥梁，她同时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与崇敬，被视为中国人民良知的化身，被被誉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平友好的代言人”^①。这就是毕生为建设和谐的世界大家庭的宋庆龄。

（三）关注弱势群体，给予实际帮助

对于劳苦大众、妇女儿童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关注和帮助是宋庆龄“博爱”思想的又一体现，是宋庆龄为实现和谐社会而奋斗的重要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宋庆龄反对专制制度，为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斗争的重要武器，她认为民族、民权、民生是不可分割的，并总是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而战之时，适时地提出实现民生主义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她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充实以时代的内涵，并身体力行，进行实践。

如前所述，宋庆龄毕生致力于“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事业。年轻时代的宋庆龄对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劳苦大众充满人道主义的悲悯之情。在她走上革命道路以后，经历了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在血与火中不断受到锤炼，思想很快升华到科学的高度。认识到“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工人推进和维持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民生产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② 所以广大的工农群众“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进而更确信工农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因之，她坚决而有效地支持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要求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切实解决土地问题，是她对中国最大部分人口——农民的最大关爱。并且她还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和时期，适时地提出改善民生的要求和具体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

① 《宋庆龄来往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量的国务活动，但她仍然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教育工作——这是她的博爱精神的又一重要体现。

在旧中国，妇女受着阶级的压迫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在新中国，妇女虽然已经获得了阶级的解放，但还要砸碎套在她们思想上的封建枷锁，妇女才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宋庆龄强调打碎束缚妇女的封建枷锁是全社会的责任，她一方面坚持对全社会进行关于解放妇女的教育，同时不断推动和主持各种解放妇女及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法令、措施的制订，并亲自督促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包括：（1）必须继续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2）必须提供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施，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3）必须加紧扫盲工作，并多设训练机构，使妇女能够自由选择职业；（4）必须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和加强她们的组织联系，保证她们尽量地积极地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等等。为了使在生产第一线的妇女减少后顾之忧，宋庆龄不断呼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直至宋庆龄的晚年，她仍然谆谆教导广大妇女，祖国“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表现了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不息的热情”。

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成长，是宋庆龄一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她的晚年，当她将要渡过她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的时候，曾无限深情地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她把儿童视为“人类的至宝”，为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她要求人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缔造未来”是宋庆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主导思想；把青少年儿童培养成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祖国和世界充满义务感和献身精神、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有健康体魄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即培养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新一代，是宋庆龄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学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是宋庆龄倡导的科学教育方法。宋庆龄关于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理论和在实践中的示范，现在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宋庆龄马上适时地将“缔造未来”的伟大工程纳入议事日程，为它的大规模开展在短期间内做好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当务之急，是把广大的劳动妇女和儿童从贫病交加的惨况中解救出来，将大批流浪儿童作妥善安置，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这方面进行了十分有效的工作。

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宋庆龄及时指示中国福利会（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50年更名中国福利会）将包括儿童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必须要“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① 儿童工作的重点逐渐移到“儿童保健、儿童教育、儿童戏剧、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和儿童读物的出版方面”，积极开展“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② 她自己首先在这方面作出表率，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建立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等等，为儿童的培养教育提供科学的示范。同时，宋庆龄极为重视建设一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及少年儿童工作者队伍，她指示要建立更多、更好地培养各级教师的学校和训练班，并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和保证。

培养教育青少年儿童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是宋庆龄设计的“缔造未来”的伟大系统工程出发点和核心。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和人民的解放与幸福奋斗了大半生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给祖国的未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竭尽全力，默默耕耘。在她的垂暮之年，她仍然以她的生命的最后光辉，映照着“缔造未来”的事业。

宋庆龄在妇女解放和少年儿童培养教育方面的贡献，体现了她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奋斗。

建立博爱和谐的社会，是宋庆龄毕生的理想和追求；而宋庆龄自己，正是为实现这个理想而不倦奋斗的无畏战士。

①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②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40页。

辛亥革命的“隐君子”，捍卫共和的勇斗士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宋耀如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为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一生的忠诚战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历史功绩愈来愈为人们所肯定和称颂。

（一）革命的隐君子

革命的“隐君子”，是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赞誉，也是对宋耀如为革命所作贡献和他高尚人格的如实反映。现在看到的材料中，记载宋耀如参加辛亥革命的材料并不多，但已足够说明他是这伟大事业中的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

诚如宋庆龄早年所说：“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①。宋耀如在孙中山的“革命言论时代”——1887年至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期间前后，就认识了孙中山，赞同他关于推翻封建腐朽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思考和言论。孙中山在1912年4月17日致友人李晓生的信中曾谓：“宋君嘉树（宋耀如——作者注）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他无限感慨当年三人立志为改造中国，使祖国臻于独立、民主、富强而“屡作终夕谈之事”。^②他们的思想极为契合。1892年宋耀如辞去了所有教会职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追随、协助孙中山宣传革命，应该也是原因之

^①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17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2页。

一。虽然退出了布道团，但宋耀如一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热心教会事务。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生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但他已经把1880年皈依基督教时立下的人生信念：“行善、敬人、赞美上帝；为别人做好事，将他们从永恒的惩罚中拯救出来。”与挽救民族危亡和帮助人民挣脱封建枷锁的事业结合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因而使基督的博爱精神得到充实和延伸。

当孙中山因上书清朝权臣李鸿章要求改革失败，转而开展以武装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战争事业”的时候，正是宋耀如审时度势后，致函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并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孙中山，促使他回国起事，始有乙未广州起义之举。二十多年后，孙中山对此“战争事业”的第一役仍有深沉痛切的回忆：“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予则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①

广州起义失败后，宋耀如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在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宣传鼓动的时候，他为教会印刷圣经的印刷所，同时为革命团体兴中会和以后成立的革命党同盟会印刷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和传单。对于这段时间的情形，宋庆龄后来仍有记忆：“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从事革命。”^②

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侵略我国，在上海爱国者发动的拒俄运动中，宋耀如在教会的拒俄集会上慷慨陈词：“大旨谓耶教救国有自由之权，今俄人夺我之地，我欲自保，并非夺人之地也。教友能结团体，如日方新，有蒸蒸日上之势云云。”^③据说他还带上几个稍大的孩子蔼龄、庆龄、子文等一起赴会，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①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230页。

②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③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耀如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革命党人（也有研究者认为宋耀如早年就参加了兴中会）。旋赴美国为革命筹款。他特别访问了自己在美国读书时的长期资助者“卡尔父亲”，请求他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的事业——中国的革命事业，并取得成果。此后，他多次往返于日本、美国和中国之间，继续为革命筹集经费。他被同盟会任命为司库——实即主要为组织武装起义而筹款，同时兼任孙中山在上海党部的执行秘书，负责孙中山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与具体安排。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清廷通缉的孙中山在海外奔波策划，又先后亲自发动了九次武装起义，国内同志在宣传、筹款、联络、策反、组织等多方面策应，上海常是孙中山秘密回国策划的落脚点，有时会住在宋家。

1906年，13省留日学生为抵制日本迫害中国留学生的“取缔规则”而集体归国，后在上海吴淞创办了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一个活动据点，校内革命党人为数众多，宋耀如亦是该校教员之一。

被许多人称为孙中山“最大的财务支持者”的宋耀如，目前记载他的革命活动的史料还不多见，但孙中山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①可见他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实际工作。一方面由于在国内进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不得不十分秘密行事；另一方面是宋耀如具有默默奋斗、甘于奉献、不事张扬的高尚品格，所以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隐君子”。然而从上面所引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耀如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最早的战友，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并且是从开始就投入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名副其实的战士。

（二）捍卫共和的勇斗士

当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孙中山从海外返回阔别16年的祖国时，“隐君子”宋耀如也得以公开他的“身份”——孙中山的挚友、参加辛亥革命的战士。“隐君子”浮出了水面。

民国建立不久，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迫于形势，不得不让位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2页。

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彼时，他天真地认为民族、民权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是致力于民生主义、建设富强的祖国的时候了。孙中山特别着重于铁路建设事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孙中山曾寄居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宅，宋耀如“帮助孙先生从事财物工作和负责英文信件的答复等等”。^①他不仅积极参与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担任孙中山创办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会计，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铁路计划，陪同孙中山赴日本等地视察，还介绍长女宋蔼龄任孙中山的秘书，随侍左右。孙中山为了发展实业和推进革命需要筹款，创办了“中国兴业公司”，宋耀如则执掌兴业公司的所有簿据，在财务上对孙中山鼎力支持。

然而，袁世凯暗杀革命元勋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立即率领宋耀如等返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坚决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二次革命”。宋耀如是孙中山的坚决的支持者之一，他和蔼龄父女两人不顾危险，协助孙中山工作。

不久，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在意见分歧中进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宋耀如都因受到通缉而被迫流亡。在1913年8月孙中山走避日本之前，宋耀如举家先期到达日本，为孙中山做好安排，并尽力帮助孙中山重新聚集革命力量，以期再举。在流亡日本期间，宋耀如已经体弱多病，但仍然积极协助孙中山工作。同时，又将在美国留学毕业的二女儿庆龄召至日本，使其与姐姐蔼龄一起作孙中山的助手。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在国内，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在日本，孙中山处境维艰——先是日本政府受到袁氏政权的压力而拒绝他登岸停留，以后权衡了各方利弊，对已抵达日本的孙中山及他的同志在“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②的前提下，同意他们暂时留居。更大的问题在于革命队伍的本身——原本因如何解决“宋案”而意见尖锐分歧的革命党人此时队伍更加涣散，部分人因气馁而离开了革命队伍。孙中山曾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困境：“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③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相互诟谮，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

①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② 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37页。本文所有引用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均由王振锁译、俞辛焯校。

③ 原载《国民党周刊》第1期（1923年11月25日）。

体，几乎一蹶不振。”^①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重新聚集力量，他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但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战友，甚至连一些长期与他并肩英勇奋斗的同志如黄兴等，也因不同意入党时要宣誓效忠党魁的形式而离去，孙中山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然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重新聚集革命队伍，重振旗鼓。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孙中山1913年8月9日抵神户后至15日，“除宋嘉树及其女儿和胡汉民访问外，未与其他中国人会见。”^②8月18日，孙中山移居东京后，即加紧着手武装反袁的“三次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他一面继续关注指导国内的反袁武装斗争，一面设法与“二次革命”失败后陆续走避日本的同志联系，并联络日本朝野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宋嘉树和他的长女宋蔼龄成了他联络同志的最重要助手。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静》的记载，住在神户的宋嘉树父女，几乎每天都从神户到东京去协助孙中山工作。除进行秘密联络外，还参与了再举的谋划。^③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先后与来访之宋嘉树及其女儿宋蔼龄、美和作次郎、萱野长知商谈。”；“与来访之头山满、萱野长知、菊池良一、岛田经一、寺尾亨、宋嘉树父女等议事。”^④之类的记载不少。

1913年8月29日，在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应父亲宋耀如之召抵达日本横滨。翌日，宋庆龄跟随父亲和姐姐拜访了孙中山，当晚，宋氏父女三人留居东京孙中山寓所。30日以后，宋氏父女回神户去与家人团聚。此时，在孤独中奋斗的孙中山太需要宋氏父女的帮助了。从9月5日至9日的五天中，孙中山连续给在神户的宋嘉树发去6封电报，又与宋蔼龄通了两次长途电话；10日，宋嘉树自神户赴东京孙中山处工作半天。当晚，回到神户的宋嘉树又致电报与孙中山，孙中山随即给宋蔼龄回电；自11日至15日，宋嘉树又几乎每天都自神户赴东京孙中山处工作，孙中山还多次与在神户的宋蔼龄互通电话。16日以后，宋嘉树携蔼龄、庆龄姐妹移居东京，以方便工作并免除每天在神户与东京之间的劳碌奔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第160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39页。

③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1—844页；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90—92页。

④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1页。

波。16日当天上午即一起访孙中山。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至当月28日，宋氏父女三人赴孙中山处工作十数次以上。每次短则二、三小时，长则半天甚至大半天。有时一天去两三次。^①这段时间正是孙中山紧锣密鼓地为筹组中华革命党策划发动“三次革命”，与陆续到达日本的同志如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柏文蔚、戴季陶等反复密商，并广为联络日本各界朋友争取支持的时候。他在日本密探的监视下，几乎每天都在住所频繁会见同志及日本朋友；有时也往访日本重要的朝野人士。宋氏父女此时也几乎每天进出于孙中山的住处。虽然日本外务省档案没有明确记载他们的具体所为，但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们是在为孙中山重组革命队伍而进行联络。他们工作量很大，不停奔波，任务繁重，除联络外有时也参与会见与密商。宋耀如同时还负担另一项重要任务：“他那时的任务是为党筹集革命经费。”^②

1913年9月27日，筹组中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吸收了第一批5名党员，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入党盟誓。是年10月，在东京和上海，又分别吸收了第二批党员，12月在东京、上海、大连等地，再吸收了一批新党员……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在扩大中，孙中山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看到新的希望，认为：“吾党虽然失败，然有此抵抗之事实，能使袁氏不敢公开称帝，虽败犹胜也。”他充满信心，“从新再做，合集此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党，以为再举之图。务期达到吾党人纯粹革命目的，即民权、民生主义是也”^③。在孙中山的策动与督导下，武装反袁斗争陆续在国内各地开展。

筹款、联络及文书工作是大量的。在组织反袁的“三次革命”中，孙中山已离不开宋氏父女的帮助了。1914年1月，宋庆龄陪伴母亲回上海治病。这时，宋蔼龄因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已不能全力承担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而宋耀如因肝肾病的加重也不堪工作的重负，不得已，宋耀如电召宋庆龄回东京协助并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自3月中旬返回东京后，宋庆龄几乎每天随姐姐赴孙中山处工作。6月份以后，宋庆龄单独赴孙中山处工作时间大大增多。8月，宋嘉树举家迁居横滨。9月，宋蔼龄结婚后，宋庆龄正式接替蔼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自此，住在横滨的宋庆龄“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地）工作，经常由我

^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9—852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95—97页。

^②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同。第128页。

父亲陪去”^①。宋庆龄的任务是“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复信工作”^②。当时，“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③。经费的募集是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而宋耀如那时所负责的，正如辛亥革命时期一样，“帮助孙中山为党筹集革命经费”^④，他所承担的，是为革命提供保障的重担。

1914年5月底，孙中山发出第一次《讨袁宣言》——《讨袁檄文》和《讨袁告示》，高举“二次革命”以来武装讨袁的旗帜，历数袁氏“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的倒行逆施，誓与全国民众一起“掣（犁——作者注）庭扫穴，共戮国贼”^⑤；“扫除专制凶顽，改革恶劣政治，恢复人命（民）主权”。6月，中华革命党进入组织建立的实质性阶段。15日下午，孙中山与陈其美等讨论成立党本部、干部选举以及召开党员大会等问题，宋嘉树父女也参加了讨论。^⑥7月8日下午，孙中山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并就任总理。由此，重新形成捍卫共和的队伍和阵线。

是年9月，由于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的报纸上发表了揭露袁世凯罪行的文章，美国政府应袁氏要求，禁止上述报纸在美国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的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调查事实真相。为答复美驻日大使的询问，孙中山撰文逐项条举袁氏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廖仲恺、宋嘉树、宋庆龄参加了文件的起草。据记载，9月24日“下午1时40分，孙中山给横滨市山手町59号的宋嘉树发一电文。2时35分，宋嘉树（携同宋庆龄）至孙中山处，参与起草条举袁世凯罪状的材料，5时离去。除他们三人外，廖仲恺也参加了起草”；^⑦9月26日“上午9时，宋嘉树与宋庆龄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起草材料，下午5时30分离去”；9月28日“上午9时18分，宋耀如（携宋庆龄）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和孙面谈，起草材料。宋耀如下午4时10分离去，5时20分再访。5

①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②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③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④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⑤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⑥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87页。

⑦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06-907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09页。

时30分二人离去。”^①又，当日“上午，波多野春房带着打字机来访，从孙处取英文稿，打印50余张。孙令廖仲恺校对原稿。”^②当晚，孙中山携陈其美、廖仲恺等前往美国驻日大使馆，但因大使和参赞不在而返，次日和10月1日、3日，孙中山再携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居正、谢持、田桐等几次赴美国大使馆，并得与大使及参赞面谈。^③

是年秋，孙中山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历数袁氏罪行，号召革命党人和民众武装讨袁，恢复真正的、民主的中华民国。从主要内容看，《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与条举袁世凯罪行的材料无异。而《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是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革命党文献《革命方略》的重要文件之一。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中华革命党的组建过程中，宋嘉树除担负筹款、联络等工作外，还参与了宣传和文件起草工作。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组织武装讨袁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宋耀如是坚定的支持者，参与者，是为捍卫祖国新生的共和制度忘我奋斗的战士。而那时候，他肝、肾的疾病已经非常严重，有时甚至不能下蹲或久坐了。

宋耀如不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争中，还引领两个女儿——蔼龄和庆龄参加了这一伟大事业。这是宋耀如对革命的忠诚使然，是他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虽然蔼龄于1914年9月结婚后离开了革命队伍，而庆龄却从此迈开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近70年革命生涯的坚实的第一步。从美国留学毕业归来的宋庆龄，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由父亲宋耀如亲自引领，来到孙中山的身旁。在革命的低潮中，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刻，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给他以坚定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和战友，进而成为孙中山终生不渝的伴侣。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为祖国真正的独立、民主、富强又奋斗了56年，并且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而引导她参加革命的，正是她的父亲宋耀如。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无论从世俗的伦理观念，还是从宗教的理念要求，对宋耀如的心灵都是重创。但他仍然深信孙中山领导的事业的正义性而给予大力支持。直至他1918年5月病逝。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积极地在国内外发展组织、宣传鼓动，并策划了多次武装

①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②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09—110页。

③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10页。

反袁，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了袁世凯政权，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袁护国浪潮的高涨。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再次举起武装讨袁旗帜，袁世凯帝制自为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中以闹剧收场。

作为辛亥革命继续的武装讨袁护国，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巩固了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再次普及。它在中国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共和转变，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宋耀如作为辛亥革命和捍卫共和的一名战士，奉献毕生精力。他的勋业和他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将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

宋庆龄与宋美龄

——历史上的几个时段

(一) 前言

宋美龄与宋庆龄姐妹情深。她们生长的环境、成长的经历大致相同，亦都曾经贵为“第一夫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影响。但她们在社会理念、政治立场、人生追求等方面完全歧异，导致她们姐妹感情逐渐疏离，以至于社会政治理念战胜了个人感情，最后分道扬镳。宋庆龄在晚年曾多次向友人倾诉十分想念妹妹美龄，甚至为接她回大陆团聚进行筹划。而宋美龄在她的晚年，甚至还用她的政治理念去压抑藏于心底的对二姐的感情。否则，她会对国家民族作出别人无法代替的贡献。

自从1927年1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由于政治上的深刻歧见，姐妹两人几乎形同陌路。然而在中国历史的一些转折关头，她们也曾再聚首，互相支持，协作奋斗。例如在1937—1945年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在民族危机空前的时候，她们都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暂时将巨大的分歧置于一边，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她们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对于促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直至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时期，是宋美龄和宋庆龄在政治上少有的最为接近的时候。

（二）姐妹双双出嫁后走向政治对立

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之前，她与二姐宋庆龄感情弥笃。家庭教育本使宋家的兄弟姐妹感情和谐亲密，1904年大姐蔼龄赴美留学后，庆龄成为美龄最亲密的玩伴、最知心和最依恋的姐姐。1907年，10岁的美龄跟随14岁的庆龄到美国留学。一年后，先后到大姐先期入读的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注册入学，三姐妹得以在美国团聚。1909年，蔼龄毕业返国，庆龄成为美龄在美国的实际监护人，直至1913年庆龄毕业回国。年龄的相近，较长时间的相依相伴，美龄视庆龄为最知心的姐姐。据说，在全家反对庆龄与孙中山结合时，美龄却是姐姐坚定的支持者。

然而，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她与二姐宋庆龄注定在政治上站在相敌对的立场。

宋庆龄1915年嫁给年长自己27岁的孙中山，是理性和激情的选择。结婚之初，宋庆龄的爱国情怀大于感情因素。她在写给美龄的信中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自己仅有的快乐，只有和孙博士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①多年以后，宋庆龄曾对友人这样介绍自己“委身革命”的情怀：“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②当然，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10年以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事业、理想以及他的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对孙中山的爱情与日俱增，日久弥坚。在她82岁时致友人廖梦醒的信中抒发自己对孙中山的感情与思念时说：“你懂得，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人生在世，总不免一死。……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③

^①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第179页；转引自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②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③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

宋庆龄是在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的。那时，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革命队伍发生了分裂和分化，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谮，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①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黄兴，也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而远走美国。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终因这个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孙中山以流亡者的身份，在日本惨淡经营，为捍卫共和策划新的斗争。宋庆龄在革命低潮中走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使之作出的充满激情而又理性的选择。

宋美龄与蒋介石于1927年12月在上海结婚。宋美龄选择蒋介石，也是理性的选择。刚与陈洁如结婚一年的蒋介石在1922年认识宋美龄后，就对她展开了“攻势”，而宋美龄对蒋介石经过长达五年的了解，虽然母亲和二姐坚决反对——宋母后来在蒋介石作了皈依基督教等一系列承诺后也同意了这桩婚事——仍然决心嫁给他。

宋庆龄反对这桩婚事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蒋介石已有妻妾，过去还曾流连于花街柳巷，生活极不检点；更主要的是，此时宋庆龄已认定蒋介石是背弃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叛徒。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时候，宋庆龄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公开决裂。所以宋美龄选择蒋介石，即公开选择了与宋庆龄相对立的政治立场。

孙中山逝世后，深受他信任的蒋介石很快就抛弃了他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标志的三民主义。至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镇压工人运动。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与武汉革命政府对峙，通过“清党”决议……首先举起反共大旗，国内各地封建军阀纷纷起而效尤。面对突然事变，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一起，声讨“蒋中正戮杀民众，背叛党国，罪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②又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等及共产党人毛泽东、吴玉章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60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0页。

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①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在和南京短期对峙后，于7月中旬在“分共”的旗帜下与南京政府合流。

蒋、汪既已毁弃了三大政策，却又要利用孙中山的旗帜，就不能不请宋庆龄给自己“正名”。最好的“使者”，就是宋美龄和她的哥哥宋子文——在蒋、汪“分共”前，他曾经一度与宋庆龄有过一致的政治立场和合作。7月上旬，宋美龄特地从上海到武汉，游说宋庆龄离开当时革命的中枢武汉，随她回上海并与南京政府合作，遭到拒绝。其时，宋子文也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动员庆龄返沪，信谓：“中正等望孙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沪……”^②宋庆龄以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强烈谴责蒋、汪的背叛作为回答。声明谓：“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断然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③8月1日，又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柳亚子等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蒋、汪所把持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④同月，并以访问社会主义苏联的行动，表示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向国内外表明自己对国共分裂后的国内形势的观点、立场与对策：

(1) 表明坚决继承、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立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⑤

(2) 简明阐发三民主义的要义：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② 《纪念宋庆龄同志》图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69。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7页。

④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第一，“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援。”^①

第二，“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他（孙中山——作者注）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②

第三，“孙中山的第三项政策是关于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这种联合是合理的，因为苏联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加之于中国。……他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③

(3) 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本质进行揭露和抨击，认为“国民政府的盛名，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昔日受革命委托而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他们自身也正在堕落，或即将堕落为新恺撒的臣仆了”^④。

其后，宋庆龄出访苏联，努力探索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途径和方法。关于国内形势和阶级分野，她的观念更明确：“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但宋庆龄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理由是：①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得到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任，他们将领导着群众沿着革命道路继续前行：“经过锻炼的群众领袖们今天全都站到国民党左派的行列中”，“这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承受孙中山留下来的革命的称号的党派……而群众是信任这些领导者的”；②“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却根据国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③工农大众已经用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新军阀的统治。

宋庆龄公开宣布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⑤

在蒋介石“清共”葬送了大革命后的混沌状态中，宋庆龄很快就分清了阵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5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线。宋庆龄力图把国民党左派重新组织起来，团聚于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以推进革命发展，而革命的对象，正是蒋介石所代表的一切反动势力。

宋美龄了然姐姐与蒋介石的敌对立场，也知道姐姐坚决反对她与蒋的婚姻，可是她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集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蒋虽在1927年8月策略性地暂时下野，婚后不久又重新上台），并且举办了隆重豪华的婚礼，这无疑在美龄向庆龄公开叫板，表示坚决支持蒋介石的政治立场。这确是对丧夫不久并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得不出走苏联的宋庆龄沉重的一击。

（三）抗日战争与“新生活运动”

婚后，宋美龄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我极度的热心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① 宋美龄用她的一生证明了她确是竭尽全力“与丈夫合作”。可惜，南京政权的内外政策及带来的后果验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并不是孙中山理想中的“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国家。这个政权对内是代表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所制定的对外政策也是以此为前提。

——南京政权自建立之日起，主要力量用以消灭共产党，剿灭工农革命运动以巩固独裁统治。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捕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不同政见者外，从1930—1934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江西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从第三次“围剿”起，蒋介石亲自担任“剿匪”总司令。就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大片国土沦丧的危急局面，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竟然电令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② 致使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东北四省全部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战，蒋介石却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议》。而第四次“围剿”正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进行的。从1932年6月开始，至1933年3月，“围剿”被红军粉碎，历时九个月，总共投入63万兵力。紧接着，同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了更大规

^①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② 《民国日报》1931年9月27日。

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以红军失败被迫退出根据地告终。

本着“与丈夫合作”和“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的原则，宋美龄在婚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虽然社会头衔和社会职务很多，但是她主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陪伴蒋介石进行“剿匪”，另一件是稍后着力推行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

对于蒋介石的“剿匪”，即剿共和剿灭工农红军，宋美龄作这样的解释：“过去五年来中国有若干省份，都遭到无穷的匪患。匪徒们公然破坏法律与秩序，使政府不能不用兵讨伐”。^①宋美龄在她的一些文章中多次追述她随同蒋介石“剿匪”时所遇到的险况。在写于1935年2月的《闽边巡礼》中，她描述随同蒋介石经过工农红军撤离后的闽浙赣三省边界进入福建时，沿途欣赏美景的极为愉悦的心情，完全无视被围困一年、历经无数惨烈战斗后的根据地的荒芜与凋零。并且自白：“我何以愿意和丈夫在前线共尝艰苦，他具军人的胆略，又有词客的温柔呢。”她在蒋介石过去的北伐、东征和后来的五次“围剿”中，体会到他的“胆略”，而且推崇备至。在福建被“围剿”后的地区，宋美龄也看到“许多村庄，都是杳无人影，很难看到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大半都像死寂了的世界，一眼望去，人和动物，什么都看不见，沉默像一张厚幕似的罩在断井颓垣之上”，“举目所见，一片空虚，一片荒凉”。她把原因归结为“匪徒的成绩”。^②

在“围剿”工农红军的同时，面对日本侵略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以“礼义廉耻”为核心内容的旨在“提高人民道德水平”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蒋介石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但宋美龄是这个运动的实际指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她负责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担任指导长。在“新生活运动”一周年的时候，宋美龄撰文纪念，谓“新生活运动的概念，是蒋委员长在剿匪期中所悉心考虑而成的……相信我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就以礼义廉耻四维为基础，创导新生活运动”，以四种道德为基础，“以此振刷道德精神”。具体的做法是“第一步先把那四种原则实施于衣食住行”，换句话说，就是“先实施于生活中最普遍最必需的事项”。^③举凡“养成有秩序的习惯，所有居室和环境都保持清洁，然后大家的思想，也就跟着纯洁了”；“现在清洁和整饬，如吐痰用

①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4页。

②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9页。

③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12、13页。

手中，出门扣好衣纽等等，大家严格奉行。”^①不一而足。

“新生活运动”虽在全国提倡，但当时主要是在“匪区”推行。“匪乱实是破坏法律、秩序、公正、忠信，以及一切人类美德与国家道义的无上利器。它降低了人民的人格，剥夺了他们的生活乐趣。委员长鉴于这种可悲的现象，决计发起新生活运动”。在第四次“围剿”的大本营南昌，“新生活运动就在江西省会南昌发起”^②。“我们在江西，每收复匪区，第一步先遣派名为别动队的青年军官团，到那饱经蹂躏的地域，帮助复兴工作……”^③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宣讲“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宋美龄认为：“剿匪和新运工作，两者都是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人类一切败德的开创工作。”^④宋美龄宣传推动“新生活运动”不遗余力，撰文，演讲，对媒体发表谈话至实际组织……而且这些活动几乎贯穿她到台湾前的政治生活。当然，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新生活运动”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比如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更多地与发动群众支持抗战，救助战争灾民，特别是救助伤兵和难民联系在一起，使“新生活运动”有了适应时代的内涵。而在运动的头几年，在被反复“围剿”的根据地推行，不由不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晋惠帝问饿得快要倒毙的灾民为何不食“肉糜”的故事。

在推行“新生活运动”之初，有识之士已洞察其背后的政治图谋，并加以揭露。宋美龄为此辩解说：“有人讥笑新生活运动是警察强迫人民扣上衣纽，或斤斤于吹求小节工作”；“有人批评新生活运动，以为全国人民衣食尚且不给，而高谈精神复兴，是无济于事的。……倘使人人的日常生活，能遵此四种原则（注：指礼义廉耻）绝没有衣食不足的道理”；有的“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运动为复古”。^⑤但无论如何辩解，在“新生活运动”提出之初即诟病不断。

在宋美龄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的时候，宋庆龄一方面对蒋介石的政策本质继续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努力进行争取国内民主和动员、组织民众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初，曾期望宋庆龄的支持，为自己披上孙中山的正统

①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23、25页

②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13页。

③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4页。

④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17页。

⑤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14、12、22页。

继承者的外衣，因而对宋庆龄采取拉拢怀柔的办法。不但他们自己，还请宋庆龄的母亲劝说宋庆龄离开苏联回国，但为宋庆龄拒绝。她和她的同志们认定蒋介石、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在宋庆龄看来，蒋介石已成为继续推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头号敌人，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可以调和的余地。宋庆龄在1927年12月17日从苏联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②。稍后，她再致电蒋介石，指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不仅现在称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凛然宣称：“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③宋庆龄的立场是如此坚定，即使在1929年5月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和南京政权划清界线，行前特别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为了在组织上终止蒋介石之流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的职权，改组或重建忠诚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等积极着手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使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人士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推进中国革命。

然而，1931年8月宋庆龄在回国奔母丧不久，即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她毅然留在国内，从事抗战救亡运动。主要是宣传号召动员全民抗战，组织领导群众性的抗日爱国团体，给抗击侵略的前线和军队以尽可能的后援等等。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宋庆龄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不顾安危亲自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又联合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建“国民伤兵医院”救助伤员。1933年3月8日，上海工人、学生、知识界、文化界、商界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30多个群众团体联合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自救会的宗旨是“争取中国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宋庆龄当选为自救会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的演说，号召全国抗日群众紧密团结，一致奋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1934年4月，宋庆龄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会

① 《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9页。

长名义，发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要求全国人民和全体武装总动员，一致对日作战。7月，又领衔发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宣言》，指出“中国人民除了抗日之外再无出路”。提议“设立一个中华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由工农商学兵等选出作为反日运动的中央机关，赋予解决一切抗日问题的权力”。1934年8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该会成立后多次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创办《武装自卫》、《抗日先锋》等刊物作抗战的宣传号召。1936年，参与领导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为抗日救亡，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政权进行斗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5年“华北事变”这近五年中，蒋介石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的手段，除了对红军和中央苏区反复军事“围剿”外，就是镇压一切群众性的抗日爱国运动和不同政见者。南京政权很大程度是靠军队、杀戮和特务统治来维持的。就在“九·一八事变”不久，国民党军队在南京武装镇压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行抗日爱国示威的学生，打死学生30余人，重伤100多人，是为“珍珠桥惨案”。同年11月，蒋介石指使特务逮捕并秘密杀害了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邓演达。1933年4月，蒋介石于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在南昌发表谈话中强调：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之处罚。^①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根据当时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国民完全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等的公民权利；当局动辄可以将人投入监狱，施以酷刑，以致秘密杀害。至30年代初，在三四年间，被杀害、监禁的革命者、爱国者及工农大众达数以百万计。如此反动的内外政策，致使“九·一八事变”继东北四省沦陷后，华北地区又逐渐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在“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这四年内，宋庆龄主要从事动员组织全民“攘外”，宋美龄主要是陪同蒋介石“安内”。

对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美龄为其辩护谓：“为了抵挡敌人的攻势，我们曾先竭尽一切力量，藉以争取时间来准备自己。”^②又谓：“先总统在

^①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②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338页。

对日战争直（之）前，最为人所不谅的，其一是为国家忍辱负重，在此起彼息安内之中及应付强敌行动中，勉强的争取了十年建设的时间；及十年整军在此嘎嘎乎其难予置辩的情况下，达成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痛苦的验证了总统攘外必先安内的苦心远见。”^①

国民党的堕落使宋庆龄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②从此，她把全部希望和信任寄托于处境十分艰危的中国共产党，公然表明自己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她说：“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③这是宋庆龄公开彻底地与蒋介石把持的、堕落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决裂，从信奉三民主义进而信奉共产主义的宣言。不久以后，她加入了共产国际。宋庆龄与宋美龄各自站在了公开敌对的两个阵营。

根据国内的形势，宋庆龄判定蒋介石政权是抗日救亡的最大阻力。因为“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更有甚者，“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中国军队的领导权都在反动军人的手里。”^④“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⑤。因此，她认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国内民主是抗日救亡的先决条件。此时，宋庆龄关于抗日救亡的指导思想是：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能取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只有实现国内民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以全部力量参加神圣的抗战。也就是在为民族争独立

①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18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的同时必须为人权争保障。她参与领导着群众性的抗日反蒋运动。1932年12月上旬，宋庆龄联络国内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部分知名人士，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力于：（1）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2）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3）协助为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诸民权努力实现之一切奋斗。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上的讲话》、《中国的自由和反战斗争》等文中，集中反映了她的抗战必须民主的观点。

对于面临空前民族危机而出笼的“新生活运动”，宋庆龄持批判的态度。她指出：“这个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① 宋庆龄以对儒教进行批判，来否定在大敌当前推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她指出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是服务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宋庆龄对“儒学”进行剖析，指出它是以“服从”为核心的，主张“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认定“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②。在政治上，孔子“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因而“孔子是保守的”，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严重的消极作用，“他与革命毫不相干”。^③ 对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中国，“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④，在判定了儒教的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宋庆龄实际上就批判了鼓吹尊孔崇儒的蒋介石政权的封建专制的性质，揭露了这个政权对内对外政策的反动性。而“新生活运动”却要求以“儒学”的封建道统和法统规范人民的言行。因而宋庆龄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儒学的复活”，并且引入“新生活”，这是十分明显的“堕落”，她断言“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⑤ 至于对孔子本人，宋庆龄则科学地肯定他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改良家，孔子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但“很有理性”的、“鄙视迷信”的孔子“只会活在我们的史书当中”。^⑥

由于政见的分歧，立场的敌对，婚后的宋美龄与宋庆龄疏于来往。即使在孙中山奉安大典、宋庆龄极为悲痛的时候，宋美龄也只是出席公开的纪念仪式而没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7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5页。

有陪伴和安慰姐姐。宋庆龄在奉安典礼后的当天即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几天后宋美龄专程从南京赴上海，邀请庆龄出席将要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被宋庆龄所拒，宋美龄于当天即返回南京。除1931年8月因母亲去世，宋庆龄与兄弟姐妹一起举丧外，几乎没有关于宋美龄与宋庆龄交往的记载，也没有看到来往的信件。1932年9月，宋美龄和蒋介石曾从武汉到上海看望过宋庆龄，劝其移居南京并到南京政府任职。姊妹相见，当然很亲热，但宋庆龄还是拒绝了宋美龄的邀请。据说，在那段时间，因为宋庆龄的反政府立场，国民党特务曾想暗杀她。但宋美龄几次警告特务机关，不得对庆龄“胡来”。可见此时政治分歧还是让位于亲情。

（四）以民族大义为重处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宋美龄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她是最大的“功臣”。这也是她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宋庆龄对“西安事变”，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个人恩怨，采取了与宋美龄一致的立场，并发挥了独特的影响，加速了事变和平解决的进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成全民族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也使政治上分道扬镳近十年的姊妹俩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重新走到一起。

宋美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仅考虑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也虑及内战的大规模爆发将使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得逞。所以当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逼蒋抗日的事变刚发生，宋美龄即表现出她政治家的胆识，“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留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她认为所面临的多方面的压力，主要的来自于四方面：（1）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他们极力主张进攻西安以扩大事态，最好是以战火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并谋求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妥协。（2）蒋介石。他是否能在软禁中被迫接受张、杨两将军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3）张、杨两将军。他们是否能接受调停。（4）中国共产党。该党会以什么立场主张对张、杨两将军施加影响。

在事变中能调停好各方面的立场，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人选当宋美龄莫属。

对于主张立即向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的意见，宋美龄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

事方面复于此时，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她“叠向京中诸要人剖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又向国民党“中央诸公……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①宋美龄与“讨伐派”的争论，有时甚至剑拔弩张。她表示“愿决死为和平奋斗”。当国民党的“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她又“力争展限三日”，赢得更多的调停时间。同时宋美龄力排众议，坚持亲自赴西安——当时甚至连蒋介石都反对宋美龄赴陕。事实证明，宋美龄此举极为正确和必要。宋美龄当面向蒋介石分析事变后的形势，转述张、杨两将军“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并“无伤害委员长之意”，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与张、杨两将军谈判。其时虽然中共中央应张、杨两将军邀请，派出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达西安，并于15、19日两次通电南京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两将军主张，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宋美龄终因中共“为委员长多年剿讨之寇讎”，纵使“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她也“不愿信此无稽之谈”，始终对中国共产党持怀疑敌对态度。不过她也深知没有中共的参与，事变也难和平解决。宋美龄毕竟也是政治家，她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代表中共和红军的周恩来，同张、杨两将军进行谈判，最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事变的和平解决，当然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要求有很大关系。然而，宋美龄在国民党内的引导、斗争和决策，她对蒋介石的影响，以及她与中共和张、杨的联络、谈判，对和平解决事变，是至关重要的推动力。

宋庆龄对于“西安事变”，也是持和平解决的态度，她认为这有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事变当天，宋子文、孔祥熙等即刻亲往宋庆龄寓所，请她出面与中共联系，务求保住蒋介石的生命。宋庆龄立即将情况通告中共有关负责人潘汉年。翌日，又将斯大林关于事变意见的电报转交中共。该电报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对

①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言论选集》，第30、31页。

②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2—573页。

中共的决策有直接的影响。宋庆龄并约请胡子婴等同赴西安，“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只是因为没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而未能成行。几天以后，宋庆龄对来访者发表声明：“中国目前处在战争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正在入侵我国的绥远。考虑到现在国家正处在危急时刻，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他已不能在另一场法西斯内战中损失她的工人、农民、战士、市民和元帅。”强调“内战必须停止！……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① 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对事变的立场，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应该指出，宋庆龄在进行“抗日反蒋”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她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逐步发展。她在“御侮会”筹备大会上的演说和领衔发表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表明她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已经形成，而且开始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在实际斗争中，宋庆龄参与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救亡团体，是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尝试、宣传和进行实际的组织工作。只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还不可能建立包括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妥协投降的蒋介石集团在内的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已。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宋庆龄从“逼蒋抗日”转而为“联蒋抗日”，力促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进而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她首先着力打开国共两党沟通的途径，及时转达国共两党谈判的意愿，协助安排双方的磋商，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她还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起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的建议，^② 恢复了已中断十年的与国民党的关系，出席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利用国民党的讲坛，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处理“西安事变”之时，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为对付共同的大敌，宋氏兄弟姊妹站到了一起。宋庆龄的立场和她为事变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使宋美龄倍感温暖和安慰。她当时力求亲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其是“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

^① 《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575页。

^②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页。

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但综前所引资料看，可以这样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问题上，宋庆龄是自觉进行的，而宋美龄是被迫进行的。

（五）抗战期间的携手协作

在全民抗战开始以后，宋庆龄和宋美龄各自在有关领域里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协作。

“七七”事变后不久，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宋美龄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为团结抗敌和支持宋美龄的工作，“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转入“妇慰会”，成为分会。1938年7月，全国妇女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宋美龄担任指导长，宋庆龄任委员以示支持。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先后邀请了一批中外著名人士作为“保盟”的发起人。宋子文应邀担任了会长，宋庆龄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同政见的各界人士，纷纷聚集在团结御侮的旗帜下，积极而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保盟”主要向海外募集资金和物资，进行战时的医疗救伤工作。救助战灾儿童，也是“保盟”的工作重点。

稍后，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成立。“工合”的宗旨是组织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它不但生产了战时急需的民用和军需品，而且使许多个人连带技术设备得以保存下来，并从日本占领区转移到抗日地区，从而为战时及战后培训了一批有技能的生产者。对“工合”的支持，在“保盟”的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939年1月，宋庆龄建议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以便更直接地得到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的资助，她亲自兼任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在香港，宋庆龄多次发起为“工合”募捐筹款的义卖和义演。1941年7月，她为“工合”发起了一次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为其募集赈济黄河水灾难胞的基金，她自己亲自担任这次运动的名誉主席。宋庆龄还在开幕式上义卖了她珍藏的孙中山遗墨和其他纪念品，带头捐助。“一碗饭运动”大获成功，捐助日期一再延长，所得全部赠予“工合”。

1940年2月宋美龄自重庆到香港治病，宋庆龄应邀与美龄一起住到沙逊路宋蔼龄寓所。这是自1927年以后三姊妹仅有的一次亲密团聚，日本的侵略战火暂

时烧掉了她们的政治分歧，她们仿佛回到了青春少女时代，亲情又从心底升起，家中充满亲密的话语声和笑声。在香港期间，为了显示团结御侮的决心，宋氏三姐妹共同出席“保盟”和其他爱国团体的救亡活动。长期分道后又重新携手，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3月，三姊妹又一同飞赴当时的“陪都”重庆宣传抗日。在重庆的一个多月，三姊妹一同视察防空设施、学校、孤儿院，参观“工合”下属的各工厂，到医院慰问伤兵，出席各救亡团体的活动和各种社交活动等等，显示国难当头共同奋斗的姿态。重庆各报连篇累牍报道三姊妹的活动。在公开的场合，宋美龄盛赞宋庆龄为抗日救亡所作的努力，谓“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也作了不少工作，最近她们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又对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救助中国的战难同胞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而宋庆龄一改过去对“新生活运动”的批判，因其融入救伤济难工作而给予肯定，并两次视察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庆龄结束重庆的访问返港后，对中外记者发表感想，认为“（1）人民对抗战信念极坚，内地生产建设与日俱进，散漫人力业已团结；（2）政治已见改善；（3）各方均深明抗战大义，情绪团结，敌伪造谣徒见其心劳日拙。”三姊妹的这些活动，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然而，毕竟由于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政治理念与人生追求迥异，各人的性格也不同，所以在合作中也常会有矛盾和摩擦。1942年4月30日，宋庆龄致友人函，谓：“很奇怪，信中所附的支票这次是蒋夫人交给我的，而不是中国银行。她告诉我，既然美国援华会呼吁捐款用的口号是‘为了中国的难童’，我就应把支票兑现后的五百美元交给她。我回答她说，我要和我的委员会商量一下，这可能是弄错了，因为我曾写信给美国援华会为培养儿童的学校筹款。……很明显，这是一个很久很久的宿怨。她一直反对我们‘干预’难童工作，那是她的领域！”^①另一封信讲到请求释放廖承志的事：“我恳求释放的理由是廖夫人（指何香凝）的健康。至于说到廖搞了什么活动，他当时正在来重庆的路上，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工作。但蒋夫人只回答说她一无所知，并说要把此事报告蒋大元帅。”^②

显然，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抗战取得胜利的保证。“七七

① 《宋庆龄书信选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② 《宋庆龄书信选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页。

事变”后，蒋介石虽被迫抗战，但并没有放弃反共，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更是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与日本进行谋求妥协的秘密谈判，并希望日本军队帮助他消灭共产党。从抗战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对日“和谈”一直没有停止过。宋美龄于1939年3月，还被派到香港指导对日秘密谈判。关于对日关系，宋美龄坚持假如要签订和约，则必须写上“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至于签订“防共协议”，宋美龄和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①在日本诱降与军事打击面前，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则强化法西斯和特务统治，打击共产党和爱国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向抗日根据地挑衅，制造摩擦乃至袭击……因此，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始终存在妥协、分裂、倒退和抗战、团结、进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宋庆龄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的路线。1939年11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进攻陕甘宁和晋东南等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开动宣传机器宣扬“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代和将来的一切要求”等等，以经过篡改的三民主义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制造理论根据。针对这股逆流，宋庆龄坚决进行反击，她在1939年11月发表了《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指出那些盗用孙中山名义的国民党员们“没有认识民主的真谛，更没有认识民生主义”，他们“不配算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这些人在“遇到了真正为国家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随时有思想发生动摇的危险，甚至变成卖国的汉奸”。^②这是宋庆龄对掀起反共高潮的蒋介石集团的揭露与严重警告。当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联名致函蒋介石，声讨他背信弃义袭击新四军的罪行，指出“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又与何香凝等公开通电：“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③庆龄还通过《新闻通讯》，向国外详细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动员国际舆论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在共产党和新四军坚决抗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袭击，以斗争求团结的时候，宋庆龄团结了一支爱国者的队伍，一支在国内国际上

^① 《蒋介石日记》等。转引自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26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323页。

主持正义的队伍，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相配合，击退反共分裂的逆流，使团结抗战得以坚持进行下去。当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宋庆龄在重庆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要求：“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于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予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这是她对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和个人独裁的蒋介石的最好反击。在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活动和斗争实践，作出独特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0日，日军侵占香港。在日军到达前几小时，宋庆龄在宋美龄的帮助下，搭乘从香港至重庆的最后一班飞机撤离。

1942年8月，撤退到重庆的宋庆龄正式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宗旨和工作内容一仍如旧。三姊妹在工作和生活上也互有联系。蒋介石的一些礼节性的外交活动也会请宋庆龄出席，比如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招待史迪威将军等。宋庆龄也会应邀并把这作为自己工作的机会。

宋美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夫人，她有国民党、政府和总统做后盾，她可以出访欧美任何国家；她可以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为祖国争取更多的外援；她可以随时到国外看病休养，进行带有官方色彩的“民间”访问……抗战期间，宋美龄在对外宣传、争取外援和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面，确实建树了功勋。而撤退到重庆的宋庆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与宋美龄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从几封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可见一斑：1942年6月，“保盟”需要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宋庆龄不得不为准备一些小点心而操心。为此，她致函友人王安娜，谓：“你不用为明天的事去买蛋糕和小饼干了，因为孙科夫人已送来一些。那些已订的将另有用处”；^①“……孙科送给我的两个西瓜吃完了，苹果也吃完了。如有机会，请多送些苹果给我……”——1942年7月30日；^②“饼干和苹果的包裹昨天晚上收到了，非常高兴。我还听说孙科先生今天将给我送些西瓜来，因此我想待客的东西全解决了。……我将选一天大清早孔博士（孔祥熙）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坐他的车进城。……我有个朋友每个星期六都来，所以有时可以叫她带肉来。这样，当你过来的时候就不必带牛排来了。”——1942年8月；1943

①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②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年4月，宋庆龄曾到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黄山别墅”小住，她在致友人的信中谓：“……随着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黄山别墅，我与你们的联系就很困难了。……因为在这里看不到报纸，也不能正常地与朋友联络，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宋庆龄尽力于战时救伤济难工作，每年通过“保盟”向前线和敌后根据地送去大量的医药和军需物资。宋庆龄在支持抗战，在建立和巩固国内、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同样建立了功勋。

（六）尽管天各一方，亲情并未泯灭

抗战胜利后内战重开，宋美龄和宋庆龄各自坚持自己的选择，复又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但亲情并没有泯灭。现在看到的宋美龄给宋庆龄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49年5月19日，是与宋子良一起署名的。谓“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希望你能平安顺利。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你……”从宋蔼龄给宋庆龄的复信中，亦知庆龄也是尽可能地想法与兄弟姊妹们取得联系的。蔼龄的信中说：“又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高兴。……在我手术后，恢复了视力，我将尽快回来看你。尽管我不是经常给你写信，但我心里时刻都在牵挂着你，并且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在一起。……”^②

——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也许宋氏三姐妹还会重聚，为国家作出另外的贡献呢！

（本文为参加2009年在香港举行的《宋美龄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所写，2011年8月修改于北京）

①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② 《宋庆龄来往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421页。

附录一：

宋庆龄研究回顾与展望

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女儿——“国之瑰宝”宋庆龄的研究，是在她逝世后才展开的。至今已走过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回望这30年，感到十分欣慰——从起步到现在，宋庆龄研究者们筚路蓝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事业从空白到有了长足的发展，硕果累累。但距缕清宋庆龄曲折、坎坷、丰富多彩而瑰丽的一生，还原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宋庆龄研究以丰富、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把宋庆龄研究从“纪念史学”提高到学术层面等方面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待于热爱宋庆龄的人们和史学工作者继续共同努力。

到2010年，宋庆龄逝世已经29周年。大致说来，宋庆龄研究在这近30年期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是宋庆龄研究的起步阶段与始创阶段。

宋庆龄逝世前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她一生的业绩和高贵品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崇高的荣誉。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当年的10月是辛亥革命70周年。当时，中共中央为了缅怀和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位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贡献的伟大的女性，决定由廖承志副委员长主持，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办宋庆龄生平展览，故居同时对国内外人士开放，供大家瞻仰。第一个介绍宋庆龄生

平事迹的展览在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一周年时，于北京宋庆龄故居由邓颖超大姐和廖公主持开幕，首次以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向国内外较为系统地介绍宋庆龄的生平及她的伟大业绩和思想。同时出版了《纪念宋庆龄同志》——国内外第一本以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介绍宋庆龄一生的图传。廖公亲自审查了图传的书稿并题写了书名。进行这两项工作时，文物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对宋庆龄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最初的梳理和介绍。

宋庆龄研究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宋庆龄一生为人谦逊低调，她自己没有留下回忆录。有关自己的点滴情况，仅见于她写于1922年6月的《广州脱险》（约2800字左右）和《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约2000字左右）。前者曾以相同的内容稍异的文字，以《自传》为题目收入1938年在香港华光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自传》一书；后者载于《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还有一些资料分别散见于她给友人的信件，或她的友人和同事的著作、回忆录中。由于宋庆龄的革命道路曲折特殊，许多经历不为人所知，或当时不能为人所知，此前也没有人研究宋庆龄，没有人较为系统地了解她。廖公当即指示从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中组织力量进行宋庆龄研究。事实上，对宋庆龄历史的梳理和研究，就是在廖公的直接指导下、组织下开展的。

当时研究宋庆龄可根据的资料有：

一是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的追悼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致的悼词。邓小平在悼词中总结并肯定了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这不仅是对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历史地位的认定，而且指出了她思想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主义出发，毕生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与时俱进，成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或许有人认为这会成为宋庆龄研究的“框框”，使探寻宋庆龄的思想发展历程有了“主观”的前提引导。此种看法其实是不够客观的，应该说关键是这个归纳是否符合实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并面临被世界列强瓜分的旧中国，宋庆龄作为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她必然会从爱国而走上救国的道路，从爱国主义者发展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宋庆龄的家庭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关系，使这种转变变得更为必然；也正因为从爱国和立志救国出发，她必然会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奋力进击，顺乎世界潮流，不断地自我超越，她的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宋庆龄的思想和实践，反映了她代表的那一代爱国者们的探索、追求和思想发展规律，并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缩影。

二是宋庆龄自己编辑和审定的她的两部文集——《为新中国奋斗》和《宋庆龄选集》。《为新中国奋斗》195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宋庆龄1927年至1952年7月撰写的文章、演说稿63篇，根据不同的革命阶段分为五部分内容：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为争取民权自由的斗争、为争取国内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坚持团结与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解放和人民政府。据此，可以理解为宋庆龄将自己从孙中山逝世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段历史大体分为五个阶段。另一册是196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选集》。该《选集》是在《为新中国奋斗》的基础上增订的，共收入了宋庆龄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的文章、声明、演说稿等144篇，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少数文章由于种种原因，经宋庆龄同意，由编辑出版者作了个别删改。

在宋庆龄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有近70年的革命生涯。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她所处的特殊地位和险恶环境，使她常常不得不以笔为武器，发表声明、宣言和文章，以指导革命和引导潮流。宋庆龄这两本著作，是研究她的思想和实践的最真实、最重要、最基础的历史文献。正如她在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为新中国奋斗》的《序言》中所说：“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革命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因此，关于它的事迹写得越多，从它的经验中所能获得的好处也越多。陈毅将军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劝我说，如果我能把我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所发表的演说、文章和声明编印出来，我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著作反映了历年以来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最后冲破一切，取得胜利。”收入文集的这些文章、演说等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极为重要的文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

三是宋庆龄逝世后，很多曾与宋庆龄共过事的前辈、被她营救过的革命者、在宋庆龄的关怀下成长的一批同志……他们怀着对宋庆龄非常深厚的感情，陆续发表了许多回忆文章，这些回忆录成为我们研究宋庆龄的重要资料来源。

应该说，宋庆龄研究初始，是由中共中央推动，由廖承志副委员长亲自组织、指导进行的。参加资料收集、考订、整理并进行研究的，除少数文物、史学工作者外，更多的是对宋庆龄充满感情的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及各界人士。

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宋庆龄研究从几乎空白着手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办的宋庆龄生平展览及宋庆龄图传问世，第一次形象地向人民群众介绍了宋庆龄光辉的一生，为后来人们撰写长篇传记提供了翔实的、可以作为根据的资料。之后陆续出版了一批介绍宋庆龄生平的

著作，如蒋洪斌的《宋庆龄》、《宋庆龄的足迹》；吕明灼、刘家泉、陈漱渝、尚明轩和唐宝林等分别所著的《宋庆龄传》等。由尚明轩、陈民、刘家泉、赵楚云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也于1986年出版。这一段时间所出版的宋庆龄传记，尽管由于受史料限制，考订不尽精当，因而有些结论不够准确，但是总的来说，宋庆龄一生做了什么，特别是她在新中国建立前做了什么，大的脉络是清楚的。他们为宋庆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是宋庆龄研究的先行者。

对宋庆龄一生进行阶段性研究也同时开展，收获颇丰，如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季鸿生、郑灿辉、吴景平著的《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1986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杨耀健著的《宋氏姐妹在重庆》，1987年中国建设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宋庆龄故居、上海中山故居及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合编的《宋庆龄在上海》图册，以及稍后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刘家泉著的《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宋庆龄在香港》等。

集此阶段成果之大成者，是1992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受宋庆龄委托，由宋庆龄多年的同事和挚友爱泼斯坦先生所著、翻译家沈苏儒所译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该书以史料丰富翔实——许多历史事件作者曾亲历或参与，立论客观科学，文字精练朴实，成为研究宋庆龄的必读书。

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搞清宋庆龄这位伟大的女性一生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什么贡献，成绩斐然。

另一方面的重要收获是资料收集、整理的逐步深入和系统化。为便于研究，各有关方面对宋庆龄的文章、演说、函电等分类出版。如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关于中国福利会的论述专集《永远和党在一起》，1984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1988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题词选》（收录宋庆龄题词墨迹103幅），199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最有分量的是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上下卷）。新版两卷本的《选集》辑录了宋庆龄在1912年至1981年间的文章、讲演、文电、书信等358篇。较之于1966年版，修订版收文篇幅增加了214篇，几乎收入了她一生的主要论著；旧版中因政治原因删改过的地方尽量恢复了原貌，是迄今收录宋庆龄著作最完备的一部选集。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同志们为《选集》的修订出版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

从1981年开始，国外有关宋庆龄及“宋氏家族”的一些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内，其中有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家族》、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氏王朝》等。英国的张戎、乔恩·哈利戴所著的《孙逸仙夫人》也由中国和平出版社翻译出版介绍到国内。这些作品所提供的资料，对宋庆龄研究均有不同的参考价值。

此阶段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出版了一批论著和资料选辑，其中研究性专著，包括年谱、传记、资料集（如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由吴景平教授翻译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纪念集等共40余种；文章、回忆录以及相关资料有740多篇。1992年12月，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图书馆高级馆员苏爱荣编的《宋庆龄研究文献目录》。《目录》共收入了1911年至1991年，用中文正式发表或出版的宋庆龄著作篇目和对其生平事业、思想研究的专著、报刊论文以及史学论文集中的有关篇目，并酌收了部分研究机构内部出版物中有关篇目共2300条。这部目录对宋庆龄研究发展状况及其成果作了总结与回顾，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

随着研究的开展，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广州、北京、重庆等城市——在孙中山宋庆龄活动的主要地区，有关宋庆龄的纪念馆、纪念地陆续建立起来，研究的队伍也逐渐地组织起来了。宋庆龄基金会设立了宋庆龄研究室推动资料收集与研究、宣传工作；上海孙宋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宋庆龄陵园管理处，从建立的时候开始，也建立了宋庆龄研究室。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单位的历任领导对研究工作都十分重视，从开创至今，一直给予关怀和支持。上海宋庆龄故居、上海孙中山故居、中国福利会……所有这些跟宋庆龄有密切关系的单位，他们都把开展宋庆龄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工作之一，体现了他们对宋庆龄的深厚感情。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第一个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在1991年成立。他们组织资料收集整理，开展关于宋庆龄的研讨，整合研究队伍并加强与各高校和各研究机构的联系，大大加强了研究的学术力量。

1993年1月，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宋庆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国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论文，会后论文集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以宋庆龄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尚属首次。这次研讨既是为缅怀宋庆龄的伟大业绩、崇高品格；同时也是对10年以来宋庆龄研究进行总结，以推动今后研究更好地开展。因此此次研讨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的意义。

在宋庆龄逝世后的前10年，对她的研究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严格说来，还算不上对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然而，这也为以后研究打基础的十年，是很关键的十年。

(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宋庆龄诞辰110周年，大约也是10年左右的时间，可算是宋庆龄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基本解决了宋庆龄一生主要“做了什么”，第二阶段则主要解决她“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

第二阶段研究是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还是继续扎实地做基础工作，也就是资料的收集、发掘、整理，并且结集出版，提供研究者使用。在这第二个阶段中，这方面的成果也是很丰硕的。宋庆龄自己的著述如《宋庆龄书信集》（上、下册）、《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相继编辑出版。《宋庆龄书信集》收入宋庆龄自1913年至1981年近70年间致同学、同事、友人等的书信900余封、近100万字。内容更多地涉及她各时期的工作（通过信件布置工作或与同事讨论问题，是宋庆龄的习惯工作方法）和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看法及表态。2004年《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的出版有着特殊的价值——以往结集出版宋庆龄书信的时候，可能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多一些，而《续编》收入的全部是私人信件，这些私人信件很多是宋庆龄由于各种原因，要求收信者“阅后销毁”，而她的友人舍不得将信销毁，在经历了许多劫难后得以保存下来的——有些人因保存了一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灭顶之灾。这些私人信件中有很多私密的东西，包括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保密，也有因个人原因而保密的。信件除披露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外，还可让我们更加多角度地了解宋庆龄。如她处理问题的立场、原则、技巧和方法，以及她的文化修养、她的兴趣爱好、她对亲属的挂念和交往、她的人际关系等等各方面，使得我们对宋庆龄的了解更具体。宋庆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有独特地位的伟大女性，但她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对我们多方面了解和研究宋庆龄是很有帮助的。

其间，还有相关的重要历史资料如《中国福利会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等陆续出版，还有大量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各方面的资料相继问世，为宋庆龄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基础条件。上海宋庆龄故居编辑的《宋庆龄来往书信集》不仅收集了宋庆龄致友人的信，还有别人给宋庆龄的来信，由

此，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比较清楚了。这种编辑方法是很值得称道的。

在宋庆龄研究的第二阶段，对宋庆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继续深化研究“宋庆龄一生主要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探究“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探究宋庆龄思想发展的历程。第二，是探究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即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把就事论事提升到历史研究的理论层面。

在此阶段，广泛开展了对宋庆龄的专题研究。如：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宋庆龄；宋庆龄与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少年儿童教育、与救济事业、与世界和平事业……这些个案研究，不仅丰富和深化了对宋庆龄毕生实践的研究，而且探索了她与时俱进的思想发展历程：从爱国主义出发，最后走向共产主义。大量的阶段性个案研究，使研究更细致，结论更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也更科学，反映了宋庆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但限于资料和研究力量的不足，使得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要在目前还原历史原貌还相当困难。

此阶段，对宋庆龄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研究者们对于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贡献达成共识——在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10年，她是孙中山忠诚的学生、助手、战友和伴侣；在孙中山逝世后，她是孙中山思想与事业坚定的继承者、捍卫者，她不断地发掘、拓展孙中山思想事业的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与时俱进，永远活在祖国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宋庆龄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

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图传，则完全用历史文物照片、文献资料，无可疑义地阐释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互为影响的关系。

早在举办宋庆龄生平展览的时候，廖公就多次指出：“宋庆龄是一位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伟大女性。”他也曾多次指示，希望以北京宋庆龄故居为依托，成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中心。廖公这样的一个建议，事实上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研究孙中山和研究宋庆龄是不可分割的。

在评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重大的、不可代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必须充分确认她与孙中山的关系的意义。1991年5月26日，在宋庆龄逝世1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以一整版刊载盛永华撰写的《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1993年1月，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盛永华在《海南日报》发表题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其间，盛永华还发表一系列论述宋

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及“三大政策”的继承与发展的论文，集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她以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的身份，支持、继承、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她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熄的生命力。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国内不同的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社团，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一支中国革命与建设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率领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她的人格的魅力，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会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历史的舞台，仍在鼓舞人们前进，宋庆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宋庆龄无愧为炽烈的爱国者的楷模，她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感使她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反顾地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作为孙中山忠实的、亲密的助手、学生、战友和伴侣，她的奋进成为连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宋庆龄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了孙中山的事业。她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赋予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以新的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这种连接和贯通，能够使过去革命斗争的传统、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革命所吸收，并使更高层次的革命斗争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在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许多仁人志士从孙中山的旗帜下出发，走进了新的革命行列，跨入了新的革命时期。”这些论文于1993年结集成《宋庆龄论》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她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10年，她是用她的一生去捍卫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曾经在多个场合多次讲道：新中国成立了，使得孙中山的理想结出了美丽的花朵和丰硕果实。这个果实“比想象当中还要美丽”。但是，到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筹备纪念活动之时，宋庆龄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要建立一个

全国性的孙中山资料整理和研究机构。她认为这是一份历史的遗产，对研究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有帮助的。她希望有一个常设的机构，整理和系统地出版孙中山的著作，同时“应该搞一些电影等影视节目，以教育后人”。为什么写这样的一封信？在短短的5至6年时间里，宋庆龄可能发现了什么问题，宋庆龄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孙中山仍然存在，他的思想仍然有生命力。20世纪50年代，宋庆龄相继写了很多篇文章，介绍孙中山与列宁的联系，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联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她仍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在演说中她总结了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很多精神遗产——孙中山对革命的不息的热忱、他对人民的亲近的感情、他不断地前进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对于孙中山思想和革命原则的守护，宋庆龄是第一人。孙中山逝世后的56年里，她是孙中山思想事业忠诚的守护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孙中山被诬为“牛鬼蛇神”，“四人帮”同时向宋庆龄射出暗箭，对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说三道四。宋庆龄一生当中从没有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坚决捍卫自己与孙中山的婚姻的合法性。她在给友人的许多信件中，着重谈自己50年前与孙中山结合的情况，痛斥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是“有罪”的，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深情。这不仅仅是维护一桩婚姻，这是在维护孙中山的旗帜。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事业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成为宋庆龄研究者非常关注和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家确认研究孙中山，尤其是他的最后十年，不可不研究宋庆龄；研究宋庆龄，更是不可不研究孙中山。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加入了宋庆龄研究的行列，大大推动和深化了宋庆龄研究。

在整个90年代以至宋庆龄诞辰110周年的10多年时间，宋庆龄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宋庆龄的研究者们，特别是上海的有关部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为了抢救“活的”历史资料，他们动员力量访问了不少当时还健在的宋庆龄的同事、友人和亲属，这些“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对宋庆龄研究的深化大有助焉。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宋庆龄陵园等等单位，他们在扎扎实实做好博物馆本身职能要求的工作的同时，对研究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不同的时期，他们陆陆续续召开了不同专题的研讨会，提出了不少研究的新课题；并且把论文结集出版。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

此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有关专题论著、学术

研讨论文集、图传、纪念集等逾 70 种，发表在各种报纸杂志的学术论文超过六七百篇。

(三)

21 世纪的到来，迎来了宋庆龄研究的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国内外大量的档案资料逐步解密，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时空。而宋庆龄作为中国近现代先进人物的一员，她与近现代中国重大的、足以改变历史发展航向的事件关系又是如此之深切，对她的研究也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庆龄研究已不仅仅是解决她“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的问题，而是把她的所做所想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去，考察她如何站在先驱者的行列中，引导潮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并从中寻找出一些规律。由此，宋庆龄研究从“纪念史学”走向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新世纪开始，宋庆龄研究呈现了很好的势头。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等相继公布，为宋庆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资料；近年来，海峡两岸与香港等地多次举办了关于宋美龄、宋子文、宋耀如及“宋氏家族”的学术研讨，为宋庆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角度，推动着宋庆龄研究的拓展。2008 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由海南省宋庆龄研究会、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编，周泉根著的《一九九二年以来宋庆龄研究文献长编》，集中反映了近年宋庆龄研究的喜人成果。更为可喜的是，经过 30 年的努力，各研究机构和学者们认识到必须携手合作，才能有力地推动宋庆龄研究向前发展。今年 4 月，在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目前国内仅有的两个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和海南宋庆龄研究会，与目前国内唯一的宋耀如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然而，宋庆龄研究的开展毕竟只有大约 30 年，所取得的成果与宋庆龄对国家民族的贡献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如宋庆龄和国共两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国共双方都离不开宋庆龄。当蒋介石需要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时候，他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让她把希望谈判的意愿传达给共产党；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时也要通过宋庆龄传达给国内外。中共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通过宋庆龄联络 1000 多

位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名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名义发表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宋子文他们通过宋庆龄向共产党请求不要杀蒋介石；而共产党方面，也及时把自己的意见通告宋庆龄。宋庆龄的斡旋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当时国共两党的沟通，都是以宋庆龄为桥梁，她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她的作用是多么的独特。但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不甚了然。又如史料表明宋庆龄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为共产国际工作，但她和共产国际是怎样的关系呢？也不甚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她起了什么作用？对于中共的重大决策，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对外政策以至“文化大革命”，她有什么看法、想法和建言？她向人大、政协提过什么提案？什么提案被接纳了，什么意见没有被接受等等。可以说，对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些问题的研究，与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互为补充和促进。许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等待资料的进一步解密。又，现在还有许多宋庆龄的函电分别收藏于各个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和个人手中未能公之于世。即使是搜集材料这方面，空间也是非常广宽的，更遑论在大量收集、发掘、整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总之，宋庆龄研究现在是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前景美好，大有可为。

但在宋庆龄研究中，也存在学风浮躁；急于求成，资料封锁，东抄西拼和水平重复的弊端，这是应该引起注意和纠正的。

在宋庆龄研究方面，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着全国其他省市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上海是宋庆龄出生、成长的故乡，是她和孙中山并肩战斗的根据地之一，是她为新中国奋斗的主要战场，也是她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工作的地方。因此，上海留下了很多有关宋庆龄的遗迹、丰富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留下了由她开创的许多事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上海已经打造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对宋庆龄充满感情的文物工作者和历史科学工作者相结合的队伍。他们在宋庆龄研究这片园地里默默地耕耘，扎扎实实地推动着宋庆龄研究向深入发展。应该说，关于宋庆龄研究的总体水平，上海是站在全国的前列的，他们已取得成果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有理由期待宋庆龄研究不久将有更丰硕的科研成果。

（原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附录二：

宋庆龄生平大事简表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诞生

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在上海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及革命党人的极富有的家庭。教名露瑟萝，学名罗莎蒙德（Rosamonde），曾用名庆琳、林泰、苏茜等。祖籍海南岛文昌县。

父亲宋嘉树（1861—1918），名教准，字嘉树，号耀如。原姓韩，因过继给宋姓堂舅而易姓宋。少年时随亲戚赴美国，在其于波士顿开设的丝茶商行当学徒。后因向往在广阔的世界中探索和意欲求学而离开商店，先在一艘税收巡船上当侍童，后得到许多善良的美国朋友帮助，先后进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和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0年11月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1886年在神学院毕业后返上海，作为美以美教会的神职人员巡回布道。由于感到教会内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引起内心的反感。1892年前后认识孙中山，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所担任的教职为革命提供掩护。后辞去教职转而从事实业，创办美华印书馆、担任阜丰面粉厂经理等，为革命筹集了不少经费。孙中山称其“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①。

母亲倪珪贞（1869—1931），浙江省余姚县人，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之后。虔诚的基督教徒，少年时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曾在教会学校任教，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毕生热心教会及公益事务。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2页。

姐宋蔼龄（1889—1973），1909年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为我国早期少数女留学生之一。1912—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4年与孔祥熙结婚。民国时期，孔祥熙长期担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等要职。1948年举家移居美国。

大弟宋子文（1894—1971），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在纽约国际银行任职。1917年返国，任汉冶萍煤铁公司秘书。1923年以后，曾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和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47年9月起担任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1949年1月辞职赴美国定居。

妹宋美龄（1897—2003），1907年随二姐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等。

二弟宋子良（1899—1987），1921年毕业于美国凡顿贝特大学。以后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内从事金融、经济和实业方面的工作。

小弟宋子安（1906—1969），1928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以后主要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九岁

入上海美国教会所办中西女塾（马克蒂耶女子学校 Mc - tyeise School for Girls）读书。该校主要招收中国富家女孩，基本按照美国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采用英语进行教学。在校勤于学习，爱思考，曾参加戏剧演出，显示了艺术天赋。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十四岁

夏 偕妹美龄离上海赴美国留学。

秋 入新泽西州萨密特镇私立学校补习外语，准备投考大学。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十五岁

夏 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文学系学习。曾担任该院院刊的文学编辑和学校文学社团通讯秘书。在学校以好学深思、温雅雄辩而深得同学敬重。

在校期间，经常接读父亲来信及剪报资料，进行研究思考，“考虑她的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系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① 并对同学表示，“如果忘记了祖国，人生就失去其意义。”^②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十八岁

在院刊《威斯里安》发表题为《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的政论文。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在政治、教育、社会改革等方面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认为：“他们帮助中国吸鸦片的人建立戒烟会，这些人希望永远戒除自己的恶习。在城市，他们组织了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人们社交集会的活动场所。中国青年不再像过去那样习惯于认为变形的脚是漂亮的，或者要求女人裹脚。现在他们拒绝同缠足的女子结婚，他们甚至解除童年时代包办的婚约。这在中国是一件严重的事。”文章认为中国政治的腐败主要由于官吏选拔制度的不当而引起，希望通过对官吏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并且认为“中国赋予这些留学生广阔的工作领域和无限的机会”，^③ 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高度的义务感。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十九岁

年初 在学校里扯下清朝的龙旗，挂上父亲寄来的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欢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

4月 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对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重大意义。指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滑铁卢战役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革命。”这是由“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推翻满清政府就是铲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了

①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全译本），澳门星光书店1985年版，第115页。

②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纽约1939年版，第116页。

③ 《威斯里安》院刊1911年11月号。中译文刊于《儿童时代》第10期，1982年5月16日出版。

“包括了社会、教育和工业”等等方面的改革，并“坚信中国人能够有效地、明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完善和繁荣”。认为辛亥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而“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因为“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文章歌颂了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满怀真诚地期望“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他方面起作用”。中国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的伟大国家，它将以“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出来。它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①表达了因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对国家的期望与信心和对人类崇高的义务感。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癸丑）二十岁

4月 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论文《现代中国妇女》和散文《阿妈》。《现代中国妇女》一文表达了要求妇女解放的观点，认为“女孩的智力不比男孩差”，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②。《阿妈》一文，抒发了对自己家里的一位老保姆的怀念，表达了博爱的高尚情感。^③

该年夏天，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当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年刊》刊载其毕业照片，照片下面说明：“她的眼睛和前额都焕发着内在的光辉”。^④在后来追忆这段留学生生活时作如下评价：“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

① 《威斯里安》院刊1912年4月号。中译文刊于《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② 《威斯里安》院刊1913年4月号。

③ 《威斯里安》院刊1913年4月号。

④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年刊》1913年（Weslyan Year Book. 1913）。

国，是非常珍贵的。”^①

8月 离美归国。到日本探望随同孙中山流亡的父母，29日到达横滨。途中致函老师哈扎特（Hazzard）夫人，叙述旅途生活，并表达了“国内的局势变得严重了起来，我们也许得在日本逗留一段时间”^②的忧虑。

9月16日 携带美洲的爱国华侨赠送孙中山的礼物和信件，至日本东京看望孙中山。此后十天内，随父亲或与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大姐一起，共访问孙中山八次，^③增进了对孙中山的事业和中国的情况的了解。

是年 随父亲及大姐协助孙中山工作，处理英文电函。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甲寅）二十一岁

是年 继续随父亲及大姐协助孙中山工作，偶尔离开东京时，与孙中山有信往还。

6月22日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因大姐积极筹备与孔祥熙的婚事，更多地替其承担协助孙中山的工作。

9月 大姐结婚。经孙中山同意，接替大姐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深得孙中山信任，委以保存文件，处理函电，保管通讯密码和革命经费以及对外联络等重任，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与孙中山配合日益默契。致函在美国读书的妹妹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④认为“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⑤。给孙中山工作以极大帮助，感情以极大抚慰。共同的理想与事业，成为两人相爱的基础。

11月 离日本返上海探视因病先期返国的父母。向孙中山表明心曲：“经过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

^① 宋庆龄：《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对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载于《宋庆龄自传》，光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38页。

^② 《宋庆龄1913年8月24日致哈扎特夫人》，《宋庆龄书信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政务局第一课，第294-295号。缩微胶卷MT103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

^④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51页。

^⑤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57页。

这样委身于革命。^①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乙卯）二十二岁

3月27日 由上海返抵日本。

6月中旬 由东京返上海。后就与孙中山结合的问题征询父母意见，遭到全家反对。写信给在美国的妹妹和大弟，表示：“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②

10月 排除亲友重重阻挠，毅然离沪赴日，于24日抵达东京，孙中山亲自到车站迎接。

10月25日 由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主持并在其家中举行与孙中山结婚仪式。此前，孙中山已与原配夫人卢慕贞办好了协议离婚手续。婚后，继续担任秘书工作。在给同学的信中说：“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语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③多年以后，向好友埃德加·斯诺谈及这段婚姻时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④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丙辰）二十三岁

4月9日 与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在东京集会庆祝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

4月27日 孙中山由日本启程回国，5月初到达上海。

5月19日 由日本返上海，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斗争。

8月 随孙中山赴浙江、绍兴等地参观游览。

①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58—159页。

② 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英文版，第179页。

③ 项美丽：《宋氏姐妹》，第97—98页。

④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4页。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丁巳）二十四岁

4月2日 致函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夫人，谴责北洋军阀将中国拖入帝国主义战争：“有很多自私的野心家正竭力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这样做，对我们来说即使无所失，也将一无所得。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为了些微小利得一点钱，不少人竟甘愿牺牲他们国家的命运。”又说：“我的丈夫为中国的独立，几乎贡献了他的全部青春，他敏锐地感到有些官吏的卑劣行径，他们是金钱和个人的地位胜于真理、忠诚和自尊。”^①

7月6日 孙中山离沪返穗，进行“护法”运动，17日抵达广州。

9月10日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戊午）二十五岁

5月3日 父亲宋嘉树在上海病故。前后一直在上海侍奉父病并陪伴母亲。

6月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离穗于26日抵上海，居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

8月 同孙中山迁居华侨集资购赠的莫利哀路二十九号住宅。辅佐孙中山著书立说，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后来追忆这段生活时说：“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欢的事，是铺开巨幅的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科、埃利斯、危普顿·辛克莱等写的书。”^②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 己未）二十六岁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

7月 代孙中山起草致广东军政府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谴责桂系军阀的倒行逆施“不惟为粤人之所公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③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 庚申）二十七岁

11月 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离沪返穗，重组“护法”军政府。

① 《宋庆龄致梅屋庄吉》，载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三号。

② 张珏：《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载《红旗飘飘》第27集，第1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页。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 辛酉）二十八岁

夏 为支持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与何香凝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自任会长，并带领慰劳队亲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战士。

12月 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为支持北伐，率领红十字会员抵桂林。

同月 在桂林，孙中山同共产党人张太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会谈。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壬戌）二十九岁

5月 孙中山赴广州韶关督师北伐，率红十字会会员多人从行。中旬，电广东红十字会，要求从速再派会员赴韶。

6月1日 随同孙中山返回广州。

6月16日 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再三婉求孙中山先生撤离，自己留在总统府内吸引敌人注意，掩护孙中山撤离险境。当日下午脱险。

6月18日 在黄埔港登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一小时后离去。

6月28—29日 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粤变纪实》一文，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详述脱险经过。

8月下旬 和孙中山在广东省坚持反叛斗争月余后返抵上海。23日，陪同孙中山在寓所会见共产党人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以后与孙中山多次在寓所同李大钊、林伯渠等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①

同月下旬 陪同孙中山会见苏联全权大使越飞的代表，商谈“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

是年 多次参与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商谈，担负大量与苏俄函电往还的起草及翻译，为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制定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癸亥）三十岁

1月 陪同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晤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

年初 陪同孙中山接见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黄日葵、王昆仑等。

2月 滇桂联军驱逐陈炯明后，随孙中山离沪返穗，重建大元帅府。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页。

5月 陪同孙中山在广州、英德等地劳军。

10月11日 陪同孙中山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

10月21—23日 陪同孙中山视察虎门要塞各炮台。

12月21日 陪同孙中山到广州岭南大学演说并与学生合影。孙中山勉励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是年 继续与孙中山共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参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见和商谈，并负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函电联系。促成孙中山思想巨大飞跃，决心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甲子）三十一岁

1月 国共合作问题正在激烈的辩论中。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①。多年以后，追忆此时国民党内激烈斗争的情形时说：“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国民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和他站在一起，拥护他的勇敢的行动和他的开明的思想的人中有廖仲恺和朱执信。”^②

是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为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

2月 孙中山出席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的中国国民党追悼列宁大会。

6月16日 随同孙中山出席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5—466页。

礼。

8月 陪同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

夏秋间 热情接待苏联友人，并向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介绍中国妇女运动，以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0月 直系将领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囚禁“大总统”曹锟，通电邀请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

11月13日 随同孙中山乘永丰舰离广州，后经上海取道日本入北京。

11月28日 途经日本。应神户县立高等女校的邀请，就妇女解放问题发表演说，她引用“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的名言，指出“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商业的福利运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①

12月4日 抵达天津。孙中山肝病发作。

12月31日 由天津抵北京。孙中山在北京车站发表书面谈话：“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②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乙丑）三十二岁

1月 孙中山病重，确诊为肝癌。在病榻前日夜侍候。

是月31日 在协和医院接待前来慰问孙中山的段祺瑞等。

2月9日 何香凝从广州到达北京探视孙中山并陪伴宋庆龄，会见于协和医院。

2月18日 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

3月11日 在极度悲痛中接受孙中山遗嘱。

同月12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孙中山逝世。

4月10日 孙中山丧事毕后由北京抵南京，翌日抵上海。此后，致力于阐发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事业。

6月初 在上海就“五卅惨案”对《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打

^① 《孙逸仙夫人激励神户女学生的讲话》，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1924年12月4日，中译文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第288—28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2页。

倒帝国主义”为“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对内推翻满清帝制，对外反抗一切强权与侵略，皆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号召“唤起全国人民之民族精神，为长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而“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认为此次斗争“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因为中国历届政府“皆不可靠”，而“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惟有人民团结自救”，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①

6月30日 由上海抵北京赴天安门参加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表示因身体不适，不能发表演说，但因系群众运动，不能不参加。^②

是月 在上海多次出席支持“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群众集会，并联络于右任、徐谦等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为罢工工人募捐。

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以孙中山为争取两广关余而向帝国主义斗争的无畏精神，鼓舞正在罢工的省港工人。

8月 在上海惊闻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深为悲痛愤慨。致电何香凝表示哀悼，并号召：“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以因此挫折。”^③

11月 以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党员李大钊”等议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裂革命阵线。通电谴责，指出：“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④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丙寅）三十三岁

1月3日 带病离沪赴穗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日晚抵广州。

是月 在国民党“二大”上发表演说，坚持、捍卫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谴责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国民党右派，号召革命派“团结坚固，不要接受人家的挑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后由何香凝代理）。

同月20日 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希望“诸姊妹们，齐领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② 《晨报》1925年7月1日。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页。

④ 《星洲日报》1981年5月30日。

导妇女们向国民党革命战线上走”^①。

同月25日 接见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等。前后，为省港罢工工人募集了十余万巨款。

11月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与国民党先遣人员陈友仁及鲍罗廷等先期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

12月 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领袖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党政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经常出席民众集会，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 丁卯）三十四岁

2月12日 在武汉开办的妇女政治训练班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演说，指出“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妇女解放运动“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行为。”“妇女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②

3月9日 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强调妇女培训班的目的是给妇女“授以政治知识，使有解决政治问题之能力，努力于中国妇女之解放”，并“使其姊妹均有世界眼光”。^③

3月10—17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会上，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密切配合，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统一革命势力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一系列决议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3月20日 与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新选任委员一起宣誓就职。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统一战线破裂。

4月22日 与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1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17页。

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号召革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①

上半年 发起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救济伤兵工作。

7月14日 在汪精卫分共清党的前夕，洞察其背叛革命的阴谋，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厉斥责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他们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认为工农“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没有工农的支持，“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采取削弱工农的政策，“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揭露蒋介石之流实行的是“疏远并且压迫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指出他们“注定要失败”。号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武器，特别要依据民生主义，进行“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革命”。严正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在国民党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前，“只有暂时引退”，坚决与国民党右派决裂。^②

8月1日 与毛泽东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汪集团背叛革命，号召人民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同月2日 被推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

同月22日 为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间断地探索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从上海秘密出发访问列宁的故乡苏联。行前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强调要使中国“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孙中山“铸造”的“合适的革命工具”，是“改组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2页。

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第一项政策是“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第二项政策是“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第三项政策是“关于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苏联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加之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孙中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痛斥蒋、汪集团控制的“国民政府”已经“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而国民党也“即将堕落为新愷撒的臣仆了”。申明“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①

9月6日 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中国革命也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共识。申述访苏的目的，一是“站在被压迫民族一分子的立场上”向革命的苏联致谢；二是要使全世界明了蒋介石、汪精卫集团“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三是实现孙中山访苏的遗愿。^②在此前后，连续发表了《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年青一代〉》、《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妇女与革命》、《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声明与论文，表示对三大政策的忠诚不渝。在《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中，重申：“广大的被压迫群众是中国真正革命分子的主力，他们是中国战胜外国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希望。”^③

11月1日 和邓演达、陈友仁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汪集团窃取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旗号，“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表示决心与新、旧军阀斗争到底。

12月18日 电斥蒋介石与苏联绝交为“自杀”行为。指出历史将以他们为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3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页。

“误党误国之罪人”。^①

同月 23 日 再次电斥蒋介石。

是月 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旋返回莫斯科。

1929 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己巳）三十六岁

5 月 离苏联返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重申“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表示了对反人民的南京政权的不妥协态度。

8 月 10 日 发表《痛斥戴季陶》的谈话记录稿。痛斥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们一方面将孙中山作为“偶像”，同时却篡改了三民主义，连孙中山的遗嘱都“出卖”了，“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意义”。蔑视反动派不准再发表宣言的恐吓，声明“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

1930 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庚午）三十七岁

旅居欧洲。进行社会调查并潜心研究理论，还与邓演达等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

1931 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三十八岁

7 月 23 日 母亲倪珪贞病逝于青岛。

是月 从德国经苏联回国奔丧，于 8 月 13 日下午到达上海。

8 月 邓演达被捕。为营救而多次奔走于南京与上海间。

12 月 19 日 发表《宋庆龄之宣言》，揭露和控诉蒋介石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降妥协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动政策。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41 页。

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百般拷打，以至于死”；“五年以来，内战和政治阴谋循环不已。由于背弃了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向锦州推进的时候，“所有的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遇、阿谀和保护”。从国民党政府反动的内、外政策上完全可以看出它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对于已经堕落为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的国民党，她认为“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坚决与其决裂，并坚定地相信：“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公然申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诚拥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念。

是年 为营救在上海被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成员牛兰夫妇而奔走。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三十九岁

1月 “一·二八”事变后，和何香凝等到真茹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设有三百个床位的“国民伤病医院”，亲任理事。

12月17日 和蔡元培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名义，为营救在北平因要求抗日救亡而被捕的许德珩、侯外庐等爱国师生，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无罪开释“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同月，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胡愈之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长。规定同盟的任务为：“（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制度……首要的工作是释放大量的无名囚犯。（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人民的主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立即废止。（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①

同月 共产党人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在上海租界被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

^① 《申报》1939年3月19日。

反动当局。多次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讨论营救事宜。

4月1日 为营救被捕共产党人，发表《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

同月2日 与蔡元培联名致电汪精卫，要求释放罗登贤等。

5月13日 为谴责德国希特勒政府在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同日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

同月24日 发表《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一文，指出：“帝国主义绝不能征服和瓜分中国，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自由、统一、革命的新中国。”

6月 杨铨于18日遭国民党特务暗害。为杨铨被害发表声明，抗议蒋介石杀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并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恫吓参加杨铨的成殓仪式。

8月 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委会主席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

9月30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发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在中国，“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斗争的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只有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① 这次大会正式成立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被推选为主席。

12月30日 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四十一岁

4月20日 与何香凝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即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90页。

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

秋 以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名义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四十二岁

8月 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等联名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四十三岁

春 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5—6月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被选为执行委员。

6月5日 写信促鲁迅就医，提出“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

10月22日 在上海万国公墓参加追悼鲁迅大会，并发表演说。

11月26日 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名义发表声明，抗议蒋介石蹂躏民权的罪恶行径。

12月 “西安事变”发生。主张释放蒋介石，争取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四十四岁

2月 同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在全会大会上发表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

4月 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指出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揭露蒋介石政权以鼓吹尊孔复古来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实质，主张以改善人民生活的运动来代替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6月下旬 为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同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进步人士。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严正指出：“我们都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

7月5日 亲率救国会领导成员十六人，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监狱探视“七君子”，并向法院要求羁押同服“爱国罪”。

同月31日 “七君子”获释出狱。

同月 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的主张。

8月 从上海移居香港。

同月 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则“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

10月3日 致函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要求英国支持中国的抗战。

11月 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赞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指出：“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今天“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四十五岁

3月7日 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控诉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呼吁共同来战胜全人类的敌人。

6月14日 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积极向海外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主要运送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并且介绍一些国际友人援华医疗队到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7月5日 发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

9月 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四十六岁

1月 “工业合作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任该会名誉主席。

3月8日 在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

11月11日 发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追述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和孙中山从事革命的目标，进而阐述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意义。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四十七岁

3月31日 与大姐宋蔼龄、小妹美龄一起，从香港飞抵重庆，显示并宣传

团结御侮。

4月 三姐妹经常一同视察伤兵医院、孤儿院及战灾区，显示团结抗日，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

5月9日 自重庆返抵香港。

是年 在香港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 辛巳）四十八岁

1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严厉斥责破坏团结抗战的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10月 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

11月28日 为纪念邓演达被国民党杀害十周年，发表《纪念邓演达》一文。

12月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在香港沦陷前，乘飞机离港抵渝，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四十九岁

7月 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总结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历史，指出中国妇女只有投身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在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中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8月 “保卫中国同盟”各中央委员陆续从沦陷的香港撤退到重庆，重新大力开展战时救灾工作。

冬 在重庆寓所举行茶餐会，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一起欢送董必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五十岁

3月 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以争取胜利的主张。

5月 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协会主席的名义，举办国际足球赈灾义赛，并将义赛所得全部捐赠河南灾民。

9月18日 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的公开信》，指出：“保卫中国同盟完全致力于救济工作……但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

济。”呼吁大家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五十一岁

2月8日 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指出：“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中国的民主也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呼吁美国工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斗争。

3月12日 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广播演说。

是年 送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一台X光机。这是根据地的唯一的一台X光机。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五十二岁

9月 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住所同到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会见。

12月 离重庆回到上海。“保卫中国同盟”易名“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从事社会救济事业。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巨大的物资援助。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五十三岁

7月23日 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认为内部的灾难威胁全国，“解决的办法虽困难，却是明显的，那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认为“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①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五十四岁

9月16日 发表声明，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的“竞选”。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9—180页。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五十五岁

1月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

同月 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号召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表示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念，并勉励青年“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和人民一同前进”。

年初 拨一批奶粉交《新少年报》社，托转送给全国贫苦的少年儿童。

是年 募集大量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各种物资通过各个渠道运至解放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斗争。

冬 迁居到淮海中路1843号住宅（即今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9年（己丑）五十六岁

7月1日 在上海发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作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同月7日 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

9月 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2月11日 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

同月 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950年（庚寅）五十七岁

4月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报告》，全面总结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日 为国际儿童节在《解放日报》题词：“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

8月 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在妇幼保健和少年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11月23日 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

理事。

是年 创办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儿童时代》。

1951年（辛卯）五十八岁

6月1日 给《解放日报》题词：“保卫和平！保卫儿童！”

同月 为文集《为新中国奋斗》作“序言”。

9月18日 在北京接受1950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旋将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作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之用”。

11月26日 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1952年（壬辰）五十九岁

年初 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以增进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友谊和了解。亲自指导和帮助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3月21日 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5月3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儿童——世界之宝》一文，称“儿童是人类的至宝”。

9月 文集《为新中国奋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 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 率领中国代表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同月下旬 访问苏联

1953年（癸巳）六十岁

1月13日 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3月9日 发表《悼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一文。

4月25日 被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致全体儿童保育工作者和全体儿童工作的同志们》一文。

1954年（甲午）六十一岁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什么是幸福》一文。

9月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2月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乙未）六十二岁

1月 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一封信》。

8月20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2月 应邀访问印度。廖承志、陈翰笙等随行。

1956年（丙申）六十三岁

1—2月 率领廖承志等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接受巴基斯坦达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6月1日 在《中苏友好报》发表《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为苏联〈少年先锋队真理报〉作》一文。

8月 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9月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致词说：“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1月 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和《回忆孙中山》两文。

1957年（丁酉）六十四岁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把教养儿童的责任担负起来》一文。

9月 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1月 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苏联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

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

1958年（戊戌）六十五岁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谈几句话》一文。

同月14日 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福利会从创立的那天起，就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将来也是这样。”

1959年（己亥）六十六岁

4月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孩子们祝贺“六一”》一文。

1960年（庚子）六十七岁

4月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6月1日 在《中国妇女》第十一期发表《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一文。

1961年（辛丑）六十八岁

5月11日 在上海寓所会见来访的毛泽东。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孩子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一文。

9月 任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2年（壬寅）六十九岁

1月17日 在上海接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6月1日 出席北京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联欢会。

11月12日 发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指出：“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

1963年（癸卯）七十岁

4月 从上海到北京，居住在后海北沿四十六号住宅（即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6月 为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中国建设》第六期上发表《缔造未来》一文。指出“儿童工作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因为未来是属于新一代”。

1964年（甲辰）七十一岁

2月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身份，同周恩来、陈毅一起访问锡兰。

5月30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儿童读物更好地为培养革命后代服务》一文。

12月21日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1965年（乙巳）七十二岁

1月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5月 为《北京周报》作《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一文，勉励儿童向雷锋学习，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6月1日 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孩子们欢度儿童节。

10月 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6年（丙午）七十三岁

11月12日 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讲。

同月 《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接刘少奇子女求救的来信，立即将信转给毛泽东。

1968年（戊申）七十五岁

8月31日 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路易·艾黎出示证明，指出“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

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的避难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和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①

1972年（壬子）七十九岁

1月10日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15日 接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和子女来电，得悉斯诺在瑞士逝世。

同月16日 电唁斯诺夫人，称：“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像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将永葆长青。”^②

9月5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何香凝的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5年（乙卯）八十二岁

1月13日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76年（丙辰）八十三岁

1月 担任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委员。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7月 担任朱德治丧委员会委员。参加朱德的追悼会。

9月 担任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委员。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

1977年（丁巳）八十四岁

4月 作《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满怀深情地写道：“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

^① 原件影印。《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317。

^② 《人民日报》1972年2月17日。

我们学习的榜样。”^①

9月9日 参加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及毛泽东纪念堂落成仪式。

1978年（戊午）八十五岁

2月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6月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一文。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情操”。

6月14日 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作《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

9月17日 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表示决心同大家一道进行新长征。继续当选为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2月 撰写《追念毛泽东》一文，称毛泽东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②

1979年（己未）八十六岁

6月 作《孩子们，好啊！——祝一九七九“六一”国际儿童节》一文。

同月 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问团、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

10月12日 在北京寓所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同月 和邓小平一起接见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

1980年（庚申）八十七岁

1月1日 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元旦茶会。

3月5日 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大会并致词。

3月8日 参加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七十周年大会，并致祝词。

5月17日 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同月30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少年儿童创作更多好的作品》一文。

10月7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决定于一九八一年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① 《中国建设》1977年第四期。

^② 原件影印。《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19。

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1981年（辛酉）八十八岁

5月2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一文。指出“历史赋予人类以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一代一代地把希望的火炬传下去，以不息的奋斗去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我们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好。”满怀深情地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深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关心这年轻的一代，不断地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用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去培养和教育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的火炬接下去，传下去”。

5月8日 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讲话。

同月14日 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发去贺信，表示：“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①

同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同月1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同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所作《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一文。

同月29日 因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晚八时十八分在北京寓所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为其举行国葬。

6月4日 在上海万国公墓为其举行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

^① 宋庆龄：《我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载《中国妇女》1981年第6期。

主要征引参考书目

1.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2. 《宋庆龄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3. 《宋庆龄书信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4.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5. 《宋庆龄来往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6. 《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7.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8.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9.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10.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1981—1986 年版。
11.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2. 《纪念宋庆龄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3.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4.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15.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16. 盛永华：《宋庆龄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7. 盛永华等主编：《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8. 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9. 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 年版。

20. 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21. 刘家泉：《宋庆龄流亡海外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
22. 刘家泉：《宋庆龄在香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23.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2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
25.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
26.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27. 廖承志：《我的回忆》，载《人民日报》1982 年 5 月 29 日。
28. 《纪念宋庆龄同志》，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29.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30. 盛永华：《宋庆龄与毛泽东》，载《光明日报》1994 年 5 月 30 日。
31.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全译本），澳门星光书店 1985 年版。
32. 埃美丽·哈恩：《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
33. 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
34. 《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
35.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36. 俞辛焯、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37. 《档案与史学》，1997 年第 1 期。
38. 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
39. 《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
40. 《广州民国日报》。
41. 上海《民国日报》。
42. 《申报》。
43. 汉口《民国日报》。
44. 《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45.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后 记

2013年1月27日，是被誉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120周年诞辰纪念日，仅以本书献给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女儿，以表达我们对她深深的崇敬和怀念。

1993年1月，在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习作——宋庆龄研究论文集《宋庆龄论》。当时，宋庆龄的研究刚刚起步，资料少之又少。宋庆龄一生谦逊低调，没有留下回忆录，有关自己的点滴资料，仅只有她写于1922年6月的《广州脱险》。此文曾以相同的内容、稍异的文字，以《自传》作为题目收入1938年在香港华光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自传》一书；还有其后写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于《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其他一些零散资料分别见于她给友人的信件中。最重要的资料，当然是宋庆龄自己编辑和审定的文集——195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新中国奋斗》和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为新中国奋斗》收入宋庆龄自1927年至1952年7月撰写的文章、声明、演讲稿等63篇；《宋庆龄选集》是在《为新中国奋斗》的基础上所增订。共收入了宋庆龄自第一次国内革命以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撰写的文章等145篇。

在宋庆龄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有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她的活动与近百年国内国际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她对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她的革命道路曲折特殊，经历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她所处的特殊地位和险恶环境，她的经历和作为不为人所知或当时不能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虽然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她的大量的实践和思想同样不为人们所晓。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仅凭上述的资料，很难对其一生做出客观

科学的介绍和评价。所以，在宋庆龄研究起步阶段结集的《宋庆龄论》，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难免有片面、不够严谨、不够科学的地方。在《宋庆龄论》的《后记》中，我当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之所以不揣浅陋，敢于把这部结集公之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之前，主要是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为推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宋庆龄研究而抛出一块引玉之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禁区逐个解禁；国内外大量的档案资料逐步解密并相继引进，使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得以还原或更加接近其本来面目，从而为中国近现代史和近代人物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充分的条件。如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等相继公布，为宋庆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资料；近年，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学者多次举办了关于宋美龄、宋子文及“宋氏家族”的学术研讨活动，为宋庆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角度，推动着宋庆龄研究的拓展。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国际共运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入和取得的新成果，使得将宋庆龄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去，考察她如何站在先驱者的行列中，引导潮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考察她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可能。更为珍贵的是大量宋庆龄致友人同事的信函陆续得以披露，与她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不断得到整理和刊布，大大丰富了研究宋庆龄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史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 20 多年的努力，宋庆龄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些，有助于我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心得进行再思考，并运用新发现的材料分析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使结论更接近客观，更严谨和科学。

本书虽然未能收入作者对宋庆龄研究的全部论文，但就现有内容看，所论已涉及宋庆龄一生思想和实践的多个方面。然而主要且着重论述的，是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论述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学生、助手、战友和伴侣，她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支持、继承、捍卫和发展，从而体现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曾经收入《宋庆龄论》的部分论文，在这次结集时进行了修改。对于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及蒋介石等的关系；宋庆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思考和选择；她对民主建政的设想等方面，作者的一些新思考、新观点反映其中。

本书在论述的过程中，较多地引用了宋庆龄著述的原文，目的在于更准确地表述宋庆龄的思想。

感谢金冲及、张磊、林家有等诸位教授，他们不仅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更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者，是在我近 30 年的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学习和研究中，始

终得到他们的指教和鼓励。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王俊辉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书的出版还得到出版社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

对于本书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期望得到师友同仁和所有关心宋庆龄研究的朋友们的批评指正。我想，不断的交流切磋，将会使宋庆龄研究继续深入拓展。是盼！

盛永华

2012年9月于北京

宋庆龄研究丛稿

盛永华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广州 ·